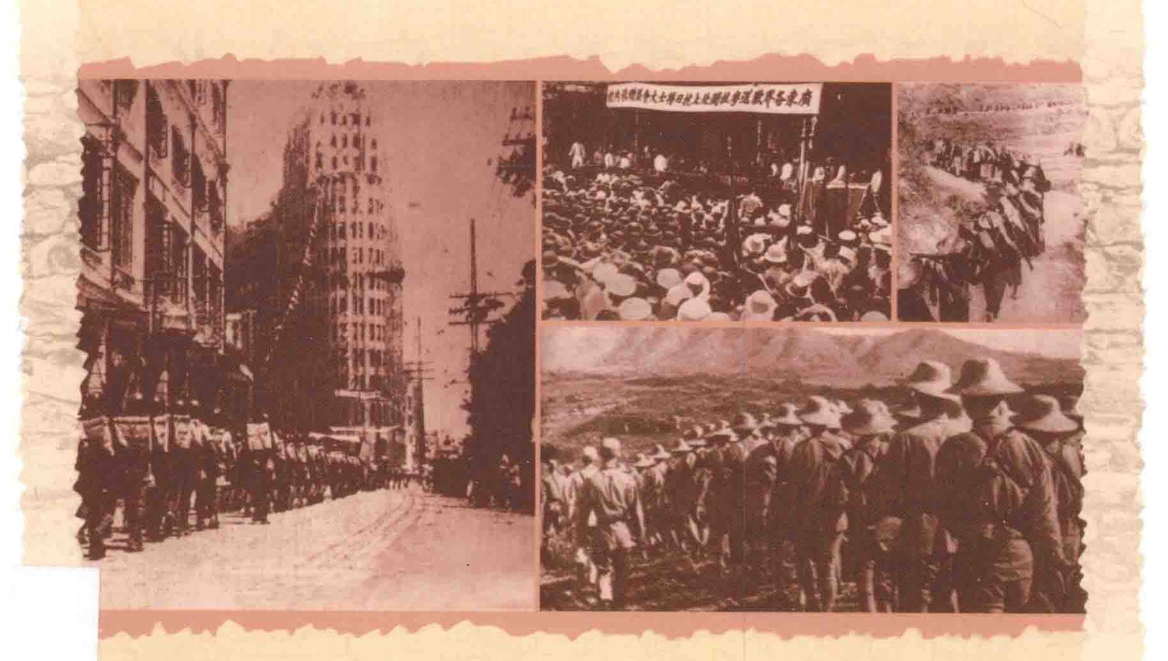
HUANAN KANGZHANSHI

华南抗战史

左双文◇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HUANAN KANGZHANSHI

华南抗战史

左双文◇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南抗战史/左双文著．—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361－5356－1

Ⅰ．①华…　Ⅱ．①左…　Ⅲ．①抗日斗争－历史－华南地区　Ⅳ．①K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7500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510500　电话：87557232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90毫米×1240毫米　16开本　19.5印张　347千字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4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实行全面抵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在华南，日军虽尚未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轰炸与袭扰时有发生，战争的阴云已实实在在笼罩着广东。从这时起到1938年10月，日军正式发动侵粤战争，此时全国已进入战时，但广东处于尚未直接卷入战火的特殊时期。在此阶段，广东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全国抗战，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高潮。中共党组织也恢复了在广州的活动，建立了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抗战初期，国民党广东当局出现了较为开明的气象，改变了过去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阻挠和限制的做法，也进行了一些抗战准备，但仍是很不扎实和充分的。

第一节　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日本在华北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从这时起，到1938年10月日军正式发动侵粤战争，1年零3个月的时间，此时全国已进入战时，但广东处于尚未直接卷入战火的特殊时期。在此阶段，广东人民一方面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全国抗战，另一方面为在华南地区迎战日寇做准备，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高潮。这时，广东的政治形势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各界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和中共政治影响的增强。

1936年初“荔枝湾惨案”后，广州地区的群众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转入低潮。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广州，广州民众一度被压制的抗日怒潮重新勃发，他们纷纷发表通电，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成立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募捐、义演、抵制日货等活动。他们普遍要求当局进一步开放民众运动，打破“党禁”，一致对外，允许人民组织起来，实行抗战。

与此同时，中共在广东的政治影响也逐渐增强。各界民众拥护共产党



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省、港的《大众日报》《珠江日报》《广州日报》公开转载中共文件，报道陕北消息，一些学校甚至公开悬挂毛泽东、朱德的相片。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逐渐恢复，中共在广州建立的秘密组织如学联筹备会、救亡先锋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小组和受中共影响的半公开文化团体如救亡歌咏团、艺术工作者协会、锋社、蓝白剧社以及各种读书会、研究会等，在卢沟桥事变后日益活跃起来。中共注意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我们一开始便未有对立的团体独立的运动，多以合法地进行工作和尊重他们领导，避免磨擦，他们也就比较的放心前进。"②

第二，派系复杂的国民党广东当局出现了"开明"的倾向。

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派系主要有：地方实力派、掌握军权的余汉谋，中央派粤、任广州市长的曾养甫，广东省长、政学系的吴铁城以及孙科太子派的钟天心。这些政治势力因各自不同的利益和主张，存在矛盾和分歧。但抗战爆发后，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他们有感于大势所趋，民心不可违，对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政策。这既是为了应付形势，敷衍民情；也为了巩固自身利益，凭借民气，扩大势力；当然也有感于民族危亡而真心主张抗日之举。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广州地区救亡运动的开展。

广东政治形势的上述特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东的建立和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广州在抗战初期成了中国"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和仅次于汉口的国统区救亡运动中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前方将士，积极从事抗敌后援工作。

抗战爆发后，广州民众最早做出积极反应的是广州八和粤剧协会，该协会率先于 1937 年 7 月 12 日在海珠戏院义演筹款劳军，以全部票房收入尽汇前方，慰劳第 29 军将士。7 月 20 日，广州医药界联合组织战时救护大队奔赴华北前线，担任救护工作。而其他救亡团体也纷纷组织救护队、慰劳队、战时服务团、难民服务队等进行抗日救亡服务工作。如"广东妇女团体联席会议"成立的"广东妇女团体联合战时服务团"，总计有团员 300 多人，分别组成救护队、慰劳队、勤务队和各种妇女辅导队等，为前方将士征募棉衣、到医院慰劳伤残战士、为救济难胞和受灾儿童义演募捐等。③

---

①② 张文彬：《广东工作综合报告》（1938 年），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怀念张文彬》，208～209 页、206 页，1998。

③ 侯霭云：《抗战期中广东国统区的妇女组织及其活动》，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50 辑，29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抗战以来，广州各界开展了多次募捐献金、支援前线的活动，其中由国共两党在1938年联合发起的“八一三”献金运动最具影响。献金运动由余汉谋任会长，吴铁城、曾养甫为副会长，具体的宣传工作则由共产党负责。8月13日，在广州市的繁华地段分别搭起6个献金台，大张旗鼓地开展为时一周的全市性献金运动，由于余汉谋、吴铁城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带头捐资，各界都踊跃参与，共获捐款上百万元，活动极为成功。

2. 举行声势浩大的救亡宣传集会和示威游行。

1937年7月17日，广东省各工会、各大中学校、各团体联合在广州举行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发表通电，表达“百粤民众誓以热血同赴艰危”的决心，并致电前方将士，“百粤民众誓为后盾”激励官兵誓死抗击日寇，保卫国家。会上还成立了“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由国民党省党部谌小岑主持，作为统领广东民众运动的机构。7月25日，中共广东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余汉谋、谌小岑、钟天心等的统战工作，通过群众救亡团体，发起广州市15万群众参加的御侮示威大游行，使广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新的高潮。8月29日，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发动十多万民众举行抗敌大游行。12月9日，广州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大会并示威游行。12月20日，广州十几万民众举行市民自卫运动大会，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长期抗战等提案，发表《为抗战自卫告全国民众书》《告全省民众书》，并举行示威游行。①



图1-1　1937年底，广东各界举行抗日游行活动

① 广州市政协文史研究馆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下），48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938年，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4月10日发动和组织广州30万人台儿庄大捷祝捷游行。7月7日组织广州各界民众举行纪念抗战一周年火炬游行。8月13日晚，广州万余人举行“八一三”献金大游行，高呼“保卫广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9月18日，广州20多万人举行纪念“九一八”七周年火炬大游行，宋庆龄也徒步参加。直至广州沦陷前夕，广州还举行了“保卫大广州”的7万人大游行。在广州郊县，1938年3月7日，三水举行了由县抗敌后援会发动的反侵略火炬大巡行。[①]

上述的集会、示威游行，使广州地区的爱国力量联合起来，壮大了人民抗日的声势。

3. 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为了组织群众抗战力量，推动救亡运动向前发展，抗战开始后，广州地区涌现了一大批抗日救亡团体。从界别看，包括：

文化界：先后建立了救亡呼声社、抗战教育实践社、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等一批有影响的团体。成立于1937年8月14日的救亡呼声社是抗战初期在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促进下，由国民党省党部出面组织的广州地区第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救亡团体，对全面掀起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的带头作用。该社创办的《救亡呼声》旬刊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判汉奸理论，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青年界：抗战开始后，公开合法的广州青年抗日团体陆续建立，其中青年群社、学抗会及以青年为主的救亡呼声社3个团体人数最多，影响较大。1937年12月，在“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上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1938年1月，在中共南方工委的领导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等8个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国民党当局认可、由中共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抗先”），“抗先”的成立标志着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从分散走向统一。

妇女界：抗战初期广州的妇女抗日团体很多，有以女工和平民妇女为主的省市妇女抗敌同志会、市妇女会、市车衣工会，有以女学生为主的中大女同学会，以宗教界妇女为主的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有以上层妇女为主的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省女界联合会、省妇女慰劳分会、广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随着广州妇女抗日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广州各妇女团体也由分散走向统一，1937年12月，在有识之士的建议和中

① 菊华：《救亡烽火在三水》（1938年3月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1册，399页，1987年印刷。

共广州党组织的推动下，广州的主要妇女团体成立了“广东妇女团体联席会议”，实际上成为抗战初期广东妇女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机构。1938 年 9 月，宋庆龄、邓颖超亲临广州。在广州妇女抗日团体的欢迎会上，邓颖超指出，华南的妇女运动十分重要，不但是保卫华南的劲旅，而且可以响应各地的妇运，领导各地妇运的开展，妇运工作要加强统一，加强团结，要建立在广大的妇女大众之上。[①]在她们的指导和推动下，将“广东妇女团体联席会议”改为“广东妇女团体救国工作协进会”，继续领导妇女界的抗日斗争。[②]



图 1 – 2　1938 年 8 月底，宋庆龄在广州检阅妇女壮丁队

劳动界：在中共广东党组织的积极推动下，自抗战爆发至当年年底，广州市各行业工会纷纷建立或重新改组，有机器工会、轮渡工会、报贩工会、邮务工会、榨油业工会、沽票员工会、铁路工会、玻璃工会、印刷工会等二三十个，拥有 4 万多名会员。并在此基础上，于 1938 年初建立了全省工人救亡的统一组织——广东工会抗敌联合会。工会在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抗日行动，广州铁路工人组织了“粤

① 灏：《一个难能可贵的晚会》（1938 年 9 月 17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508 页，1987 年印刷。

② 侯霭云：《抗战期中广东国统区的妇女组织及其活动》，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50 辑，29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年印刷。

汉铁路员工抗敌后援会广州分会”，积极从事抗战宣传、训练、劝募、防止敌谍等工作。①

农民组织方面：在中共广州市委和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中山大学抗先队的积极努力下，于广州南郊成立了“十三乡救亡工作者协会”，东北郊成立了“龙眼洞贫苦青年教育团”和“长湴农民抗日先锋队”等。②

4. 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不少救亡团体都带有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宣传队、美术队等组织，他们走上街头，以歌曲、话剧、漫画、标语、壁报等形式，进行救亡宣传。他们还到工厂、农村开办识字班、夜校等，鼓吹抗日。广州的一些剧团，如前锋剧社、艺协剧团、锋社剧团、春雷剧社、儿童剧团等，也兵分两路，一部分人走上街头，一部分人下乡宣传。剧目包括：《血洒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锄奸》《最后一计》《张家店》《没有祖国的孩子》《汉奸的子孙》《夜》等。③在花县（今花都），花县中学抗敌同志会、前锋剧社战时服务团等救亡团体积极组织下乡活动，向民众进行抗战宣传，演出的剧目如：《扫射》《战地英魂》《上前线去》《不做汉奸》等。④

创办刊物也是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形式，当时，几乎所有党派团体，都有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刊物发行。如中共出版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群众》《解放》等，国民党控制的《新战线》《统一战线》等，第三党派出版的《南针》《抗战农村》《抗日青年》《抗战华侨》，广州妇女会出版的《妇女知识》等，此外，还有《游击队》《青年



图 1－3 抗战时期中共广州市委机关刊物《游击队》

① 《在敌机的轰炸下粤汉路广州员工的救亡工作》（1938 年 2 月 12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369 页，1987 年印刷。

② 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510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③ 过仁：《一月来的广州剧运》（1937 年 9 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9 册，112 页，1987 年印刷。

④ 《活跃的花县》（1938 年 3 月 24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409 页，1987 年印刷。

群》等进步刊物。它们对宣传、发动民众踊跃参加抗日，起着积极的作用。

5. 学习军事，做好迎击敌人来犯的准备。

为适应战时需要，不少救亡团体都组织群众进行短期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些学生、青年还参加了国民党当局办的训练班，学习军事。

"抗先"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救亡团体，因此它经常组织军事训练，为抗日武装斗争打基础。1938 年 1 月 26 日，"抗先"组织了 300 多名青年到广州近郊石榴岗举行了为期 3 天的军事大露营，进行战斗行军演习，开展夜袭、包抄、埋伏等军事训练，并邀请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等到营地讲授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①在此前后，"抗先"各队部也先后开展了军事训练和演习活动。

广州妇女也不甘人后，省、市"妇协会"联合，经"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批准后，在广州成立女壮丁队，训练女军事干部，女壮丁队共开办两期，培训了 200 多名妇女骨干。

当然，广州救亡运动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追求形式、追求轰动效应的活动比较多，扎扎实实的备战工作较少；敌人一旦来攻，对广大市民实在、有用的东西不多。而且派系纷杂，各有所谋，民众未能切实、有效地组织起来，一些地方还受到土豪劣绅的操纵、破坏。例如广州东北郊的番禺第 4 区，"救亡工作本来应该很好，岂知这里救亡工作比任何地方还落后，虽也有过几队宣传队到这边来宣传和做戏，但并没有收得怎么大的效果，因为该地民众政治水准的低落，虽则该区公所也曾发过几次的号召，但根本却没人彻底地去做"。龙眼洞贫苦青年教育团办的壁报和标语，经常被当地的土豪劣绅撕毁，说"一开口就是日本仔，将来日本仔真的登陆看你们往那里跑"，还要乡民"预备制好日本旗"将来欢迎日军。② 直到日军进攻前夕，广州青年组织的状况仍不尽人意："在广州最显明的现象就是青年组织机构特别多，……组织机构多，团体与团体间发生磨擦也愈多，使工作老是停滞在相为利害冲突的据点上，不能按照理想计划进行。……每个团体的群众基础非常薄弱，每个单位团体对一件较艰巨的工作不能执行，而彼此间联系又薄弱，……广州青年团体所吸收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前进的知识分子，不能更积极地吸收到各阶层的青年，如农人、工人等参加，

---

① 黄穗生：《抗先与广东抗日救亡运动》，载自《广东党史》，1995 年第 2 期。

② 玉泉：《番禺四区的救亡工作》（1938 年 4 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429 ~ 433 页，1987 年印刷。



分子范围愈小，愈难把工作推动到各阶层去。”①

由于上述一些缺陷，当日敌人侵广州时，广州并不像一个备战已久的城市，广州民众也没显出训练有素、很有组织，反而在仓促中顷刻陷落了。

第二节 日机轰炸广东与广东军民的抗击

抗战时期日本对广东的侵略，是从空中轰炸开始的。

日军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在向华北、华东疯狂进攻的同时，就已将战祸引向华南，凭借其战争初期空中的绝对优势，对广州及广东各地进行狂轰滥炸。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其日后侵略广东做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妄图以残酷的轰炸手段，打击广东民众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其时日本有作战飞机 2 700 多架，而当时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只有 305 架，广东的防空力量更是微弱，广大城市、乡村处于不设防状态；同时由于广东地处南疆，日机便于从台湾、南海各岛屿和航空母舰上起飞，随时进袭。② 日机的轰炸在前期以广州为重点，珠江三角洲以及粤东、粤北的县城也是其攻击目标，给广东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广州是在 1937 年 8 月 31 日。日军派出 6 架飞机从上川岛和下川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十几分钟就飞进广州市区。日机窜到位于天河的机场上空，企图破坏国民党空军基地，投下了大量的炸弹。此后日机便不断来袭，有时夜间也出动飞机轰炸。在 9 月下旬，日机轰炸明显增多：“过去半个月来，广州屡遭日机狂轰滥炸。9 月 21 日之前，小股日机前来扰乱，一般约一小时就飞走；但从 21 日起，空袭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日本两艘航空母舰驶进广州水域，把澳门附近一岛屿作为其航空基地。当天清早 6 时 40 分左右，两组日本空袭机群各约 15 架飞机同时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飞临广州上空，中方飞机早已升空迎击，但由于日机数量多，大多数日机侵入市区，高射炮及高射机枪马上开火。……同日下午一时半，37 架飞机再犯广州，日机借助月光也进行夜袭。从 22 日到 27 日，日机接连轰炸广州，每天从早到晚进犯数次。不过，到了月底，敌机的活动只局限于轰炸虎门炮台、黄埔、粤汉铁路等，……有许多颗炮弹落在市区，估计炸

---

① 高汾：《强化广州青年统一战线》（1938 年 9 月 2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473 ~ 474 页，1987 年印刷。

② 曾庆榴、官丽珍：《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广东罪行述略》，载自《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1 期。

毁一百多间楼房，炸死一千多名无辜居民。几艘中国炮艇在虎门附近被击沉或重创。在夜袭过程中，几个叛徒在屋顶点火指示轰炸目标，当局正采取严厉措施铲除这些叛敌分子。”① 而由于中国空军的反击，从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的两个多月，日机较少来袭扰轰炸。但1938年1月下旬后，日军的轰炸日渐增多，专注于摧毁交通线，轰炸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和沿线各站，郊外许多工厂也遭到袭击。1月25日日机在东山一带轰炸后，空袭次数、出动架次、轰炸目标、攻击范围都逐步扩大，甚至连意大利领事馆、欧美国家的天主教堂、教会学校都未能幸免。②2月28日，日机出动50余架分10批轰炸广州、黄埔、军田、惠州等地。3月1日又轰炸了广州机场和中山大学。3月27日又出动54架飞机轰炸广州和军田等地。4月中旬起，日机便集中轰炸广州市区。如4月10日，日机轰炸西关和流花桥一带市区，炸毁房屋无数，死伤民众惨不忍睹，仅缝纫厂的女工就死伤100余人。③又如5月28日，日军出动71架飞机分3批狂炸广州市区，炸死市民600余人，炸毁房屋600余间，炸伤市民约1 000人。第二天日机又出动轰炸，死伤市民500余人，炸毁民房300多间。第三天又炸死400余人，炸伤700余人。经过这3天的狂轰滥炸，市内一片狼藉。



图1－4　广州沦陷之际，市区发生火灾，到处浓烟弥漫

---

① 广东省档案馆编：《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50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有修改）。

②③ 张洁：《七七事变后的广州》，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18～19页，1987年印刷。

尤其是黄华塘（今黄华路一带），全村被炸平，血肉横飞，惨不可闻。①事后有幸存者在黄华塘立一石碑，上刻“血泪洒黄华”以志永不忘记此日本军阀的暴行。六七月间，日机连续10多天狂炸广州，每天数十架飞机对市区实行地毯式轰炸，大学、公园、酒店、医院和市场均成为轰炸目标，连珠江上的船只都未能幸免。8月8日，日机再次轰炸广州，目标转向住宅区和商业区，广大路、广卫路、西湖路、惠爱西路等中心地点共落弹36颗，死伤500多人。第二天又有日机48架轰炸市区，死伤160多人。到日军大举侵粤前夕的10月上、中旬，日机对广州及其附近的轰炸更为频繁，每天出动飞机100多架次。从1937年8月31日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机对广州的轰炸持续了14个月，投弹2 630颗，炸死1 453人，受伤2 926人，毁房2 004间，市区被炸地点达300多个。②广州是当时受日机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图1－5　1938年6月广州惠爱西路被日军飞机炸死的民众

---

① 冯湛泉：《日机空袭广州目击记》，见《广州抗战纪实》，8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广东全省防空司令部：《广东省空袭损失统计表》，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401，目录号6，案卷号194－3。曾庆榴、官丽珍：《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广东罪行述略》，见《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关于这段时期日机轰炸的惨况，当时在广州主编《救亡日报》的夏衍先生曾经留下过十分真实的纪录：

在1938年5月的广州大轰炸之前，“广州可以说是‘升平世界’。说来也很奇怪，日本空军来轰炸时，广州市面上照样人来人往，若无其事，因此，这次大轰炸损失就特别严重，市民被炸死的数千人。我当时正在官禄路宿舍写文章，附近落下一颗炸弹，竟使写字台上面的电灯泡撞到墙上而爆破。接着我们全社动员，去采访轰炸后的惨景。遍地都是被烧焦了的尸体，这是我毕生看到的最惨的情景。”①

1938年6月8日，伴随着连续的警报和轰炸声，夏衍写下了《广州在轰炸中》一文：“广州是被连续无目的地轰炸了12日了，要轰炸到什么时候为止，谁也不能知道！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的失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货汽车上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倒塌了烧毁了的民房，炸弹片，一排排的用芦席盖着的尸首，和由红变褐，由褐变黑了的血迹！晚风吹过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气和血腥！是的，经过这十多天的轰炸，广州是遍体鳞伤了，任何一条路上走一百码，就可以看见一处惨痛的伤痕。”“广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是一片平地了。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风吹着，这肠子在慢慢地在摇晃。红的血被太阳一晒，变成赤黑色的凝块了。尸亲发着低低的泣声，在尸丛里面寻找他们的骨肉，找不到的时候痴呆地回去，找到了的时候一阵凄厉的哭声。”②

在粤东，1937年9月日机开始轰炸汕头市。1938年夏，日军在南澳岛建成简易机场，对粤东各地空袭更加频繁。至1939年6月汕头沦陷，空袭汕头的飞机共803架次。同一期间，日机空袭潮安200架次以上。此外，日机还对饶平、揭阳、潮阳、普宁、惠来等县进行轰炸，及在惠阳、博罗、梅县、兴宁、五华、蕉岭、丰顺、河源、龙川、紫金、和平、连平等县投弹，并炸毁了龙川大桥，使粤东交通受到严重破坏。

在粤北，由于广州沦陷后韶关一度成为广东的省会，因此日机对韶关及粤北各县的轰炸十分凶猛，轰炸时间最长。其中乐昌、南雄、韶关（曲

---

① 夏衍：《回忆〈救亡日报〉（广州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省港抗战文化》，185～18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16～1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江）、英德、翁源、清远、佛冈等粤汉铁路沿线几个县受炸最为严重。

在珠江三角洲，日机对增城、东莞、花县、番禺、从化等县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1938 年三灶岛机场建成后，日机对中山、佛山、四邑各地的进袭更为频繁。

在西江地区，日机轰炸肇庆市区 55 次、高要县 200 多次，还频频轰炸三水、四会等地，其中 1940 年底轰炸三水芦苞镇，投掷了百磅巨型炸弹，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①

在南路和钦廉地区，日机多次轰炸阳江、高州、化州、电白和茂名。1938 年 9 月 11 日，日军进占涠洲岛，在该岛修筑飞机场，并在岛外停泊小型母舰，日军得以随时起飞，轰炸雷州半岛和钦廉各地。

据 1941 年《广东年鉴》统计，从 1937 年 8 月 31 日至 1941 底，日机袭粤共 19 281 次，投弹 33 857 枚，共炸死 7 153 人，炸伤 11 836 人，毁屋 18 021 栋。这份统计并不完全，也未包括 1942 年以后的情况。实际上，直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夕，日机还轰炸了阳山县。故从受害范围来讲，涉及广东 76 个县市（未计海南），时间达 8 年之久。

从日机轰炸的目标来看，包括：①教育机关、文化场所。②医院、庙宇、教堂。③居民区、商业区。④交通枢纽、工厂产业。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践踏国际公法，疯狂轰炸广东城乡，大规模屠杀平民，摧毁非军事性质的教育、文化、医疗、宗教设施以及民房、产业等，这一历史罪行是永远抹杀不了的。②

为抵御日机的空袭、增强广东防空力量，1937 年 8 月 9 日，广东省航空建设分会成立，吴铁城任会长，并筹设各县市分会。8 月 18 日，日本 4 架飞机窜到虎门上空，首次做北上袭击广州的试探，我空军出发截击，广州发出空袭警报，敌机离去。余汉



图 1－6　广州秉政街的宣城书院被日军飞机炸毁

① 参见（香港）王玉棠：《九一八事变后粤西地区的反应及抗战末期日军进犯西江的实况》，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213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史料源于《高要文史》，第 4 辑，32 页，1988。

② 关于日军在广东各地轰炸的详情，请参见曾庆榴、官丽珍：《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广东罪行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1 期）一文，有修改。

谋即令第四路军参谋长缪培南兼任广州市警备司令，林时清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以加强广州防务。19日起，全省实行警戒及灯火管制。8月25日，省政府聘请张惠长为省防空协会副会长，专职负责防空工作，包括实行灯火管制及举行联合防空演习。

8月31日，日机6架首次袭击广州，在白云机场投弹，被我空军高炮击落2架，重伤1架，当日省政府令各地迅速成立救护分会。9月底，省府饬令各县政府督促建筑防空壕并派员宣传防空常识。为增强空防力量，11月16日，由余汉谋、吴铁城发起的广东人民购（飞）机委员会成立，并筹设各县分会。省军事当局令各县组建递步哨队。

1938年3月，为解决广东国防经费不足的问题，国民政府批准广东发行国防公债1 500万元。7月初，全省防空司令部成立，余汉谋、吴铁城兼正、副司令，广州市郊积极增建防空壕室，郊外地洞限1个月内竣工。至9月10日左右，全省购机捐款已达1 000万元。国民党中央也曾先后派员、派飞机到广州筹划加强华南地区防务，将之纳入整个正面战场防御体系，对增强防空力量起了积极作用。①



图1－7　20世纪30年代初启用的广州天河机场

面对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中国空军虽然处于劣势，仍奋勇驾机抗击日寇，展开过多次空战。当时驻广州的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只有一个飞行队，9架美国霍克—3式战斗机，驻广州天河机场。当1937年8月31日，日机首次空袭广州时，中国空军便出其不意，起飞迎战，地面空防炮火给予配合，经过激烈空战，中国飞行员邓从凯、黄绍濂各击落日机1架，其余4架日机仓皇逃走，中国飞机受伤，损失较小，取得了首次空战的胜利。捷报传开后，广州市民十分兴奋，纷纷慰劳空军官兵。对于击落日机者给予每架1 000元的慰问奖金，并送来大量罐头、汽水等慰问品。在后来的多次空战中，中国空军都能奋勇作战，面对优势日机沉着应战，取得战果，也有一些战士英勇牺牲。特别是1938年上半年，战事激烈，4月13日，36架日机来犯，中国空

① 沙东迅：《民国时期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及其应变措施》，载自《广东史志》，1999年第1期。

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两队共18架飞机起飞迎敌，击落日机7架，中方牺牲4人。[1] 1938年夏，又有数十架日机袭击广州，中国空军迎战，在广州东北上空击落日机2架，追击到粤北时又击落日机1架，并击伤日机多架，重创敌人。中方损失飞机2架，受伤2架。在这次空战中，空军大队长吴汝鎏不幸在南雄上空中弹阵亡。事后广州各界隆重悼念，各报纷纷报道。

广州人民还以各种方式揭露、声讨日军的暴行。当时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州大学的教授于1937年10月15日联名致电欧美文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请求各国主持正义，严厉制裁侵略者。宋庆龄于1938年8月至10月，先后两次来广州，推动抗日救亡运动。8月21日，宋庆龄在广州向美国纽约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说，愤怒谴责日军狂炸广州。[2] 对于一些为虎作伥的可耻汉奸，广州军民给予严惩。在日机夜袭广州时，时常发生汉奸在市区施放火箭为日机指示目标的事件，经过周密侦察，广东宪兵司令部逮捕汉奸多名，最后将3名罪大恶极者处决。[3]



图1－8　宋庆龄检阅广州防护团救护队

此外，在日机轰炸的威胁下，广东民众增强了防空意识，采取一切措施防止空袭。包括疏散城市人口物资、建立空警网络、加强防空宣传教育、构筑防空壕穴、加强防护班的组训、大力征集防护器材、厉行防空人员奖惩办法等。并创造了许多反空袭的好办法，如韶关防空情报所长詹宝光用挂大气球与敲钟相结合的方法报警，有效解决了警号混乱的问题，这一办法为重庆、桂林等地广泛应用，并为盟国所重视。防空常识的提高和防范措施的加强，有效减轻了轰炸造成的损失。1938年，日机对粤投弹1 446

① 黄绍濂：《我参加的对日空战》，见《广州抗战纪实》，8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张洁：《七七事变后的广州》，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20页，1987年印刷。

③ 冯湛泉：《日机空袭广州目击记》，见《广州抗战纪实》，8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枚，炸死2 272人，炸伤4 530人，毁屋3 654栋；1939年投弹8 065枚，炸死2 089人，炸伤3 089人，毁屋6 929栋，相比之下，投弹数大大增加，伤亡人数却减少了。①

日军除不断空袭外，还以优势的海军封锁中国沿海，在广东沿海地区进行侦察、骚扰和炮击，企图截断广州与香港的联系。为防敌海军侵入，广东省江防司令部采取对策，一是堵塞封锁，将珠江三角洲6门——虎门、横门、蕉门、磨刀门、虎跳门、崖门及坭湾门、潭洲口等入海口各航道加以堵塞，沉废舰、废船、沉石。各口堵塞工作于1937年10月完成，至12月再加补塞。二是布雷封锁，在各江咽喉严密布雷，先布旧存水雷，1938年春起自制水雷，至广州沦陷时得2 000余颗，布于各封锁线，另又曾以漂雷袭击敌舰。上述封锁措施对阻敌深入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敌陷广州后，使其不能利用舰艇引导陆军长驱深入各江上游。

1938年6月20日，日军在粤东进攻南澳岛，国民党军黄涛部一度反攻夺回，至8月再度失守。

1938年9月13日，日舰轰击大鹏湾。14日晨，日舰4艘，自伶仃洋驶向虎门，攻击虎门炮台，虎门要塞各炮台及空军还击，激战48分钟，击沉日舰一艘，余舰仓皇退去。中国“海周”舰中弹受创，官兵颇多伤亡。此后，日军改以飞机向中国各舰轰炸，炸沉我舰多艘，江防司令部较大的舰只已损毁，乃将余舰重新分配巡弋，警戒各地。并先后在三灶岛、横门、珠江口等处布雷或用漂雷袭击日舰，炸沉敌舰多艘。②

第三节　城市居民的疏散与工厂、学校的迁移

1937年8月31日，日本在广州开始轰炸后，市民即开始大批逃离，9月17日后的连续轰炸，更使得一段时间“全市关门，居民十分之八回了乡”，留在广州的，也大多集中到较为安全的河南一带。③为躲避空袭，市内各大中学校纷纷迁移郊外，如仲恺农工学校、执信女子中学、省立女子师

---

① 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4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② 李达荣：《抗日时期的广东海军》，见《粤桂黔滇抗战》，160～16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③ 《中共广州市委工作报告》（1937年11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9册，45页，1987年印刷。



范学校就于1937年10月3日迁到南海西樵开学。

日军的空袭对广东的工商业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工厂基本上不具备防空袭能力，工厂附近没有防空壕，工厂本身没有防空设备，一部分工厂在工作时间锁闭，部分工厂在晚上休工时间锁闭工人宿舍，工人也缺乏组织。到1938年4月，顺德、东莞、新造、市头的糖厂和广州大利军服厂先后被炸，损失惨重。为了保卫工厂，广东省在1938年上半年发起了一个“工厂安全运动”，4月24日正式成立了“全省工会抗敌联合会”，工人参加各项救亡活动的热情高涨，人数也在迅速增长。

据粤省银行发表的数字，由于8月底开始的轰炸，广州9 625家工商企业中，到1937年11月还在停业的有1 507家，10万商业职员中，有1.3万人失业，手工业停业者在1/3以上。①

对于政府举办的省营工厂，抗战爆发后，为避免集中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工业毁于战火，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业内迁。粤省省营工厂占全省工厂总资本的2/3以上，且战时其产品对满足军需民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省营工业的内迁问题遂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政部建议粤省省营糖厂酒精部和硫酸苏打厂迁移内地安全地带，省营工厂内迁的筹划由此拉开序幕。省建设厅、省营工业管理处、广东省工业监理委员会等机构及省营工厂的负责人对省营工厂的迁移问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提出各种初步的迁移意见。1938年2月8日，经济部长翁文灏致函广东省银行行长顾翊群，“粤省工业夙较内省发达，公营事业亦较有规模，但所设厂址均濒海滨，以战氛渐近华南，即使不致遽有兵灾之虞，而空袭频繁，殊难全免危险，为今之计，自应及早筹帷，以避免无谓之损失，而各厂如糖厂之类，尤为内地所需，如为一劳永逸起见，不如妥择安全地域迁地复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也指令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筹备粤省工厂迁移事宜，并派员与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商议工厂迁移的原则与办法，同时请经济部速派干员到粤办理工厂内迁。

1938年3月敌机轮流轰炸省营市头、新造、顺德糖厂，各厂电机、锅炉、工场、宿舍均受损严重而停产。解决省营工厂的安全问题更为迫切。粤省当局遂饬令各有关机关对工厂内迁问题拟具意见，然而各机关意见分歧，工业监理委员会建议从速制定工厂迁移原则，组织“迁厂委员会”负责办理迁厂事宜。但省政府工商股和建设厅省营工业管理处以迁移耗资巨

---

① 杜达：《抗战开始后广州工运工作的总检讨》（1938年4月28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9册，369页，1987年印刷。

大，生产停顿，迁移后设备原料及运销困难为由，提出相反意见。4月7日，经济部长翁文灏致电省主席吴铁城，提出工厂迁移的几点建议：①可迁移的工厂从速迁移，例如造纸厂可迁湘西南，糖厂可择要移四川或广西。②可以与英美合办工厂，尽早实行。③重要地方例如士敏土厂等必须增加防空设备者，由省府商同军事机关酌量实行。④工厂迁移具体办法，由经济部派工矿调整处组长林继庸赴粤面商。4月8日，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派曾负责办理上海、武汉等沿海沿江工矿内迁的林继庸到粤。4月中旬，翁文灏又亲自赴粤，与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建设厅长徐景唐商议粤省工厂迁移问题。翁文灏并建议粤省将新造糖厂和市头糖厂让售给四川省政府。当时两厂相距仅十余里，市头糖厂日榨蔗量在新造糖厂的5倍以上，布局未尽合理，让售一厂之后，将来在南路或琼崖重新设厂，或许更好，因此，粤省同意出售新造糖厂。1938年5月，省营工厂管理处就此与四川省政府代表沈镇南数次磋商，终因粤方要价过昂未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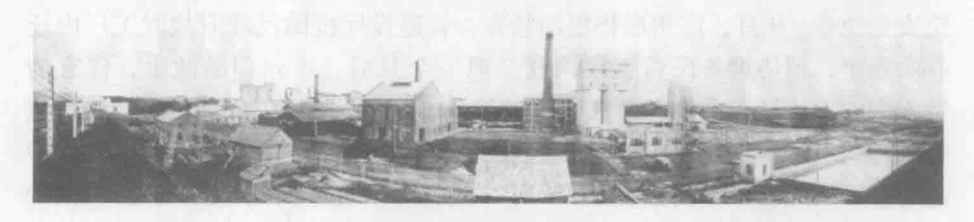


图1－9　1932年建成的广东西村士敏土厂（水泥厂）外景

虽然国民政府力主粤省省营工厂内迁，但粤方却迟迟按兵不动，原因是：①如按经济部的建议将省营工厂迁至西南地区，则省营工厂的所有权必将变更，粤省将失去这一丰厚的经济来源。②省营工厂，赢利丰厚，虽然“七七”事变后，各厂迭遭轰炸，但产品收入每月尚达百余万元。且由于抗战后，敌人封锁沿海各港口，舶来品输入减少，内地对国货需求增加，省营工厂产品供不应求，当局宁可增设防空设备，而不愿因工厂搬迁停产。③迁移工作存在种种实际困难。各厂中只有硫酸苏打厂拆卸运输比较容易，其他如肥田料厂、纸厂、士敏土厂（水泥厂）等机器笨重，拆迁困难，交通工具奇缺，迁移费庞大。此外，当局对日军南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在近期内不会进攻广东。故虽然国民政府屡次敦促，粤省当局仍一味拖延，幻想依赖外人来保证各厂安全。做法是将工厂改组为有限公司，加入外资，工厂悬挂外国国旗，雇用外籍名义厂长，负责对外交涉。

省营工厂直至日军大举进犯时，仍未迁移。1938年10月12日，当日军在大亚湾登陆，除有外债关系的市头糖厂、顺德糖厂及纸厂附属的电力



厂外，其他省营工厂如新造糖厂、士敏土厂、肥料厂、硫酸苏打厂、饮料厂、纺织厂、纸厂等仅能将轻便而贵重的机件匆匆运走，其余机器设备按照“焦土抗战”政策，广州警备司令部在撤离广州前的10月21日上午，将纸厂、饮料厂、士敏土厂、纺织厂炸毁。由于时间仓促，各厂的破坏并不彻底，其后为日军所占夺。

广州沦陷后，省营工厂中，仅余揭阳糖厂和梅菉麻袋厂。1939年初，当局决定将麻袋厂机器拆卸运至法属广州湾保存。1939年3月，潮汕形势紧张，省政府决定将揭阳糖厂重要的机器设备拆卸下来，运至汕头，再转运香港，但机器仅运一半，日军已在汕头登陆，只能把未及时运出的机器藏匿到附近乡村。其后有部分机器运往韶关，分配到各新建工厂使用。①

1938年5月，因日机轰炸，当局和商会曾分别劝令广州各大民营工厂向外迁移。7月，较大的工厂遂纷纷做迁移准备，因迁厂费用过大，各厂请政府依照工厂迁移办法，酌予补助。各大工厂拟待中央准予补助后，即移至安全地带。9月，广州形势更加紧张，省建设厅按国民政府战时工厂内迁办法规定，拟协助各民营工厂内迁。但一个月后，广州即陷敌手，仅有为数不多的工厂迁至香港和西江流域的德庆。广州市的10余家工厂，如八达电机棉织厂、友仁织带制尺厂、大华铁工厂、冯强橡胶厂等将工厂直接搬迁香港继续经营，平安福橡胶厂、华南制钉厂、协同和机器厂、捷和钢铁厂等数厂将全部或部分资金和技术人员转移至香港。另有一批织造厂、药号迁移香港或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粤沪公记电池厂、合益糖厂等数家工厂在广州沦陷前夕迁至德庆。碾米业中数家较大的厂家迁往内地。

民营工厂迁移的厂数相对要比省营工厂多，然而就整个民营工业来说，迁移的工厂仅占少数，大部分民营工厂未及迁移，处于鼎盛时期的民营工业随着广州的沦陷而遭受严重损失。②

据澳门《华侨报》报道，1937年11月份广东受到日空军猛烈轰炸后，大批难民开始拥进澳门，既有个人，也有团体，如浸信会广州瞽目院的负责人率领数十名师生到澳门，广州许多中小学也纷纷迁址澳门，如岭南学校、协和女子中学、广中中学、培正中学小学部、执信中学等。澳门一时聚集了数十间中小学校。这导致澳门人口迅速增加，战前15万人口的澳门，

① 以上有关省营工厂部分摘引自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省营工业的损失与重建》，见《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

② 以上有关民营工厂部分，请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黄菊艳博士论文及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425～42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在抗战爆发3个月后增加了3.8万人，广州被炸后更为明显，1937年12月28日至30日的3天内难民进入澳门的官方统计数字即达1.14万人，不足半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1/3达20万人，后更增至30万，最高峰达45万，当然，这些人并非全部来自广东，但无疑主要是来自广东。①

抗战开始后，中山大学石牌新校舍因目标显著，曾遭敌机轰炸，学校搬回文明路旧校舍及惠福路国民大学分教处上课。1937年底，中山大学为使书籍仪器不被破坏，决定将学校内迁，此决定曾引起一些进步人士的反对，认为"少数人为了维持一己地位与安全的迁校，会直接打击到广州全部的救亡工作。""我们并不反对将古书古籍古物搬到安全的地方，但我们应该坚决的反对把整个学校搬到安全的地方。"②到1938年五六月间，日机轰炸更为严重，中山大学常为敌机所炸，师生安全和教学工作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到九十月间，有情报说，敌军将从惠州、博罗方面登陆，10月14日，广东军政当局通知疏散市民，预备撤退。国民政府教育部也通知中山大学即行迁校。中山大学为此成立了迁校委员会，由萧冠英主持。最初决定迁往罗定县，10月19、20两日，分批乘船将人员及1 200余箱公物抢运出广州，这批公物仅占当时全部校产的1/3，10月底全部运抵罗定。这时广州已沦于敌手。11月初，中山大学开始在罗定办公，到月中正准备复课，忽接教育部电以汇款不便，指示另觅桂、滇两省迁校。遂又择定广西凭祥、上金、宁明各县为校址，正在筹备启运之际，又接教育部电告，日敌谋在北海登陆，接近龙州，指示速迁往云南。遂改变计划，于12月1日出发，溯西江而上，1939年1月19日到龙州，然后从龙州走滇越铁路赴云南，2月中旬全部抵达云南澄江，随即于3月1日复课。

1940年夏，日敌侵迫越南，威胁滇境，时局变得紧张，到6月间，许崇清出任代理校长，决定将中山大学又迁回广东军政当局所在的粤北，到1940年12月，仅滇、黔、桂、湘辗转数千里迁回坪石，校本部、研究院及文、理、工三学院设于坪石及附近的铁岭、塘口、三星坪等地，医学院设于乐昌县，法学院、师院设于乳源县，农学院设于湖南宜章县，1941年1月复课。1945年1月，又因敌情严重而分迁梅县、连县、仁化等地，抗战

---

① 陈锡豪：《抗日战争期间的澳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打印稿，29页、31页。

② 岐锋：《关于中山大学迁校问题对中大同学的一个紧急号召》（1937年12月2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9册，197页，1987年印刷。

胜利始逐步迁返广州。①由于数次搬迁，图书、仪器的损失极为严重，据统计，迁徙中总计丢失仪器、标本、模型等达604箱，散失图书、杂志等20多万册。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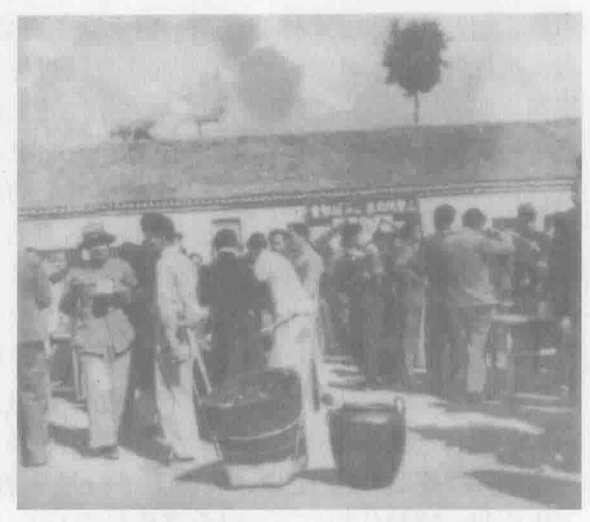


图1-10　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北撤，先后辗转数地，师生风雨同舟，共度艰辛

广东勷勤大学于1938年8月一分为三，工学院并入中山大学工学院，商学院改为广东省立商学院，教育学院改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在广州沦陷后数度迁徙，历尽千辛万苦，初迁广西梧州，二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粤北乳源，五迁连县。其间又曾与商学院合并，后又易名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为著名教育家林砺儒。学院对所迁地区的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做出了许多贡献。初迁梧州时，"学生们课余协助各乡镇村街的国民基础学校，推行民众战时教育"；二迁藤县时，学生们"也分道向村民宣传抗战局势，唤起他们对最后战胜的信心"；三迁融县，帮助一些乡镇"办理儿童教育和民众教育"；在乳源、连县，都开设了文化补习班和民众夜校。1942年春，迁校于曲江，由黄希声任院长。1945年初，曲江沦陷，该院猝不及防，遭到重大损失，先在连县收容逃难师生，继在罗定复课，并另在兴宁与广东法商学院合设分教处。勷勤大学的商学院在抗战爆发后成立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初迁广西融县，续迁粤南遂溪，三迁粤南信宜，1941年迁曲江，曲江沦陷后，再迁信宜。

抗战期间广东迁入香港的大学有4所，其中较为完整迁港的有私立岭南大学、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在战时迁徙的高校中，岭南大学算是搬迁较为顺利的。该校1938年10月18日退出广州，在香港大学的支持赞助下迁

---

① 周鼎培等：《中山大学工作三十九年见闻》，见《过去的学校》，322～32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

② 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9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香港，11 月 14 日在港复课，农学院二、三、四年级另在九龙、新界实习，医学院五、六年级在曲江实习。光华医学院在香港沦陷后停办，学生疏散到内地医校借读。部分迁港的一是私立广州大学，该校在广州战起后，搬迁计划一再变更，先迁西江开平，转往赤坎，后因空袭紧急而回返香港、澳门方向，终因中山沦陷，而一部分择址台山，一部分到香港设分教部，在迁徙时，其图书仪器、文件册籍，因“有难言之痛”，而“决然舍去”，其学校房舍“部分被焚”，其余部分“为日军占有”，1941 年冬迁曲江，1944 年敌扰粤北，迁粤西罗定和连县，1945 年 1 月迁粤西连平，再迁粤东兴宁。另一所是私立广东国民大学，从广州迁往开平，并在香港设分教处，中学部迁校于台山。香港沦陷后大学部迁曲江，1944 年迁粤西茂名，后迁粤北和平。①

岭南大学师生迁香港后，“无不以未能直接参与抗建工作及与内地人民共同甘苦为憾”，“因此对于爱国工作，员生均踊跃参加”，这所仅六七百人的高校在抗战头 3 年，就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回内地“慰劳战士及为伤兵难民服务”，3 次参加捐献和认购建国储金券，并为前方战士筹募到相当数量的寒衣。香港沦陷后，岭南大学迁回曲江，医、农两学院分在韶关、乐昌等地授课，1945 年春再迁梅县，抗战胜利后，1945 年秋返回广州原址。



图 1 - 11　岭南大学农学院坪石校址

此外，还有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从广州迁到云浮，1940 年 10 月，合并于省立文理学院，设为体育专修科，抗战后复校。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0 年春于韶关成立）1942 年 5 月迁曲江，1944 年底因粤北紧张，先迁连县，后在罗定设址上课，抗战胜利后迁广州。广州协和神学院迁往云南

① 徐国利:《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载自《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大理。①光汉中医专科学校迁往顺德陈村。

中专中师类：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抗战开始时迁校于南海西樵简村，广州沦陷后一度停办，1940 年 6 月在韶关市郊复校，1942 年 6 月迁连县，兼办国民教育短期训练班。省立广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战开始后迁顺德大良，广州沦陷后，先后迁校于澳门、中山、乐昌、云浮等地，1944 年改校名为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省立仲恺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抗战初迁校于南海西樵官山，1939 年 8 月迁中山，1940 年 2 月迁澳门，复迁粤北乐昌，1944 年 6 月迁新兴县，不久，又迁云浮、贺县、罗定等地。

中学类：省立广雅中学，抗战爆发后迁顺德，广州沦陷后迁茂名，1939 年 3 月，改办为省立南路临时中学，再迁信宜，1941 年恢复原校名，抗战胜利后迁回广州。省立执信女子中学，1937 年迁南海碧村，1938 年 10 月迁澳门，1941 年 12 月迁乐昌，1944 年底，乐昌沦陷，迁仁化，1945 年迁回广州。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抗战爆发后迁顺德，广州沦陷后停办。省立庚戌中学，抗战爆发后迁罗定，1944 年迁新兴，复迁郁南，抗战胜利后未迁回广州。省立仲元中学，广州沦陷后迁韶关，1945 年迁回广州。私立南武中学，广州沦陷后迁香港九龙，香港沦陷后，港校停办，不久，粤北的校友在韶关复办南武中学，后迁回广州。私立教忠中学，广州沦陷后，迁澳门南湾，另在郁南设分校，后迁回广州。私立知用中学，广州沦陷后迁澳门，不久迁至粤北，继迁湘南，后迁回广州。另有私立金陵中学迁新会，私立长城中学迁罗定，私立知行中学迁香港，私立大中中学迁开平，私立复旦中学迁香港，私立广中中学迁澳门，私立越山中学迁台山、开平、澳门，私立培桂中学迁藤县、平南、容县。私立学校中教会办的中学：私立培英中学迁香港，私立真光女子中学迁香港，私立培道女子中学迁香港、澳门、坪石，私立培正中学迁鹤山、澳门、坪石，私立中德中学迁澳门，私立青年会中学迁韶关，私立协和女子中学迁台山、澳门，私立兴华中学迁开平、香港，私立岭南大学附中迁香港、曲江，等等。②

1939 年初，日军进攻潮汕的迹象日益显著，潮汕地区在国民党独立第 9 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华振中的指挥下，开始加紧疏散与破坏工作。“潮汕方面坚决强制汕头、澄海、潮安及沿海人员、物资疏散，向内地及游击据

---

① 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载自《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② 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点内迁移，这工作经一月来之劝导、强制及敌机不断袭击潮汕之实际教训，汕头市之疏散尚有成绩，人口、物资、工厂机器已大部撤退（而且华司令之疏散汕市物资正是接受我们《新华日报》提出的焦土抗战的办法和步骤，这也可说是进步的地方）。梅县、兴宁各城市也正计划疏散。闽南沿海也积极疏散，沿海公路、机场之破坏准备也在着着进行。”①

被敌人暂占或有被侵扰危险的市、县的学校，也纷纷由城镇迁往农村地区坚持上课和开展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四节　中共活动的恢复与加强

1936 年 9 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薛尚实为负责人。这标志着已中断两年的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机关重新建立，华南各地党组织的活动开始恢复。与此同时，王均予、麦蒲费、林振华以“广东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及附近地区进行活动，12 月，经“南临委”同意，中共广州市委成立，王均予任书记，罗范群为组织部长，麦蒲费任宣传部长，林振华任青年部长，周明任职工部长。广州市委下辖：中山大学支部、勷勤大学支部、广雅中学支部、文化支部、教忠中学支部、小学教师支部、广州学筹会（地下学联）支部、工人支部等。到 1937 年下半年，广州市内已建立了 16 个党支部，党员 96 人。广州市委（以“广东工作委员会”名义，1937 年 8 月改为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麦蒲费）在广州外县建立的党组织有：中山县委、东莞县工委、江会支部、肇庆支部、开平特支、石井特支、南海贺丰乡支部等。还在台山、紫金、佛山、阳江、阳春、廉江、顺德、南雄、澳门等县、市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到 1937 年 11 月，上述市、县共有党员 105 人。②



图 1－12　“中青”的领导人王均予

---

① 《中共闽西南特委给南方局的报告》（1939 年 5 月 20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3 册，238 页，1987 年印刷。

② 摘引自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 1 卷，378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七七"事变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7月8日以"华南情报号外"的形式，通报有关情况。13日，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的名义，就动员群众援助华北抗战的问题做了部署。8月初，"南临委"布置广州等地：第一，发动所有组织参加"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举行全市各界团体代表大会。第二，立即发表通电、宣言，阐明对时局的主张，并制定工作大纲。第三，组织北上慰劳队、救护队、战地服务团、抗敌后援会、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发动募捐，援助华北抗战。第四，加紧组织民众武装及军事训练，"应把这项工作提到党生活的第一位"。第五，举行抗日游行示威。第六，支持余汉谋、香翰屏（国民党第4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发表的抗日主张，建议他们与民众联合。第七，出版抗战专刊、特辑、小册子，召开抗战座谈会。第八，"利用同志各种社会关系，与军官、兵士建立密切的联系，推动其工作，组织各种抗救团体"，并依此开展工作。①



图1－13　中山大学师生组织了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伤兵

1937年9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张文彬到达广东，着手对广东党组织进行整顿，调查和处理"南临委"与广州市委之间的矛盾（实际是"南临委"负责人薛尚实与广州市委书记王均予之间的矛盾）。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南临委"，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委"），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组织）、饶彰风（宣传）、梁广为委员。1938年2月机关由香港迁至广州。



图1－14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

根据"南委"指示，1937年10月，广州市委改组为广州市工作委员会，罗范群任代理书记，

①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38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广州党员人数，1937 年 10 月为 70 名，1938 年 3 月增至 650 多名。广州以外珠江地区之各县党组织，由外县工委领导。

经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批准，1938 年 4 月 18 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宣布撤销“南委”，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任省委书记，薛尚实任组织部长（后李大林），饶彰风任宣传部长，古大存任统战部长，梁广任职工委书记，尹林平任军委书记。省委机关设于广州市。接着召开广州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选举产生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由李大林任书记。

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中共广东党组织自 1937 年 12 月起连续开办了数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其中 1938 年六七月间和八九月间两期在广州开办，学员各为 26 人和 50 人，由省委负责干部讲政治形势、党史党建、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部队政治工作、工人运动、青年与群众运动、妇女运动等。在当时敌机不断轰炸广州、经常停电停水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训练任务，成为后来广东党组织在各地、各个方面的骨干。①

为推动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党组织积极活动。1937 年 7 月，广州学生抗敌后援会改名为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中共广州市工委先后派学生党员陈能兴、陈恩、吴凤珠等到这个团体活动，在其宣传、组织等部门任职，并在该团体建立了党的支部，由陈能兴任书记。广州市工委还派党员参与筹建广东青年群众文化研究社，并在其中建立中共支部，该团体于 1937 年 12 月正式成立，在广州有成员 700 多人，是一个名义上由国民党省党部主办，实际为共产党员掌握的组织。

1937 年 12 月，广州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时，中共“南委”提出了“建立学生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鉴于活跃于北方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面目过于暴露，决定建立适合广东情况的青年群众组织，遂由中山大学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青年群社、救亡呼声社、青年抗日先锋团、平津同学会和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联合发起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国民党广东省、广州市党部登记立案，于 1938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简称“抗先”。“抗先”成立了中共支部，实际上是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有各阶层青年广泛参加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组织。1938 年 7 月，中共广东省委利用广州

---

① 金阳：《抗战初期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班情况》，见《广东党史资料》，第 12 辑，25 ~ 31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市大中学校学生暑假回乡休假之机，号召党员和进步学生，组成32个工作队，分赴全省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广泛开展群众救亡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党的组织。

中共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12月，郭沫若应救亡呼声社官山分社的邀请，到南海县向教师、学生和民众做“抗战必胜”的演讲；1938年5月2日，叶剑英在中山大学做《目前抗战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分析抗战局势、国共关系和中苏关系，介绍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情况。叶剑英还在广雅中学做《把握住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的演讲。

中共十分重视广州地区的上层统战工作。1937年春，中共中央派云广英、张云逸等先后到达广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商讨合作事宜，并商讨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问题。1937年11月初，张云逸与余汉谋谈判协商，取得余汉谋等同意，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年1月成立，由云广英任主任。办事处以公开合法地位，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团结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抗日将领，号召和组织捐献物资、经费，介绍进步青年到延安以及掩护省委及地下党活动，积极支持爱国民主人士李章达、李洁之、李伯球、陈丽洲等开办劳工干部训练班，开展工人运动及工会工作，以及争取余汉谋、李洁之、莫雄等帮助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300多人，为发展广东抗战形势，促进国共两党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南委”和省委提出的策略是：放手发动群众，利用有利环境，向开明人士靠拢，建立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力争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主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各种抗日团体，广泛开展群众救亡运动。中共尤其注意争取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谌小岑、钟天心等上层人物，对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及宗教界人士，也保持密切的联系。



图1－15　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

中共广东党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和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推动、支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战。1938年春夏，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广州，市民死伤惨重。广东省委此时即把防空救护、慰问抚恤、捉拿汉奸、帮助群众疏散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并提出应建立青年、文化、妇女战时服务团、战时工作协会，成立战时工作联席会议等统一战线领导机关，统一指挥各项防空救护工作。

省委通过抗日进步人士、余汉谋部卫生部长陈汝棠组织第4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护干班”），陈汝棠任主任，中共有李守纯、李云、宋绿伊等党员干部到“护干班”帮助工作，并建立了中共支部。“护干班”成立战时救护队，奔赴敌机轰炸现场，抢救受害群众，并在四战区各县建立了“农村救护网”。8月13日，广东全省开展“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在广州，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与《新华日报》分馆联合献金，带动了在西濠口举行的献金运动，有2 000多人参加献金。①

在统一战线中，中共广东党组织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也注意克服自身的关门主义错误。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发表《建立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文，一方面，攻击共产党“收买群众”“离间民族团结”，提出要将共产党排出抗战阵营，随后又连续发表文章，鼓吹“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另一方面，“文化界中的‘左’倾关门主义情绪还十分浓厚，未能团结广泛的文化人，对于党政方面也有些过分的批评与责难”“对统一战线政策不坚定”。对此情况，中共长江局派往广东调查指导工作的黄文杰及其他负责同志决定：“坚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从正面说明我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见解”“有些无关紧要问题，可作相当让步”。具体做法是：①立即出一期《大路》（中共“南委”机关刊物），表明中共的立场。②黄文杰、张文彬“即来广州向同志解释我们的立场；小廖（即廖承志）与夏衍同志亦来广州分头向党、政、军上层方面及文化界接洽，说明我们党的政策、主张”。③“对文化界中的左翼分子指出他们的过左情绪的不利，耐心说服他们，使其能完全清楚了解与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样做，既坚持了原则，又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②

1938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宣布停止《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报刊发行，又一次制造反共分裂活动。为反击顽固派，根据广东省委的决定，廖承志于9月初以《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名义，在广州召开有800多人出席的各界人士招待会，重申中共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会后，省委派廖承志、云广英向广东当局交涉，当

①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39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② 《文杰给中共中央长江局报告》（1938年2月12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6册，109～110页，1987年印刷。

局被迫允许《新华日报》在广东继续印刷发行。

广东省委开展的这一系列工作，促进了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对广东抗战起了推动作用。

第五节　国民党当局的应变措施

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下台后，广东表面上"还政中央"，实际上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矛盾依然存在，出现了派系纷争的复杂局面。

地方实力派以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首，掌握约10万人的军队和全省大部基层政权，视广东地盘为命根，在日寇南侵威胁和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放民众运动的政策。而且，他们对"中央"势力在广东迅速增长深感担忧，企图联合包括中共在内的政治力量以抗衡之。因此余汉谋及其主要将领如李煦寰等均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图1－16　时任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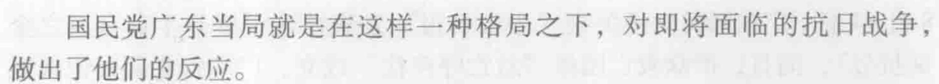
"中央"势力包括C. C系和复兴社（军统）两个系统，是蒋介石安插在广东的嫡系力量，掌握广东党务、财政大权和一些特务组织，其代表人物、时任省党部常务特派员、广州市长的曾养甫，政治上属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左翼人物，主张联共抗日。曾养甫手下的得力干部、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公开赞成统一战线口号，积极倡导民众运动，是广东当局中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激进代表之一。但复兴社则对中共和民众运动采取限制态度，是"中央"势力中的右翼。



图1－17　吴铁城

广东当权人物中，还有省主席、政学系的吴铁城，周旋于地方实力派和C. C系之间，对开放民众运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省党部特派员、孙科系的钟天心，靠近地方实力派，公开赞成统一战线，积极推动民众运动，在文化界有较大影响。①

① 黄建新：《抗战初期中共广东省委的统一战线工作》，见《广东党史资料》，第14辑，196～19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国民党广东当局就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之下，对即将面临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他们的反应。

即在“七七”事变前，国民党中央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广东地方当局虽与“中央”有矛盾，但在反共问题上态度却是一致的，继续其反共政策，镇压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在1936年1月制造了轰动全省的“一·一三”荔枝湾惨案。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广东当局与国民党中央相一致，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从反共内战向联共抗日政策转变，并有一些主动的要求和行动。

1937年7月11日，广东绥靖公署、第四路军总司令部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纪念周，少校以上均参加，余汉谋报告华北形势和国难严重情形，做准备抗日之动员。第四路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在福建漳州发表讲话：为抗日救亡，四路军枕戈待命。①

7月14日，第四路军总司令部在广州发表《告将士书》，表示要“加紧抗敌的准备，期以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为国家民族挥洒于战场，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②。

7月21日，国民党省党部公布了《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工作团组织大纲》，要求在统一指导下将全省民众组织起来并实施训练。次日，省党部常会后，党政军长官会商御侮救亡大计。广东省各界御侮救亡会随即开始办公，设总务、宣传、筹募、调查、组织等部，成为统一指导广东抗日救亡工作的机构，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按照各业、各界组织工作团，每团100人，抗战爆发不久，就组织了近400个工作团，工人、商人、妇女、学生、机关职员都有参加。在宣传方面，在全市划分20个宣传区，每区组织若干宣传工作团。在广东地方当局的认可支持下，广东各地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在其后各地开展的抗日斗争中，不少民众抗日自卫团发挥了作用。

8月2日，广东各界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有4 000人参加的联合纪念周，余汉谋、吴铁城、罗卓英均报告华北问题，余汉谋要求大家一致奋起，实行自卫。广东省、广州市国民党党部电请国民党中央动员抗战，驱除暴敌，誓率百粤民众听候驱策。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余汉谋陆续奉派第83、64、66各军及香翰屏、邓龙光、李汉魂等率部北上，参与淞沪、南京、陇海、南浔诸战役。

①② 转引自沙东迅：《民国时期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及其应变措施》，见《广东史志》，1999年第1期。

8月14日，广东国民党机关报《中山日报》发表社论《展开生存自卫之全面抗战》，同日，群众救亡团体“救亡呼声社”成立，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任社长，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负责实际工作。16日，在省府纪念周中，余汉谋报告抗战自卫，维护国家民族生存，国家利益高于一切。19日，广州铁甲车队开始出巡，连日拿获汉奸10余人。22日，吴铁城发表《告粤民众书》，号召抗战救亡。第四路军总部举办在乡军人登记，准备动员在乡军人参战。

9月25日，各市县国民党党部集中训练抗战工作，党员报到多已办竣。10月19日，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录取1 000余青年干部，20日入营集中，当日即出发工作。到11月上旬，第四路军总部起用在野军官达七八百人。广东当局奉国民党中央训令，组织省党政军联席会议，每周开会1次，11月24日，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开始工作，主席余汉谋，副主席吴铁城。此为非常时期广东最高机关。

1938年2月19日，省党政联席会议奉令改组为省动员委员会，余汉谋为主任委员，吴铁城、香翰屏、曾养甫等为委员。①



图1－18　曾养甫

在开放民众运动方面，当局多次表示要发动民众，焦土抗战，保卫大广东。广东出现了开放民众运动的“开明”局面，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了开放民众运动决议案；余汉谋公布了允许人民拥有枪支实行自卫的“五点保证”；省、市党部联合发表《为发扬民众潜力共同御侮救亡宣言》，称“凡能真诚一致，确为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而奋斗者，将不问其过去之派别如何，均愿共披赤诚，相与戮力，发动英勇之民众运动，以适应大规模持久抗战之需要”②，实际上即是主张联合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共同抗日。

1938年1月，广州当局成立了“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训练各厂店派出的壮丁（即壮丁队），总队长由市长曾养甫担任，军统派李崇诗担任副总队长。1937年12月到1938年9月，广东动员委员会分别办了4期广州

① 上引内容请参见沙东迅：《民国时期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及其应变措施》，见《广东史志》，1999年第1期。

② 黄建新：《抗战初期中共广东省委的统一战线工作》，见《广东党史资料》，第14辑，197～19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市和广东省劳工训练班，对工人进行抗战政治、军事训练，共有1万多人受训。1938年8月，当局又举办“劳工干部训练班”（劳干队），以培训工人骨干。同年暑假，广东省政府又举办了“高中以上学生军事集中训练总队”（简称集训队），总队长由省保安司令邹洪担任，省国民军训处处长李节文任常务副总队长，省教育厅长许崇清也兼副总队长，区队（排）以上干部均由国民党军官担任。规定高二以上和大学生一律参加，在广州市设3个区团，分别为大学男生、大中学女生、高中男生。并于9月开始集中军训。广州沦陷时，迁连县继续训练，至1939年1月结束。[①]在广州沦陷前，还在三元里组织了“广州市民众抗敌自卫团”。

此外，在抗战初期，广东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中共活动的限制，陆续释放政治犯，允许中共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适度开放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与中共合作组织救亡团体，除前述“广东民众抗敌御侮救亡会”之外，当局又出面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敌后援会”（广州市党部主办，后改称广州市学生抗敌救亡会），“广东青年群文化研究会”（省党部特派员余俊贤指导，简称“青年群社”），“救亡呼声社”（谌小岑主持），“抗战教育实践社”（钟天心发起组织）等一系列救亡团体。抗战教育实践社自1938年1月起在中大举办特训班，叶兆南为主任委员，第一期为“乡村工作”，科目为抗战理论、民众组织与训练、农民问题和军事讲话，以及外交、时事讲座，学员包括大中学生、公务员，日班93人，夜班44人。

国民党广东当局除明确表示坚决抵抗的立场，开放救亡运动，并调兵出省参战外，为防范日敌在华南的入侵，也采取了若干应变措施。

在军事上，国民党中央曾先后派员、派飞机到广州筹划加强华南地区防务，将之纳入整个正面战场防御体系，广州当局也予以配合，加强了戒备及努力增强防空力量。[②]

在经济建设方面：首先，加强粮食的生产、购运、管理。

广东历来缺粮，抗战时期粮食问题更为严重。据广东省调节民食会这时的调查，我国每年进口粮食约1 200万担，粤省占700余万担，约占65%。为促进粮食生产，粤省当局决定1937年度暂贷款1 000万元，又贷款100万元拨作杂粮生产建设费。战时粮食贷款处于1937年12月初成立。1938年4月下旬，又设立省银行贷款部，举办春耕贷款，放款额可增至500万元。

---

① 吴仲：《广东学生军事集训队和广东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的基本情况与地下党的活动》，见《广东党史资料》，第16辑，91～9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② 详情见本章第二节：“日机轰炸广东与广东军民的抗击”。

当局成立了广东省战时粮食委员会，省主席兼任粮食委员会主任。决定发展战时农业，奖励农产畜牧，厉行垦荒种杂粮，强迫冬耕。省府有关部门召开垦荒会议，拟定移垦计划，停止种烟一年，改种粮稻。又令各地设立储谷仓，储粮、储盐备荒，禁止酿酒。

省政府组织桂米粤盐互运，规定邻省运粤农产品免征入口税。华南米业公司在1937年组织了100万担粮食进口。其后，又经财政部特准，陆续进口75万担洋米以济广东民食。为防止奸商以粮资敌，1937年9月22日，颁布《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并继续严禁谷米等出省出口。[①] 此外，粤省生丝畅销安南（今越南）等地，为积极推进非常时期蚕丝事业，举办了100万元蚕农贷款。

其次，调剂金融。1938年5月24日，中央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由汉口抵广州，与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商谈稳定金融办法。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在广州成立联合办事处，准备推销救国公债。广东成立了救国公债劝募分会，各市、县成立了劝募支会，在粤销售救国公债2 000万元，其中1/4用于省防。广东银行界并集资400万元储粮。另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拨毫券1 000万元调剂券币比率，再进一步调剂港汇。粤省银行拟发行毫券5 000万元，调剂国币、毫券供求。

1938年4月1日，省财政厅为防止敌方吸收内地资金，开始征收沦陷区货物入口特税。

再次，指导工交贸易电讯业等适应战时需要。上海沦陷后，广州成为唯一与国外交通贸易的商埠，对外贸易激增。根绝仇（日）货、经济绝交，两会于1937年12月7日同时开始检查仇（日）货，广州市面仇（日）货渐见绝迹。日货绝迹后，广州小工业复兴，省建设厅拨款100万元，以增加省营工业生产量，计划在湘桂粤赣设推销处。省建设厅还与省银行订约，发展省营工业。

为适应战时需要，广东省成立了统制交通车辆委员会，省公路处加紧修筑公路，1937年度筑路费仍为300万元。

战时电讯十分重要，省政府决定本省无线电话改归国营，有线电话仍由省办，建设厅加速完成各县长途电话，以应战时之用。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广东钨矿业管理处扩大组织，积极开发矿藏。省

---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第377期（1937年8月30日）；第380～381期（1937年10月10日）。

政府饬令严禁钨锑等战略物资偷运出口资敌。①

总之，“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广东当局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对于动员全省军民起来抗战做了一些准备。但这些准备还是很不充分的，有的也并未落实。

① 沙东迅：《民国时期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及其应变措施》，见《广东史志》，1999 年第 1 期。



第二章　广州沦陷与日伪在广东的统治

日军入侵华南蓄谋已久，1938 年 9 月 7 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广州。敌 21 军在海军第 5 舰队协同下于 10 月 12 日凌晨分三路在大亚湾登陆，以余汉谋为首的广东地方当局疏于防范，除在福田、正果、增城等地略有抵抗外，许多地方一触即溃。10 月 21 日，日军攻占广州并迅即占领广州附近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各要点。日军为巩固对广州地区的占领，加紧扶植伪政权。1938 年 12 月 10 日，成立了由汉奸彭东原、吕春荣分任正、副会长的伪广东“治安维持会”。大汉奸汪精卫也积极到广东活动，并派其妻弟陈耀祖与彭东原等争夺对广东伪政权的控制。1940 年 5 月 10 日，以陈耀祖为主的伪广东省政府和以彭东原为主的伪广州市政府正式成立。配合日军加强对占领区的军事控制、经济掠夺和推行奴化政策。日军在广东占领区烧杀、强奸、贩毒、劫掠、加强特务统治，推行奴化教育，肆意对广东人民进行蹂躏。

第一节　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对华北、华东发动了强大攻势，企图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分别在华北和华东组织了忻口会战和淞沪会战，给敌人以很大打击，粉碎了日本侵略者 3 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由于中日两国实力相差悬殊，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军攻陷上海、南京后，就积极布置向华中、华南的进攻。1938 年 6 月，日军分五路进犯武汉，中国方面组织了 90 个师约 120 万人进行抵抗。在武汉方面的作战进行约 4 个月，日军又悍然发动了对华南的攻击。

日军入侵华南的决心由来已久。广州当时人口约120万，[①]是南中国最大城市，它不仅是广东省省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州成了国民政府军与海外联络的要地，在输入战略物资、培养抗战力量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在日军占据华北、华东许多战略要地和切断海上交通后，华南地区广九、粤汉两铁路的香港—广州—内陆区间这一路线就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对外交通线，有大量的战略物资经由这一路线运抵中国的抗日战场，其补给量约占当时进口军用物资总量的80%。[②]这样，广州和华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就更加突出。

因此，早在1937年11月左右，日军大本营就有入侵华南、攻占广州，切断我国这一最大外援路线，以削弱中国继续抗战意志的意图，并制定了代号为“A作战”的攻略广州的作战计划。“A作战”预定于1937年12月26日在大亚湾发动，但至12月22日所有作战准备工作一律中止。其主要原因是12月12日进攻南京的日军在芜湖地区封锁长江时，击伤了英国的军舰和商船，击沉了美国的炮艇“巴纳”号，随之英美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两国的舆论亦为之鼎沸，日本在外交上非常被动。所以，日本政府为避免引起英美猜疑，决定暂停对与英美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华南地区的进攻。[③]

但是，日本侵略者从来没有放弃进攻华南的计划。因为“A作战”的中止，以广东和香港为基地的援华活动更加活跃，日本方面认为攻占广州的必要性比以前更为紧迫。1938年5月底，日方在决定攻占武汉的时候，日军大本营就曾考虑从早日完成军事行动出发，同时实施攻占广州较为有利。但由于海路运输资材不足，以及进攻武汉还需要预备兵团，所以决定“待攻占汉口后再实施”[④]。6月24日，鉴于武汉会战未能速战速决，日本提出了“集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度达到战争目的”的指导方针。7月，充作广州作战用的海路运输资材准备完毕，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遂决心同时实施广州作战。为慎重起见，陆军部与海军统帅部、陆海军省及外务省进行了周密协商。8月10日，日苏签订停战协定，张鼓峰事件解决，从而解除了日军在北方的威胁，这更增强了其实施广州作战的决心。9月7日，日本召

---

① 1937年11月24日，广东省会警察局发表广州市人口统计数字：共235 679户，1 216 112人。其中男性672 136人，女性543 976人。见广州市政协文史研究馆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下），48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②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

③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中译本；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94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开大本营御前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攻占广州的正式决定。①并于当日下令组建实施广州作战的第21军司令部。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从1938年8月中旬就已开始着手准备攻占广州。作战军主要幕僚日军大佐藤室良辅等研究了攻占广州的具体计划，最后日本大本营做出了作战军主力由大亚湾登陆的方案。预定参加作战的第5师团自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陆续集结于青岛；第18师团从杭州转至上海，9月下旬集结于上海北部；第104师团也于同时集结于大连。各师团都根据实战需要进行了登陆战斗训练和改编建制与装备。9月16日，日本第21军司令部组编完成。19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广州的命令如下：

大陆命第201号 命令

一、大本营意图在进攻汉口之先后，夺取华南敌之重要根据地，并为切断其主要对外联络补给路线，占据广州附近要域。

二、第21军司令官应协同海军攻占广州附近要地，攻占广州后之占据地域另行命令。

三、台湾军司令官应对第21军之兵站给予援助。

四、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昭和13年（1938）9月19日

奉敕传宣

参谋总长　载仁亲王

第21军司令官　古庄干郎

台湾军司令官　古庄干郎



图2-1　敌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居中者）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

大陆指第273号　指示

根据大陆命第201号指示如下：

一、关于第21军之输送及登陆大致决定如下：

第一输送船队（约40万吨）　大亚湾岸　10月中旬左右

第二输送船队（约20万吨）　紧跟第一输送船队

第三输送船队（约20万吨）　珠江岸（应以主力首先迅速夺取虎门要塞）10月下旬左右

以后到达船队之登陆地点，根据情况为大亚湾或珠江岸。

登陆及今后之作战指导，参考附件广州作战要领。

二、关于与海军之协同作战，应遵照附件“广州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

有关细节需再与第5舰队司令官长官协商确定。

三、应尊重第三国之领域及权益，防止引起无谓纷争。

四、攻陷广州后之占据地域，预定限于以广州、虎门为中心，在切断广九、粤汉铁路及珠江水路所必需之范围内。

五、关于兵站及交通另行指示。

昭和13年（1938）9月19日

参谋总长　载仁亲王

第21军司令官　古庄干郎

其陆、海军攻击部队的编成与任务如下：

第21军（代号波集团）	司令官	古庄干郎	中将
	参谋长	田中久一	少将
	副参谋长	藤室良辅	大佐
第5师团	师团长	安藤利吉	中将
	参谋长	樱田武	大佐
第18师团	师团长	久纳诚一	中将
	参谋长	小藤惠	大佐
第104师团	师团长	三宅俊雄	中将
	参谋长	片冈董	大佐
第4飞行团	团长	藤田朋	少将

军直辖部队主要有：野战重炮兵第1旅团，独立重机枪3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3个中队，山炮兵2个联队，迫击炮5个大队，8个野战高炮队及兵站部队。

海军第5舰队　司令官　盐泽幸一　中将（旗舰“妙高”号）
　　　　　　　参谋长　田结穰　　少将

海军第8、9、10战队辖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

第2、5水雷战队辖2艘轻巡洋舰，4个驱逐队。

第1、2航空战队辖3艘航空母舰，搭载飞机约110架，2个驱逐队。

第14航空队辖1艘航空母舰，搭载飞机8架，还辖飞机约52架，1个驱逐队，1个炮舰队。

第2根据地队辖第11扫海队、第4炮舰队、港务部队等。

任务：

第21军在海军第5舰队的协同下，攻占广州及附近要地，切断中国军队的对外补给线路。①

此次华南作战，日军参战兵力约7万人，舰船500余艘，飞机200余架。

日军于武汉会战尚未结束之时就急于开辟华南战场，其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控制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切断香港—广州—内陆区间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外援补给路线，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战意志。第二，通过进攻华南来牵制中国军队，阻止华军北援武汉，以利于其武汉方面作战。第三，直接占领华南这一富庶地区，掠夺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第四，打通粤汉路，使南北日占区连成一片，造成全面西进的姿态，向迁移重庆的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投降。

广东在抗战开始后被划为第4战区，驻粤之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为：

广东分区指挥官、第4路军（广州沦陷后改为第12集团军）②
　　　　　　　总司令　余汉谋
第62军　　　　军长　　张　达

① 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第2卷，军事（上），685～68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② 不少史著称是在广州沦陷之前，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 541页，余汉谋任第12集团军总司令的任命日期为1937年12月4日，但台北出版的《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黄仲文编纂，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称1939年3月，第4路军才奉命改编为第12集团军。原任第4路军总司令部少校作战参谋的陈一林的回忆为“广州沦陷后，第4路军总部撤往翁源三华，改为第12集团军”。粤系将领在有关惠广战役的回忆文章中，也都用第4路军番号，故广州沦陷前，应当尚未启用第12集团军番号。

第151师　师长　莫希德
第152师　师长　陈　章
第63军　军长　张瑞贵
第153师　师长　张瑞贵（兼）
第154师　师长　巫剑雄（后为梁世骥）
第64军　军长　邓龙光
第155师　师长　陈公侠
第156师　师长　邓龙光（兼）
第65军　军长　李振球
第157师　师长　黄　涛
第158师　师长　曾友仁
第93师　师长　甘丽初（属66军）
独立第20旅　旅长　陈勉吾
独立第9旅　旅长　张简荪
独立第2团
虎门要塞　司令　郭思演
广东保安团、驻粤空军、广东江防司令部、广东警宪部队。①

但从大战前夕广东的政治、军事情况来看，备战情况是不尽人意的。一年多来，也做了一些准备，如释放政治犯，取消邮电新闻检查，允许民众组织救亡团体，组建地方武装，开办民运、防空、救护训练班，等等，曾被称为"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但表面文章多，落到实处少。关于这一点，当时即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粤省在日军登陆以前，虽然外表轰轰烈烈，口头慷慨激昂，俨然全国抗日最坚强的堡垒，然而知道内容的人，却早就说过，那完全是纸老虎。粤省的政治是"一国三公"（指第4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这三公在一切抗战国防要务上，不但不能合作，反而时常互相掣肘，互相竞争。所竞争者大都是有面子的事情，如大家各开国际宣传机关数个，所掣肘者则是真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如一方面委任许多"民军司令"，另一方面则一饷一弹不发，结果是"司令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多于弹"，讲什么"武装民众，保卫大广东！"②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944～94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② 《导报》社论：《血的教训》，1938年10月25日。

余汉谋的第4路军，主要是由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1师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官兵大部分都是广东人。在十年内战时期，曾在两广、湖南、江西打过不少仗，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在陈济棠时期，曾利用广东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向德国、捷克购买不少新式武器；一般说来，它的装备在当时全国军队中是属一流的，有些甚至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好。经过两次整编后，实力虽比陈济棠时期有所减弱，仍不失为一支10万人以上的大军。但由于主力部队不断被调离广东，内部有派系分歧，官兵走私贩私，贪享安逸；其战斗力实际上已大打折扣，在惠广战役中暴露无遗。

第二节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

大亚湾位于广州东南面，水深可泊万吨巨舰，海面宽广，便于舰艇展开；登陆后，又有公路通淡水、惠州，进军便利，且地形不复杂，适合大兵团作战，是理想的登陆地段。

日军为确保在大亚湾登陆成功，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敌军认为当21军进攻广州时，中国空军将会利用广东和福建的机场，对其舰队和登陆部队进行轰炸，因而在登陆前几天重点对广东和福建地区的机场进行了侦察和攻击轰炸，使中国空军无法在短期内使用这些基地。为了解作战地区的实际情况，敌21军还派人与海军协同，在大亚湾附近海域进行了侦察。①

日军精心策划的进攻已迫在眉睫，而国民党广东军政当局对此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妥善的安排。自国民党第4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以下各级官佐都处于一种松懈状态，军事上没做认真戒备。其实早在1938年4月初，余汉谋就接到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情报，说日军现在台湾集结陆军4个师团，海军舰艇约90艘，合计兵力8万余人，即将大举向广东进犯。这对当时的广东当局确实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第4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往翁源，并在翁源构筑了防空地下室备用。余汉谋也遵照蒋介石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第7号防御作战计划，在广州失陷前半年发至各军军部，各部大体上按照该计划执行，分别占领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作战。②

第4路军还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从香港采购了大量钢铁、水泥，分拨各阵地。但事隔不久，军事委员会又发来一次情报，说日军已改变战略，

---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95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② 卜汉池：《增城防御战的回忆》，见《广州抗战纪实》，118～1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将原准备侵粤的部队调至长江地区作战。这样一来，广东军政当局就开始松懈下来。

至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前夕，国民党广东部队的调出和驻防情况如下：

调往参与淞沪会战的有叶肇第66军［辖谭邃第159师、叶肇第160师（至武汉会战时华振中任该师师长）、彭林生教导旅］，调往参与武汉会战的有第64军李汉魂部陈公侠第155师、彭林生第187师，另有156师调往武汉，157师调往福建漳州。①

在粤部队驻防情况为：

莫希德151师，何联芳旅驻惠州澳头、淡水，温淑海旅驻深圳龙岗；

张瑞贵153师，驻深圳宝安一带；

曾友仁158师，驻新塘、黄埔一带；

李振186师，驻龙门、永汉、增城一带；

张简荪独立第9旅，驻防中山，后调回广州；

陈勉吾独立第20旅，原驻高要准备调往武汉，临急调往增城一带；

梁世骥154师，驻防花县；

陈章152师，驻防海南岛，后调回紫金；

陈崇范炮兵旅，辖两个团，驻防广州市郊夏茅；

战车部队一个营，驻防燕塘；

高射炮部队，第1连驻广州湫珠岗，第2连驻肖岗，第3连驻黄花岗；

独立炮兵第1连和高射炮机关枪营，驻石龙、石滩铁桥；

独立第2团，驻广州沙河；

税警总团，驻广州市河南一带。②

1938年10月4日，余汉谋再次接到军委会的情报，说日军已在台湾集结陆军2个师团，海军舰艇约30艘，空军各种飞机约80架，即将进犯广

① 姜克夫：《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军事史略稿》，第三卷上册，83页、1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陈一林：《广州失陷的片断回忆》，见《广州抗战纪实》，111~11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一说调出的还有邓龙光83军（师长巫剑雄、刘其宽），见黄仲文：《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3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

② 陈一林：《广州失陷的片断回忆》，见《广州抗战纪实》，111~11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东。广东军政要员对此半信半疑，以为日本不会过分刺激英国，暂时还不会入侵华南，余汉谋等高级将领也不重视这次情报，疏于防范，甚至任由所属各级官佐离开防地前往广州、香港等地游玩。① 前线部队甚至在敌登陆前夕仍然缺乏足够的警惕。时任186师师长李振追述道："10月10日，我海防部队在大亚湾海面发现有三四艘日舰游弋。因为长期以来日军为了封锁我海上交通，有日舰出没是经常的事，不认为有登陆企图。至当日下午，敌舰增至十七八艘。83军军长兼151师师长莫希德判断敌舰有登陆企图，遂即以电话报告第4路军总司令部，……我于11日零时到达惠州军部。与莫军长研究结果，认为日军确有登陆企图，主张变更部署，加强第一线兵力。当即向总部建议：将深圳防务交153师，大鹏湾一带留少数部队警戒；以何联芳旅任平山、下冲（今霞涌——引者）之守备，温淑海旅任澳头守备，师部及直属部队推进淡水；惠州防务请总部另派得力部队接替。当日黄昏前，日舰船增至四五十艘，前有航空母舰一艘，判断敌人总兵力有四万人左右。莫军长将此情况报告总部，并要求按我们所提建议，迅速变更部署，加强第一线，准备迎击敌人。但总部参谋长王俊指示：敌人不会在澳头登陆，勿为敌人佯动所迷惑，部队非有命令不准移动。"② 王俊乃何应钦的亲信，蒋介石在战前数月派他来任参谋长，"实际是指定王俊负责指挥作战和监视余汉谋。因为那时军委会已有命令，规定师以上的作战命令，都要参谋长签署，不得由主官一人擅断。"③

敌人的间谍活动也十分猖獗，日本利用广州毗邻港澳和沙面是外国租界的条件，抗战前后在广州设立谍报机构频繁活动。此种活动还深入到余汉谋部的心脏部分，如余总部的少将工兵指挥郭尔珍、少将高参李某（东北人）均是潜伏的汉奸。这两人系在抗战开始后由余汉谋的前任参谋长徐景棠以日本陆军士官同学关系介绍进来的，当时第4路军全部集训工兵、广州等处的防御工事设计和阵地组织图纸都归他们掌握。余总部本身和蒋介石军统局派来的反谍人员固属不少，但对郭、李活动一直未能发觉，直至广州沦陷前两天，即10月19日，郭尔珍潜逃香港后才被发觉。又如日本派来的女间谍，在"七七"事变开战后不久潜来广州做交际花，至1938年夏

---

① 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见《粤桂黔滇抗战》，14～1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② 李振：《广州失守的追述》，见《广州抗战纪实》，115～11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卜汉池：《增城防御战的回忆》，见《广州抗战纪实》，1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虽曾被反谍人员捕获，但用尽一切方法都无法破获其间谍组织，相反却被假供妄指，搞得满城风雨，草木皆兵。①

1938 年 9 月 29 日，日军 21 军司令部从日本门司出港，10 月 2 日到达澎湖列岛之马公。各师团分别从上海（第 18 师团）、青岛（第 5 师团）、大连（第 104 师团）各港登船，于 10 月 7 日秘密至马公集结，护卫舰队也在此前到达马公。敌大本营为了和 21 军取得密切联络，派末次中佐、雍仁亲王（秩父宫中佐）、解良七郎大尉、松谷诚少佐组成大本营派遣班，于 10 月 8 日到达马公，随 21 军司令部一起行动。为了协同作战，陆海军在该地缔结了“关于乙作战波集团长与护卫舰队指挥官间的协定”②。各师团长也和海军方面各护卫队指挥官之间分别缔结了现地部队间的协定。

登陆前，日军先派了一支部队占领三门岛，断绝从珠江口通向粤东的海面交通，封锁消息，拦截过往船只，将船拖至焚船角（现名）烧毁，把船上的人全部拉到杀人崖（现名）杀掉推入海中。

一切准备就绪，敌华南派遣军第 21 军司令官古庄干郎率领波集团主力船团—— 满载着 3 个师团的基干人员、武器、军需品等的 106 艘大船，在第 5 舰队的护卫下成两列纵队按其预定航路行进，未受任何妨碍，于 10 月 11 日黄昏到达大亚湾海面。接着，在驱逐舰施放的烟幕中进入湾内。日军的先头舰艇已于前一天进抵大亚湾附近海面。为确保顺利登陆，日军在汕头方面实行了佯攻。

蒋介石在此以前对敌情判断错误，以为日军短期内不会大举入侵华南，因而不重视华南防务，一再抽调第 4 路军部队到外省作战，以致广东兵力空虚。蒋介石还认为敌人如果进攻华南，其目的只不过在切断我广九线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太平这一段的海上交通，敌人主力必然使用在虎门要塞地带，而在大亚湾只是一种佯攻以牵制我军兵力而已。所以蒋介石的战略是以确保广九线为主旨。根据这样的判断，守军就更加忽略了大亚湾地区的防务。当时戍守惠州、平山、淡水和大亚湾沿海地带的国民党 151 师下辖两个旅，温淑海旅驻龙岗、深圳和广九线上；何联芳旅守备惠州、平山、淡水、澳头。该旅罗懋勋团团部和两个营驻淡水一带；澳头驻 1 个营，营部驻亚妈庙；土湾驻步兵第 8 连；黄鱼涌的禾里巴驻一步兵

---

① 曾其清：《抗战中的惠广战役》；张大华：《工兵指挥部在弃守广州中的一些情况》，见《粤桂黔滇抗战》，24 ~ 25 页、75 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31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中译本。

连；禾堂头驻机炮第3连。以这样的兵力与几万日军对抗，实力相差悬殊。中国守军对敌军的登陆计划一无所知，直至10月11日晚上，当守军发现海面出现日本军舰时，才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通知正在那里玩耍的军官赶快回防。当时各电影院的银幕上突然出现“151师官兵迅即归队”的字幕，弄得人们莫名其妙。

敌军开始进攻后，蒋介石最高统帅部收到的电报因为翻译错误，竟将大亚湾误为大鹏湾，蒋介石对余汉谋的应战指令因此也是据此做出，而完全是张冠李戴：“敌既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截断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唯一目的，亦为其目前最高企图，故我军不必到处设防，为其牵制，先求巩固该处既设防线，一面多构预备阵地，以备节节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图出击，以敌军全部兵力之统计，决无大举窥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着应战，予寇痛创也。”① 在敌已经大举发动进攻后，对敌进攻的方向、兵力、意图等具体敌情判断，仍沿袭此前的看法，而存在严重失误。至于对敌战略意图的判断，蒋介石则认为：“倭在粤登陆之目的：①表示其非达到中国屈服不可之目的。②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③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故其声言不危害不抵抗之人。暴寇之愚拙，自陷绝境，不败何待。④至其截断广九路之目的犹在其次。若谓占领广州有利于其战略，则更非主因，可说为恫吓我政府而不惜冒此覆灭之险，实上帝授余以良机矣。本日照常办公，对倭战略与政略自觉胜算可操也。”② 这个判断也属过于乐观。鉴于认为日本进攻广东是向英美的挑战，蒋介石分别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和在港的宋子文，让他们分别与美英方面接触，促成他们共同出面对日本的侵略加以干预。③ 12日凌晨，日军开始分三路登陆。右翼由第104师团和第9旅团担任，他们兵分二支，一支在平海的碧甲沿海沙滩登陆，到稔山后沿西北方向继续进攻平山，沿途未遇抵抗；另一支在霞涌圩以东登陆，霞涌驻有国民党海军陆战队1个营，在沙公坳略做抵抗，即向盐灶背方向溃退。这支日军也在天黑前进抵平山。担任中路和左翼的日军第18师团，其左翼支队在澳头圩西南约5公里的倒装湾小桂登陆，然

---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427页，台北“国史馆”，2010。多年之后，还有说日军是在“惠阳大鹏湾澳头、平海……各地猛攻”的（见黄仲文：《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38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2日。并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426页校补（有修改），台北“国史馆”，2010。

③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430页，台北“国史馆”，2010。

后由汉奸引导，绕过澳淡公路沿线的钢筋混凝土工事，于当日下午占领淡水镇。淡水附近原驻有莫希德师第451旅旅部和罗懋勋团团部及两个营，但在敌人尚未接近时，未放一枪便弃城向惠州溃退。中路是日军的主攻部队，登陆地点在澳头圩以东5公里的官溪（现在的东联管理区）的马涌至霞涌以西的桂米涌，这里是一片长达七八公里的海岸沙滩。登陆后经新桥、芬墩，出大径与左翼配合占领了淡水镇。



图2－2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海防空虚的情况下，侵占大亚湾

新桥是座古石桥，约1米宽，20多米长，桥下水深约2米，水流湍急，是通往淡水的必经之路。当中路一队日军在凌晨5时左右经过新桥时，遭到守桥部队151师何联芳旅步兵8连王排长率该排部分士兵的顽强阻击，他们在桥西三四十米处一个小山坡下的水泥碉堡及两旁的散兵壕内向企图过桥的日军射击，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天亮以后，敌人飞机掩护其步兵冲桥，守军不支，至早晨7时多，新桥失守，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残暴的日军将王排长剖开胸膛，吊在树上！①

与此同时，粉石坳也在激战。一股日军企图经该地奔袭淡水，何联芳旅8连大部分士兵在此阻击。由于罗懋勋指挥无能，汉奸又将通信线路毁坏，以至形成各连各自为战的局面。守军既无坚固工事，又受到日军的多

① 黄贵煌等：《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纪实》，见《粤桂黔滇抗战》，8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面夹击和敌机的低空扫射，早晨7时多，粉石坳阵地也告失守，该连仅连长率10余名士兵突出重围。

敌人进攻新桥、粉石坳的时候，原黄鱼涌驻军两个连进入企岭、石岩仔等地的水泥工事内埋伏。12日上午10时，日军向企岭发动进攻，我守军利用防御工事给敌人以猛烈打击，日军又以飞机掩护地面部队进攻，守军却只有跳出碉堡，手托机枪或在树上用步枪对空射击，对敌威胁不大。最后因孤立无援，只好撤出阵地向双罗溪方向退却。在双罗溪再次与敌交锋，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8时左右，守军战死过半。逃难民众待敌军行进后，下山将烈士遗体掩埋。日方死尸则被日军砍伐灌木立即就地火化，为此阵地附近的灌木被全部砍光。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一天之内就占领了从平山至淡水、澳头的大片领土，巩固了阵地，为长驱直入攻占广州打下基础。

第三节　惠州失守和增城之战

日军占领澳头、淡水后，兵分两路合击惠州。一路沿淡水至永湖直扑惠州，一路沿稔山至平山向惠州进攻。准备攻下惠州后即沿广汕公路，经博罗、增城直扑广州。

当时国民党军在从澳头、淡水、惠阳至博罗这样重要的战线只驻有3个步兵团的兵力，而在增城也实际上仅有一个步兵师，在蒋介石和余汉谋的心目中，以为这样有利于节节抵抗，实际上这恰恰给了日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蒋介石得到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消息，立即命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县等地调兵增强广州防务。又于1938年10月13日电令张治中部预备兵团增援广东。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于同日宣布封锁珠江口，并限令老、幼、妇、弱及公务员家属于两日内疏散。国民党中央和余汉谋亦分别发表《告全省军民书》和《告广东同胞书》，呼吁全省同胞一致奋起抗日，保卫广东。但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缺乏足够的准备和部署，军队组织松弛，虽调兵遣将，但为时已晚。

日军不顾炎热的天气，于10月14日到达惠州南郊。惠州前临大亚湾，背靠东江，实为广州东南的第一道门户。当日夜间，日军第18师团侦知防守惠州的为第151师一个团及装备较好的独立第20旅之一部。敌第18师团长久纳诚一估计中国方面会再向惠州增调部队，因而决定以先到的第23旅团当夜即向惠州发动进攻，并令第35旅团急速赶至。日军在当晚的大雷雨中开始攻城，守军利用已构筑好的工事进行顽强抵抗，双方激战至第二天

上午10时，惠州城被日军完全占领。当时驻守在惠阳的莫希德认为兵力太少，又是孤军作战，于己不利，乃决定放弃惠阳，在东江东岸构筑阵地，阻敌渡江。因而日军于同日7时轻松占领惠阳，随之又以优势兵力突破东江防线。日军乘胜前进，于16日傍晚攻占了博罗县城。



图2－3　1938年10月15日，日军占领惠州

至此，余汉谋等人才意识到敌人的主攻方向不是虎门，其目的也不仅仅是切断广九线，还要占领广州，遂决定在博罗至增城一带阻击日军，以掩护广州的大撤退。并调原驻宝安的153师钟芳峻旅到福田，原驻东莞的陈勉吾独立第20旅到增城东北的正果圩，还有一些炮兵也被调来以增强火力。但是，这些兵力再加上原驻增城的186师，相对于日军来说仍然是很单薄的。余汉谋不敢亲自去指挥这次作战，其他官佐也相互推诿，所以直到作战前一天才任命第65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由于时间紧迫，李振球匆匆忙忙带领几个参谋副官于19日赶到增城朱村设立指挥所，可是仅半天时间，作战部队就全部崩溃了。

10月17日，敌军先遣队1 000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沿博罗至增城公路搜索前进。奉命从广九铁路东调的国民党军第153师钟芳峻旅两个团于当日深夜进入福田布防。第二天凌晨，敌军到达福田，钟芳峻当即指挥本部及林君勳团，李振球第186师叶植楠团（后未及时赶到战场），协同夹击该敌。日军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一部隐蔽在小树林里，待敌接近，才出其不意的迎头痛击，打得敌人乱作一团。战约1小时，将敌击退。不久敌后续部队赶到，在坦克、飞机的协同下向守军疯狂进攻，守军利用简陋的工事与敌激战。至12时左右，守军伤亡惨重，钟芳峻旅的黄志鸿团长受伤不能指挥，撤回后方由团副徐毅民接任继续坚守阵地。战至下午2时，国民党军弹尽援绝，后方混乱不堪，一切给养都无法送上阵地。钟芳峻旅长见部队孤军奋战，已陷于三面包围之境地，为避免全军覆灭的命运，乃下令部队后撤。撤退时没有组织好，士兵各自逃命，秩序混乱，完全暴露了目标，任由敌飞机、大炮扫射、轰炸，又遭到不少损失。

国民党军一部撤往公路以北的罗浮山，一部撤往公路以南的石龙、石

滩。当钟芳峻退至新塘附近时，因部队战败，悲愤异常，愤而拔枪自杀，以谢国人。

福田之战虽然国民党军最终战败溃散，但这一次战斗却是日军自大亚湾登陆以来遇到的第一次较有规模的顽强抵抗。

敌军自与守军钟芳峻旅交战后，不敢继续冒进。敌军先头部队一个大队于19日上午到达增江东岸高地，发现增城城内守军不多，当即集中兵力攻占了该城。同时，300余敌的步炮联合队伍向中方独立第20旅正果圩阵地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

独立第20旅是1938年3月刚成立的部队，辖3个步兵团，1个特务营，最初是想建成机械化部队，装备较好，军官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年轻军人，但士兵却全是新兵，一般是入伍半年左右，少的则为3个月，训练不足。第二天，敌主力几千人到达，凭其优势火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独立第20旅阵地疯狂进攻。独立第20旅担负主阵地守卫的是第3团，第1、2团分别置于右翼和左翼。旅指挥所也设于第3团后面。战斗打响不久，第2团失去联络，第3团受敌压迫后撤，团长张琛临阵脱逃。形势已相当危急，旅部作战参谋黄韬远临时赶至前沿阵地，组织配属独立第20旅作战，正往后撤的炮兵第3营第9连（连长吴应朝）向正在山间狭道上朝守军追来的日军纵队轰击。敌猝不及防，来不及展开，又无处躲藏，伤亡较大。守军士气大振，步兵、炮兵协同作战，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正在后撤的部队也转过身来奋勇向前。守军两侧部队则迂回过来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敌人逐步后撤，守军勇猛追击，又给敌人以不少杀伤。布防老虎石山顶的3团黄植虞营官兵，英勇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毙伤日军160多名，其中还包括一名联队长。黄植虞营也付出沉重代价，伤亡200余人。至下午3时半，战斗基本结束，独立第20旅官兵停止追击，撤回正果圩吃晚饭，休整待命。

正果之战是惠广战役中国民党官兵配合较好、抵抗效果较好的一次战斗，守军独立第20旅部分爱国官兵在上级指挥失当、最初受挫的情况下，发扬积极主动的精神，奋勇杀敌。后来日方广播也说："皇军此次从澳头、淡水登陆，进攻广州，如入无人之境，只是在增城正果附近被蚊子咬了一口。"战后群众为了纪念抗日阵亡的将士，在白面石村附近建了一座纪念亭，亭内石碑上刻有："黄种图存，群英抗日；沙场战死，烈士留芳"一副对联，至今保存。①

① 黄植虞：《忆增城正果之战》，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65~66页，1987年印刷。

当晚，独立第20旅陈勉吾旅长下令部队向西北沿派潭、从化退往广州方面，但由于侧翼没有布置相应掩护部队，陈勉吾旅受已占领北面永汉的日军骑兵向南的冲击，部队大部分被冲散，旅指挥所与部队失去联系，伤员失散，重武器、辎重等多有丢失，仓皇退至从化附近，发现从化已被日军占领，只好又转向良口方向撤退。

就在正果之战前夕，第4路军总部曾召开过一次军事会议，由惯于纸上谈兵的参谋长王俊制订了一个盲目的歼敌计划。这个计划要求63军军长张瑞贵率部由三汉圩向增城前方的福田进发，作为右翼包围攻击敌人；驻正果的独立第20旅南下福田作为左翼包围攻击敌人；以总预备队之一部，即462旅922团增援。王俊称这个计划为“球状战术”，即把敌人置于中间，你踢、我踢，大家一起踢破它。

王俊制订这样一个计划的主要依据是186师师长李振曾承诺能守住增江西岸的主阵地，而其他部队也都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并及时赶到攻击阵地。可是实情却并非王俊所想象的那样乐观。186师是新成立的师，兵额不足，又未受过严格训练，该师叶植楠团仍留在罗浮山，所以实际只剩下3个步兵团，却防守着长达数十里的战线，这是很难抵挡住强敌进攻的。而隶属63军的钟芳峻旅在福田抵抗一阵后被击溃，独立第20旅虽在正果之战中取得胜利，但是第二天也被敌骑兵冲散。

几乎与正果之战开始的同时，日军向增江西岸186师阵地发动了进攻。敌人在强大炮火和飞机、坦克的配合下，沿交通线两侧采取快速进攻、猛追猛打、中央突破的战术，直扑守军阵地。战斗异常激烈，下午4时左右，守军阵地被突破。陈绍武旅长率潘标团沿广汕公路向南溃退，其余部队向从化、翁源方向撤退，增城附近主阵地完全失守。王俊的计划已根本无法实现。

在增城附近配合186师作战的中央重炮兵旅（缺1个团）以及第4路军的炮兵一部，因第一线部队已被摧垮，且受敌机轰炸扫射威胁，炮兵威力不能发挥，以至溃散逃跑。所有炮兵武器全部丢掉，损失惨重。炮兵旅长改着便装，只身逃到154师460旅旅部请求收容，其余



图2-4　1938年10月19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侵占增城城区

溃散官兵经收容后退至翁源。原为总预备队的154师撤往良口，152师邓琦昌旅向源潭撤退，158师向花县撤退，独立第9旅向清远撤退，税警团向三水、四会撤退。

从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到21日广州失陷前这短短的8天时间，日军长驱直入，连破国民党军数道防线，虽然国民党军部分官兵在福田、正果、增城等地曾有较为顽强的抵抗，但整个战场惊慌失措，互不协调；部分将领贪生怕死，指挥失误；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力量又不能有效发挥，在整体上对日军根本不能构成威胁，增城主阵地的失守，使广州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第四节　广州及附近地区失守

日军为了将国民党守军围歼于广州附近，敌21军司令部命令104师团从较远的广州东北面迂回，以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21日中午，日军司令部接到其空军送来的情报：①早晨以后未受到来自广州附近原有阵地的射击；②有汽车约600辆沿广州—从化公路北进中；③在广州南面的珠江上聚集着无数的帆船和小汽船；④广州市内数处起火。因而判断国民党军将放弃广州，遂在下午3时发布命令如下：①第18师团在攻占广州双层阵地后进入沙河地区，监视广州，同时将主力集结在龙眼洞、沙河、石牌之间；②第104师团向太平场附近急进，首先尽快切断敌之退路后，继续执行原来任务。[①]

早在日军进犯惠州时，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就已打算撤离广州。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偕省政府机关人员于10月14日退至翁源，广州市长曾养甫和市政府迁至广宁，后曾养甫在广宁组织了西江八属游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广州市的大撤退工作进行得很仓促，当敌军在10月15日继续北犯的时候，第4路军司令部反而渲染为大捷，炮制了一大堆战报，广州各报纸便据此大肆宣传，使人们对严重的敌情仍十分麻痹。17日，敌情确实已非常严重，第4路军总部才着了慌，急急忙忙叫警察局通知市民疏散。[②]

敌第18师团追击队的先头部队从增城镇龙圩出发，沿镇龙圩—广州公

---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

② 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见《粤桂黔滇抗战》，17～1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路向广州东面地区前进，在新庄与国民党独立第9旅、独立第2团遭遇，国民党军被击退。敌独立装甲车第11、51中队甩开沿途国民党军一直突进，21日15时冲进广州，并扫荡了通向珠江江岸的各主要公路，广州沦陷。

敌104师团则采取大迂回战略，从增城出发向广州以北的太平场攻击前进。在福和附近击退了国民党军一部的抵抗，此后就没遭到大的阻挡，于22日进入太平场附近。随后又奉命"向从化追击"，23日18时进入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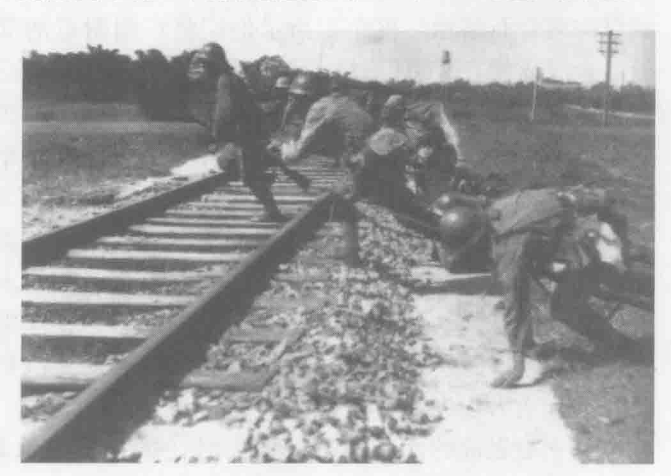


图2－5　日军在广州郊区

敌18师团的及川支队，10月12日登陆后，14日到达惠阳东北横沥圩，15日渡过东江北进，16日经茶径、三径圩、杨村至显村圩，18日到达龙华圩，21日到达永汉圩、径口时，知18师团其他部队已占领广州，遂继续向西，23日上午占领从化。日军沿途所经过的桥梁、道路，国民党守军及当地民众均予以破坏，以迟滞敌人。日军在龙华圩、永汉圩、径口等地都遭到过国民党军队的抵抗。

为配合占领广州作战，敌21军司令官决心提前实施珠江方面作战。10月21日下令"安藤兵团（第5师团）应在X＋Y日（10月21日）从现驻港口出发到珠江湾，首先迅速攻占虎门要塞，然后从珠江及其以西水流地带向广州方向突进，以利于军的主力作战"。① 当日夜间，由海军第5舰队护航，第5师团主力从大亚湾出海，第二天早晨7点进入伶仃洋和内伶仃岛附近的锚地，随即在海、空军机群的护航和导引下，对珠江两岸的炮台发动进攻。国民党海岸警备部队的炮、步兵对日军船队和登陆步兵进行不断射击，敌军遭受不小伤亡。但在日军陆、海、空军协同的猛烈轰击下，守军阵地几乎被摧毁殆尽。23日傍晚，虎门要塞两岸的炮台全部被敌占领。

22日，在珠江西岸登陆的敌41联队当晚沿水路到达顺德东南地区。23

---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

日在顺德以北的陈村与千余国民党军遭遇，经短暂战斗后，第二天占领佛山以南的澜石。第5师团长安藤利吉因而决定继续扩大战果，令部下相继占领三水、佛山，一部于29日抵达广州市西南的货仓，与第18师团会合。

20日傍晚，日军进至广州城郊。第4路军总部召开了广州失陷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余汉谋及蒋介石派往余汉谋部的参谋长王俊等人对守卫广州已失去信心，但感到责任重大，不敢独自承担这个责任，乃打电话到武汉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指示他们将广州附近的部队转移至粤北重新部署。余汉谋便在21日清晨4时下令总司令部沿广花公路向清远撤退。由于当时乱成一团，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处理，甚至连一些后勤直属机关都未通知。战局至此，为了实行蒋介石所谓焦土抗战的策略，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在10月21日发表《告同胞书》，宣布日军已逼近省城，所有机关公署、重要工厂、公共设施都要实行爆破以免落入敌手。一时城内爆炸声连连，烟尘四起。关于疏散的通知下达后，市内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广大市民成群结队，扶老携幼逃向乡间避难。由于撤退的秩序混乱不堪，又没有防空设备和隐蔽措施，致使四处奔逃的难民不断受到敌机的扫射与轰炸，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关于撤退前的混乱情况，据当时任第4战区兵站总监的李洁之记载："那时市面上一片慌乱，市民们多半向西北方向奔跑。我们到达荔枝湾，看到有一百多部汽车等待着渡江。那里的渡船能力有限，每小时只能渡4部车子。于是我们立即折往黄沙码头，找到一艘自备的电船撤往清远。""当我道经黄沙时，回头看到市面行人已经不多，珠江河面小艇已向西走避一空。远望河南士敏土厂附近，东山天河机场附近，三元里白云机场附近，都冒出了浓黑的火烟，还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大概是在烧毁一些搬不走的军用物资了。在佛山、西南沿途看到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他们沿着广三铁路线向西奔跑，不断受到敌人飞机分批袭击。死者暴尸，伤者喊救，生者抢路，惨状难言。我们沿途触目惊心，联想到国家养兵是为了卫国保民，现在敌人还没有到来，我们这一批人便纷纷各自逃命，撇下老百姓不顾，把广州就这样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现役军人，大敌当前却怯懦至此，抚躬自问，宁不愧死！"①

关于撤退前广东当局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做法及撤退时的景象，当时在广州主编《救亡日报》的夏衍在他的《广州最后之日》一文中做了切实的

① 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见《粤桂黔滇抗战》，21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记录：

10月19日下午："当局好象早已决心放弃这个中国仅有的富庶的城市了。警察无秩序地在驱逐市民，在仓惶地逃避了的市民后面，他们就从容地收拾了市民剩下的东西！对于战事任何机关都守口如瓶地不发表一点消息，而一切公用机关，邮政、电报、银行都已经自动地停止工作了。整个广州象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再也没有人出来过问，'保卫大广州'的口号也悄悄地从那些忙着搬家眷的人们嘴里咽下去了。"

10月20日中午："中央社早已不发稿了，广州的晚报，一律停刊了，电讯断绝了，要发稿的时候，除开欧阳山兄（《救亡日报》在前线的特派记者——引者）的战地报告外，什么战事消息也没有，打电话问，什么地方都没有人接。"只好决定在21日之后暂行停版。

21日凌晨1点以后："远雷似的炮声，大家听到了，有风的时候，还夹杂着煮豆似的机关枪声音，……接着，是广州已经几个月不曾有过的夜间警报，警报未完，机声已经在头上了，满街是汽车的声音，远远的火车机关车的吼声，炮声，铁甲车碾地的那种可怕的声音……全市漆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全社12个人，只拿了些日用必要的东西"，匆匆撤出广州。①

日军发动广州作战，目的之一即为配合对华中武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首尾难顾，结果竟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广州沦陷，华中已是几面受敌，战事再难以为继，只得随之匆匆结束。

这次日军轻而易举攻陷广州，损失甚微。其作战兵力约7万人，共战死173名，伤493名。投入战马27 000匹，报废和死亡1 069匹。② 广东部队与其他地方的国民党部队比较，一般说来装备较好，有相当数量的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配合，轻武器中连发武器较充足。但战前有6个师和几个补充团被抽调北上参加武汉会战，这时留驻广东的部队约为6万人。在日军进攻面前，未能有效发挥，反而损失惨重。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此役共缴获中国军队步枪2 371支，轻重机枪214挺，火炮134门（不包括珠江沿岸的要塞炮53门），战车及轻装甲车21辆，汽车151辆，俘虏1 340名。③

敌21军占领广州后的布防情况为：第104师团位于广州东北的从化、

① 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23~2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

③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

以北的源潭墟地区；第18师团位于广州以东的增城、东南的石龙地区；第5师团位于广州西南的佛山及以西的三水地区。1938年11月9日，古庄干郎调出，原第5师团长安藤利吉接任第21军司令官，11月29日，第5师团调回青岛，原在武汉的台湾混成旅团于11月19日调至广东，旅团长为饭田祥二郎少将。①



图2-6 接替古庄干郎出任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官的安藤利吉

这次战役造成中方惨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国军队相对于日军来说，武器装备太差、战斗技术不足等客观原因外，主观原因主要有四：

第一，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对敌情判断失误，认为日军在短期内不会大举进攻华南，所以抽调了大批精锐部队北上参加武汉会战，共计有6个师和几个补充团，约占广东总兵力的一半，这严重削弱了华南地区的防御力量，广东当局实际控制兵力仅为6万人左右。日军进攻开始后，蒋介石没有派出哪怕1架飞机支援华南战场，所以制空权完全操纵在日军手里。

第二，战前广东军政当局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前沿阵地的官兵根本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有的甚至还在广州、香港等地玩乐，以至于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下，措手不及，被动挨打。

第三，广东地方军政当局指挥不灵，措置不当，各部之间不是密切协同，相互支援，而是互不配合，联络失灵，许多部队在战场上都是孤军奋战，以至被日军各个击破。

第四，间谍、汉奸活动造成极大危害。除前述事例外，驻防淡水一带的国民党部队走私严重，“他们经常派大卡车多部偷运赣南的钨矿出口赴港；同时又在香港购办大批洋货运入内地倾销，……而日军正好利用这种机会，有计划地派便衣特务一批又一批乘搭他们的走私卡车混进淡水墟，预先控制淡水一带的市镇乡村，并在登陆前截断各县的电话线，破坏我通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11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讯设备，接应敌人大部队登陆。因此，日军登陆后消息隔绝”①。又如“在惠博战事进行中，最活动和最能给人们威胁的，要算敌人的空军和汉奸。”“在博罗城以西沿公路的各乡镇电话，实际上于10月13日即被汉奸完全破坏，致各级地方机构尽失联络。由于通讯障碍，汉奸即乘机渗入难民队里乱造谣言，进行捣乱。如14日敌机轰炸长宁时，就有汉奸乘机砍伐公路电杆，……又15日敌机轰炸福田公路木桥时，亦有汉奸以红布一块铺置桥面，指示目标，……凡系单独行动的敌方部队，均带有汉奸同行，在敌部队之前，逐步刺探。……在10月16、17日，由仍图经显村进攻龙门之敌，亦系汉奸带路，……闻这些汉奸，多系过去惠、博一带私枭，他们经常携带禁品，避开关卡检查，习惯于走羊肠山径，敌即收买他们为其向导。故敌踪所至，无论荒村僻路，均如识途老马。”②

日军侵占广州后，即迅速加强对广州的控制，利用汉奸重建广州统治秩序，以便利其殖民统治和掠夺，并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广州这座昔日美丽富饶的华南大都会，从此竟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呻吟了差不多7年。

广州在短短10天即告失守的消息传出，海内外为之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驻美大使胡适致电蒋介石，谓“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广东旅渝同乡会致电余汉谋、吴铁城，责问广东当局“准备年余，何以不及十天，广州遽陷？”人民群众对广东军政要员的表现尤为不满，“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冇甫”的讽刺民谣也从此不胫而走。③ 邹鲁等在渝粤籍要人感于“地方上负责当局，既不能预防于前，又不能抵抗于后，旅渝同乡无不愤慨。因此集合在渝中央委员，联名电广东所有在籍军人，即刻起来策动民众共保家乡，以期亡羊补牢。”④ 当时电报的措辞应该严厉得多。因此事反响甚大，故24日，蒋介石专门复电邹鲁、孙科等人，称广东失守应由他负责：“广州失陷，以粤省精良部队全调长江前方应战，故粤中空虚，敌军趁我不备，直窜广州，此为弟指导无方，顾虑不周之所致。顾此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

---

① 冯湛泉：《广州沦陷前后见闻》，见《广州抗战纪实》，15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钟凛之等：《惠博沦陷亲历记》，见《粤桂黔滇抗战》，81～8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③ 张洁：《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到广州沦陷》，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56页，1987年印刷。

④ 邹鲁：《回顾录》，41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① 但对粤籍人士的反应，蒋介石内心是甚为不满的，其在当日日记中称“广州失陷，粤中落伍军阀与政客勾结，大有乘火打劫之象”②。

不久，蒋介石对此次作战不力的将领进行处分，余汉谋革职留任，莫希德押重庆交军事法庭审判，第186师师长李振、第154师师长梁世骥各记过一次；广东宪兵司令李江未见日军先行撤退，又复畏罪潜逃，通缉归案究办；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工兵指挥郭尔珍通缉归案究办。

第五节 日伪政权的建立及其黑暗统治

10月21日下午，日军占领广州。日军攻占广州后，军事上一方面在广州外围的顺德、黄埔、增城、佛山、三水及西江、北江、东江沿岸各要点设置重兵，构筑工事，加强守卫；另一方面又北犯从化、花县，并集中力量企图消灭活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抗日武装，巩固其对广州的占领。在政治上，日军则积极扶植汉奸，组织傀儡政权，以便利其对广东人民的统治，实行所谓“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政策。



图2－7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市政府

从22日下午始，日军伙同汉奸开始在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劫掠，所有大商店门窗悉被击破，大批商品被掠走。23日始，广州市内浪人、汉奸四处纵火，“每小时均有新火头发生”。抢劫者初为汉奸，其后则为日人。③广州市内劫后所余的新式省营、民营工厂也难逃劫运，几乎全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464～465页，台北“国史馆”，2010。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4日。

③ 《广州市陷入混乱》《广州成火焰地狱》《广州火势未衰》，1938年10月24日、25日、26日《申报》。

部为日军占据或劫迁。繁华的广州形同一座死城。粤海关税务司的情报对此的记载是："人们会回想起，去年（指1938年）10月中国军队撤退后不久，本市好几处，特别是沙面附近的商业中心被火烧了，加上刮季风，熊熊大火连续烧了整整三天，结果造成了本市空前的财产损失。"①



图2-8 日军进入广州市区惠爱路（今中山四路一带）



佈告

一、絕對不准市民持武器及彈藥

二、若有發見隱匿武器及彈藥者即嚴懲戒

三、若有提出武器及彈藥給附近之日本軍隊者則以相當價格購買

四、密告隱匿武器及彈藥者有重賞

大日本南支派遣軍司令部

图2-9 日军搜缴广州民间武器的布告

为了对付广州郊区的抗日游击队，日军一到晚上7时就宣布戒严，严禁市民通行，并经常在市内突击搜查，稍有可疑者即被日军逮捕杀害。在黄埔港附近，日军设立了宪兵大本营，每日均有大批同胞被日军押解至此审讯，酷刑拷打之声及惨叫声日夜不绝。刑讯之后日军便将人运至黄埔牛山脚下枪杀，将尸体扔进废旧的炮坑。仅此处被残害者达万人以上，日积月累，尸骨满坑，臭气熏天，被附近居民称为"万人坑"。在黄埔大沙路口的一棵百年榕树下及其他地方，日军吊打残杀过无数群众，并将死者尸体悬树示众，以至于人们经过此地时都心惊胆战，不敢驻足。② 日军在向城北进犯时，沿途捉住南村、园下村村民15人，全部捆绑拉往水塘边枪杀；后又抓住其他村民20多人，在被迫为日军拉回大炮后，日军竟残忍地用长剑斩断他们的头颅，人头滚地，鲜血喷射，惨不忍睹。③ 在广州东郊，日军采用斩头、打活靶、活埋、电击、集体枪杀等手段，杀害了大量无辜群众。有

---

① 《各项事件传闻录》（英文），广东省档案馆藏，94-1-1591。转引自黄菊艳博士论文。

② 黄晨光：《日军杀我同胞的牛山"万人坑"》，见《广州抗战纪实》，395~39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刘侣剑：《日军在广州近郊的暴行》，见《广州抗战纪实》，38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一次，日军抓住30多名村民，强迫他们排成一排，用铁丝穿过每个人的两只手掌，再把铁丝绑在村旁两棵树上，然后开枪逐一杀害。日军为恐吓村民，还逼迫其余村民前往观看。①

日军所到之处，兽性大发，奸淫抢劫，无恶不作，甚至肆意拘捕良家妇女充当军妓，不从者即予杀害。日军军纪败坏，无论白天夜晚，随时都会闯入民房抢掠财物、强奸妇女。1938年11月8日，日军出动数百人对增城西洲村进行骚扰，见人就刺，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捉到妇女就强奸，共强奸妇女20多名，上至老妇，下至10余岁的女童都未能幸免。② 1939年11月17日，日军在广州拘捕良家妇女2 000余人，关押在黄德光医院编为"姑娘慰问团"，分送前线充当军妓，拒绝者多被残杀。③ 日军在广花公路各处交通要道设立哨卡，任意杀戮群众，侮辱妇女。1942年春某日，日军凌辱3名青年村妇，脱光她们的衣服，其中一妇女反抗，被当场以刺刀刺破腹部杀害。④ 在花县农村，日军勾结汉奸，经常强迫或诱骗农妇到日军营中当军妓。⑤

1940年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为使两广成为向我国内地进攻的策应地区和进窥东南亚的基地，决定成立华南方面军，安藤利吉任司令官直辖第18、38、104、106师团和独立飞行队，另辖驻南宁的第22军，22军由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组成，师团长为久纳诚一。

1940年10月，安藤利吉因在指挥部队侵占越南的过程中采取了若干与日本政府意图不符的行动，被撤职，10月3日，由后宫淳中将任华南方面军司令官。

1941年11月，后宫淳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广州日军番号改为第23军，司令官为酒井隆中将，辖第38师团（宝安）、第51师团（佛山）、第104师团（增城）、第19旅团（潮州）、独立第1步兵队。1942年7月后，第51师团调出，独立第1步兵队改编为独立混成第22旅团（驻中山）。

---

① 樊积龄等：《日军在广州东郊的罪行》，见《广州抗战纪实》，39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日军蹂躏增城西洲村纪实》，见增城党史丛书"增江怒涛"，1991。

③ 张洁：《日军铁蹄下的广州》，见《广州抗战纪实》，37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④ 刘侣剑：《日军在广州近郊的暴行》，见《广州抗战纪实》，38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⑤ 陈寄鸣等：《日军在花县的暴行》，见《广州抗战纪实》，41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1943年3月，田中久一中将接任第23军司令官，成为后期日军在华南的最高指挥官。1944年2月，该军增辖新编独立步兵第8、13旅团和第22师团。1944年9月，该军主力两个师团、两个旅团进入广西参加打通湘桂线作战，只留下第8、13旅团在广州地区。到1945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准备对付美英的进攻，决定收缩战线，指令：第23军，以第104师团（末藤知文中将，司令部驻惠州）、第129师团（鹈泽尚信中将，驻惠阳淡水）、第130师团（近藤新八中将，驻新会沙湾，后移驻番禺），独立混成第23旅团（下河边宪二少将，驻广州中山大学旧址），独立步兵第8旅团（加藤章少将，司令部设新街）、第13旅团（川上护大佐，驻广州），香港防卫队（冈田梅吉少将）为基干，迅速将分散各地之部队，撤收至广州附近，以确保广州、香港周围之要域。至7月末要大体完成广州、香港地区对美英作战之准备。此一态势基本维持至日军投降。①

1939年，日军在广州组建了细菌战机构：波字第8604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为佐藤俊二军医大佐，配属有1 200余名专业人员。大本营设在广州百子路（现中山二路）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内。本部下设总务课以及细菌研究、给水研究、传染病治疗研究、鼠疫研究和病体解剖、器材供应5个课及疟疾研究室、细菌培养室等。该部除担负侵粤日军防疫给水保障任务外，主要是从事细菌和各种传染病的研究和实施细菌战。在部队长佐藤俊二指挥下，采取食物撒菌、人体注射和带菌蚊虫、跳蚤、老鼠传播等手段，秘密杀害中国军民，并留下严重的疫情后果。②

驻粤日军为加紧对广东的控制和搜集情报，在广州建立了多个情报机关，实行军事占领和特务统治相结合。这些机关包括：

第21军参谋部情报科（第2科）。军以下各师团、旅团、联队参谋部内均设有一个情报室，情报室下有由汉奸组成的侦谍队及多个情报点。

广东特务机关。1939年设于广州北京路，首任特务机关长为矢崎勘什中将。内有日本特务30余人，汉奸50余人。设有政务班、军事班、经济班、特高班、庶务班。政务班的任务是控制汪伪广东省政府的机关团体和监视汉奸大员；军事班的任务是控制伪军、伪警；经济班的任务是统制物资和掠夺物资；特高班的任务是指挥汉奸特务搜集情报和镇压抗日活动。其外围特务机关有4个，即设于广州太平南路的“长利行”，设于广州沙面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4册，2 82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②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卷13（军事志），69～70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的“兴亚会馆”，设于德政中路的“水野联络所”，设于吉祥路的“东亚研究所”。该机关掌握许多宗教帮会组织，如回教协会、佛教协会、青帮组织等，利用他们进行谍报谋略活动。广东特务机关下面还设有惠州分机关和汕头分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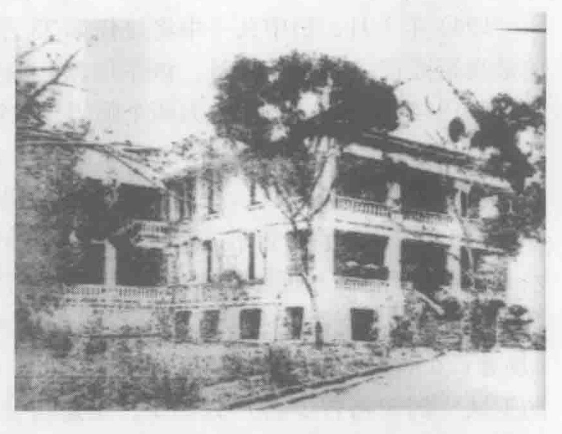


图2－10　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在广州的大本营遗址（现为中山医学院旧图书馆）

广州菊机关。1942年4月设立，机关长为菊池信中尉，他原名竹田信，后来他又另外组成一个“竹田机关”。广州菊机关的活动范围包括广州、南海、三水、新会、高要、花县、惠阳、博罗、东莞9个县市，主要任务一是收买网罗土匪兵痞组织武装特务队；二是搜集日军封锁线前沿地区情报；三是对国民党军及其地方游击队进行诱降。菊机关有日本特务10余人，初设时有汉奸140人，最多时达560余人，下面设有4个支局和1个特务队。1942年7月，菊机关将之合并为“北江工作总队”，下设庶务、宣抚2个班。1943年3月，又另外成立了一个“西江工作总队”。1945年2月成立的“广州竹田机关”，任务则是专门对付中共的东江游击队。



图2－11　日军在广州的特务机关

广东宪兵队。属“南支那派遣军宪兵司令部”，地址设在广州市广大路，任务是搜集情报镇压中国人民和侦缉抗日活动，下设东、南、西、北、

中区、水上、江南芳村7个宪兵分队。

此外，还有1939年设立的广州松机关、1944年6月设立的广州吉野机关、湛江高杉机关、广州加加美机关、广州三角机关、广州林机关、广州原机关等。① 与日伪军一起，在广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警宪特统治网，肆意对广东人民进行蹂躏。

日本在广东进行了疯狂的贩毒活动。广州被占以后，在日本人的鼓励和汉奸的利诱下，鸦片烟馆和赌馆在市内林立，甚至街道上的走廊、人行道都可随意设立海洛因摊、红丸摊、牌九色仔赌摊，吸引路人前来吸和赌。初时毒品价格低贱，鸦片1角多1钱，红丸1角可购二三十粒，以引诱一般无知的市民上当，受毒瘾的控制。鸦片烟馆也成为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的经济来源之一。

1939年3月，与华南日军特务机关关系密切的日籍台人陈思齐在广州设立福民堂（至1943年5月止），囊括了广州的鸦片专卖权，由陈思齐一次交纳20万元军票给广州日军特务机关，另每月再交1 000元（军票1元＝0.010 4美元）。此后又以月交50万元（约合黄金1 000两）取得对广东全省的鸦片专卖权。福民堂初期在广州设立"售吸所"70多家，分销处6个，其余向福民堂交纳一定费用而开设的大小烟馆近350家。在广州附近的南海（包括佛山镇）、番禺、顺德、新会、三水等地设有7个福民堂的专卖分处，总销量与广州市区的大体相同。花县则强制成立了一家福民堂鸦片生产中心，专事生产海洛因。日本对广州当地的流氓的控制，是采取"以流氓制流氓"的办法，允许他们以维持治安的特权，给予他们开设烟馆、赌馆、售米、售换钞票等特权，让他们互斗互杀，互相牵制，但也要他们负责其控制区内的基本秩序。

广州鸦片的来源，由日本公司或日军船艇直接或间接运自伊朗，而福民堂的鸦片，则大部分自伪满洲国购来，用日本军用船只运输，在广州本地煮成烟膏出售。赢利除每月交日军特务部50万元外，其余数十万元，福民堂也不能独吞，其中绝大部分仍须上交日军特务部，为日军的特殊财源之一。至1940年之后，才考虑拨出一部分给伪政府使用。

为保障鸦片供应，自1939年下半年起，日伪即开始在广州附近的从化、番禺种植罂粟，据说在番禺即种植了3 400多亩，收获之后，每亩收税40元。广州周围其他各县也多有私种鸦片的，日军甚至在潮安等地公开张贴

① 逄复主编：《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178～19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告示，鼓励人民种植鸦片。1941年12月之后，广州市郊及附近各县种植罂粟更为普遍：市郊如嘉禾、龙归、人和、南村、北村、竹料、钟落潭一带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同安、同知、榕树头、长湴、龙眼洞一带所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南土”；石牌、员村、程界、车陂、棠下、朱村、黄村一带生产的鸦片，俗称“黄埔土”。东莞生产的鸦片称“东莞花叶”；其他还有从化、花县，以及四邑（开平、新会、恩平、台山）所产的鸦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海上运输几乎被切断，中国东北的“大连土”无法用船艇南运，1941年，为应付广州方面对鸦片的急需，日军竟将生鸦片装在石油桶内用轰炸机运至广东，由负责日军给养的“国策公司”出面售卖。日军司令部内则经常另储有60公斤的生鸦片四五包，随时准备售出。为贩毒牟利，无所不用其极。①

日军在占领区还肆意搜刮资财。截断侨汇、发行军票、盘剥工农、摧残实业，造成占领区各地工厂倒闭、田园荒芜、商业凋零、饿殍遍地。日军为了榨取商业财富，胁迫兴办由华人出资、日人入空股的合作社，从而瓜分利润、操纵物价。日货充斥广州市场。在日军铁蹄之下，占领区人口日益减少。战前广州约有170万人，到1943年8月，只剩三四十万人，②一片萧条荒凉景象。

日军占领广州后，又加紧扶植汉奸，建立伪组织和伪政权。1938年12月10日，在日军策划和扶植之下，成立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由汉奸彭东原、吕春荣分任正副会长，会内设置秘书、治安等处，潘芸阁为秘书长，吕春荣兼治安处长，作为广东占领区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③关于该维持会的成立，有学者认为，由于日军对广东的长期轰炸等原因，“故广东人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极恶毒式的贩毒活动，敌忾之心最深，而痛恨日本人的情怀似乎较之福建人远为强烈。”“一般在日军占领后的中国城市经常所迅速成立起来的‘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在广州则在拖延了50天之久之后

① 以上有关日军贩毒部分摘引自李恩涵：《日本在华南的贩毒活动，1937—1945》，载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期，1999年6月出版。

② 张洁：《日军铁蹄下的广州》，见《广州抗战纪实》，37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陆满：《广州沦陷后汪伪群丑之争》，载自《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7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

的1938年12月10日，才由无多大社会地位的彭东原与吕春荣组织起来。”① 这一伪组织成立后，又加紧制造傀儡，“如黄大伟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叶福为伪广东绥靖军主任，周有日、曹日文、门少山等为伪广东维持会委员，同时复组织广东伪政务委员会，陈耀祖、彭东园（原文如此，下同）、吕春荣等为委员，潘芸阁、欧大庆等分任为秘书长及厅长等职。伪广东沙田整理委员会，以许少荣为委员长。李超群与饶善初二逆分任伪华侨联合会正副会长，李家英为委员。上列各伪机关成立后，各傀儡借其千载一时之机会，莫不以贪污狡诈为能事，群狗争食，烟赌林立。彭吕两逆互相猜忌暗斗，各拉党羽爪牙。彭东园以潘芸阁、李道轩、周有日、欧大庆等为其党羽；吕春荣则以黎耀、曹日文、吴少康等为其爪牙，争向其主子献媚，并曾有一度剧烈之冲突，后经温宗尧由上海南来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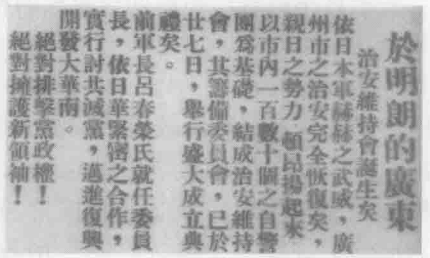
图2－12　伪广东治安维持会会长彭东原（前排左二），副会长吕春荣（前排右一）



图2－13　1938年12月，伪广东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



图2－14　伪广东治安维持会成立时的所谓庆祝游行



於明朗的廣東
治安維持會誕生矣
依日本軍赫赫之武威，廣州市之治安完全恢復矣，親日之勢力，頓已揚起來。以市內一百數十個之自警團爲基礎，結成治安維持會，其籌備委員會，已於廿七日，舉行盛大成立典禮矣。前軍長呂春榮氏就任委員長，依日華緊密之合作，實行討共滅黨，邁進復興開發大華南。
絕對排擊黨政權！
絕對擁護新領袖！

图2－15　日军张贴的有关成立伪治安维持会的布告

① 李恩涵：《日本在华南的贩毒活动，1937—1945》，载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期，153页，1999年6月出版。

解，始稍平息。”① 该会一成立，立即遭到广东民众的唾弃。另外，在日本海军的支持下，孙承泗等汉奸串通组织了一个所谓“民船公会”，管理水上交通船只，在行政系统上归“治安维持会”管辖。在番禺市桥一带有敌伪组建的护沙大队，由李辅群为大队长；在东莞、增城一带有以曹荣为首的护沙大队。

及后，彭东原趁伪广东省政府尚未成立之机，要求日军全力支持他，把“治安维持会”改组为伪广州市公署，以把持将来的伪省政府。伪广州市公署成立后，彭东原获任伪广州市长，下设秘书处、财政处、司法处、警务处等。原维持会副会长吕春荣因与彭东原矛盾重重，此时便独树一帜，自行组建“和平救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但因实力不够，为时不久即告瓦解。伪广州市公署成立后，汉奸们为了敛财，在市内开设妓馆征收花捐，并派人包揽烟赌，为虎作伥。汉奸们又组织伪市商会，以植子卿为会长，纠集一批奸商开设米店金铺，操纵米粮，炒卖金银。汉奸们还主办了一份《民声日报》，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充当日军喉舌。



图 2－16　日占时期广州公开的妓馆

关于日军占领广州前期伪政权的特点，一位学者认为：“日军占领下的广州与其周边地区，由于没有在政治上与在社会上够分量的广东耆宿肯出任当地伪政府的领导工作，其伪政府在品质上甚至无法与华北的王克敏伪政府与华中初期之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政府相颉颃，其所能实行的统治政策，只能大略如它在华北与华中低层次的县、乡、镇较小地区的统治一样，实行赤裸裸地利用地痞流氓和土匪之流的人士以掌握地方权力，以华制华；一方面给予这些人‘维持治安’的权力，另一方面则给予他们开设烟馆、赌馆、卖米、兑换钞票等经济特权，以谋取大利。所以，当地社会的糜烂，

① 《广东省奸伪动态调查专报》(1940 年 11 月 1 日 粤统字第 20 号)，广东省档案馆编：《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243 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是可想而知的。”①

广东“治安维持会”成立后的第8天，汪精卫偕同其妻陈璧君及亲信离开重庆经昆明出逃河内，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汪精卫为了建立他的叛国投敌基地，壮大他的投降势力，从而在日本人面前抬高身价，1939年7月23日，乘专机由南京飞抵广州。汪精卫到达广州后，即与时任日军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的安藤利吉密谈，乞求日军支持成立伪中央政府，并策划在广州建立伪政府和对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诱降活动。汪精卫还召集广州地区的汉奸头目了解情况和布置成立伪政权的具体任务及安排。②

汪精卫在广州的卖国活动得到了日军的支持。8月11日，日军华南方面军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声称日汪意见已经完全一致，日军不仅支持汪精卫广播讲话，而且愿意尽量给予援助。日汪达成了如下协议：第一，汪精卫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在华南建立华南政权。第二，华南政权建立后，日军即把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卫、行政、经济等权力移交该政权。第三，对国民党将领的诱降活动，首先把重点放在张发奎、邓龙光等人身上。③

根据汪精卫和华南派遣军关于筹建华南政权的协定，1939年9月16日，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伪广东省党部执委会，汪精卫以其妻弟陈耀祖出任主任委员，以在广东扩张势力。伪广东治安维持委员会会长彭东原对此虽有不满，但知道汪系处于伪中央的地位，难于与之抗衡，于是先将收入最丰的广州市据为己有，并趁伪广东省政府尚未成立，于11月18日宣布撤销维持会，而于20日成立伪广州市公署，自任市长。彭东原分别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所属各处接管，以其爪牙潘芸阁、许少荣、欧大庆、李道轩分任秘书处、财政处、复兴处、公安处处长。同时，彭东原还组设广东省政务委员会筹备处，自任主席，与汪派的陈耀祖等人相对抗。

汪精卫广州之行后，广州地区的汉奸更加嚣张起来，其汉奸活动更趋公开和频繁。1939年11月15日，原国民党第1军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

---

① 李恩涵：《日本在华南的贩毒活动，1937—1945》，载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期，159~160页，1999年6月出版。

② 张洁：《日军铁蹄下的广州七年》，载自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216页，1987印刷。

③ 《汪精卫与华南派遣军协商事项》（1939年8月16日），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1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挥黄大伟率部投敌，被委任为伪和平建国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① 日伪当局为了全面控制广州，还胁迫各行业建立了各种“公会”，如米业、轮船业、航运业、酒楼茶室业等公会，分别由汉奸担任头目。此外，日伪还成立了“满族留粤会”“华南体育协会”“妇女会”等伪组织。日伪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广大民众都成为服服帖帖的“顺民”。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但由于日本推行“分治合作”的政策，汪伪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范围很小，因此汪精卫很想把广东纳入其实际控制之下。早在1939年冬，汪精卫就派其妻陈璧君以党政军特派员身份从南京到广州筹建伪政权，提出由陈耀祖任伪广东省主席，极力削弱彭东原的伪市府权限。但日本华南派遣军认为陈耀祖资望不够，有意支持彭东原出任，并提出原维持会全班人马在省市政府成立时照原级录用。汪精卫因彭东原非其嫡系，坚决不愿接纳，仍于1940年4月12日亲自出马，与其干将林柏生、周隆痒、陈耀祖等飞抵广州。下午5时，汪精卫谒见安藤利吉，商谈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及省长人选。13日，汪精卫在中山纪念堂对伪省市官员发表讲话，要求“发挥和平反共救国真义”，并于晚上发表广播讲话，宣扬投降卖国理论。由于日军坚持原议，汪精卫只得同意由汪伪中央立法院长陈公博兼任伪广东省政府主席，在陈公博未到广州前由陈耀祖代理，而广州市伪市长职位则让与彭东原。4月23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伪广东省政府组成人员。伪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公博兼任，陈耀祖代理（兼建设厅长和保安司令），委员有周应湘（兼秘书长）、汪宗准（兼财政厅长）、王英儒（兼民政厅长）、林汝珩（兼教育厅长）、彭东原（兼广州市长）、周秉三（兼外交特派员）、李道轩（兼警务处长）、黄子



图2-17 汪精卫在广州与日本指挥官安藤利吉会见

① 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美、周之桢。5 月 10 日，伪广东省政府和伪广州市政府举行成立典礼，沐猴而冠。①

伪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建立后，极力强化其统治。

首先，进一步加强对省内占领区的军事控制。广东敌占区范围十分有限，仅限于广州、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并在各抗日力量的威胁之下。为加强控制，1940 年 5 月 15 日成立了伪广东省保安司令部，5 月 27 日成立了伪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其后在保安司令部下面又建立了一个特务总队。1941 年 4 月，日伪当局又增设广东省警防司令部，统辖所占区的警察局、保安队和自警团。② 1941 年 9 月，汪伪又成立伪广州绥靖公署，任命陈耀祖为主任，统辖驻粤伪军。但无论日伪采取何种措施，也时刻处于恐惧不安之中。因害怕游击队的袭击，广州到江门的轮船、广三和广九以及粤汉各铁路沿线，都要由军舰或大批军警护航护路。

由于广州市郊及各地抗日游击队日益活跃，1943 年春，日伪试图通过"清乡"来稳定其统治，但是由于日伪在乡村既无真正听其驱使的基层机构，又无群众基础，"清乡"往往并不成功。为加强效果，汪精卫于 1943 年 5 月 1 日特派在南京、上海一带疯狂"清乡"的伪江苏省长兼警政部长李士群来广东指导"清乡"，并于年底任命伪广州绥靖公署参谋长黄克明为伪广东清乡事务局长，随后在东莞、宝安、中山、新会、南海、顺德等地开展以掠夺战略物资为主要目的的"清乡"运动。

1943 年 3 月 17 日，为了加强对广州的控制，伪广州绥靖公署在市内增设了警务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市伪警，同年 11 月又增设伪宪兵第 4 大队。1944 年 6 月，日伪当局又乞灵于保甲制，成立伪省市保甲委员会。8 月，伪广州市保甲会还对广州市户口进行清查，但由于广州市民的抵制，加上战时流动人口多，日伪当局从未查清广州市民户口，乡村户口更查不清，所谓保甲制不过徒具形式而已。

其次，对财政金融的控制。自日军攻占广州后，粮食就极为缺乏。因日军实际控制范围不大，郊县农民弃田外逃，本省粮源不敷供应，日军只能依靠从日本、台湾或泰国购进粮食，但在运输途中又经常受到抗日武装的水陆袭击，供应十分紧张，加上日伪大小官员贪污成风，广州市民经常

---

① 以上汪伪广东政权成立部分见郑泽隆：《汪精卫与广东伪政权》，载自《广东党史》，1998 年第 4 期。

② 张洁：《日伪在广州的罪恶活动》，见《广州抗战纪实》，432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处于饥饿之中。1941 年 7 月之后，因被日本军舰包围，香港粮价猛涨，大批居民离港返穗或经穗回乡谋生，12 月份日军占领香港后，返穗港人更是超过 46 万。1942 年 6 月 22 日，伪广东省政府开始实行计口售粮和食盐凭票供应。①

随着粮油价格的飙升，广州金价也一路疯涨。1944 年伪广东省政府对所有金铺全面实行登记，企图加以抑制，但毫无效果。无奈之下，伪警务处于 7 月底开始派出大批警员坐镇所有金铺监视，并曾拘捕 20 余人。8 月 11 日，伪广东省政府更勒令全市金铺停业 6 天，也以失败告终。对于日益贬值的汪伪"中储券"，伪广东省财政厅于 1944 年 5 月 4 日出示布告严禁市民"歧视中储券"，但市民依然千方百计予以拒用而暗中使用法币。由于财源枯竭，日伪政权便开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1944 年 5 月又增收所谓"通行税"20%，乘车坐船也要交纳重税，市民更是苦不堪言。②

---

① 张洁：《日军铁蹄下的广州七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225 页，1987 年印刷。

② 张洁：《日军铁蹄下的广州七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227 页，1987 年印刷。

第三章　日军扩大侵略与汪精卫的诱降阴谋

日军侵占广州后，广东地方当局北迁韶关，与日军对峙。日军为进一步切断我国沿海的进口通道，接连发动了对广东沿海各要地的侵占。1939年2月，敌21军台湾混成旅团及海军第5舰队攻占海南岛，并谋求长期占领和统治，岛上军民特别是中共领导的琼崖纵队坚持了长期英勇的抵抗。

1939年6月，敌21军第104师团所属第132旅团及部分海军协同攻占汕头，国民党守军华振中独立第9旅进行了较为顽强的抵抗，潮汕民众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对占领军的斗争。

1939年7月，汪精卫飞抵广州，谋求侵粤日军对在华南建立伪政权的支持，并对粤系国民党将领进行诱降，遭到张发奎、余汉谋等粤系将领的痛斥，广东各地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

1943年2月，日军又攻占了广州湾。广东南路人民与日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一节　日军侵占琼崖

攻占广州后的日军，在切断我“主要的补给干线”后，获知我国仍通过南海沿岸的香港、九龙、澳门、汕头、广州湾等口岸以及越南等地“继续进行物资的补给”。为此，日军大本营在1938年10月、12月，曾先后下令驻广州的21军设法切断我国沿海的进出口通道。

敌21军在1939年“以切断补给路线为主要目的”的作战，包括2月间攻占海南岛；3月底向西江地区的江门、新会出击；6月攻占汕头、潮州；8月间占领九龙以北的深圳；11月攻占钦州湾和南宁等地。

日军侵略海南岛的目的在于：以该岛作为“对华南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基地”和向东南亚伸展的据点，并“切断河内和缅甸援蒋通道”。此外，海南岛还是“天然资源宝库”，特别是“世界良质铁矿（含铁量57%）”，是“建造舰艇用最好的钢铁原料”，“海军表示特别关心获取海南岛的地下



资源”。①

1939 年 1 月 13 日 13 时，日本御前会议做出进攻海南岛的决定，1 月 19 日，日军大本营向驻广州的第 21 军下达了与海军协同攻占海南岛的命令。

此时敌驻广州地区的部队又有所变化，原驻佛山一带的今村均第 5 师团，已于 1938 年 11 月 29 日调回青岛，原在武汉地区的台湾混成旅团，于 1938 年 11 月 19 日调至广东，新任台湾混成旅团长为驻山西太原第 1 军原参谋长饭田祥二郎少将；原21 军的司令官古庄干郎，也于1938 年11 月9 日调出，由第 5 师团长安藤利吉接替。

敌进攻海南岛的部队，陆军为台湾混成旅团，即台湾步兵第 1、2 联队，台湾炮兵联队；海军有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的第 5 舰队所属担任护卫的第 5 水雷战队，第 4 根据地队，第 3 联合航空战队（辖“赤诚”号航空母舰），横须贺第 4、吴港第 6、佐世保第 8 特别陆战队。其进攻计划为：

1. 陆军的台湾混成旅团，由珠江口的虎门出海，经万山群岛向西至海南岛北部的澄迈湾附近登陆，然后向东迂回攻占海口、琼山以及文昌、定安和清澜港。

2. 海军的攻击部队，由雷州半岛南部的竹山海岸附近出航经海南岛以西的海域，至该岛南部的榆林、三亚附近登陆，攻占榆林、三亚、崖州。

3. 预定作战开始时间：台湾混成旅团于 2 月 10 日拂晓在澄迈湾登陆；海军攻击部队于 2 月 14 日拂晓在三亚登陆。

关于岛上的守军，“在广州失陷后，驻扎琼崖的正规军 152 师陈章部，就奉命离开琼崖调往广东南路一带布防，留在琼崖的军队只有保安 11 团、保安 15 团、各县壮常队（约有 1 000 人）和民团（名义上约万人，但实际上只有四五千人）以及我们的部队——琼崖抗日自卫团独立大队。敌寇对于这种情形是很清楚的”。② 这是因为敌人的情报活动相当猖獗：“许多年前，敌谍已在琼崖活动，胜间田是海口的敌药商，敌国的海南通。他居海口数十年，借着行商的假面具，到处去侦察地方情形，联络当地的土豪、失意军人、官僚政客、烂仔地痞。敌侵琼时，他随军抵崖，为敌国派遣海南岛海陆军的总顾问，去年他曾派汉奸詹逆松年赴琼活动，及后，又派汉奸田有德赴琼活动，田逆是北平人，在海口设立国语讲习所，借以掩护，他会绘

---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10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中译本；另见王伯符译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琼内幕》，广东省海南区党史办等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327 页，1986。

② 广东省海南区党史办等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81 ~82 页，1986。

画，常到军事要区去写生，曾被海口警察局逮捕两次，均为某员力保释放。及敌侵琼，他便在海口内应。”①

事实确是如此，日本情报机关在进攻之前已了解到：

（一）武汉失守前，驻于海南岛的守军约15 000人，之后，即相继撤到大陆。1938年11月23、24日，张达第62军所属陈章的第152师利用暗夜分乘帆船离开海南岛进驻至大陆的西江地区；

（二）目前岛上守备部队的编成和兵力：

海南岛守备司令		
兼第5旅旅长	王　毅	
副司令	杨永仁	
保安第1团团长	文华胄	计3个营约900人
保安第2团团长	龙　驹	约700人
独立大队大队长	冯白驹	约300人
新编守备部队		7个营约1 750人
海口以西的秀英		约250人
炮台守备部队		
海南岛游击司令	云振中	

敌按其预定计划，台湾混成旅团1万余人在第5舰队30余艘舰艇和5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在琼山县天尾港、马袅港登陆。天将黎明时，10余艘敌舰驶近了秀英炮台西北岸。炮台守军奋起开炮还击。敌机连续轰炸，秀英炮台国民党军大半殉难。接着30余架敌机轰炸海口、府城、潭口。登陆日军分左右两翼向前突击；左翼队以台湾混成旅步兵第2联队为主力，向海口突击，国民党守军稍做抵抗，随即溃退，海口沦陷；右翼队以台湾混成旅步兵第1联队为基干，向琼山县府城突击，很快占领了府城。

海军第5舰队于1939年2月13日0时由琼州海峡北岸的竹山出航，14日拂晓到达了三亚湾。5时，海军陆战队3队约2 550人开始登陆，因未遇到抵抗，于当日中午占领了三亚、榆林、崖县。

占领海口、琼山方面的日军，于19日起，先后占领了定安、文昌、嘉积、乐城、新州、那大等重镇，继续向全岛推进。海南各县城，除白沙县城外，其他交通要道、重镇、沿海港口等先后沦陷。

日军占领了海南岛的南部榆林港和北部的海口后，即由海军的太田泰

---

①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6册，401～402页，1987年印刷。

治少将的第4根据地队，在该地进行海军和空军基地的建设，在海口附近“建立起一大飞机场”，又在文昌的潭牛、临高的加来、崖县的三亚以及北黎港附近分别各建一个机场，使之与澳门西南的三灶岛、台湾、北部湾的涠洲岛（于1939年2月1日建成）各机场构成有机联系，战机不时从这些机场起飞，轰炸两广等地和作为将来向东南亚进攻的跳板。与此同时，还整备港湾，兼及其他。如在榆林港“建筑潜水艇根据地”，以及在岛上各地广修碉堡等。

为了对海南岛进行统治，日本陆军大臣板桓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于1939年4月21日共同决定了“海南岛政务处理暂行纲领”，其方针为“首先应置重点于完成作战和确保治安，同时应适应我国资源不足的急需，尽力调查和获取重要资源”，并由陆海军及外务部门共同组织海口联络会议负责对海南的管治。

原在海口的台湾混成旅团，于7月下旬返回广州，担任佛山附近的警备。海口防务由21军编组的海南岛派遣部队接替，部队长为马渊久之助大佐，以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为基干。

日军占领海南岛之后，即于3月30日由日本政府宣布：南沙群岛亦为日本之领土，并归台湾的高雄市管辖。随即在这些岛屿上开采磷肥。

世界各国对日军侵占海南岛一事反响强烈，认为这是“日本要南进”。对此特别关注的法国、英国政府，通过其驻日大使，先后向日本提出了质问。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对此答复说：“攻占海南岛，是出于加强华南沿岸的封锁，加速蒋政权崩溃的军事上的需要。”

对日军进攻海南岛，国民党军队没有进行稍微有力的抵抗，基本上是采取自动放弃以观国际反应的策略。2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敌军今晨在琼州海口登陆，声明占领该岛，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决心与世界开战矣。”① 11日又记：“敌占我琼山海口，实为第二之‘九一八’，而敌国乃借此鼓动其议会通过预算案，其强哭为笑，强悲为乐之惨境，实甚于饮鸩止渴，措火积薪之危殆，预料英、美、法、俄列强不久必有积极行动之表现。”并考虑“决定敌军占据琼山后之战略与部队之调动”②。2月12日，蒋介石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将此事称为“太平洋上的满洲事变”，说战争已扩大到太平洋方面来了。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继续关注此事，记有：“雪耻：敌军占我

① 蒋介石日记，1939年2月10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9年2月11日。

琼山海口是其外强中干之总暴露，无异于回光返照最后之呼吸也。"① 蒋介石判断这是日军南进的一个步骤，势必最终走上与英美为敌的道路，说明敌人已在走向毁灭的途中。蒋介石的这种策略，也是作为弱国在敌我处于相持阶段时不得不暂时如此的一种选择。

日军在军事占领海南岛后，对海南做了长期统治的打算。

在行政方面，计划将全岛划为 13 县，置警察署、监狱署。在基层，"整备确立保甲制度"，作为地方行政的辅助机关，并组织伪警察队，"协助日军的警备和维持治安"；黎族聚居地区特设"抚黎署"，另行制定对待黎族的"理蕃方针"。日本在制定岛上居民申请取得日本国籍的许可制度的同时，另行制订了日本人往该岛移民的计划。还计划不时派遣"宣抚班"，"纠正排日思想"，设置"简易日语讲习所"，彻底普及日语，"实施亲日教育"，企图通过上述措施，使岛上居民全盘"皇民化"，10 年达到当时在台湾已经达到的殖民统治程度。②

根据 1940 年的一份报告，日军在海南实施"政治进攻"的主要做法：一是设法分裂统一战线，挑拨国共关系。"它利用公开的汉奸傀儡，到处做反共反独立队的宣传。它们的宣言、传单、布告、画报、海南迅报、小册子等，主要是强调反共。"二是实行诱降。"利用汉奸们的各种社会关系，以私人名义用一套汉奸理论暗地里通信给一般动摇的反共的军政长官或绅士名流，引诱他们降敌。这类诱降的信，被我们截得者有数十封之多。"三是建立伪组织。"敌人占领的县城，都已有伪维持会的组织，占领的区乡也有一部分成立伪维持会。近来敌人又利用赵仕恒为伪专员，琼山、文昌已有伪县长出现。以詹松年为伪自卫军司令，据去年底的估计，全琼伪军组织，已有千人之多，但大部分都在琼山。儋县——这两县有五六百伪军，其余各县数量较少，差不多都是一些伪警察的组织。在海口府城方面，敌人又组织反共青年团、赴日视察团及俱乐部之类，而建设琼崖新政权的运动，也和汪逆中央政权呼应着。"四是实行欺骗宣传和怀柔政策。宣扬"皇军是海南岛的救星""皇军秋毫不犯""只要不和皇军敌对者，就可以安居乐业""领良民证者可得皇军绝对保护"，威胁"勾结共匪者绝不容恕"。日军将抢劫来的粮食发给"顺民"，送钱给"顺民"，逮捕来的民众只要乡绅出保就行释放。"但是敌军纪律腐化到极点，不仅奸淫掠劫一般的民众，

① 蒋介石日记，1939 年 2 月 14 日。

② 宓汝成、王礼琦：《日本侵占海南岛和海南岛人民的抗日斗争》，载自《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1 期。

就是‘顺民’他们也是奸淫掠劫的，甚至伪维持会长的老婆也被敌军强奸。特别是做‘顺民’之后，敌人就要抽壮丁，要苛捐杂税，要少女给皇军公用，要当苦役。所以做‘顺民’、当维持会长而反省者甚多”。①



图 3－1　日军在广州发放的“良民证”

在经济掠夺方面，日军侵入海南后，即从国内和台湾派遣大批“技术人员”到海南，对全岛各种资源进行调查。日军驻琼机构设立“经济局”“产业试验所”“植物检查所”等机构，并组织大批日本商社来海南，进行所谓“经济开发”。这些“会社”，依据统制经济方针，受权划地经营。日方掠夺的重点：第一是矿业。日方人员估计，海南的石碌矿山，埋藏矿量数亿吨，含铁量60%；田独矿山埋藏矿量约500万吨，含铁量63%，羊角岭矿山和位于海南—香港间的南朋岛上，也蕴藏高品位的铁矿。日方主要对上述四矿进行开发，采出的矿石，绝大部分被运往日本本土。第二是农业资源的“开发”。日军压迫当地民众从事各种劳役，以生产日本国内当时甚为短缺并属必需的物资，如棉花、黄麻、油料作物等。第三是金融掠夺。日军在海南滥发军用票，强迫流通，并禁止法币流通，以军用票“回收”法币，所定价格远远低于实际价格或市场价格；之后将回收的法币以及银元、铜元、毫洋，或辗转运往中国大后方，套购物资；或运回本土大部熔化为军需原料。日本为谋求“统制”全岛经济，还对海南的林业、水产、盐业、畜产、工业（包括机械、水泥、制铁、造船、烟草、电力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计划，并策动本国一些相关公司前来“开发”。第四是统制流通领域。对重要军需民用物资，日军实行直接控制，其他则由日军当局确定收买机构——日本洋行及其代理商行敌伪组织的合作社等掌握。

下面是一份日军占领海南一年多之后经济状况的描述：

“战后受影响最大的是商业，因为大城市的失陷，大商人不是逃跑去海外，便是寄居乡下。过去兴旺的对外贸易，在敌人的封锁下，就变停顿。以前繁荣的市场，有的沦入敌手，有的变为焦

① 《李吉明关于琼崖抗战情况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广东省海南区党史办等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89～90页，1986。

土，而公路线上中小市镇，也毁坏殆尽，就形成商业上惨淡之况。现在维持乡村间贸易关系的，大都是重新建立起的新市场。

“农业和土产原料的手工业，好像受战争的影响比较轻微。在土地耕种上，就在敌人据点两三里地的田园，农民也于夜间偷偷的耕种和收割了。去年整个年头雨水既足，又无风灾，所以夏秋雨季，都是近年来所未有的丰收，每逢收割和耕种时，我党便发动农民们的互助合作运动，故在农作上少受敌人摧残，因之农产品甚丰富，价格大都比战前低廉……至于手工业生产，除依靠外来原料的生产部门外——如五金业受多少影响外，其余部门大都能在农村继续生产，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

“渔业在敌舰的暴行下，渔船被烧，渔民被杀害者甚多，因之较大规模的深水渔业，几乎都停业了。但沿海一带的小规模的浅水的渔业，仍是继续作业。内地——如定安，鱼价较前为贵，但沿海一带鱼价有许多地区反较战前便宜起来。盐业有些地方也遭敌人蹂躏，但很快的又复业起来了。琼崖四方皆海，差不多地方都能产盐，所以盐比任何地方都便宜。

“敌人破坏我们经济的手段，是无限地劫掠家畜、粮食及金属器具，利用奸商廉价收买他所需要的一切，利用奸商贩卖仇货；制造伪币来混乱金融，扰乱民众耕种和收获，但是敌人‘军用票’在中小市镇及农村中是不能通用的。”①

对日军的占领，岛上军民并未屈服。海南岛是我国沿海的大岛，虽然四面环海，但由于面积大且中部以南的黎母岭、鹦哥岭、霸王岭、弥猴岭、尖峰岭、五指山等，海拔均在1 400米以上，山高林密，连绵不断，岛上的抗日军民，即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坚持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占领海口之初，中共部队改编的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在队长冯白驹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海口以南南渡江的潭口渡首次出师阻击敌军，接着在琼文公路又打了好几仗。3月中旬的罗牛桥一役，截击满载敌人的军车1辆，全歼20余敌，其中少将1名，振奋了民众的抗日信心。很多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小商人以及侨胞子弟，纷纷要求参加独立队。“一些进步分子领导下”的地方势力，也携带枪支，自愿编到独立队。独立队不断壮大，仅在一个月内，迅速由300人发展到

---

① 《李吉明关于琼崖抗战情况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广东省海南区党史办等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93～94页，1986。

1 300余人。活动地区由最初的琼山、文昌两县扩大到澄迈、临高、儋县、琼东、定安、乐会、万宁、昌江、感恩等县，成为岛上抵抗力量的主力。日军在海南的有效占领地域，时大时小，总的说来，只限于沿海平原一带，即使在这一带的广大农村，也未能完全控制。至于面积占该岛一半的岛的中部山区，则一直控制在岛上抗日军民手中。整个岛上，形成了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3个地带。

抗日武装袭击日军，破坏日方所设的工厂、矿山，使其"开发"计划受到阻碍；抗日民主政府明令规定："代敌寇汉奸购办或运输军用品者"以危害抗战罪论处，"运货资敌或运牛猪出口""或运仇货返回内地者"予以没收。民众也经常组织起来破坏公路、桥梁，以阻敌军物资运输；为拒绝使用军用票，宁肯以物易物。抗日军民的斗争，使日军无法为所欲为地扶植伪组织，使日军不得安宁。[①] 这从日军频频发动"扫荡"和"蚕食"作战的目的即可看出。继1941年11月日军发动"丫五作战"、1942年6月发动"丫六作战"之后，1942年11月又发动"丫七作战"，原因在于："10月间盘踞在岛内东北部一带的敌共产军行动活跃起来，不断发生对环岛道路及其附近的日军阵地及军用卡车袭击事件。为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达到歼灭其目的。""丫七作战"以失败告终后，1943年12月，日军的"丫八作战"又开始了，这次作战则是根据"共产军积极对日军行动，袭击日军部队、军用卡车、民间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后，即撤退返回；保安团一面对日军表示敌意，一面与日军维持外交，不会发生积极的攻势作战的情况"，"为断绝扰乱治安之敌"而发动的。[②]

第二节 日军侵占汕头及袭扰沿海各地

汕头在华南地区是仅次于广州的大港口，外国商船出入较多。敌人侦知广州失陷后，我国把汕头作为对外联系的重要地点，经潮韶公路运送了大量军用物资进内地。汕头地区还是东南亚华侨的主要出生地，这一地区的华侨汇款额很大，是滋润中国抗战力量的源泉。因此，日本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了潮汕地区。

① 宓汝成、王礼琦：《日军侵占海南岛和海南岛人民的抗日斗争》，载自《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② 王伯符：《日本侵略军在琼岛的垂死挣扎》，广东省海南区党史办等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333~336页，1986。

在正式进攻之前，日军进行了连续几个月的袭扰。日军经常派军舰游弋，逮捕、劫掠我渔船，搜查扣留进口轮船及用飞机在沿海侦察、轰炸各重要交通线（潮汕铁路、内河轮船等）。4 月中旬起日军在潮汕澄海有过几次小规模的登陆试探，5 月以来更在汕头、潮安（今潮州市）、揭阳、潮阳大肆轰炸，“尤以汕头轰炸最烈，市区、码头、海面船只均遭轰炸，伤三四百人；潮汕铁路虽屡炸屡修，始终未中断行车，但所有车厢已悉遭轰毁”①。

1939 年 6 月 6 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攻占汕头的命令，提出“攻占汕头一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华南一带的封锁，并使该地成为谋略上，尤其是对华侨进行工作的一个据点”②。

此时日本驻广州的安藤利吉的第 21 军，驻北平的杉山元的华北方面军，驻南京的山田乙三的华中方面军，仍由其大本营直接指挥。第 21 军接到攻占汕头的命令后，即指定滨本喜三郎的 104 师团所属第 132 旅团长后藤十郎少将，率领步兵第 137 联队、独立步兵第 76 大队，山炮兵 2 个大队，工兵 2 个中队，轻型坦克兵 1 个小队，1 个渡河中队，由海军协同，进攻汕头。

近藤信竹的海军第 5 舰队，协同第 21 军进攻汕头的部队计有：海军第 9 战队，第 5 水雷战队，第 12、第 21 扫海队，第 45 驱逐队，第 3 联合航空队轰炸机 24 架，水上侦察机 9 架，佐世保第 9 特别陆战队及其他特设舰。

日军进攻前掌握的中国军队在汕头地区的驻防情况为：华振中的独立第 9 旅主力在潮安，一部在汕头。汕头和潮安周围各驻有一个保安团，在沿岸的主要村庄有若干自卫团队。另遵照余汉谋的命令，驻在翁源南面的陈勉吾独立第 20 旅于 6 月 13、14 日两天乘汽车向汕头一带开进。

6 月 14 日，进攻汕头的后藤支队在广州东南的黄埔上船，16 日前在马公集结完毕，并进行换乘舟艇的训练。为了保密，日军在黄埔上船后只让将校知道是实施攻占汕头作战，因此出现了返回国内的风声。

6 月 20 日，日军攻击部队从马公港出海，预定于次日，即中国的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中国人沉浸于节日喜悦之时，正式发起攻击。21 日天亮前到达了汕头港外投锚，约 3 000 人在汕头附近登陆，凌晨 2 时 20 分，左侧部队在汕头港南岸的达濠岛登陆。主力以 1 个大队在新津港附近登陆，其余沿韩江支流西溪溯江而上，8 时 30 分在汕头以东地区登陆，从东、北方

① 《中共闽西南特委给南方局的报告》（1939 年 5 月 20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3 册，235 ~ 236 页，1987 年印刷。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10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中译本。

向迂回攻击汕头市，22 日拂晓完全占领了汕头。接着附近澄海等县相继被日军占领。此时，国民党驻潮汕的部队有独立第 9 旅，保安第 4 团、第 5 团，以及各县自卫队武装和汕头市的警察。在独立第 9 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华振中的指挥下，面对日军的进攻，曾进行了抵抗，但在遭受较大伤亡后撤退。国民党潮安县长、澄海县长仓皇而逃，后被撤换。“惠来的、潮阳的、揭阳的诸县长，大家都同样暂时避开过，事后看没有事了，大家才回来。此事华振中在警备司令部未取消前，曾召集一个各县长、书记长会议，有‘此次战事发生，军是动了，民也是动了一些，政呢？党呢？都没有动！’的愤慨之语。”① 敌 132 旅团，于 6 月 25 日攻向汕头以北约 40 公里的潮安，26 日进至潮安西南郊区的枫溪，遭到守军独立第 9 旅较为顽强的抵抗，日军于 27 日上午占领潮安。虽然这次作战天气不好，但敌陆空军轻轰炸第 31 战队仍冒着恶劣天气支援了其地面部队作战，狂轰滥炸汕头市附近各县。②

对于日军进攻汕头，蒋介石的反应与此前海南岛的沦陷类似，似有静观局势变化之意：“敌占领汕头口与阳江附近登陆此在意料之中，亦其强弩之末之表现。”③ 蒋介石对日军此一行动意图的判断是：“一、汕头与定海皆被敌占领，倭显欲威胁英国，不愿天津事件了结，而其用意：①使英国不订英俄同盟。②对新嘉坡英法军事会议示威。③见好于德国，可知其全为德国所操纵也。”④ 7 月中旬，国民党前线部队反攻潮安城，士兵冒着枪林弹雨由北门冲入，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日军伤亡惨重。汕头日军派出增援部队，国民党军才退却。“当我军反攻潮城时，潮城附近之民众都很踊跃地出来帮助军队，送破衣（化装之用）、送茶水、送饭、抬伤兵，甚至自愿带路。而当我军被包围在潮安城内时，城内的民众很多把我们的伤兵藏匿起来，有的把我军带从小路逃了出来。”⑤

日军占领潮汕地区后，为强化法西斯统治，大肆烧杀抢掠，扰乱当地经济。仅汕头市金沙乡，日军进乡当天就至少杀害 300 人，还有 700 多名青

---

① 《中共闽西南特委报告》（1939 年 9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3 册，276 页，1987 年印刷。

②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 2 卷，1 119 ~ 1 120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③ 蒋介石日记，1939 年 6 月 21 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39 年 6 月 24 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 《中共闽西南特委报告》（1939 年 9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3 册，280 页，1987 年印刷。

壮年被拉去当劳工。他们把50多名农民，用铁丝穿过每个人的掌心，连成一串，用军刀活活挑死。① 日军第二次攻陷澄海县城时，又屠杀群众700多人。“在一些地区，老百姓积极帮助驻有日军的乡村，或治安不宁的乡村，敌寇是非常残酷的报复屠杀的。例如桑浦山的红岗、下城、鸟叫、蛟龙、埔尾、狗头几乡，全乡都被烧光，人民都被屠杀……又例如潮揭边的官硕乡亦因为协助军队，去年（指1942年——引者）年末敌人把村民全部洗杀。死400余人，内中很多老翁、小孩和妇女，整个池塘都是死尸。又例如土尾、双港的伪乡长被国民党便衣队掳去之后，次日敌人就下山来把全乡4个保长都砍头了，说因为他们‘串通’的缘故。”②

一方面，“敌人在汕头、庵埠、潮安、澄海等地积极建筑工事并几次地扫荡××山边的游击队来巩固其占领支点；对于沿海沿山各重要乡村、后方城市墟镇不断轰炸、恫吓来扰乱秩序，动摇人心；对于东津、枫溪、莲阳、黄岗、揭阳等地的试探突击；对于奸细、土匪的扶植，企图造成纷乱局面，以便利其占领和掠夺”。“在澄海、潮安等处各种私货络绎于途，如豆饼、田料、火柴、鸦片、香烟、脯料等物，而销路几遍于全潮；敌人利用奸商来吸收未沦陷区的粮食，收买桐镭麻袋等；提高敌军用币的价值，吸收国币，对于华侨汇款的控制和汕头海关的夺取等也同样积极地进行。”

另一方面，又玩弄怀柔手段，建立维持会和伪政权，进行欺骗宣传，并施以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敌人占领了汕头、潮安、澄海之后，积极地建立伪维持会，并在占领地分区召开会议，建立伪政权；敌人经常用飞机散发传单、写信，及汉奸联络组的活动来引诱一般绅士和民众投降，在粤东报上经常不断的刊载着各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在占领地、在战区，敌人常常发米、发火柴，散发报纸、画报等给民众来实施他怀柔欺骗的阴谋；在占领地，敌人公开地贩毒、赌博，宣传复古，开办日语训练班，组织伪和平救国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来麻醉和消灭我民族思想。”③ 潮汕之间的庵埠（今潮安县）为日军占领后，烟赌、妓院、小偷充斥，日军强迫使用军用票，“积极从事于奴化教育，准备复办昔日所有的学校，而日语学校

① 夏琢琼等：《日军在粤暴行》，见《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246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② 《潮汕的一般情况——敌占区的扩大、敌伪动态和国民党情况》（1943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3册，533页，1987年印刷。

③ 里予：《目前潮汕形势与潮汕青运的任务》（1940年1月1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2册，481页，1987年印刷。



的敌人，更以每个小孩上学每天给予3个铜仙、一只麦包来引诱小孩和民众，敌宣抚班亦以物赠送民众，从中宣传”①。

敌人在潮汕的主要驻兵地点为汕头、潮安、庵埠，尤以庵埠为中心，经常保持有两三个中队的兵力，建有若干兵营，兵营周围绕以铁丝网与环沟工事，重要路口则筑有小堡垒。另在澄海、潮阳、南澳一些重要乡镇驻兵。其装备情况，在进驻潮汕之初，步兵配有大炮、小钢炮、平射炮、迫击炮，还有几辆中小型坦克与少数骑兵。一个中队约有小钢炮或迫击炮一二门，重机枪一二挺，轻机枪几挺。敌人还重新修筑了汕头附近的机场，将原潮汕铁路路基改建为军事公路干线，修通了连接韩江支流的水渠，以便利敌橡皮艇和小汽艇的调动。②

日敌的入侵给潮汕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仅直接受到战争的侵害，同时什么东西都马上飞涨起来，现在米、糖、×、火柴……日用品、必需品都比战前要贵上三倍的价钱了。而相反地，他们的农产品由于不能出口而廉价也卖不出去……而在战争状况底下，一些意外的摊派，比方应付过境的军队、抬伤兵、带路都必须出钱，由乡公所另外雇人——又多些支出。有些地方因为米本来就不多，给军队在那里买了食了，他们在担心饥饿……加之敌机滥炸，他们间又有些悲观起来，他们说：‘打多几个月大家都饿死了。’”“沦陷后米每元只3斤多，柴每元30斤，洋火每盒涨至1角多，土产不能出口（如大埔碗工20 000多人失业，竹木不能出口，洋米不能入口），南洋来款困难，渔民盐民不能出海，……征兵与捐税的不合理压迫”③ 等。

日军侵占潮汕后，潮汕中共党组织即建立了汕头青抗会武装大队，开展武装斗争。1939年11月14日，日军又以大队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潮汕铁路两侧进行扫荡。中共领导的汕青游击队驻防于潮安的枫溪与乌羊山之间的高田村。战斗打响后，汕青游击队配合国民党驻汕部队，凭蔗林作为掩护，主动出击，把队伍推进到英塘，并派出小部队侦察，接近羊头村迫击炮阵地，出其不意，以猛烈火力向敌人射击，日军猝不及防，被打死打伤多名。乌羊山国民党军队向日军发动进攻，汕青游击队就侧击敌人，

---

① 吴启燕：《受辱的庵埠》，载自《新华南》，第2卷，第6期，1940年6月1日。

② 《潮汕敌伪情况与地理形势》（1945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3册，578～582页，1987年印刷。

③ 《中共闽西南特委报告》（1939年9月1日，1939年12月16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3册，280～281页，335页，1987年印刷。

以分散其火力。不久，日军集中兵力攻占了乌羊山，汕青游击队立刻奔袭敌防守空虚的云步镇。这两次作战，游击队与国民党部队互相配合，合作良好。

在南路地区，1940年2月，日军为确保邕钦公路交通运输和联络的安全，以第18师团1 600人向邕钦线东侧灵山、太平地区进犯。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南路游击队第3司令部、灵山民众抗日自卫大队等抗日武装，配合当地国民党175师524团奋起抗击，与日军激战3昼夜，毙敌中队长吉田三郎以下300多人，伤80多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国民党部队290多人牺牲。

日军通过一年多的作战，扩大了在华南的占领区，封锁了华南沿海的主要港口，使我国接受外援的困难更大。

日军占领广州，主要目的之一即是阻断我国从香港进口物资的通道，所以18师团曾派出一部兵力占领了深圳及附近地区，海军则封锁了香港东、西附近海岸及珠江口，但不久18师团又将部队撤回。

敌军通过侦察得知，还有相当的物资由深圳地区输入，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于1939年8月中旬命令敌18师团再派出部队，长期占领深圳、沙头角一带的边境地区，为此，日军曾事先通知英国当局说："日军将在中英国境方面进行作战，希不要防护我军的行动和供给中国军队使用英国租借地。"①

敌18师团派出步兵第114联队主力、步兵第124联队的1个大队及炮兵、工兵的一部分进行了作战。

8月13日，敌军在黄埔上船，顺珠江到虎门集结。接着，于13日夜从虎门启航，14日拂晓在宝安附近登陆，一直向深圳挺进，守军153师、159师不战而退，日军于当日占领深圳。15日占领了沙头角一带。

敌军得手后以步兵第124联队的1个大队为基干部队驻留，大部置于深圳，小部置于沙头角一带；敌军主力仍返回原驻地。

9月30日，国民党独立第20旅向深圳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固守待援，18师团急派114联队（缺1个大队）前往增援，该敌军10月1日半夜从黄埔启航，2日在宝安登陆，企图从北面较远的地方迂回以围歼中国军队，4日，中国军队8 000余人在天堂围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当敌军进至黄洞附近时，中方发起反攻，歼敌一部。敌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中方反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1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



扑，6日到达深圳，独立20旅退回原地。

1941年初，敌华南方面军为达到既封锁我国沿海港口，又可通过登陆锻炼将来至东南亚作战的部队，决定按照其大本营2月26日关于封锁我国东南沿海的命令，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这时东南沿海的情况是：敌华南方面军虽然封锁了香港及越南的海防、鸿基港口，但仍有相当数量的物资由中、小型船只甚至木船运载从香港以东及以西沿岸之中小港口上陆运入内地。对此，华南方面军曾经以空军进行侦察和攻击轰炸，但效果不大。2月4日华南方面军第18师团35旅团长川口清健少将率4个步兵大队在大亚湾登陆，攻占了惠阳县的淡水镇；藤井洋治中将的第38师团的步兵团长末藤知文少将指挥3个步兵大队对深圳、大鹏湾一带进行策应。这次封锁作战，有不少物资被敌抢走，但之后进出口并未因此而中断。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命令，后宫淳的华南方面军决定以15个步兵大队在广东、广西沿海登陆。即近卫师团的9个步兵大队，在广海、阳江、电白登陆（每点3个大队）；48师团的6个步兵大队，在海康、北海登陆（每点也为3个大队）。完成登陆后，再转用兵力至以东的汕尾、甲子港、汕头一带登陆进行封锁。

3月3日拂晓，近卫师团、第48师团在海军第2遣华舰队的配合下，在上述五处进行登陆后，抢走该地区尚存的大部分物资，至3月15日返回其原驻地。

日军于2月初在大亚湾登陆攻占淡水并封锁大鹏湾后，发现在大亚湾以东的红海湾、碣石湾和汕头以南的潮阳、汕头以北的潮安附近，仍是我国粤东沿海出口的重要地区，且有不少第三国船只驶入海丰县以南的汕尾港。驻于汕头、潮安的独立混成旅第19旅团，从1939年6月至该地布防以来，也未能阻止我国在汕头一带的进出口。

敌华南方面军在结束了广海、阳江、电白、海康、北海的登陆作战后，即转移兵力，进攻封锁香港以东的我国沿海地区。

3月23日，敌独立混成旅第19旅团一部在海军第2遣华舰队的配合下，由潮安登陆后，抢走了不少进出口物资。

4月10日，敌近卫步兵团长小林隆少将率步兵3个大队，由汕尾地区登陆，经战斗后占领了该地并抢走物资。之后日军即在汕尾、潮阳进驻。

4月中旬，配合第48师团进攻福州的近卫师团步兵第3联队多贺勤少佐的第2大队，在从福清县海口镇撤回广州地区时，根据命令于5月1日在陆丰县以东的甲子港突然登陆而占领该地。5月4日又在陆丰以南的碣石湾

登陆，将这些地区的物资劫走或销毁后，于6日撤回至广州附近。[①]

第三节　汪精卫诱降阴谋的破产

汪精卫在1938年年底出逃之前，曾指派高宗武、梅思平为代表与日本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在上海举行“重光堂会谈”，汪精卫的代表向日方提交了《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得到日本方面同意。其中提出：“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东、广西两省成为加入新政府的地盘。”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广东军队和在其他战线的军队，同情这一运动（即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引者）的也不少。”[②] 满心指望广东方面能加入他们的叛国阵营。

汪精卫出逃，他的《艳电》发表后，自以为与广东地方实力派过去关系较深，更把广东作为其诱降的重要目标。汪精卫“并以沈崧（汪精卫的外甥）熟悉广东军人，指定他负责运动军队，随时汇报陈公博决定”[③]。日本情报部门也做了类似的估计。他们认为：与汪精卫联系较多或对蒋介石没有好感的军人，首推云南的龙云，其次是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以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但都很难说就一定能站到汪精卫一边。而“张发奎是现在最有可能成为汪的势力的人。他同汪自国民党左派时代就关系密切，以后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个人之间仍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张现在率领着4个师驻扎在广东一带，虎视眈眈地等候着机会”[④]。

汪精卫为了建立他的叛国投敌基地，壮大他的投降势力，从而在日本主子面前抬高其身价，1939年7月23日，亲自出马乘专机由南京飞抵广州，大肆进行诱降活动，他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商定要建立日伪合作的华南政权。据1939年8月16日的《冈崎总领事报告》，《汪精卫与华南派遣军协商事项》要点如下：

一、汪精卫一方面推进建立中央政府工作，同时为建立华南政权工作而迈进。因此，汪精卫在广州对华南工作研究必要措施后，将派同志到广东

---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3册，1 461～1 46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②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88～8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③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④ 日外各省情报部第三课：《汪精卫路线的进展和抗日势力的现况》（1939年8月），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继续工作，其本人暂回上海。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如有必要再来广州。

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地方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本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协助，并使之扩大至华南5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实行推翻重庆政府。为了便利这一工作，须建立华南政权。

三、华南政权如果成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

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需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

陈济棠和许崇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因而可使陈济棠的旧部黄质文与汪精卫合作，使其拉拢陈济棠旧部军队。

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精卫也要与之直接联系。

五、须建立保安队。目前派廖轰在博罗、惠州、宝安附近收容零星的汪派军队。其他，在广州市附近也要进行建设。

六、为进行连接华南政权的准备工作，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由汪精卫的同志、张发奎和邓龙光的联络人、黄质文、张永福、金章和广州治安维持会会长等组成，预定以汪精卫的同志为首长。①

接着，汪精卫“又召集香港方面的同志，并于今后和平运动做了恳切交谈”，参加者达数十名。

实际上，想在日本人面前极力自抬身价的汪精卫，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资本。真正愿意死心塌地追随他叛国投敌的并不多；而以汪精卫平时势利多变的为人，出于私人情感而被其感召的又能有几个？即使他们寄望最重的张发奎，对他实际上也早生裂痕。张发奎的舅父、抗战时在张发奎部任少将参议的官其慎就曾对在张发奎部活动的战地服务队左洪涛说，“1932年汪在南京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时，张曾去晋见汪，汪见到张已是‘败军之将’，一无兵权，二无地盘，拒不接见。张大为恼火，从此即与汪绝交”②。这或许含有在进步人士面前澄清张发奎与汪精卫的关系之意，但

①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163～1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特支十年》，4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既有意澄清，也反映出大汉奸汪精卫的实际号召力是多么有限。

汪伪寄望甚殷的另一广东军政界元老是陈济棠。据《日中战争内幕记》作者冈田酉次披露："到 1939 年 3 月，中国和平同志跟日方有联系预定参加和平运动的人有：陈济棠、何键、张发奎、龙云、陈素农等大多军政界有力人物"①。但陈济棠不为所动。1938 年 12 月汪精卫出逃时，陈济棠正在香港陪妻就医，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着着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在此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在此之后，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拉其下水，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均避不见面，将陈璧君拒之门外。1942 年 1 月香港沦陷后，又冒险脱离虎口，辗转到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一职。②

1939 年 8 月 9 日，汪精卫在广州冠冕堂皇地发表了一篇《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骂抗日是要把全国"变成瓦砾，变成灰烬"，蒋介石抗日是"奉共产党的教条"，呼吁地方实力军人摆脱"蒋介石的箝制"，公开赞成"和平"。他厚颜无耻地声称："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关于怎样实现和平，彼此互相披沥诚意。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必能以极友好的考虑实现以下几件事，即是：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即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因此我今日敢公开约束：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最高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以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尤其是对于广州市民，我敢说在最短期间，必能以广州市还之广州市民之手，使广州成为比较去年 10 月以前更有秩序，更有幸福的地方。"他口口声声说地方当局是受蒋介石操纵，蒋介石又是受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操纵。然而，他在广州的这篇所谓讲演，却恰恰是由日本军方拟定要点，经日军司令官

---

①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470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 钟卓安：《陈济棠》，250 页，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

认可后才发表的。据日军代理华南特务部长原中一大佐在给军令部第一部长宇坦少将的电报中称："竹内（汪精卫代号）在8月9日20点0分作题为'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预定要点如下（原稿是由陆军给参谋本部及上海晴气庆胤陆军少佐，全部空运）。上述是根据竹内的自立的印象，在独自的立场上进行。其内容业已由军司令官负责承认。"① 这无可争辩地表明，他在广州所上演的，恰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傀儡戏罢了。

汪精卫的可耻行径激起了广东各界的极大愤慨。中共广东党组织动员群众发起了一场反汪运动，广东省委通过机关刊物《新华南》发表评论和文章，揭露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罪行。1939年9月号编发了"讨汪特辑"，三名主编均参与撰稿，即石辟澜的《三民主义乎？'三反主义'乎?》，任毕明的《捉拿卖假药的棍徒》，何家槐的《打狗》，随刊附送，并在正刊上发表了黄正诚的《反汪讨论大纲》。石辟澜在文章中指出"以华制华——是敌人灭亡中国的重要策略的一部。汪逆窜粤，在现阶段，就是这重要策略的具体之执行"，是配合日寇对华南实施政治诱降的行动。必须揭露汪精卫逆"反蒋""反共""反抗战"三反主义的媚敌投降本质，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警惕抗日阵营内部新的投降危险。② 1940年6月《新华南》又出版了"关于汪逆登台及怎样反汪"专辑，收入了谭天度《对汪逆伪组织的认识与反汪运动》，及思慕、李筱峰等的文章。在曲江出版的柳倩等编辑的《持久战》以及《新建设》《新军》等刊物也将反汪、反投降作为这阶段刊物的重要宣传内容。钟天心主编的《新军》2卷4期（1940年3月出版）推出"讨汪特辑"，发表了编委、张发奎部少将参议黄中廑《扑灭汪逆要肃清无形汉奸》、叶兆南（即孙大光）《桂南大捷与反汪》等文，以及耕石《反汪与提高民族义务感》、史汉《反好运动的群众化》等文章。

中路地区纷纷举行集会，开展反汪签名运动。东江地区举行反汪座谈会，并通过《河源青年》《增城青年》《抗日小报》《战地青年》等各县报刊，开展反汪、反投降活动。西江地区的四会、广宁等县，把所有的狗都挂上"汪精卫"的字样，使反汪宣传家喻户晓。

汪精卫到广东活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判断"汪逆确已到粤，

---

①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192～1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 洪流主编：《石辟澜》，广东党史资料丛刊专刊，392～398页，广州，1993。

其必将勾引粤军，”蒋介石乃“电张余注意汪到粤之行动。”[①] 实际上，即使蒋介石不提醒，广东军人也不会追随汪精卫投降叛国。汪精卫的广播发表后，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表示要坚决给予反击。张发奎发表了由在他的部队工作的共产党人草拟的广播词，以后又发表了反汪文章，并在韶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8月14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省民众一致起来“捕杀汪精卫”。15日，广东省参议会对汪精卫通电声讨。16日，张发奎、余汉谋、蒋光鼐、黄旭初、李汉魂、蔡廷楷、香翰屏等又联名通电驳斥汪精卫的劝降谬论。原国民党粤系在野的军政官员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等亦于28日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指斥其为“民族败类”“头号汉奸”[②]。

反汪运动也扩展到香港。国民党发动了香港3家汪派报纸天演、南华、自由三报馆的“八一三”反汪罢工斗争，并给予3 000元经费支助，使报纸停版两天，一个星期才恢复正常。但工人罢工实现后，国民党却撒手不管了。为使这场反汪、反投降斗争坚持下去，共产党接过了领导权，通过文化界和香港印刷工会，发起募捐，使斗争进一步发展，发行了反汪刊物，发表了宣言，并组织了反汪回国服务团，于1940年回到内地，先后在惠州、韶关、桂林、重庆等地进行反汪宣传，扩大了反汪运动的影响。[③]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张发奎接受在该部工作的中共人士建议，由左洪涛、王家槐以他的名义起草了一篇讨汪檄文，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柳州日报》上发表。[④]

通过上述各种形式的反汪运动，揭露了汪伪集团的可耻面目，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和平运动”的汉奸理论无法立足，日伪的诱降阴谋不能得逞。

---

①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8日、9日。

② 张洁：《日伪在广州的罪恶活动》，见《广州抗战纪实》，43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7册，178～179页，1987年印刷；《唐克等关于香港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的报告》，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4册，47～69页，1987年印刷。

④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特支十年》，9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第四节 日军进攻广州湾

日军在进攻广州湾之前，先已进犯钦廉地区。那里是广东南路的南端，有钦州湾、北海等深水港，北面是桂南重镇南宁。早在1938年9月11日，日军为了配合攻占广州的作战，曾派出一股兵力约200人侵犯涠洲岛。次年1月2日，数百名日军在海空军掩护下攻占涠洲岛。日军占领该岛后，为长期占据，修筑机场，作为轰炸粤桂后方的基地，以破坏中国西南国际交通。① 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对外交通线多被切断，而由南宁到越南的国际交通线仍然畅通无阻。1939年秋，日军计划在钦廉沿海登陆，占领南宁，切断桂越交通线。日军集结兵力约4万人，11月13日从海南岛三亚港出发，15日从钦州湾登陆，很快占领钦廉一带。

广州湾时属法国租借地，有深水良港。因法国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对中国抗战一度采取同情态度。当日本占领钦廉地区后，广州湾成为华南沿海唯一仍可自由通航的国际口岸，虽然日军严密封锁琼州海峡，但仍有大量军用物资从广州湾进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本营为了进一步切断中国海上交通和掠夺粮、盐等物资以支持太平洋战争，决定占领广州湾，控制雷州半岛。②

日军作战部队为独立混成第23旅团的山田联队、小岛海军陆战队一部，共约4 000人，指挥官为镀左近少将。1943年2月16日凌晨2时，日军一股约1 600人，在5艘军舰和8架飞机掩护下，分乘汽艇，于雷州半岛东海岸的通明、下岚两港登陆，分路袭击海康（今雷州市）县城。国民党守军只有省保安第4团的第2大队，略加抵抗即退守客路。日军于当日上午10时占领海康县城。17日晨，日军沿雷州安铺的公路追击，很快占领客路。19日晨，日军分兵进犯遂溪洋青和遂溪县城，省保安第4团稍事抵抗后败退廉江良桐一线，遂溪县城被日军占领。在通明、下岚登陆的另一股日军约500人，于17日晨进犯广州湾西营（今湛江市霞山区），随后攻击麻章，与进犯遂溪的日军遥相呼应。20日下午4时，日军由麻章袭击法国广州湾租借地边界寸金桥。法方惊慌妥协，与日军签订“共同防卫广州湾”的协

---

① 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史》，2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史》，5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议。规定军事上由日军掌管广州湾，负责境内防卫；行政上仍由法国管理广州湾，并支持日军的作战行动。[①] 2 月 21 日，日军全部占领西营市区，从寸金桥方向攻击的日军同时占领赤坎市区，广州湾即告沦陷。日军举行了所谓"和平进驻广州湾"仪式。21 日晨，小股日军在吴川县黄坡登陆，侵入高岭、鸡屋等地。雷州半岛沦陷后，半岛北面的廉江及相邻的化县、吴川等地成了抗日前线。

日军占领广州湾后，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雷州城，日军把 3 名青年解押到西门谢公亭杀害，碎尸几段后挖出心肝下酒；甚至强奸庵内尼姑和 60 多岁的老妇。侵占遂溪的日军，强迫几千名青壮年修建飞机场，一项工事完工后，便将参加修建的民工枪杀，其中一次就杀害 85 人，尸首投于设在头岭村的"杀人坑"。[②] 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一方面保留广州湾的法国殖民政权和军队，另一方面收买汉奸、土匪，建立伪军和伪政权。拼凑了"三雷和平救国军"，由汉奸符永茂为"高雷警备司令"，并委任汉奸吕春荣、王英儒为"广东南路军副总司令"，委任汉奸阳江四为"南路第 7 区司令官"。

日军侵占雷州半岛、广州湾后因兵力所限，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为确保对雷州半岛的占领，日军以辎重兵大队和高射炮队约 700 人驻守西营，以步兵大队和特种兵部队约 700 人驻守赤坎，以部分步兵和骑兵、炮兵共约 1 000 人驻守遂溪及其附近，同时以部分兵力控制从遂溪、城月、客路、海康城、英利至海南岛的交通线。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实际上控制的只是部分重要圩镇和主要公路交通线。

日军占领广州湾后，虽然法国殖民当局的行政机构和军警仍保留，但日军是太上皇，为所欲为。日军经常到附近村庄圩镇掳掠烧杀。1943 年 7 月下旬，日军在赤坎捕捉 100 多名青壮年连同从雷州其他地方抓来的 1 000 余人，运到香港为日本人做苦役。[③] 经济上日军大肆搜刮，强行使用"军用票"购买大批物资，并强迫商人、市民使用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进行经济掠夺。日军还放纵邪恶犯罪，以至娼赌盛行、走私猖獗，拐卖人口时有所闻。

---

① 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史》，57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史》，58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邱炳权：《法国广州湾租借地概述》，见《列强在中国的租界》，469 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在日军进攻广州湾时，国民党在这里的兵力很有限，只有省保安第10团和第4团，分别驻守钦廉、遂溪、海康；另各县只有少数训练差的自卫团队。因此在日军进攻下，守军稍事抵抗便败退。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官员也随之而逃（如海康县县长王光汉、遂溪县县长王辉等放弃职守，带领家眷逃走）。日军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5天内就控制了雷州半岛和广州湾。国民党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获悉日军进攻广州湾后，调整了在雷州半岛和南路地区的兵力部署，调155师主力加强茂名防卫，调原驻广西玉林的广西独立第3团加强廉江的守备力量。这样的兵力分布于广阔的南路地区，仍然是不敷使用的。因而在雷州半岛和广州湾一带，中共领导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的抗日斗争，就占了重要的地位。

早在香港沦陷后，中共南方工委即派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到南路加强领导。1942年春，王均予到广州湾后，认为日军必然入侵雷州半岛，即与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布置各地中共地方组织，加紧建立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建立广州湾至各地的交通线。当日军入侵、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中共南路特委决定：①以武装抗日作为南路中共地方组织的中心任务，要大胆地建立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加强敌后和前线地区的领导。中共南路特委从广州湾转移至廉江，王均予、周楠等建立指挥中心，温焯华也从高州转到吴川，加强吴川、化县、梅菉等前线地区的工作，陈恩全面负责雷州半岛工作。②国统区的中共地方组织，要广泛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和敌后斗争，同时发展秘密抗日武装，建立游击小组，准备一旦成为敌后，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③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派陈信材、梁弘道同爱国将领张炎联系，推动张炎组织在南路的19路军旧部武装抗日。

日军入侵雷州半岛后，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占领海康县城、客路、城月、洋青、遂溪、广州湾沿线及东海岸地区，至于广州湾沿线以西和西北地区，日军只派兵骚扰而未分兵常驻，成了前线边缘地带。中共南路特委决定派一批干部和动员学校的共产党员，深入遂溪、海康、徐闻三县的广大农村，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群众抗日自卫武装。在日军占领区，以中共支部、小组为核心，建立抗日游击队、游击小组；在日军占领区边缘和日军力量薄弱地区，以共产党员或倾向抗日的进步分子为骨干，发动各阶层群众，建立抗日联防区和抗日联防队；派共产党员、进步分子推动国民党地方武装积极抗战，打入伪军进行分化瓦解。经过努力，

以抗日联防为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逐步展开。①

1943年3月，以遂溪县金围、西岭、南坪等地的村抗日自卫队为基础，建立了界炮乡抗日联防自卫队。接着，中共遂溪县组织又先后在山家、山内、老马等地建立了抗日联防队和联防区。1943年六七月间，中共遂溪县中区党的领导人沈汉英、李晓农争取到地方开明绅士卜登勋的支持，成立深泥塘村民众抗日自卫队，共有70多人，半脱产队员400多人，联防区由原来的5个自然村逐渐扩展至遂溪、廉江边境的三四十个村庄，人口7 000多人，并成立了半脱产的抗日常备队。1943年11月初，驻洋青的日伪军200多人分三路进犯深泥塘，联防区军民出动堵截，使日伪军无法深入，不得不折回据点。1944年春，驻洋青的日伪军联合其他据点400多人，配合大炮和两辆装甲车，兵分三路夜袭深泥塘，联防队、常备队积极抵抗，击毙日伪军10多人，伤10多人，敌不得不撤退。

1943年3月，中共遂溪县各级组织根据中共南路特委在卜巢山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指示，从东区、中区调了一批党员骨干和从全县各地吸收了一批抗日青年40多人，建立中共直接领导的卜巢山抗日游击中队，后发展到近百人。不久，日军从广州湾基地和麻章、城月调集数百人前来围攻，根据中共南路特委分散发展的指示，10月，实行化整为零坚持斗争，大部转移到洋青与中区抗日武装汇合。

当日军侵占海康后，中共海康县地方组织在农村建立了抗日联防队和地下游击小组，共200多人。同时中共还派出一批党员加入进步青年廖培南组织的“抗日政治工作队”，使活跃在海康三区的这支队伍，实际成为中共领导的半军事性质的抗日组织。后争取到合法地位，整编为海康三区联防抗日自卫队，有120多人，多次打退日伪的进犯。1943年11月，国民党爱国军人陈展在遂溪、海康边境曲港成立“海遂边境联防自卫大队”。中共南路特委将所掌握的陈其谋中队同陈展大队合并，1943年冬，该联防大队进攻江洪纪家的日伪军，取得胜利。

在雷州半岛抗日前线——廉江、吴川、化县（今化州）、梅菉地区，中共南路特委同张炎、詹式邦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合作，建立和发展抗日群众武装。张炎、詹式邦均是吴川人，詹式邦原是国民党第62军152师907团团长，参加过粤北战役。1943年3月，张炎通过李济深向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力荐詹式邦任吴川县长。詹式邦就任后，与中共人士合作，

① 本段及以下南路地区抗日斗争内容引自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3卷（抗日战争时期），287～290页、36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成立吴川县战时联防委员会，组织了3个抗日联防大队，共400多人。张炎旧部文邵昌任化县抗日自卫总队副后，致力于发展民众抗日力量，将原来的1个自卫大队扩建为600多人的两个大队。

1944年8月，日军占领廉江县城。同年秋，日军进行豫湘桂战役，驻雷州半岛的日军，除派一个旅团进攻广西外，其余兵力频频向吴川、化县、廉江、梅菉地区进犯，妄图扩大占领区。在此形势下，中共南路特委决定加紧建立人民抗日武装，首先在遂溪沦陷地区举行起义，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同时准备在日军进攻高州地区时，发动各地起义，配合中共武装攻打高州。1944年10月，中共人士与詹式邦联合在吴川高岭召开吴川、化县、廉江地区乡绅会议，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各区联防队，准备抗击日军的进犯。

1944年11月23日，日伪军袭击吴川湍流村，并向石门乡进犯，吴廉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在钩镰岭堵截敌人，张炎闻讯，即令詹式邦率队出击，此役击毙中村分队长以下日军10多人。

1945年1月，中共在吴川、化县、廉江、梅菉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共编成7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1个政工队，约2 700人。随后，詹式邦、张炎相继起义，接受中共领导。起义部队占领了吴川全境。1月19日，“高雷人民抗日军”宣告成立，张炎任军长，詹式邦任副军长，曾伟任政治部主任。中共起义部队则成立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周楠任司令员兼政委，李筱峰任参谋长，温焯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支队3 000余人。①

---

① 温焯华：《南路特委领导吴化廉梅边地区抗日战斗斗争的回顾》，见《广东党史资料》，第16辑，28～3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七七”抗战爆发后，由于华北、华东地区的中心城市和沿海港口相继沦于敌手，我国对外联络通道日渐萎缩，华南地区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广州成为我国外贸进出口和外援物资输入的主要口岸。1938 年底广州沦陷、广东省府北迁韶关后，省政府主席改由李汉魂接替，李汉魂兼民政厅长，顾翊群任财政厅长（1939 年 8 月改由邹琳担任），王应榆任建设厅长，许崇清任教育厅长，胡铭藻任省府秘书长。至 1939 年 6 月，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海口、汕头等沿海工商业城市及富庶地区先后为日军占领，国民党广东地方当局所能控制的地区大为缩减，且是以粤北为主的贫困地区，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为应付战时的军需民食，粤省当局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先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重心，注意增加粮食生产，兴办农田水利设施；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担心工业品输入将会断绝，更致力于恢复或重建战时生活急需的轻纺、食品及日用品工业，奖助矿业，发展合作事业等。

广州沦陷后，日本陆、海、外三省联络会议制定了控制沦陷区经济的五条措施，其后，广州沦陷区的公用事业、交通及其他重要企业、矿山均在日军的授权下，由日本国策会社及其子公司和其他财阀企业进行掠夺和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为了强化汪伪政权，在经济上给予伪政权更多的“自主权”，让伪政权参与物资统制，日伪进一步强化了对广东沦陷区经济的控制与掠夺。

广州是华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时局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当时人所批评的“教育逃难”“文化的沉寂”。大中学校“停办的停办，逃避的逃避”。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受到了影响和冲击。另一方面，则是救亡文化的勃兴。国共合作的环境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努力，为广州抗战文化的开展提供了条件。如救亡文化团体的纷纷建立，救亡宣传报刊的繁荣，宣传抗日救亡的戏剧、美术、音乐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等等。

广州沦陷后，日伪在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严密加以控制，极力推行奴化政策，以麻醉占领区的民众，维持其长期统治。



图 4－1　广州各处的奴化宣传标语

在战时艰难动荡的环境之中，广东地方当局惨淡经营，勉力维持，使战时的广东教育得以薪火相传，教职员工的生计得以维持，少年儿童减轻了失学之虑。

第一节　抗战初期及战时国统区的经济

抗战初期，由于华北、华东地区的中心城市和沿海港口相继沦于敌手，我国对外联络通道日渐萎缩，华南地区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广州成为我国外贸进出口和外援物资输入的主要口岸，过去经长江运往上海的华中、西南各省的进出口货物，现在大部分转向广州，粤汉铁路取代了长江下游的航运，成为沟通货运的大动脉："中国腹地各省土产，曩昔经由上海轮运出口，现因时局关系，不得不改由粤汉铁路，运抵本埠（埠：指广州），转输外洋。"①国内出口的蚕丝、矿砂、桐油、茶叶、蛋品、猪鬃等货物，多由粤汉路集中广州，再转运香港，或经广州湾、澳门等处转运香港，然后出口国外。广东又是海外各种物资进入国内的主要区域，国内所需军械、油料以及其他必需物资，经香港至广州，再通过粤汉铁路北上转运内地。惠广战役之前，以广州为主，广州沦陷后，汕头、澳门、广州湾取代广州，成为华南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口岸，1939 年 6 月汕头失守后，华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又由粤东西两翼一些更小的港口所取代，如饶平、澄海、潮阳、惠来、陆丰、开平及台山等地的港口。②

1937 年的出口商品中，生丝和钨砂增长幅度最大，"粤丝销路畅达，几

① 《民国二十八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广东省档案馆藏。见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258 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② 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385～389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至供不应求，各丝厂出品，概能于制成以前，脱售一空。其销售地，依次以越南、印度及法国为巨擘”。生丝价格较上年最高价格高出近10%［每担（1担为50公斤）高出约50港元］。本年因一些大国“竞事扩充军备，对于钨砂，需求弥殷，输出数量，以视上年，约达4倍之谱”①。进口商品以煤油、汽油增幅较大。1938年钨砂、桐油出口激增，钨砂出口比上年增长162.5%，桐油由上年的6 400公担（1公担为100公斤）激增至326 000公担。进口货物以石油、煤油、汽油、柴油、大米、棉纱、铝箔等为大宗。其中汽油进口较上年增加520万公升，煤油增加740万公升，润滑油增加70万公升，大米进口较上年约增加50%，棉纱由上年的1.3万公斤激增至8万公斤，铝箔由上年的1.2万公斤激增至7.15万公斤。

这种外贸进出口的有关情况，可见表4－1、表4－2：

表4－1 1937—1938年广州港对外贸易统计表

单位：元

年份	数量				
	进口货值	出口货值	进出口货值	出超（+） 入超（－）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百分比/%
1937	45 166 170	63 845 966	109 012 136	+18 679 796	6.07
1938	56 945 897	106 693 552	163 639 449	+49 747 655	9.87

资料来源：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258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表4－2 广东会战前外贸进出口统计表

单位：千元

年份	洋货进口	土货出口	进出口总值	比上年增长百分比/%
1936	130 171	84 546	214 717	
1937	180 025	130 065	310 090	44.4
1938	253 303	199 089	452 390	45.8

资料来源：《广东年鉴》，第16编第3章，民国30年版，见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38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抗战初期，由于广州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显重要，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设立“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主

① 《民国二十八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广东省档案馆藏。见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258～261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办国际运输，以广州市长曾养甫兼任该处主任，对外称“兴运公司”（后改为西南运输公司）。该处主要经办兵工署的进口军械、航空委员会的油料以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军用品。军用物资源源不断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到广州，再从广州经粤汉铁路北运。在广州市区内以及河南的芳村、花地等地都设有存放由港运粤的物资的仓库。而成为南北运输干线的粤汉铁路，货运之拥挤比前增加数十倍，货物运长沙、衡阳两地最多。①

陈济棠统治时期，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在广州及其周围创办和扩建了一批新式工厂，与素称发达的商业、贸易相结合，经济建设已经开始进入较好的时期，但由于日本的入侵，而打断了这一过程。在日军侵粤之前，日机的轰炸已使各企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或者直接损毁于炮火，或者在筹划及实施搬迁的现实压力之下，一些工厂虽随炸随修，但生产能力已大打折扣，省营工厂从抗战开始到广州沦陷，产品收入几乎下降一半。据不完全统计，1937 年 9 至 12 月，广州因日机轰炸、时局动荡而倒闭的工商业就达 1 760 余家，未倒闭的亦深受影响，经济损失总共达 160 余万元。② 日军进攻广州时，又因绝大多数省营企业及多数民营企业未及搬迁，而损失惨重。

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6 月，日军先后占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海口、汕头等沿海工商业城市及富庶地区后，国民党广东地方当局所能控制的地区大为缩减，且是以粤北为主的较为贫困的地区，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为应付战时的军需民用，粤省当局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先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重心，注意增加粮食生产，兴办农田水利设施；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担心工业品输入将会断绝，更致力于恢复或重建战时生活急需的轻纺、食品及日用品工业，奖助矿业，发展合作事业等，均有一定成绩。

在农业方面，广东粮食生产向来不能自给自足，战前每年缺米即达 2 000 万市担，由于战乱及灾荒，战时缺粮情形更为严重。为解决粮荒，国民党广东当局一是推广中山大学农学专家培育出的优良稻种，1940 年种晚稻季节开始推广，逐年增加，到 1944 年曲江等 17 县达到 133 万余亩（1 亩为 665 平方米），比一般土种增产 10% ~30%。二是扩大冬耕，以发放冬耕

① 《西南运输总处战时运输史》，广东省档案馆藏，72 - 1 - 72。资料来源见黄菊艳著：《损失与重建——抗日战争与广东经济》，中山大学历史系 2000 年博士论文。

②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梗概》，190 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贷款及督导抽查等方式予以鼓励，冬耕面积从推广前的不足1/4，达到约1/2，1944年为1 834多万亩，除种植油菜、绿肥外，以薯类杂粮为多，成为“本省战时粮食增产工作中收效最大者”[1]。三是广植备荒作物，1941年开展广植木薯运动，1943年种植达60多万亩，产量为400多市担，其余品种有玉米、甘薯等。四是倡导垦荒，至1944年累计垦荒面积达109万余亩。此外还有改良肥料、改良畜牧、促进林业、发展蚕业等措施。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1940年省建设厅农林局增设水利课，1942年又成立水利处，负责对各地农田水利设施的查勘工作。在此基础之上，先后建成了蕉岭白马乡、乐昌指南乡、仁化董塘乡、曲江马坝、乳源城郊等灌溉、水电、防涝工程10项，灌溉面积达86 500亩。已开始施工的工程有惠阳马鞍围、曲江火山乡等4宗。小型水利工程则由各县兴办，1943年并推行一保一塘运动，到1945年6月，计完成一保一塘及小型水利工程5 505宗，受益田亩达87万多亩。[2]

在工矿业建设方面，原有省营工业在省府北迁时因事起仓促而“荡然无存”，到韶关后只能重起炉灶，最初几年进展甚缓，头一年只建了1个电池厂，生产2号手电池及通信用大电池。1940年建肥皂厂，1941年建药棉、制纸二厂。其后，乃加快了工业建设步伐，先后增设了棉纱、织造、面粉、酒精、炼油、农具、制糖、化工材料、麻织等十余厂，产品有脱脂药棉、纸张、丝棉织品、面粉、动力酒精、汽油、柴油、农用机具、白糖、红糖、硫酸、盐酸、麻袋、军毯等数十种，以供战时之急需。还有省实业公司开办的8个厂，省银行经营的4个厂，省振济会主办的24个厂。这些厂规模都不大，各厂资本为几万至十余万元，缺乏机械化的生产设备，多以手工生产，且因沿海被日伪控制，原料奇缺。为健全省营工厂的“科学管理”，渡过战时的严重困难，在1942年制定实施了各种规章制度，包括《省营工业材料采购办法》《省营工业材料保管办法》《省营工业产品处理办法》《省营工业连环竞赛办法》，注意节省消耗，利用废材。1945年春，因粤北战事，多数工厂被迫停工。战时登记的民营工厂有92家，计酒精厂21家，火柴厂15家，卷烟厂15家，电气厂21家，电讯器材厂2家，机器工业2家，其他16家。政府对民营企业也在业务上、技术上尽力扶持，广东省银行1942年贷出的工业贷款达111.6万多元。矿业方面，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作，调查粤北各县重要矿产；与资源委员会合办工矿理事会，开采乳源

① 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印：《战时粤政》，30~31页，1945。

② 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印：《战时粤政》，33页，1945。



八字岭煤矿，及英德八宝山钨矿。此外，至1945年4月，成立各种合作社15 041家，经营项目着重于农工业之生产，及供给、运销、信用等业务，至1944年，经营总值达1.63亿元。①

在交通方面，主要是发展和维护公路交通，保持战时各种运输的通畅。在敌犯粤北时，则将公路加以破坏，以免资敌。战时新修的公路有2条：连县三江墟至广西贺县，粤省境内长63公里，是联络粤桂交通的重要公路，1941年底竣工；连县星子经湖南宜章至乐昌坪石，全长80公里，是后方军事交通要道，1944年底建成。加以维护改善的公路则较多，1939年有韶坪路等3宗，长549公里；1940年有忠定路等4宗，长1 587公里；1941年有韶兴路等10宗，长1 034公里；1942年有连贺路等8宗，长1 538公里；1943年有连坪路等15宗，长1 602公里；1944年改善桥梁136座，涵洞126座；1945年7月止，有韶坪路等7宗，改建桥梁34座，涵洞5座，改善桥梁14座，抢修桥涵33宗。

通信建设主要是架设以韶关为中心的长途电话，东通兴宁，西及鹰杨关，北至湘粤边境，南达茂名。至1944年底，共架设电话线30条，长3 374公里，战时全省电话网大部完成。同时加强线路的巡护与管理，在各处设立长话分所27个，通话站5个。

在财政金融方面，粤省当局采取措施，严防敌人掠夺资源，严禁敌货输入，抵制伪钞流通，调整、稳定"省券"币值，加强缉私，对敌伪实行反封锁。当时广东沿海沿河富裕市县，大多沦于敌手，而省内所有进出口货物运输线，均在沿海一带及接近游击区，为与敌伪争夺税收，省财政厅即在沿海及接近游击区，密布征收网。1941年，全省有税务局61个，稽征所91个，在靠近沦陷区的地方尽量争取民众向我方纳税。为方便战时征缴，将以前较为繁杂的租税简便化、统一化。如营业税，或以营业额的1%按月征收，或以资本额的3%按月征收，废除以前由商团包征等形式，由税务局实行查账计征，税款则由纳税人直接缴交公库，以防弊端。1938年度半年征得145万元，1939年征得380多万元，1940年征得700多万元，1941年普通营业税一项征得300万元。1940年起征收桐油管理费，年入约150万元。进口卷烟管理费，运入本省的征35%，经本省运销省外者征20%。1939年收入189.5万元，1940年收入768万元，1941年1月起平均月收入达90多万元，为粤省战时财政一大支柱。战时财政的主要支柱则是征收

① 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印：《战时粤政》，34～36页，1945；见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梗概》，196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舶来物产专税”，即对外来物产输入广东和经广东输入内地的物产征税，1938年下半年征得280万元，1939年征得684万元，1940年达2 500多万元，1941年更达5 600万元。

为查缉走私，粤省当局于1940年1月成立“广东省财政厅缉私处”，其下分设“查缉专员办事处”6所，“查缉所”45所，“查缉哨”25所，“查缉组”1组，缉私网遍布全省各地。缉私员警与担任对敌封锁的部队密切合作，东起饶平柘林，西至防城东兴，除规定的货运通行线外，均严密封锁，组织联合检查所，依《广东省对敌经济封锁线出入总口联合检查所组织暂行办法》，对货物进行查验后方可通行。税务部门征收税费，驻军部队担任检查，分工合作，权责分明，使走私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每月缉获私货不下二三十万元。①

在游击区的重要乡镇，秘密设立省银行的办事处，又将省行的支行从战前的45个增至1943年的128个，对敌开展金融斗争。由于奖励储蓄，省银行结存总额逐年增加，1937年为34万元，1938年为87万元，1939年为638万元，1940年为3 160万元，1941年为5 000万元，1943年为7.1亿元。为了与敌伪争夺侨汇，省政府设立“粤侨通讯处”；省银行积极推进侨汇业务，改进手续，减低汇费，在新加坡设立分行，在南洋和省内设立代理点多处，使侨汇大大增加。据省银行对粤侨、港澳同胞汇款的估计，1937年为3.8亿元，1938年为5.1亿元，1939、1940年各为10.2亿元。1937—1941年，海外华侨认销公债、航空献金等约为18亿元，投资6.8亿元。②

1941年秋，田赋收归中央政府接管，改征实物，成立广东省田赋管理处。从1942年起，田赋除征实外，并随赋征购粮食及带征县级公粮，征实额定为150万市担，征购额定为100万市担。1943年因广东灾情严重，发生粮荒，征实征购降为220万市担。1944、1945年均为212万市担。③ 除田赋外，广东也发行了中央和省的公债和金库券，从1938年至1945年6月止，共募得国币15 848万元，美金310余万元。④

1936年，广东的人口达3 135万，抗战期间，人口显著减少，减少人数达300万左右。1937年，广州市有121.9万人，为战前广州人口最多的年份，广

---

① 秦庆钧：《李汉魂主粤政绩概述》，载自吴川县政协编：《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246～253页，1988年印刷，有修改。

②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877、85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③ 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印：《战时粤政》，36～40页，1945。

④ 沙东迅：《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载自《学术研究》，1995年第1期。



州沦陷后，人口锐减，1940 年只有 54.5 万人。①

第二节　日伪在占领区的经济控制与经济掠夺

一、日伪对交通、工矿业的控制

广州沦陷后，日本陆、海、外三省联络会议制定了广州沦陷区经济“复兴”的五条要点：①水电事业的恢复。②交通机关的恢复。③各种工厂的修复运营。④特殊金属及其他土产品资源的开发。⑤宣抚用品配给组合的组织及对输入广东占领区日货的统制。其后，广州沦陷区的公用事业、交通及其他重要企业均在日军的授权下，由日本国策会社及其子公司和其他财阀企业进行掠夺和统制。

日军占领了广东沿海地区后，直接控制了沦陷区的交通运输。广州沦陷区内的粤汉（广州至军田段）、广九（广州至深圳段）、广三铁路被日军占据，由日本南支派遣军直接管辖。对航运业，日军也进行严格的控制，日军占领广州后，对当时未及撤离广州及附近各地的华商船只，无论轮船或渡船以及各种木帆船一律予以收缴。计大小船舶共 1 300 多艘，其中汽船 48 艘，电船 44 艘，拖渡 19 艘，驳船、木艇等其他船舶共 1 000 多艘。② 1939 年 2 月，日军宣布封锁珠江，除日本船只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禁止通行。广东的内河航运也由日军授权的日本航运公司垄断。日军除通过日商航运公司直接从事水上运输外，日本海军特务部还筹办“广东民船总公所”，强迫民船到该所登记，领取船牌，以控制沦陷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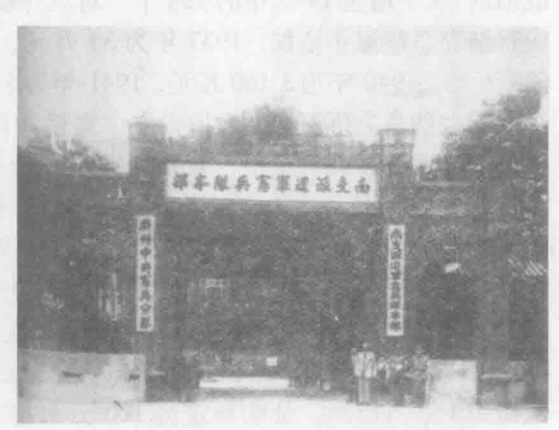


图 4－2　日本“南支派遣军”宪兵队本部

① 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176～177 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② 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277 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民船运输。日军还派军舰沿江巡逻，对过往船只进行检查，并强迫民船为日军运输军用物资。1940 年 4 月，日军宣布局部开放珠江，商船可以通行，伪粤海关监督署同时宣布开放海关，控制稍有放松。① 广州与其他日占区的公路运输主要由日本在华南的国策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的子公司福大公司垄断经营。

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国策会社以及其他财阀企业控制了广州沦陷区的主要工矿业。如台湾拓殖会社经营自来水、采煤、五金、船舶修造，福大公司经营交通、造船、铁工厂，台湾电力经营电气，日本水产公司经营鲜鱼、制冰，杉原产业专营矿产及废铁，南方开发糖业组合专营制糖业，三菱公司经营采矿、蚕丝。

广州沦陷后，所有省、市营企业以及稍具规模的民营企业即为日军及由日军支持的日商所攫夺。日本侵略者攫夺沦陷区工矿企业的方式主要有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几种形式。

对与军需有关的公、私营企业，日军以“军管理”的方式加以攫夺。广州原有的官营企业，如市营电力厂、自来水厂、省营士敏土厂、制纸厂、纺织厂、饮料厂、硫酸苏打厂、肥田料厂等战后劫余的企业，以及民营协同和机器厂、均和安机器厂、广同安机器厂、德祥机器厂和德安泰造船厂、广州制钉厂、汕头开明电灯厂等企业均被日军以军管理形式强占。

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日本侵略军为了收买沦陷区民心，宣布“发还军管理工厂”。1940 年 5 月，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华南日军组成“省市营工厂还付善后处理委员会”，将部分工厂发还中方。



图 4－3　日军装模作样地向伪广东省政府交还省营、市营工厂



图 4－4　日占时期的“广东省营第一工业区”

---

① 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341 ~ 342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随着日军的占领，日商也纷纷来粤设厂，并建立了“工业运营统制会”的组织，除占夺中国公私企业的设备改头换面外，也有部分工厂设备是从日本运来，各工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均是日本人或台湾人，以先进设备生产制造为战争服务的产品。如日本华南水产株式会社广东支店，专门生产水产品保鲜的冷藏设备，为日本海军服务；帝国瓦斯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专门制造高纯度的压缩氧气，是当时华南唯一的制氧厂，产品85%供给军用；武田制药工厂，是当时华南唯一一间生产西药的工厂；拥有3 000名工人的藤野三郎下属的被服厂、干粮厂，都是为日军生产的。“这些企业，实质上是利用中国的原料、劳动力，掠夺中国的财富，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①



图4－5　武田制药厂在爱惠路上的广告牌

沦陷期间，广州民营工业大部分受日寇破坏，幸存者也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

二、日伪对商业贸易的控制及物资统制

广州在失陷时，由于大火焚烧和日军、汉奸抢掠，广州商业损失大半，市场商品缺乏，来粤日商伺机独占广州市场，倾销日货。据粤海关情报记

①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梗概》，192～19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载，至1939年4月，在广州市的日本平民约4 400人，这些日本人大多数与新开张的约300家商店有关，这些商店中有饭店和旅店（专为日本人服务）90家，食杂店80家，进出口商50家，理发店18家，还有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商行。市面上大宗的进口货基本是日货，包括咸鱼、墨鱼、芥末、面粉、盐、糖、啤酒、火柴、罐头食品、煤油、花生油、瓷器、自行车以及棉制品等。① 因此，沦陷初期，广州市面日货充斥，尤以海味、白糖、布匹洋货及各种棉织品为多。为垄断沦陷区商业，日军规定华商或外商的商业交易、货物贩运、进出口贸易等不得自由进行，须经日伪政权的许可，各商号须领取贸易许可证后才能营业，日本特务机关随时派人监视。而日本商号概不纳税，日货也免税进口。为独占沦陷区的商业贸易，掠夺战略物资，日军对沦陷区的外贸及航运进行统制，对于外商贸易，则借口军事行动，禁止船舶装运货物，多方限制。

为了掠夺侵略战争所需的物资，日军将重要物资授权给日本大商社实行垄断经营，即所谓“统制事业”。如铁、钨、锰、锑等金属和矿石的贸易指定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杉原产业株式会社3家公司专营。牛皮、黄麻由振山洋行等日本商社专营。煤油、电油、油渣由出光火水公司专营。蚕丝贸易由三井物产、日本棉花、三菱商事等公司经营，其中三井物产统制了大部分的蚕丝贸易。1939年4月，日本7家渔业产品公司组成广东鱼市场组合，垄断经营广州鱼类批发及鱼类制品贸易。1940年4月，日本宪兵司令部将广州市内进口、销售和修理收音机及零件的专利权授予福大公司等5家日本商号。对这类物资实行强行经营和收购，如生丝为广东出口之大宗，日军规定所有生丝必须销售给三菱和三井洋行；皮革为重要军用物资，日军当局先是组织“皮革资源统制组合”，继而组织“广州市皮革同业公会”，专营皮革采购，规定每个会员每月必须向日军提供1 000张以上的生皮，广州市内所有生皮必须以“公允价格”销给日军。②

日军对广州沦陷区的物资进行严格统制，通过成立带垄断性的物资贸易机构，将粮食、军需物资及其他与其侵略战争有关的物资都列入统制范围。这些机构承担着维持军票价值和统制掠夺沦陷区物资的双重任务。日本除了对必要物资设立统制组合进行掠夺和垄断外，对一般的商品也设立

① 黄菊艳：《日本侵略者对广东的经济掠夺与经济统制》，载自《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②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梗概》，191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各业组合，进行控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为了强化汪伪政权，在经济上给予伪政权更多的“自主权”，让伪政权参与物资统制，通过物资统制，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对广州沦陷区物资掠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广州沦陷区的商业贸易被日本垄断，华商受到严重打击。

三、日伪控制金融业及对税收、粮食的掠夺

日军占领广州后，在华南实行以军用券代替银行纸币流通。这种军票只是将日本银行现成的兑换券加盖“军用手票”四个字，强制民众使用，面额分10元、5元、1元、50钱、10钱、5钱、1钱等数种，军票规定与日元同价，但不可与日元兑换，没有发行限额，视日军的需要而定。日军在占领区发行军票的目的，据一名侵华分子称，“当军票已成为华中、华南之一般经济之通货时，有下列各项主要任务：①调节军部在华生活所必需之物资。②收集日本、‘满洲’、华北等处国防经济所需之物资。③攻击‘法币’之工作等项”①。最初规定军票对港币的比价为1比1，对法币为1比2，对广东毫券为1比3。但人民不愿接受军票，日军为促使军票流通，1939年2月改为军票对港币为1比0.48~0.5，对法币为1比1.2，对广东毫券为1比1.5~1.58。但实际上只能靠强迫流通。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强制军票对港币为1比4，未几改为1比8，1942年1月，军票与法币比价为1比3.3，2月为1比4.7，3月为1比5.7，4月为1比8，5月为1比10，由此可见金融的紊乱与物价上涨之快，人民生活在极度惶恐不安之中。②



图4－6　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等人在“香港陷落祝捷巡行”活动中高呼“万岁”的丑态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宣布再建中国银行，统一币制。

---

① 宫下忠雄：《在华军票之发展过程》，1943年3月31日《新申报》。见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268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②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梗概》，192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1941 年 1 月，由日本控制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随即发行所谓新币（即伪中央储备银行流通券，简称“中储券”），1942 年 7 月，伪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在广州成立，中储券开始在广州沦陷区流通使用，广东伪政权宣布实施中储券与旧币（法币和毫券）的全面兑换，要求商民在两星期内兑换完毕，自 7 月 24 日以后不准法币和毫券流通。中储券与法币的比率为 1 比 2。法币和毫券被伪中央储备银行回收后，中储券、军票成为广东沦陷区的主要流通纸币。中储券与军票的兑换比率为 100 比 18，其面额有 1 元、5 元、10 元和 100 元 4 种。1943 年 4 月 1 日，日本宣布停止发行军票新钞，已发行的允许继续在市面流通，各金融机关从 4 月 1 日起支付现款、放款、汇款均折合为中储券，不得以军票支付，以利用中储券实现其在华中、华南的“货币统一”，控制占领区的金融。广州沦陷区市面上军票逐渐减少，而由中储券所取代。但是，由于中储券发行既没有实物保证，又无发行限制，一发行即受到人民抵制，随着敌伪在战争后期日益陷入困境，中储券的信用迅速下降，到 1944 年 7 月，广州市民已完全拒绝使用中储券 1 元以下的纸币，其后连伪财政厅征收地税也改征稻谷，不收货币。①



图 4－7　当时的“中储券”

日伪在广州沦陷区发行军票、中储券的数量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广东伪政权《规复广东省银行计划书》中载，至 1940 年日军在广东沦陷区（主要是广州）推行的军票为 300 多万元。② 伪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自 1942 年 7 月 6 日始至 1945 年 9 月 22 日被接收为止，发行伪中储券 5 921 796 万元。③

日伪控制沦陷区经济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强征各种税捐。日军占领初期，

---

① 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339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② 《粤省政改革管见》，广东省档案馆藏，2－2－199。一说至 1940 年 12 月军票发行达 5 亿元，见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337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③ 吴志辉等编著：《广东货币三百年》，349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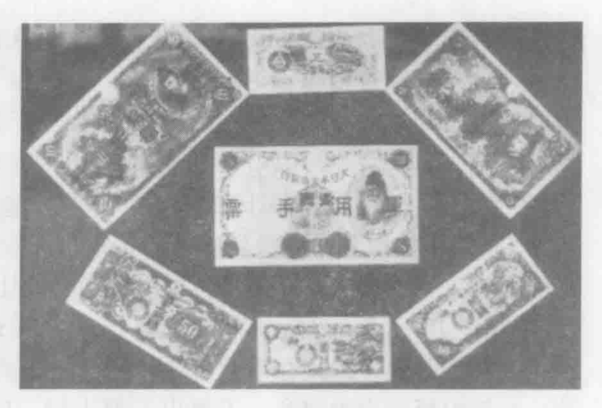


图4-8 日军在广州发行的各种面额的军票

征收税捐由广东治安维持会财政处主管，项目有营业税、屠宰税、房警捐、牌照税等，另成立特税局办理各种特税如戒烟药料专卖和食盐专卖。广东治安维持会所征税款除部分作为经费外，其余均上缴日军当局。如特种税收表面上归伪特税局主管，实际上由特务机关直接管理。伪特税局徒具虚名，所有收入税款概归特务机关支配查核。①

1940年5月，伪广东省政府、伪广州市政府成立，为维持其统治，首要的任务是充实财税。伪省政府成立前，国税、省税、县市地方税没有划分，由沦陷区各县市自行开征，伪省政府成立后，即划分各县市的国税、省税、地方税，分别接收整理。1940年6月7日，省政府代理省主席陈耀祖致电汪精卫，报告广东国税、省税接收情形如下："（一）广州烟酒税五月佳日接收。（二）食盐禁烟专卖及存盐二百七十余万斤，五月漾日接收。（三）广州市其他国省税六月东日完全接收。（四）省府成立以前，两年来盐烟专卖余利及保证金约军票三百万元，经迭次折中商定，以军票一百万元为广州市建设基金，五十万元拨为治安费，余款除保证金外，拟作省银行基金，并由宗淮自动声明，绝不作消耗用途，除广州市建设基金，应俟商妥保管手续再行核办外，余款业于微鱼两日接收清楚，其他各县国省税正逐步接收。"②

伪省政府征收的税捐，有以下各项：①地税，1940年5月至1942年2月，在"所辖和平区域之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新会、增城、博罗、从化、花县、三水、宝安、潮安、潮阳、澄海等15县"征得军票115.89万余元。②沙田税，1940年征得沙田钱粮、沙捐、护沙费共军票

① 《粤省政改革管见》，广东省档案馆藏，2-2-199。

② 《陈耀祖、汪宗淮致汪精卫、周佛海函电》，《汪伪资料档案》，法务部调查局资料室藏，载自陈木杉：《试论抗战时期汪伪政权控制下的广东省》，《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96。

34.9 万余元，1941 年合并为沙田税一项，每亩每年征 1.2 元，应征数为 138 万多元，但“因地方未靖，征收未能大有成绩”。③营业税，1941 年征得军票 50 多万元。④煤油贩卖营业税，1940 年 6 月起，一年半间征得军票 185 万余元，“但因煤油类，属于军用品之一，限制许可运销，现将断绝来源，影响税收甚巨”，税源不容乐观。⑤糖类捐，1940 年 8 月开征后，年征得国币 113 万多元。⑥纸类专税，原为洋纸税，伪政权改为纸类专税，1941 年度征得国币 100 余万元。⑦油豆专税，原为舶来农产品杂项专税，伪政权暂改为油豆两项，年征得国币 147 万余元。⑧筵席捐，年得国币 90 余万元。⑨娱乐捐，此项看似不起眼，实为伪政权收入的大宗，为赌博、彩票类的抽收，年可得国币 830 余万元。⑩中山前山三厂出入口专税，年得国币 350 余万元。⑪汕头出入口专税，1941 年征得国币 500 余万元。⑫抽纱专税，1942 年征得 158 万余元。此外还有官产收入、契税、当按押税、颜料专税、烟酒类牌照税费、屠宰税、蜡类专税、香烛纸宝冥镪捐，等等。市县地方税还得更列名目，[①]可说是网罗一切，名目繁多，不放过一丝一毫从沦陷区人民身上榨取财富的机会。

广东沿海地区沦陷后，为解决侵粤日军的军粮，日军以各种手段掠夺沦陷区的粮食。日军掠夺粮食的方式除了以武力直接抢掠外，还在广州市内设立米粮收集所，利用奸商大量收购沦陷区内的粮食。[②]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后，沦陷区谷米的征购改由伪政权出面进行。1940 年 8 月伪省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民食调节委员会，设谷米管理处，1942 年 3 月改



图 4－9　广州黄埔一带，日军搜刮来的粮食堆积如山

① （伪）广东省政府秘书办编：《广东省政概况》，第 3 编，财政，1～10 页，1942。

② 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96 页，1941，载自黄菊艳：《损失与重建——抗日战争与广东经济》，中山大学历史系 2000 年博士论文。

为粮食管理局，主管各县土谷征购。日军通过伪广东省谷米管理处，规定凡运入广州市的土谷土米，均须到该处领证，如由番禺、东莞、增城三县运来，须先经该县政府许可；领证的市的土谷土米，须将总量的1/3缴交该处拨为军粮，由该处给回公价：土谷每百斤给军票14元，土米每百斤给军票21元60钱，其余2/3，准自由贩卖；广州市居民得携同警务处所发的户籍表到该处申请，依人口数目及消费量，领取运输证。土米在300斤以下或土谷500斤以下者，准免缴1/3的军粮，但只限于自食之用。每证征收手续费军票20钱；入市土谷土米如超过100斤以上者而未经该处发证者，概作私运论，查获全数没收。①

广东向来为缺粮省份，日伪的掠夺更加重了广州市粮荒。自1942年5月28日起，广州开始实行人口调查，按户口配给粮食，实行计口授粮，并推行种植和食用杂粮等办法以缓解粮荒，但实际上收效甚微。10元钱在广州可购买粮食的数量，1933年是70公斤，1936年为8.3斤（1斤为500克），1942年为6斤，1943年为2斤10两（1两为31.25克），1944年5月为7两，同年12月为0.6两。按照伪《中山日报》1940年10月6日一篇文章的说法，是“富者转贫，贫者变乞，芸芸众生，无食者众”，各阶层的生活状况都急剧下降，在1944年7月，大学教授每月发米80斤，中学教员每月发米50斤。②



图4－10　沦陷后的广州街头，人们在排队购米

① 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34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②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梗概》，198～199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第三节　广东救亡文化[①]

广州是华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但陈济棠时期，提倡尊孔读经，迷信盛行，封杀进步言论，文教界为守旧势力所把持，鄙陋低俗之风甚嚣尘上。“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下台后，广州的救亡文化逐步开始抬头，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仍不时遭到当局取缔和镇压。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时局的变化，广州的文化界、文化人则呈现出两种趋势、两种状况。一方面，由于日机轰炸的威胁，出现了时人所批评的“教育逃难”“文化的沉寂”。大中学校“停办的停办，逃避的逃避”“因为大多数教育者或大多数学生离开城市的结果，造成了广州文化界的荒凉”。[②]人数减少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受到了影响和冲击。另一方面，则是救亡文化的勃兴。由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言论的限制；也由于上海沦陷后，进步文化人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汇聚广州，一些过去被当局迫害逃离广州的进步人士也重新活跃。上述情况，为广州抗战文化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执政的国民党广东当局在言论出版方面采取了较为宽松开明的态度：“当‘七七’抗战以后，《救国时报》、王明等在国外出的小册子即能在广州、香港一带公开出卖，11月以后即能公开翻印《解放》等刊物，而不加查禁。南京失陷后，日寇积极南进时更推动了余汉谋的坚决守土，倡办自卫团，启用部分左翼分子（多是大革命失败后消极下来的分子），支持《救亡日报》。省党部秘书长（书记长）谌小岑、四路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孙科系的钟天心等均公开提出统一战线口号，倡导群众组织”，对民运也相当开放，“去年‘一二·九’学生五千人巡行示威，今年1月文化抗敌协会成立时几千人大会均为左翼分子领导”“去年12月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印有开放民运的议案因未经中央批准故未公布，但实际上并未公开压制过救亡运动，至今年5月余汉谋更有告工人书，省党部对榨油工人加薪斗争亦未加压制还相当帮助，8月建立战区政治部时，李煦寰更大胆引用部分左翼分子在

---

①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4章第5节“广州抗战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载自袁小伦：《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上、中、下），《广东党史资料》，第21、22、2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钝夫：《起来，广州的文化人》（1937年11月11日），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9册，124~125页，1987年印刷。

第三组工作，政治工作会议上亦公开号召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等是”①。1937 年底，曾养甫在广东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提出“开放民众运动提案”，主张“在中央指示之原则下，凡拥护三民主义，拥护中央政府，拥护最高领袖，集中抗战力量之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律开放，俾振作人心，发扬民气”，提案获得通过并公之于众。

国民党当局以执政党身份，参与领导和支持一些救亡文化活动，如参加“救亡呼声社”的活动，参加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参加中苏文化协会广州分会，支持《救亡日报》复刊等。并在军队成立负责文化宣传的专门机构，吸收进步文化人在其中工作，如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的设立。1938 年夏天，第四战区成立政治部，由李煦寰任主任，采取进步姿态，表示要学习八路军，开展政治工作。李煦寰启用钟天心的妹夫左恭（中共秘密党员）担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决定成立政治部第三组（文化宣传组)，以中山大学教授尚仲衣（1939 年加入共产党）出任组长。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主要有：进步教授钟敬文、进步戏剧家赵如琳，中共党员叶兆南（孙大光)、司马文森、石辟澜、黄新波，青年画家郁风（后加入共产党)、中山大学“抗先队”队长梁有文、进步木刻家梁永泰等。

国民党广东当局自已也主办或控制了部分有关抗日救亡的刊物，如《华侨战线》《更生评论》《黄花岗》《统一战线》《轴心》等。《华侨战线》虽是由华侨团体组织——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编辑出版的半月刊，但实际上是由国民党省党部直接指导编辑发行的，为它撰文的也大都是广东党政军及社会、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该刊主题明确，都是有关华侨和救亡的内容，刊物曾发表吴铁城、曾养甫联名的《为敌机狂炸广州向海外华侨的紧急号召》，以及吴铁城的《告海外侨胞书》，号召华侨拥护国民党的领导，支持抗战。

《更生评论》原为研究学术的刊物，是“干庐学术研究社”的社刊。该社于 1937 年初成立，以阐扬学术思想、建立国家中心文化、促进民族自力更生为宗旨。“七七”事变后经过改组，直接受国民党市党部控制，其宗旨改为建立三民主义文化、发扬抗战建国精神、贯彻民族自力更生、倡导新科学文化。该刊辟有“新道德运动专辑”“战时统制问题特辑”“御侮救亡特辑”“发扬民族气节特辑”“战时民众组织问题特辑”等，从各方面阐发抗战理论，论证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中心地位。

---

①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 年），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6 册，299 ~ 300 页，1987 年印刷。

《黄花岗》于1938年2月底发刊，撰稿人多为中大教授和知名人士，所载文章一般是从各方面来论证国民党的中心地位，并收入了不少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赞语，因此在官方刊物中地位也很高。《黄花岗》有关抗战理论的文章最多，如吴宗慈《精神思想上之统一》、吴康《论统一战线》、陈安仁《全民抗战的政治纲领与经济纲领》等，均呼吁各党派要加强合作，巩固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敌。而《统一战线》与《轴心》则均为国民党自己出版的官方刊物，其出版宗旨虽都极力突出、强调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中心地位，但仍有很多是关于统一战线与宣传、统一战线与组织民众等抗战理论文章。

在救亡文化运动中，中共则发挥了更为重要而实际的作用。从组织与阵地来看，这时在广州有重要影响的救亡文化团体或活动，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都扮演着主要或骨干的角色。如标志着广东救亡运动从文化界冲开缺口的救亡呼声社及其《救亡呼声》旬刊，社长谌小岑，成员包括国共两党党员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由于中共在该团体的核心作用和《救亡呼声》言论的鲜明进步性，谌小岑本人被攻击为“共产党的书记长”①。该刊号召全民族抗战，主张“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心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不论信仰不分阶级，“各党各阶层共同联合起来以打击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还呼吁实现民主政治，要求“开放并保障一切抗日救亡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绝对自由”“让工农群众能自动的组织起来”。时人称赞该刊“像一把鼓吹团结抗战的嘹亮号角，响遍省港澳”。②



图4-11 救亡呼声社出版的《救亡呼声》旬刊

抗战教育实践社。1937年秋，广州文化界组织了许多形式的座谈会。11月21日，在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第三党联合发起下，由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面，在文化界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抗战教育实践社。理事会设社务部、

① 谌小岑：《抗战初期我在广州的见闻》，见《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5~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② 救亡呼声社编委会：《一年来本刊的政治主张》，1938；见袁小伦：《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中），见《广东党史资料》，第22辑，15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教务部、出版部和编译委员会，由钟天心任常务理事，以尚仲衣、叶兆南、石辟澜等为骨干。抗战教育实践社的成立，推动了广州教育界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华南战时教育的展开。抗战教育实践社以“不论过去，不论派别”“实现国内各党派和团体各种力量的伟大团结”和“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北伐时期民众运动的精神”为号召，[①] 开展广泛的战时民族教育，同时以戏剧歌咏、街头壁报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尚仲衣、叶兆南负责该社自修和特种训练班，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培训了一大批宣传骨干。该社还开设各种抗战理论讲座。以该社骨干为核心的《新战线》周刊，于1937年11月创刊，以统一战线的面目出现，编委有左恭、叶兆南、姜君辰（主编）、尚仲衣、欧阳山等，石辟澜参与工作。其编辑和撰稿人有各方面人物，且多为政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内容主要是报导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统一战线为抗战救亡工作献计献策，对广东当时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尚仲衣在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阐明“中华民族如能走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那就是生，中华民族如不能走到全民族统一战线，那就是死”[②]。

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为建立全省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共广东党组织与救亡呼声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会等团体共同磋商，于1937年11月14日召集教育、新闻、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界人士及广东当局上层人士（共100多人）举行座谈会，决定成立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12月25日正式成立，1938年2月改称“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由钟天心、谌小岑、欧阳山、虞焕章、李伯球、叶兆南等32人组成理事会，其成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第三党成员、广州各文化团体负责人和著名文化人。有会员1 000多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广州各党派的文化团体与文化人。这说明，抗日救亡运动促成了广州文化界的空前团结。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以“动员一切文化工作者，在政府领导下，建立文化国防，争取民族解放胜利”为宗旨，是广东文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组织。该协会的纲领是“发动都市与乡村之启蒙运动，深入内地，提高工农文化水准”，“组织移动战时文化服务团，深入本省各县镇乡村，艰苦地进行民众启蒙教育及团体、学校之演讲宣传工作”。[③] 随后，协会组织了几所“抗战知识宣讲所”和“战地工作团”，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救亡宣传活动。该会的成立，推动了广

---

① 袁小伦：《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中），见《广东党史资料》，第22辑，15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尚仲衣：《论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载自《新战线》，第8期（1938年2月12日）。

③ 《一年来广州之文化运动》（1938年），载自《救亡呼声》，第2卷，第3期。

东戏剧协会、广东文学会、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歌咏团协会、新闻界从业人员抗敌协会、社会科学工作者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的成立。

《抗战大学》。1937 年 11 月创刊，是中共南委（广东省委）主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战时综合半月刊。编委会由阳光（陈华，共产党员）、梁威林（共产党员）等组成。李汉魂、陈铭枢等为之题词。该刊发表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方振武、杨虎城、郭沫若、夏衍以及尹林平、云广英等人的文章。



图 4－12　《抗战大学》半月刊

《救亡日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上海失陷（1937 年 11 月）后，大批文化人撤退到香港和广州，鉴于广州在对外尤其是对东南亚华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郭沫若征得周恩来同意，决定将这家报纸转移广州出版。周恩来并指示：《救亡日报》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出版。郭沫若、夏衍等遂经香港抵广州，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取得广东当局的支持，余汉谋“对《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表示欢迎，并捐助了毫洋二千元作为开办费用”。因广州白报纸价格远高于香港，夏衍又征得吴铁城同意，免税从香港进口白报纸，将多余部分在广州出售获利，“我们就用出售多余白报纸的办法维持了报社的经济。”① 华嘉、陈子秋、谢加因、蔡冷枫被吸收到该报工作，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则成了该报的“义务记者”。1838 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为指导这家报社的工作，周恩来指定由夏衍和云广英、廖承志联系。后来，张文彬派饶彰风以作家的身份与该报联系。周恩来还对《救亡日报》的宗旨、方针做了明确的指示，指出“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欢喜看的报纸”，“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② 经过大家的努力，《救亡日报》成为抗战初期中共在粤港地区最

---

① 夏衍：《回忆〈救亡日报〉（广州版）》，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港抗战文化》，183～186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713～714 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重要的舆论阵地，被誉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共《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4月，《新华日报》在广州设立分馆，每天用飞机从武汉将该报纸型运至广州印刷发行。分馆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张尔华任经理、李峰任支部书记。分馆除翻印发行《新华日报》《群众》《救亡日报》等报刊外还组织《新华日报》读者会。

随着上述抗战文化阵地的开辟，广州地区的抗战文化活动迅速开展，各文化团体开展了文艺会演、宣传集会、战地宣传和文化下乡等一系列活动。广泛动员起来，投身到民族自卫斗争的热潮中去，是当时广州文化界的一大特色。随军服务队、落乡工作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广州的一些剧团，兵分两路，或下乡演出，或上街宣传。作家欧阳山组织随军服务团，诗人周行则身着戎装入伍当兵。抗日救亡时期广州文化界的又一特点，是文化的大众化运动比任何时期都活跃和有长足的进步，改变了过去只是少数几个人提倡和实践的局限。首先起来号召和付诸实践大众化运动的是文艺界，他们创作了大量通俗性作品，用广州话写作的诗歌也风靡一时，大众化运动在宣传抗战、唤醒民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8年3月29日，是同盟会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27周年纪念日，在中共推动下，广东当局决定于是日举行戏剧歌咏纪念大会。参加筹备的机关团体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州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宣传部、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抗战教育实践社、广东歌咏协会、广东戏剧协会等。钟天心任大会主任，胡春冰、马思聪任副主任，赵如琳任戏剧组长，陈世鸣任音乐组长。戏剧歌咏纪念大会在广州太平戏院举行，上演历史剧《黄花岗》，该剧是在夏衍、周钢鸣等指导下，由20多位作家集体创作的；由胡春冰、夏衍等导演，梁绮、游波、陈海云等1 000多人参加演出，省政府、市政府、四路军军乐队也参加。全剧人物众多，情节动人，气势磅礴。连续3天的演出场面十分宏伟，台上台下连成一片，最后观众齐唱《全国总动员》。活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38年8月，广东各界开展“八一三”纪念暨献金活动。广东党组织实际领导这次活动的宣传工作。省委指出：“国民党要钱，我们则要通过献金开展宣传，动员各阶层群众起来抗日。”为此，《抗战大学》发表《纪念八·一三与献金运动》（作者追光，即饶彰风），号召群众积极参加献金；由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成的献金运动筹委会宣传部，以指导、编纂、演讲、歌咏、戏剧、美术六股，分别指导各界座谈会、联席会，部署献金宣传；在广东文学会主办的献金文艺晚会上，马思聪、祝秀侠、郁风、高

灏等参加演出独幕剧《赎罪》（编剧夏衍），宣传献金的意义。

抗战初期的广东，国共两党关系的主流是联合，但也有摩擦和斗争，顽固派时刻不忘其反共企图。广东当局标榜“开放民运，开放言论”，但又执行其最高当局“对出版物严加统制”的旨意。1938 年，广东党政军联席会议公布《战时出版物检查办法》，把包括《毛泽东论文集》在内的 30 种进步书刊，列入“取缔”范围。5 月，又成立审查图书委员会，对书刊原稿进行审查。广东文化界配合中共广东省委的部署，对此进行反击。先由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召开文化界座谈会，对当局“统制”言论的行为提出异议，希望收回成命。后又在《救亡日报》《抗战大学》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对查禁书刊的做法进行抨击，指出“统制”出版物不合乎《抗战建国纲领》的精神，“束缚了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破坏了全国的团结，破坏各抗日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团结”①。广东文化团体还联名向当局陈明利害，指出查禁抗战书刊，不让出售，不仅经济上损失，而且有可能将禁书运往香港发行，造成对当局不利的政治影响。当局对查禁书刊遂不得不有所收敛。

1938 年 9 月，又发生了当局封闭《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事件。廖承志即召开有数百人参加的各界人士招待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并经廖承志、云广英等解释和交涉，当局才同意《新华日报》在广州继续翻印发行。

这样，抗战初期的广州，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沉寂 10 年之后，重现革命策源地的文化风采，成为国统区除武汉以外的第 2 个文化中心。茅盾指出：北平和上海相继沦陷以后，武汉和广州代而为文化的中心点。②

出版业进入繁荣时期。出版周期加快：为适应救亡运动的要求，让读者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和抗战动态，各报刊加快出版周期，除出版日报外，还出版周刊、旬刊等。双月刊、月刊一类期刊，均采取求快的措施，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旬刊改为周刊。出版机构猛增，除已有的出版机构外，许多机关、团体、部队纷纷成立出版机构，或以机关、团体、部队名义出版各种读物。战时广州出版机构共有 71 家。出版物丰富多彩：主要报刊有七

---

① 追光：《关于查禁救亡图书与审查原稿》，见《抗战大学》，1938 年，第 2 卷，第 1 期；见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 1 卷，464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② 茅盾：《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见《中苏文化》，第 8 卷，第 3 期；载自袁小伦：《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下），见《广东党史资料》，第 23 辑，228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八十种，出版书籍先后达160多种，包括国共两党领导人和知名文化人的著作。如1938年3月出版的《中山日报》丛书，就有《怒吼之中国》《保卫大广东》《国家高于一切》《抗战文艺总论》等书目。[①] 印刷、发行业兴旺：市区印刷厂增加，印刷工人人数增多，素质比战前有所提高。广州印刷条件比武汉、重庆优越，外地出版物也寄来广州印刷。发行业相应发达，上海、南京不少书店迁来广州，或在广州设立分店。广州汉民路成为中国最大的书刊销售中心。广州出版物外销量也有所增加。舆论认为："华南原是一个不见文化水草的大沙漠，从前这里出版的书刊，是丝毫没有销售到各省的，现在呢，广东出版的东西，各省人士就不少来订阅了。"[②]

文学创作生机勃勃。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巴金主编的《烽火》、靳以主编的《文丛》、欧阳山主编的《光荣》等几十种文学刊物，在广州出版；茅盾、夏衍、巴金、沙汀、钟敬文、何思敬、林焕平、陈残云、草明、郁风、欧阳山、黄宁婴、雷石榆、蒲风、司马文森等，在广州发表了不少作品，蒲风《抗战三部曲》、黄宁婴《九月的太阳》、陈残云的《铁蹄下的歌手》等诗集，司马文森《广州四月的轰炸》、丘东平《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夏衍《广州在轰炸中》等报告文学，欧阳山《一个广州人底迷惑》等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岭南文学的代表作，岭南新文学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抗战爆发前后，广州话剧活动已十分活跃，成立了锋社、蓝白、艺协三大剧社；各学校戏剧团体纷纷成立，主要有春雷剧团、奔风剧团、前锋剧团、邮局剧团、炬流剧团等；演出的剧目主要有《走私》《汉奸的子孙》《放下你的鞭子》《黑地狱》《雷雨》《日出》《飞将军》《保卫卢沟桥》等。1938年3月历史剧《黄花岗》的公演，标志广州剧坛的繁荣。

此外，在音乐、美术方面，音乐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全国总动员》《保卫华南》等歌曲，民众歌咏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著名的抗战歌曲，音乐家马思聪等举行筹款义演。省港地区为救亡而兴的新兴木刻和漫画创作异军突起，漫画、木刻等贴近大众的艺术作品，在报章杂志和街头壁报上大显神通，广州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个中心。以李桦为会长的现代版画会出版了《木刻界》《现代版画》刊物。该会曾举办"抗战木刻展览"，并由赖少其带到广西柳州、梧州、南

---

① 《广东省志·大事记》，1938年3月13日，未刊稿。

② 《现代中国》，第1卷，第6期。袁小伦：《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下)，见《广东党史资料》，第23辑，23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宁和桂林等地展出。①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奉献精神的年代。

第四节　沦陷时期的殖民文化

广州沦陷后，日伪在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严密加以控制，极力推行奴化政策，以麻醉占领区的民众，维持其长期统治。

日军在占领区内设立各种宣教机构，敌21军司令部设立了宣抚部，师团设宣抚处，联队设宣抚班，其主要任务是在占领区内设点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在新闻通信方面，则设立了由情报部门和日军随军记者组成的报导部。稍后，日本兴亚院设置广东派遣员事务所，对伪广东政权进行“比较长远”的指导，其中包括宣教政策的制订和监督。附属于日军的一些日本文化人也在组织所谓文化教育团体“共荣会”，其头目是久居中国的“支那通”岩井武男。该会设有专门的出版机构广州协荣印书馆，出版图书多以宣传“东亚共存共荣”的反动理论为主，并出版《新亚》《华南公论》等期刊。该会还设有“共荣印刷所”和话剧团“纸芝居”。② 一些日伪机关也出版图书，如新亚印书馆、亚细亚印务局等。



图4－13　日本随军记者火野苇平



图4－14　协荣印书馆

① 袁小伦：《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下），见《广东党史资料》，第23辑，234～25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郑泽隆：《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见《广东史志》，1999年第3期。

日本占领军对新闻舆论控制极为严密，将新闻部门视为情报机构，所有新闻的保密、控制、检查和配给纸张等，均由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部报导部直接管理。报纸头版的所有电讯，不论属于国内、国际、军事、政治、司法、公安等，都由报导部直接交下或者从日本“同盟通讯”中选出。伪广东省政府设有宣传处，但实为报导部的附庸，伪政权对其机关报只是在名义上领导而已，许多最高职权还是操纵在报导部之手。

广州沦陷时，旧有报馆全部歇业。日军报导部于1938年12月首先开办《广东迅报》，主编为台籍日本特务唐泽信夫，以宣传所谓“东亚和平”“皇军威力”。先为5日刊，两个月后改为3日刊，不久又改为日报。此外，还开辟了一个为日本人、台湾人服务的日文版专栏，后扩充为一份日文版的报纸《南支日报》，但仍附属于《广东迅报》。这两份报纸是日军在华南统治时期的主要喉舌。


廣東迅報
乘勝長驅攻陷新山
東海岸英澳軍陷最後命運
星洲敵軍惟有投降或被殲



图4－15　《广东迅报》（左）和广东迅报社社址——广州永安堂（今广州市沿江中路149号）

伪组织主办的报纸，一份是1939年1月创办的《民声日报》，由彭东原主持的伪广东省治安维持会津贴开办，但重要职位都由日军报导部派台湾人出任，次要人选也要经报导部同意。社长是台湾人叶锦灿。“治安维持会”改伪“广州市政府”后，该报又成为伪广州市府的报纸。

另一份是1939年11月1日创办的《中山日报》，是汪伪派系的报纸。汪伪在广州设立“中央电讯总社广州分社”，附设于日本“同盟通讯社”

内，先后由冯节、陈璞为社长。该社以宣传汪伪政权的“亲日”“反共”政策为主，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后，改归伪省政府管理。《中山日报》以汪伪通


中山日報

我們的目標

民聲日報

斷絕安南援蔣物資

日派員赴安南監視

陸軍西原少將任委員長

華南派艦隊一部助海防

图 4－16　《中山日报》和《民声日报》

讯社的电讯为基础，版面内容与南京出版的《中华日报》相同，打着孙中山的旗号，鼓吹所谓“大亚洲主义”，同时贩卖汪精卫媚日反共的理论，社长由伪教育厅长林汝珩兼任。该报销路曾一度超过《广东迅报》。刊物有《协力》月刊（后改半月刊），出版过“大东亚战争”“新国民运动”“南洋解放”等特辑。另有属图片宣传的《新广东》画报，“籍以引起民众了解和运之真诠及大东亚战争之意义”①。

另有所谓“商办”报纸，前期有《南粤报》《中兴报》，后期有《公正报》《群声报》等，虽由私人出资，以牟利为目的，但检查、监督、配纸和任用主要人员仍在日军报导部的控制之下。

广州沦陷后，日军军部“广东放送局”占用原“广州播音台”的设备设立广播电台，用粤语、国语、日语播音，成为侵粤日军的又一舆论工具。②

日伪还策划建立了“广州新闻记者协会”，由报导部派日本人、台湾人担任重要职务，实行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名为“广东新闻记者协

① （伪）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广东省政概况》，第 6 编，宣传，4 页，1942。

②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卷 16（广播电视志），1 028 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

会”，名义上由伪广东省政府接管，省内沦陷区的各报记者也参加，同时所有日系、台系记者退出。[①] 为欺骗舆论，制造假象，日伪发起在广州召开“东亚新闻记者大会”。汪伪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会前汪精卫以及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专程赴广州。1941 年 8 月 4 日，“东亚新闻记者大会”召开，会议“代表”汪伪60 名，日本20 名，伪满10 名，日军司令官今村均、日军特务机关长以及日、德、意驻粤总领事等参加。会议分电汪精卫、近卫“致敬”，并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及华南日军总司令“送呈感谢决议文”。汪精卫等在会上要各记者为“东亚新秩序”摇旗呐喊。[②] 为进一步控制广东各地报纸，利诱更多记者替日伪涂脂抹粉，日伪当局于1941 年9 月10 日筹组“广州新闻记者赴日考察团”，由各报社派一人参加。[③]



图 4－17　汪精卫在发表广播讲话

日军为实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控制，于 1939 年 8 月 8 日和伪广东治安维持会联合成立“华南文化协会”，发起召开所谓“中日文化恳谈会”及派学生到日本留学，蒙骗广东人民，由伪民政处长欧大庆任主席。1940 年 1 月，由日伪扶植的各“民众团体”在广州开会，并于2 月4 日成立“华南各界促进和平联合会”，打起“中日两国共存共荣”的招牌。

1940 年 12 月，日本文艺界久米正雄、中野实、真杉静枝、吉川晋等到广州配合策划“和平运动”。1941 年 1 月，汪伪广东政府与日本驻粤各机构在广州成立中日文化协会广州分会，陈耀祖、林汝珩分任名誉理事长和理事长，日本特务矢崎勘什、岩越季寒、总领事阪田富雄等任名誉理事，会员中有汉奸80 名，日本人38 名。[④] 1941 年6 月，又有所谓日本文化界“华南慰问团”到广州活动，广州地区一些汉奸文人与之座谈，大谈所谓“中

① 郑广忠：《沦陷时期广州敌伪报业》，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18 辑，33～47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

② （伪）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广东省政概况》，第 6 编，宣传，2～3 页，1942。

③ 张洁：《日伪在广州的罪恶活动》，见《广州抗战纪实》，434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④ 郑泽隆：《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载自《广东史志》，1999 年第 3 期。

日亲善”。

日军占领广州前后，广东省立和市立图书馆的典籍藏书经炮火战乱，损失惨重。中山图书馆不但在广州沦陷时被迫停馆，馆舍亦被日本海军武官府霸占，未运走的书刊近10万册，后均为日军掠夺而去。中大、市中山、仲元、教育会、通俗、省一中等图书馆藏书，亦被洗劫一空。[①] 1940年7月25日，伪省教育厅在广州朝天路再设省图书馆，派人四处搜罗各种中外图书刊物，同年9月，又设立所谓“民众教育馆”，以便“宣传和平真义”“积极推进各种社会教育事业”。除了赤裸裸地灌输奴化思想，日伪当局又利用文学艺术有娱乐性、潜移默化的特点，推行汉奸文艺，将“和平反共建国”的思想注入其中，炮制了大量的颓废庸俗、消弭意志的作品。广州的电影院大半是由日本人操纵，影片的供应由共荣会和中华电影公司代办，内容多为宣传建立“东亚新秩序”和日军的“德政”，如《东亚和平之路》等，另有不少恋爱、色情、恐怖片。在剧团方面，以共荣会主办的兴亚剧团和伪市政府的市民剧团最为卖力。在音乐方面，汪伪广东当局强迫中小学生唱“和运”歌曲，并在占领区上演“和平歌咏运动”的闹剧。



图4－18　日伪当局组织的亲日宣传游行

① 官丽珍：《抗战期间日本对广东的文化侵略述论》，载自《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对教育的渗透和控制。日军侵粤后，就在广州和各驻防地开办日语学校，由日军军官任教。1941年9月，日军特务机关通知伪广东省政府将日语学校“接收”：“惟教育机构，仍维持现状，由日本军派出教官”；“全部经费由中国方面负担”；修学期为3~6个月，至少3个月。汪粤当局共接收这种“学校”102间，其中广州有5间，南海23间，番禺28间，东莞6间，增城12间，宝安11间，等等，实际上是日军将这类学校的经济负担转嫁给伪广东省政府，其他均照旧。[①] 当局还强令敌占区内各级学校复课，以向学生灌输卖国媚日思想，并在初中以上强制实行日语教学，



图4－19 日伪当局在广州设立了多所日语学校，强迫人们学习日语

“定日语为主要功课，考试如日语不及格者不能升级”，其目的在于通过日语的推广，使沦陷区的民众“了解日本、日本人及日本的文化，进而树立东亚共荣观念”“统一东亚人的精神”。1940年3月7日，日本政府派遣“东洋妇人教育访问团”来广州为奴化教育出谋献策。为笼络广州各小学校长，并使之崇拜日本教育制度，日伪当局还选派多人到东京“考察教育”。7月26日，伪广东省政府召开第18次“省务会议”，提出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以便“沟通中日文化，促进善邻友好关系”，并决定设立一所“广东大学”，以培养上层奴才。9月25日，伪广东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林汝珩兼任校长。日本一些所谓名流学者如中村孝也等也亲赴广州，开设“王道精神之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史”等特别讲座，毒化和麻痹青年学生。[②] 另有“省立男女中学，男女师范又文理学院各一所，由伪教育厅科长何少山到港拉拢收买大学教授前往任职，并诱我大学员生登记。”[③] 为严格控制各校学生，日伪当局先后成立了伪广东大学学生自治会、伪广东省教育会、全省

---

① （伪）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广东省政概况》，第4编，教育，97~98页，1942。

② 张洁：《日伪在广州的罪恶活动》，见《广州抗战纪实》，43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广东省奸伪动态调查专报》（1940年11月1日 粤统字第20号），广东省档案馆编：《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第247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学生联盟等，并强行集中广州地区大、中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42 年 1 月，又将受过军训的学生编为“青年团”，后又改为“青少年团”，分别由伪省长、伪教育厅长担任正、副团长。



图 4－20 日伪当局组织的广东妇女访日团在日本

1940 年 9 月 9 日，汪伪发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在广州成立“东亚联盟协会”。恶意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称要以东方的“王道主义”代替西方的“霸道主义”。林汝珩任广州分会书记长，宣称“要教育中国民众，爱中国，爱东亚，同时要爱日本，爱满洲国”“将中国民族意识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意识，打成一片”。① 广州分会除召开座谈会和演讲会、创办《东亚联盟》等刊物外，还在广州开办青年团干部训练班和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并加以推广。1941 年 8 月 6 日，林汝珩做《关于广东东亚联盟运动工作报告》，其丧心病狂、甘做傀儡的丑态活现了某些国人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真实情态，很值得国人警惕和反省。以下从中摘出一段，立此存照：

“东亚联盟的思想，有四个纲领，就是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这四个纲领，同近卫声明、中日基本条约、中、日、满三国共同宣言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要拿东亚联盟运动来唤起民众，团结起来，大家一齐实行近卫声明，实行中日基本条约，实行中日满三国共同宣言。”“东亚联盟运动，是一种民众教育的启蒙运动，东亚联盟的中心是中、日、满三国，日本是东亚最强的国家，满洲国是东亚最新的国家，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国家，必须紧密提携，然后可以完成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所以中国东亚联盟运动，是要教育中国民众爱中国、爱东亚，同

① 汪伪行政院宣传部：《东亚新闻记者大会实录》（1941 年 8 月）；《广东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特刊》（1941 年 9 月）；载自郑泽隆：《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见《广东史志》，1999 年第 3 期。



时要爱日本、爱满洲国。"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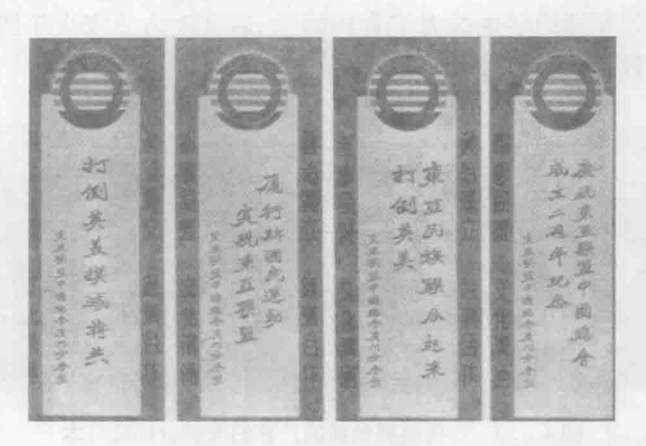


图 4－21　日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在广州市区张贴的宣传标语

继"东亚联盟运动"之后，汪伪中央又发起所谓"新国民"运动。1942 年 2 月起，伪广东省宣传处、省党部和东亚联盟广州分会等为配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先后在广东各占领区进行"思想清乡"，推动"新国民"运动。陈耀祖、林汝珩等汪伪政要除就"新国民"运动的目的和方针发表演讲外，还利用《中山日报》《协力》和广播电台等舆论工具，散布所谓"新民族观""新国家观""黄种人的共同意识"等理论，要求沦陷区人民"贡献要大，享受要少"，与日本"同甘共苦"，从物质上、精神上与日军"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而不能有任何反抗意识。其间大量印刷美化日本历史和肆意歪曲中日版图的地理以及《新国民运动讲授大纲》等奴化宣传书籍，学生的练习簿上都要印上汪伪政府的政纲和标语。1943 年 3 月 12 日，又按照汪伪中央宣传部的部署，仿效德国希特勒的做法，在广州上演所谓"新国民运动万众签誓"丑剧，企图以封建主义道德和法西斯意识规范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泯灭南粤人民的民族意识。②

日伪当局对广州地区的宗教界也加紧渗透和控制，千方百计地利诱和胁迫宗教界头面人物为其服务。1940 年 12 月 2 日，日军在广州成立"国际佛教协会华南支部"，诱使广州六榕寺住持铁禅任支部长，另一汉奸谢为何

---

① 《林汝珩关于广东东亚联盟运动工作的报告》（1941 年 8 月 6 日），见广东省档案馆编：《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470 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② 《中华日报》，1942 年 2 月 11 日。载自郑泽隆：《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见《广东史志》，1999 年第 3 期。

任副支部长。日本东亚共荣会、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中日文化协会广州分会等机构经常向铁禅等佛教败类提供经费，并面授卖国卖教机宜。1942年3月9日，铁禅与广东佛教居士林代林长沈文兴、副林长谢为何等于六榕寺商谈，决定组织为日本侵华效劳的“东方文化学院”培养亲日分子。同年4月间，铁禅受日伪之命赴香港活动，名为宣传佛教，实则为日伪推行“和平运动”。为扩大伪化佛教的影响，“国际佛教协会华南支部”按照日军的旨意设立所谓“平民学校”，并刊印《华南新少年》，内有“爱国爱家爱同种，新少年应与日本互相连”的内容。① 日伪当局于1943年6月派铁禅、谢为何参加日本“大东亚佛教大会”，并到东京等地参观寺庙。铁禅等人返回广州后，更卖力地鼓吹“日华亲善”，堕落为帮助日本侵华的帮凶。

严密禁制抗日文化，强化法西斯汉奸文化专制。1939年3月，侵粤日军为防止对日伪政权不利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从外埠进入，发出严禁此类出版物入穗的通知。同年9月，伪民政处颁布条例，规定无论以何种文字出版的出版物，凡未经该处同意不得印刷和销售。1940年11月，伪省警务处查封了广州500多家书档，并命令各地警署严查旧书本包物和旧报纸包装邮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东伪政府加强对传媒和文艺事业的控制，授权伪省宣传处从1942年6月22日起对广州的报刊、图书、标语、戏剧、歌曲等进行严格审查。1943年1月汪伪中央对美英“宣战”后，伪省宣传处又规定7管以上短波收音机限期改造，取消收听短波功能后方能领证使用，防止市民收听所谓“敌性宣传”。同年6月汪伪广东当局又根据伪中央制定的“战时文化宣传体制”，颁布了《战时文化宣传基本纲要》，将文化宣传完全纳入战时轨道，先后制定了《广东省出版品检查规程》《广东省出版社组织规程》《广东省印刷所登记检查规程》《广东省戏院娱乐场所营业许可规程》和《广东省戏剧电影技术表演检查规程》等7个章程。并经常通过卡断纸张供应的办法来威胁和限制他们认为不够驯服者。

在日伪法西斯文化专制和大肆兜售殖民文化的黑暗笼罩之下，华南沦陷区的文化完全陷入了凋残、畸形的状况之中。

① 张洁：《日伪在广州的罪恶活动》，见《广州抗战纪实》，43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广东肃奸志》，1946；载自郑泽隆：《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见《广东史志》，1999年第3期。



第五节　艰难维持的广东教育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府北迁韶关，省政府主席改由李汉魂接替，1939年元旦，李汉魂在韶关宣誓就职，许崇清出任省教育厅长。在战时艰难动荡的环境之中，广东地方当局惨淡经营，勉力维持，使战时的广东教育得以薪火相传，教职员工的生计得以维持，少年儿童减轻了失学之虑。

战时广东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广州、珠江三角洲、潮汕等均先后陷于敌手，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但省拨教育经费除个别年份外，逐年有所增长。1939年为214.4万元，1940年为419.6万元，1941年为737.7万元，1942年为1 442.8万元，1943年为1 307.2万元，1944年为1 869.9万元，1945年为4 840.7万元。[①] 当然，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幅与上列数字反映出来的有一定出入，但与广东省历年的财政收入比较，大体上还是成比例增长的，保持在5%~6%。

在教师待遇方面，一是保障教师的基本生活需要。省立学校教职员薪俸最初分为甲、乙、丙三等，因战时物资紧张，货币贬值，先是将丙级提至乙级，1942年2月，又全部提为甲级，另每位员工补助40~65元。5月份起，再定领平价米办法，每人连家属准领4名，每人交12元可领米2市斗；9月份起，生活补助费加至60~80元，已与公务员相等。县立学校参照执行，私立学校则准照规定数额征收“学米”，教员所得口粮数量，大约与省校教员相等。省立学校教员还享有医药补助、生育子女补助、丧葬费补助、子女就读中等学校补助等。二是实施年功加俸。1942年订定办法，给予32名在省校连续服务10年以上“著有劳绩者”加俸240元，1943年又给粤秀中学等21校100人加俸，全年加俸4.488万元，1944年加俸9.5728万元。三是奖励优秀教师。1944年给大专院校合格教授讲师核发研究费27.176万元。1942年8月27日教师节，教育部表彰了中学教师12人，“政务视导团”嘉奖了4人，“督学视导员”认可嘉奖了17人。小学教师在1942、1943年均发给“小学优良教师奖励金”，每年1万名，分为60元、40元、20元三等。

在收容救济因战乱迁徙的师生方面，广东战事发生后，沿海各县学校大多停办，师生失业失学者甚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澳南洋师生回国

① 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印：《战时粤政》，15页，1945。

者更多。据统计，广东省府增校增班予以收容的学生数目，1941 年以前中上学校学生 6 724 人，1942 年 5 277 人，1943 年 1 328 人，1944 年 350 人，1945 年 7 月底止 2 004 人。由地方当局登记介绍工作的教师数，1941 年前为 995 人，1942 年为 756 人，其后改为教师团负责办理，继续收容。

对撤退师生集中办理的大体上有三次：第一次是 1944 年 6 月豫湘桂战役中，为疏散韶关、曲江、乐昌中小学校学生，省府拨款 100 万元、450 市担米给予救济，学生每人发给 300 元、15 升米，经韶关、连县（今连州）、南雄、翁源、四会等路线疏散后，令东西江各县增班收容，此次共救济学生 2 802 名。第一次救济结束不久，日寇又向西江、东江、南路各地进犯，学校再度受到威胁，国民党中央拨发救济款 500 万元，广东省当局遂将之用于第二次救济，每人 1 000 元，共救济 5 000 名学生。第三次在 1945 年春，韶关、曲江、乐昌沦陷，各校退出教师每人救济 1 000 元，学生每人 600 元，受救济教师 360 余人，学生 1 697 人，发放救济费 138 万元。

充实学校设备。由于战乱破坏造成图书仪器损失，及学校的增加，教学设备较为缺乏，广东省府从战时教育经费拨出专款指定用于补充学校设备，1942 年拨发省立中学设备费 925 554 元，1943 年 389 780 元，1944 年 800 748 元，1945 年 1 414 609 元。并于 1942 年拨出 30 万元设立省仪器标本制造厂，共制造仪器标本 208 套分发各校，其余私立学校则自费购买。

设置公费学生名额。省立师范学生从 1940 年起，每人每月发放膳食代金 9 元；1941 年 4 月增至 12 元，9 月增至 15 元；1942 年 1 月增至 28 元，5 月改发副食费 28 元，米代金 31 元；1943 年 1 月改发大米 2 斗（1 斗 =10 升）1 升，8 月增至 2 斗 3 升；1944 年 8 月起副食费增至 130 元；1945 年 1 月起增至 250 元，5 月份起增至 550 元。另有 7% 的师范生可获“清寒优秀师范生奖学金”。省职业学校学生、省立学校中学生，其家在战区而生活来源断绝者，可获得生活补助，数额与上列师范生大体相等。补助逐年有所增加的原因是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以曲江为例，1941 年中等米每担 115 元，1942 年为 245 元，1943 年为 1 058 元，1944 年为 1 774 元。1945 年兴宁、河源等地涨到 3 000 多元，开平更涨到 5 000 多元。食盐的政府最高限价 1942 年 11 月为每担 800 元，1944 年 6 月起改为 1 200 元，到年底更因食盐开征军队副食费，限价升至每担 4 095 元。1943 年起因食用油供应日趋紧张，当局实施凭证售油，定量为每人每月 1 斤半。①

为改进中小学教育，举办了“小学教员假期训练班”。1940 年 8 月奉令

① 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印：《战时粤政》，68 页、113 页、114 页，1945。

推行“国民教育”，拟定以一乡镇设一间“中心国民学校”，一保（村）设一间“国民学校”，又开办了“国民教育师资进修班”，编印训练教材全套11册，国民教育辅导丛书8种，并发行辅导刊物《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出至2卷7期）。中学自1943年秋起，办理各公私立学校统一招生及联合招生，并加强对公私立学校的考核管理，增拨经费，充实仪器设备，均有一定成绩。

中小学教育逐步恢复。广州沦陷初期，中等学校有79所休课或停闭。省府北迁韶关稍稍安定后，才逐年有所恢复，见表4－3至表4－5。①

表4－3 小学教育（又称国民教育）

年度	学校数/间	学生人数/人
1937	24 031	1 544 478
1938	15 820	971 510
1939	14 992	985 912
1940	16 245	1 055 994
1941	16 712	1 237 136
1942	18 509	1 734 335
1943	21 481	1 674 288
1944	22 408	1 529 613
1945	22 927	1 958 772

表4－4 中等教育

年度	普通中学			师范学校			职业学校		
	校数/间	学生人数/人	教员人数/人	校数/间	学生人数/人	教员人数/人	校数/间	学生人数/人	教员人数/人
1937	241	55 739	5 566	42	7 367	789	24	4 409	727
1938	223	57 095	5 352	27	6 160	597	16	2 903	553
1939	219	58 165	4 350	25	3 701	465	15	1 551	314
1940	175	54 000	3 744	27	4 526	551	14	2 054	300
1941	187	61 897	3 801	27	5 714	615	14	2 330	295

① 《广东省教育统计》，广东省教育厅1947年编印，见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883～88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续上表

年度	普通中学			师范学校			职业学校		
	校数/间	学生人数/人	教员人数/人	校数/间	学生人数/人	教员人数/人	校数/间	学生人数/人	教员人数/人
1942	215	74 869	4 447	37	7 449	800	18	2 829	330
1943	289	87 346	5 868	48	11 102	1 147	25	4 127	504
1944	336	81 259	5 750	52	10 435	1 206	36	3 930	584
1945	403	124 597	8 693	63	12 100	1 500	41	4 820	845

表 4－5　高等教育

年度	大专学校数/间	学生人数/人	教职员人数/人
1937	7	5 178	1 137
1938	8	4 425	693
1939	5	1 957	416
1940	7	4 859	1 040
1941	7	5 887	1 076
1942	9	6 734	1 282
1943	9	6 873	1 443
1944	11	3 982	543
1945	13	10 990	1 462

注：1944 年度因粤北战事，缺中山大学等校数据。

抗战期间，广东还增设了两所高校。一所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0 年在曲江筹设省立战时艺术馆，1941 年改称艺术院，1942 年 5 月正式定名为艺术专科学校，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科，并附设若干训练班及师范专科，1944 年夏迁罗定续办。另一所是省立工业专科学校，1943 年在高要筹办，次年开始招生，设机械工程、水利工程、组织工程三科。1944 年夏又在兴宁增设了省立文理勷勤学院联合分教处，中文、史地、社教、理化、生物、会计、银行 7 系各招收了 1 个班。此外，还成立了私立南华学院一所。

1944 年 6 月，敌军进攻衡阳，粤北局势紧张，省文理学院等学校机关 20 余所迁连县，私立国民大学等 13 校也在连县设立办事处，其后除几所学校留在连县复课外，省文理学院、艺术专科学校琼崖分校迁罗定，勷勤商



学院迁信宜，广州工职、仲恺农职迁新兴。同年9月敌犯西江，在西江各省立学校多有迁移，局势安定后又回原址。1945年1月，敌军扰粤北各县，驻韶关曲江乐昌的学校机关被迫再度迁徙，省立江村师范迁和平彭寨，执信女中迁仁化城口，仲元中学迁兴宁罗浮墟，北江农工职迁龙川，南雄中学迁河源，护士助产学校迁兴宁。私立学校中国民大学迁和平彭寨，广州大学及附中迁连平，力行中学、中德中学迁龙川，此外还有省教育会、省教师团迁龙川。

在社会教育方面：①恢复及增设各级民众教育馆。1939年在韶关恢复省立民众教育馆（1943年迁连县），各市县也随之相继恢复，1944年县市级达72个，区级有20个。设有专职工作人员，1943年并开设馆长训练班。②图书馆事业。1941年创办省立图书馆1所，初创时有图书杂志29 421册，报纸99种。县市级图书馆1939年有33所，1943年达55所，1944年降至46所。③创设科学博物二馆。1942年创办科学馆，主要是采制动植物、矿物标本等；博物馆征集各种历史文物及历史文献，1944年两馆均撤并交民众教育馆办理。此外在建筑体育场馆、发展战区教育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开展电影巡回放映活动等方面，均有所起步。

社会教育值得一提的还有“国语运动周”活动的开展。广东在战前即普遍设有国语讲习所，但因战争而停顿，1944年遵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每年3月19日起举行“国语运动周”，韶关地区由省教育厅主办，包括展览国语资料、放映并由教师讲解拼音字母、国语教师在附近各中学轮流演讲、各机关学校职员及学生“一致受国语训练”、公事接洽及教学一律用国语等。

战时广东教育也面临许多困难：因战事影响，各级学校需随时应变，战区撤离师生需随时救济，设备损失也急待补充，但限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能如意；“员生待遇虽极力设法改善，然究未能赶上物价之高涨，故实际上仍甚困苦”；交通阻塞、运输不便，物资缺乏，出版业日见困难，课本书籍供不应求；各机关接到财政机关拨款通知书后，往往因故延迟拨发，致学校各项经常费难以按时领到，应变费又未奉拨，当战事发生时，因迁移困难，而遭受严重损失。①

---

① 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30页，1945。

第五章　对日伪统治的反抗与广东抗战的胜利

面对日军的侵略，广东军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国民党成立了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建立和收编了若干支地方团队和游击部队，其中伍观淇、汤化平等领导的较为有名。他们在沦陷区积极活动，打击日伪。国民党地下人员也开展了对沦陷区的骚扰。日军侵占广州后，广东地方当局北迁韶关，与日军对峙，并进行了两次粤北会战，阻止了日军向粤北进犯的计划。中美两国空军也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中共在沦陷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建立敌后武装，打击日伪；潜入敌区，建立据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体，进行反日宣传；策动日伪反正等。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部在海南、粤西、广州地区受降，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部在粤北、潮汕地区受降，广东光复。战后由张发奎等主持对侵粤日军中的战犯进行了审判，处决了田中久一等主犯，伸张了正义。但接收过程中也出现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当局虽有所查处，但仍让人民深感失望。

第一节　国民党领导的斗争

“七七”事变之后，广东省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余汉谋任主任委员，香翰屏、吴铁城、蔡廷锴、蒋光鼐任副主任委员，驻粤各军、师长和一些社会名流任委员。全省分为 12 个区，其中第 2 区统率委员为伍观淇，负责训练指挥番禺、花县、从化、增城的民众抗日自卫团。

统率委员会在南海官山举办培训抗日自卫团骨干的干训班，预定训练时间为 3 个月，因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被迫提前结束。伍观淇负责的第 2 区就派了禺北 100 多学员带回参训，毕业时，干训班将 9 挺机枪、100 多支步枪交给禺北学员带回参加抗战。当时，第 4 路军在禺北北村和花县平山设有军械库，存放着大量武器弹药和通信器材。广州即将沦陷时，北村军械库


图5-1　第2游击区司令伍观淇

的武器和平山军械库的武器都来不及运走，余汉谋下令就地炸毁，伍观淇接到此消息，十分焦急，立即命令第2区自卫团官兵连夜赶赴北村进行抢救。设在北村一大宗祠的军械库，头进已起火，官兵们冒着随时会爆炸的危险，一边救火，一边搬军械，一共搬出轻机枪70多挺、七九步枪300多支、驳壳手枪几十支及弹药一大批。伍观淇又命令南浦村和花县松柏村团队赶到花县平山圩会合当地团队到均和局军械库搬运军械和通信器材。搬了两天两夜，重要的军械和器材都及时搬走了，后来这批军械全部缴交第4战区司令部，又派人组织抢运第4路军存在高塘同凤社的粮食，及时把几百吨粮食运到赤泥和三水鹿和，后来第2游击区部队靠这批粮食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广州沦陷后，1938年10月28日—11月7日，伍观淇率领由广州城北及花县民众组成不久的第2区民众抗日自卫团数千武装群众在流溪河沿岸英勇抗击日军，打死打伤敌人200多人，击沉敌汽艇橡皮艇20多艘，俘获日军军曹久保田等3人。自卫队员牺牲61人，负伤38人。①

1939年12月23日—29日，第2游击区第2纵队番禺集结队第1大队在大队副麦剑夫率领下，在番禺鱼窝头迎战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毙伤日伪150余人，缴获机枪2挺及一大批弹药。31日，伍观淇第2游击司令部属下第4支队2大队在大队长叶湘指挥下，有160多人参加，在番禺良田村袭击伪军绥靖大队据点，毙敌少佐顾问川田定月、军官深町为勇等十余人，生俘日军中尉顾问深町为雄、伪大队长高培等，消灭伪军数十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步枪100多支及弹药武器一批。②

① 伍子芳等：《回忆伍观淇痛击日军的经过》，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171~178页，1987年印刷。

② 黄奕平：《鱼窝头反扫荡之战》，梁伟针：《良田全歼日伪记》；见《广州抗战纪实》，223~22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1937年，原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汤化平奉广州市长曾养甫之命，在广州河南区训练壮丁2营，后成立广州市自卫团，汤化平兼任第1团团长。当日军侵占广州后，汤化平率领所部出现在广州市区，并在河南区帮助难民10余万向东、西郊、白鹤洞一带疏散。汤化平又派队潜入河北区，在海珠桥脚及惠爱路、东堤等处阻击敌人，伤毙敌军10余名。汤化平的队伍曾与有铁甲车掩护的敌步骑兵300余人在小港路激战。敌人以海空军向该队围攻，该队粮尽援绝，乃突围分驻平洲、三山、龙眼洞、容奇一带，后派一队化装潜回广州活动。从1938年10月21日—28日，该队与日军作战20余次，毙伤敌200余名，击沉敌艇3艘，该队阵亡200余人。该队撤出广州后，奉总指挥曾养甫之命改为广州区游击别动队（以下简称“别动队”），汤化平任司令员，共有数千人，分驻广州市区内外和平洲、三山、龙眼洞、容奇、江门、佛山一带，从事游击战。1939年1月27日别动队袭击伪广州市警察局长练演生，当场将练击毙。2月1日，又在广州市郊袭击伪日军，救出被虏妇女多人。另有50多人潜入白云山脚，企图炸敌占天河机场未遂，刺死敌兵2名。从1—4月，出击30余次，毙伤敌100余人，击沉敌船5艘，焚毁敌机5架。别动队有6人因伤被俘，受严刑逼供不屈，英勇就义。①

1940年1月20日，国民政府方面的游击队在广州市区散发传单，并乘机袭击郊外敌营。2月24日，国民政府便衣队夜袭广州天河的日军航空修械厂，将之焚毁并毙敌几十人后安全撤出。1940年5月上旬，广州市闹米荒，市中心区游击队活跃，敌遍设木闸防阻无效。②

在粤中，曾在西北抗日同盟军当过师长的彭秋平，在广州沦陷后被开平家乡父老推为“坭海镇13乡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自1939年1月起，轮训民兵逾万人次，经常集合在开平以西塘口的战士300多人，不久第4战区给予“第5游击区开平自卫集结大队”番号。1939年12月，彭秋平率自卫队700多人开赴新会大泽，展开对敌伪的进攻，毙日军500多名，争取伪军联队长钟炎如、政工主任关定宇等率部起义，伪军陈碧泉部也相继倒戈。1940年，所部改属第7战区挺进第7纵队，在潭江北岸的新开公路、新鹤公路沿线作战，另有以马景泉为队长的台山自卫大队，以谭国贤、谭卓天为队长的开平自卫大队，以熊华为队长的恩平自卫大队，以何德胜为

---

① 云诚实：《粤战场》，《大公报》曲江分馆，1943。见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867~86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韶关）《中山日报》，1940年1月21日，2月28日，5月8日。

队长的新会自卫大队，以何老二柏为队长的鹤山自卫大队协同作战。1941年3月3日，江会一带日军5 000多人向台山、开平一带扫荡，占领台城，“挺七”司令彭林生率各部迎敌，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迫使日军撤出台城。①

在增城福和，一些抗日民众组成了63军杀敌队第1大队，有200多人，由魏友相任大队长，钟冠英任副大队长，在增城、从化、番禺交界处，到处袭击敌人。福和是敌人重点驻军的地区之一，1940年，华南日军主力进犯粤北，福和守敌相对空虚，随军杀敌队与国民党军459团部队一个营及翁源县大刀队一部在这年中秋前夕率部伏击了福和官塘守敌，消灭日军上百人。

国民党军统人员也开展了对沦陷区的骚扰。如葛肇煌任大队长、大队部设在三水芦苞镇的军统西江独立行动大队，就经常派出人员收集日方情报，曾炸毁日方军用汽车，炸沉日浅水舰“川丸”号，1944年4月4日，还在广州文德路伏击了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将其击毙。②

1940年10月，军统人员刘文楷受军统韶关站派遣，到番禺做策反汪伪20师40旅少将旅长李辅群的工作，得到李辅群的掩护，在市桥附近的沙头乡（后该在鱼窝头）设置秘密电台，电报内容“以日伪军调动情况为主，其次是经济情报”。李辅群在1944年秋曾决定反正，但因国民党方面改变计划而终止。③

国民党情报人员在香港十分活跃。香港沦陷后，军统将香港区改编为香港站，下设4个情报组、1个行动组、1个交通队和3个电台。1943年下半年，军统香港站奉命搜集香港气象情报和日军舰艇在港活动情报，以供美国驻华空军空袭香港之用。该站人员将港九船坞，码头及海面各浮筒的位置，分成A、B、C、D等区域，一发现日军舰群驻泊港九海面，就以预先编制的密码电告重庆总台。通知盟军飞机前来轰炸，致使日军伤亡惨重。

此后，日军舰艇为了隐蔽停泊位置，免遭空袭，改而停泊在远离港岛市区的外海。军统香港站便吸收一位香港渔民作为谍报人员，派他以出海捕鱼为掩护，侦察敌舰泊靠位置，引导盟军飞机轰炸敌舰。在一次猛烈的轰炸中，那位渔民不幸中弹牺牲。

1943年3月24日，公开身份为香港德明中学教师而实际担任军统香港

---

① 彭秋平：《粤中区抗日战争七年亲历记》，见《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② 王正之：《西江间谍战》，广州：广州华美文化艺术研究社，1946。

③ 刘帜：《我在广州沦陷区策反李辅群反正的经过》，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200~203页，1987年印刷。

站及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交通员的江清白，在携带秘密文件时突遇日伪宪警盘查，随即被押解到香港总督府宪兵队本部刑讯。日本宪兵队根据搜获的文件，加紧跟踪其他“重庆分子”，并严刑拷问江清白。5月19日，江清白在宪兵队监狱中伤重而逝，成为国民党方面在香港抗战的第一个牺牲者。

4月19日，日本宪兵队根据多日跟踪与无线电监听，一举破获军统香港站的第3电台，逮捕负责人袁洪范和成员孙柏年、欧铭等3人。此后数天，又陆续逮捕杨炳雄等国民党在港谍报人员20多人。上述人员在被刑讯之后，或被斩首惨杀，或因伤重瘐死狱中。其中袁洪范是国民党香港支部干事，实际为国民党驻港党务与谍报机关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香港坚持领导将近两年的谍报活动，“其间对敌伪军事之调动，政治之设施，以敏锐眼光，精慎窥察，作灵速之情报，游动之袭扰，使敌伪寝食不安”。杨炳雄抗战期间在香港喇沙书院读书，加入国民党，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打入日军宪兵队，刺探敌伪情报，通过袁洪范及其领导的电台，报告国民党方面。“举凡敌人之阴谋动向及在港之军事设施，无不冒险摄取”。粤港日军几度策划夹击在广东惠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事前都被杨炳雄侦知相关的进攻计划和兵力调配情况，及时发出情报。为了配合在华美军空袭香港，破坏日军的海上运输，杨炳雄后来有意出任香港港务局职员，积极窃取日舰进出香港的情报。

此外，国民党还有一些谍报人员因在香港接应援华抗日的美军而献身。

1945年1月16日，援华美军“飞虎队”空袭香港。其中一架飞机被日军击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香港。国民党九龙支部第3分部成员、香港渔业工人苏权见义勇为，将这名美军飞行员藏匿在货仓里，准备帮助他逃出香港，不料被日军侦知，两人很快被捕并当即被处死。

同年初，国民党在港谍报机关为配合美军一度考虑实施的在港登陆作战计划，调集一些军事人员潜入香港，组织秘密武装。其中有：广东南海人潘达民，曾任国民党独立第2别动队司令、粤江防舰队陆战队营长等职；广东海丰人蔡南；广东新会人朱卓云，曾任新会警察局警长及保安队中尉。日军宪兵队经过侦察，发现潘达民等人形迹可疑，便于4月23日采取逮捕行动，蔡南在奔逃中被打死，潘达民、朱卓云二人被捕后在狱中备受折磨，先后丧生。

据统计，国民党情报人员在日占香港期间被日伪宪警杀害者共33人。[①]

---

① 莫世祥等：《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纪实》，258～26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

国民党地下人员在澳门的活动也很频繁，除搜集情报外，还进行了数起袭扰活动。1941 年 9 月，伪广东省警务处副处长李式曾在澳门被击毙。汉奸黄家聪经营的国华电影院放映日军宣传片，受到手榴弹袭击。1945 年 2 月 2 日，日本驻澳门总领事福井保光被刺身亡。

1944 年 9 月 25 日，伪广州要塞司令何瀚澜途经大新路被枪击，身中 3 枪，至 27 日毙命。同年 11 月 6 日，伪广州太平分局警长范慕陶深夜在仁济路被击毙。

广州沦陷后，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最突出的是两次粤北会战，都是广州日军向驻守在粤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而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击的战役。

第一次又称为从化之战。1939 年 11 月下旬，日军为策应桂南作战，牵制中国第 4 战区主力，向粤北进犯。敌 21 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第 18 师团、近卫混成旅团、海军陆战队及伪军一部，共 2 万余人，① 在航空兵 50 余架飞机支援下，以第 18 师团和海军陆战队由增城出永汉，经左潭、地派，进犯梅坑；近卫混成旅团由神冈，经从化、良口、吕田，会合梅坑日军，出翁源，进攻曲江。为确保粤北防区，余汉谋指挥第 62、63、65、54 军，独立第 20 旅及第 66 军 151 师，约 5 万人，沿日军进攻路线，利用既设工事，阻击日军。此役分为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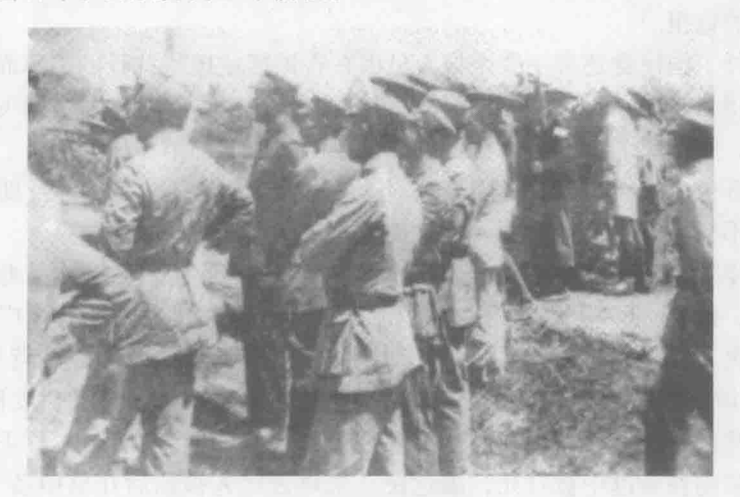


图 5－2　国民党第 4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12 集团军司令余汉谋（左立免冠者）在粤北会战中视察作战部队

① 一说有 4 万余人，见黄仲文：《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43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

12月18—26日为防御阶段。自11月21日起，敌我军队在粤汉铁路南段即有接触。12月中旬，敌分三路，大举北犯。左路为104师团之一部，沿粤汉铁路北上，进占清远琶江；中路为近卫混成旅团，12月18日，该旅团500余人从神冈进犯从化街口，被第186师547旅击退。19日，敌增援1 000余人，经反复肉搏，从化失守，日军沿翁从公路继续北进。21日，日军2 000余人在航空兵、炮兵配合下，突破第186师防线，占领鸡笼冈。之后分两路，一路于23日占领牛背脊，一路于22日突破第186师阵地，占领鸭洞、良口。25日，日军3 000余人在10余架飞机配合下，突破第151师阵地，占领吕田。为配合近卫旅团作战，第18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作为右路，于12月中旬由增城北上，至25日先后占领派潭、正果、永汉、地派、梅坑等地，第151、153师和独立第20旅退守金竹园、沙田一线。

12月26—31日为反攻阶段。12月下旬，日军在桂南战役中损失严重，遂决定缩小在粤北作战的规模，以转移兵力于桂南。26日，余汉谋根据此敌情，令各军全线反攻。当日，余汉谋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职部自上月中旬，挥军奋战，于今月余，敌既倾巢而出，我亦全面动员。始则我攻敌守，源潭一役，鏖战四昼夜，毙敌二千余。继则敌蜂拥而来，全面进犯，益以空军助战，势更猖狂。我总预备队兵力，既全使用于攻势决战，其余方面，不能不暂为防御。本周以来，伤亡过半。敌既逼我主阵地，一本其钻隙迂回之战法三面突进。我死守阵地，既无益于战况之推移，逐步战守，亦难以遏阻敌人之凶焰，一部逆袭，又无补大局。以此情形，即幸而能支持若干日，然而后援既不可期，前途益难进展。故本求仁得仁之决心，实行破釜沉舟之决战，庶几死中求生，亡中图存。即日乘敌深入，部队分离，山地崎岖，后方空虚之际，全部转移攻势。以63军长张瑞贵，率领151师、153师、154师、186师、独20旅、教导团等，紧蹑敌后，袭击梅坑、吕田、良口之敌，由南向北进攻。以62军长黄涛，率领152师、157师、自佛冈附近，先向东南方攻击从化、增城敌军之根据地，再与63军协同，全力反攻。以缪副总司令培南，指挥65军，力守主阵地。余汉谋率直属部队，亲赴前线，并发动民众空室清野，以策全面之作战。"① 27—31日，第62、63、65军及地方自卫团队等在梅坑、吕田、牛背脊、良口一线向敌反攻，苦战5昼夜，收复原阵地部分要点。牛背脊战斗最为激烈，我军将敌近卫师团一个联队悉数歼灭，并将敌军储存的粮秣、弹药、车辆全部焚毁。

1940年1月1—8日为追击阶段。由于急需增援桂南作战和粤北兵力不

---

① 黄仲文：《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44～4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



图 5－3　粤北会战中，第 12 集团军某旅在从化渡河出击

足，加之补给困难，安藤利吉令粤北日军于 1940 年 1 月 1 日向广州方向撤退。余汉谋令第 54 军由官渡向青塘、白沙、石岭、从化追击；第 63 军在回龙、水口、梅坑间，尾击日军；第 62、65 军分别在沙田、吕田、良口和青塘、黄牛头、牛背脊间，截击、尾击日军；1 日起，日军在 10 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分路南撤：一路经金竹园，向吕田、良口、从化、神冈撤退；一路沿翁从公路南撤；一路由白沙向水头、佛冈、从化撤退。2—8 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翁源、官渡、从化、良口、派潭、永汉等地，先头部队逼近神岗、太平。日军退回广州、增城。此役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日军亡 293 名，伤 1 281 名。第 4 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记载，中国军队伤亡 17 400 名。而《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则称这次会战“毙敌军官 236 员，士兵 9 800 余名。伤敌军官 87 员，士兵 3 700 余名。俘敌军官 4 员，士兵 58 名。虏获敌火炮 10 门，炮弹 800 余颗。重机枪 12 挺，轻机枪 33 挺，步枪 330 支，子弹 35 000 余颗。夺获敌军马 80 匹，伤毙敌马千余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此说可能有所夸大。会战结束，第 12 集团军政治部在曲江公园举行了“粤北大捷战利品展览会”，以宣传此次会战的战果，鼓舞抗战斗志。

在战役进行时，蒋介石也在密切关注，并自拟对敌精神作战之发言人稿：“①汪逆又到粤乎，其将设立华南伪组织乎。②敌果有打通粤汉路之计

划与实力乎。③敌由粤北攻，其必利用汪对粤军将领用利诱威胁之梦想。上午批阅自读昨拟军会发言人驳斥敌方妄报之稿甚觉得意，此又一篇对敌军攻心之文，如能生效，当可制止敌军进占韶关与打通粤汉路之野心。”①及后，蒋介石称许这次战役“粤敌猛攻粤北不能达成其攻占韶关目的，其他各战区皆我处主动优势，敌不能实施打通粤汉路之计划。”②

第二次又称为良口之战。从化之战日军败退后，经过整训和补充，于1940年5月再度反扑，欲将国民党军队主力消灭于良口地区。安藤利吉指挥第18、38、104师团2万余人和第21独立飞行队（30余架飞机），以第38师团为中路，由太平、神岗出发，经从化、凤院，进犯良口；第18师团为右翼，集结于石龙、石滩；第104师团为左翼，集结于太和、新街，协同第38师团作战。为确保粤北防区，余汉谋指挥第62、63、65军和独立第20旅等，共3.3万人，沿日军进攻路线，利用既设工事，阻击日军。此役分为三个阶段。

5月13—23日为防御阶段。5月13日，敌第38师团400余人从神岗进犯从化街口，被第187师561团击退。14—17日，敌700余人，在其航空兵的配合下，与守军152师反复争夺，先后攻占鸡笼岗、门楼关。18—20日，日军3 000余人由鸡笼岗出发，分三路向良口方向进攻，20日日军突破李寨顶第152师阵地，占领良口。22日，日军3 000余人在航空兵配合下，突破横坑第152师阵地，占领石榴花顶，23日又占望到底。为配合第38师团作战，第104师团1 000余人于16日由象山、两龙向花县进犯，中方第158师474团顽强抵抗，花县失而复得，但日军增援2 000人，再占花县。



图5-4　1940年5月，我军迫机炮在攻克从化的战役中发挥着威力

---

① 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28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30日。

5 月 24—31 日为争夺阶段。鉴于日军第 38 师团孤军深入良口地区的情况，余汉谋决定在良口地区组织反攻。以第 65、62、63 军在良口以西以北以南展开，合击良口日军。各部于 24 日黄昏开始反攻，27—31 日，双方在良口附近形成拉锯战。

6 月 1—12 日为追击阶段。中国军队连日反攻，虽未得手，但日军第 38 师团深入良口西北山区后，补给困难。因此，余汉谋决心集中第 62、63、65 军主力，对当面日军继续反攻。6 月 1 日，第 187 师收复陈围、黄围，第 158 师攻克花县。2 日，第 187 师推进至百鸟湖附近，第 152、153 师克复望到底、围脑顶、分水坳，第 186 师收复石榴花顶。3 日，安藤利吉根据第 38 师团深入良口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的情况，令该师团撤至从化，第 18、104 师团分别撤回增城、新街。同日，日军分路开始南撤。中国军队全线反击，先后收复良口、派潭、麻村、和睦迳等地，日军向神岗撤退。12 日，恢复战前双方阵地原态势。此役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日军亡 251 名，伤 548 名。第 4 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记载，中国军队亡 3 068 名，伤 2 225 名，失踪 330 名。①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和盟军美军的飞机对广州日伪不时进行空袭，沉重打击了日伪的统治，鼓舞了广东军民的抗战信心。

据有关记载，1939 年 3 月 16 日，中国空军首次轰炸了广州白云机场，22 日再次轰炸，毁日机 10 余架。5 月 7 日，中国空军 1 大队轰炸广州天河机场日军事目标，投弹数十枚。6 月 5 日，中国空军轰炸广州西村等日军阵地。9 月 29 日，中国空军轰炸广州白云机场，毁日军仓库 10 余座及日机 10 架。

1941 年 2 月 20 日，中国空军轰炸广州天河机场，毁日机 5 架。11 月 27 日，盟军飞机袭击广州，在黄埔炸沉日军载重 7 000 吨的运输舰 1 艘。

1942 年 7 月 4 日，盟军飞机轰炸广州白云机场，20 余架日机仅 5 架幸免，余均炸毁。6 月 18 日，盟军飞机又再次轰炸广州日伪据点。在盟军的频频空袭之下，日伪倍感威胁，8 月 9 日，伪广州警防司令部组织临时防空指挥部，由伪广州警防司令郑洸薰兼任指挥官。（1943 年 5 月 15 日，伪广州绥靖公署设立防空指挥部，下设 6 个指挥区。）8 月 26 日，盟军美机空袭广州、香港，击落日机 10 架。10 月 26 日，盟军美机轰炸了广州、香港日伪军事目标。

---

① 两次粤北会战内容据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军事志），第 13 卷，156 ~ 158 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黄仲文：《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43 ~ 49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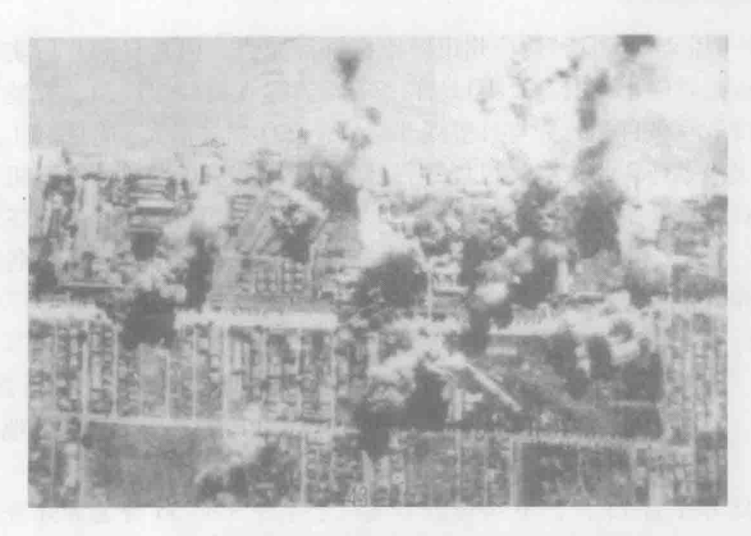


图 5－5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轰炸广东沿海的日军基地

1943 年 5 月 8 日，7 架盟军美机轰炸广州日伪据点，投弹数十枚。7 月 7 日，20 余架盟军美机轰炸黄埔附近的日军军事目标。12 日，再炸黄埔并进行低空扫射。8 月 26 日，10 余架盟军美机又炸广州日伪据点。9 月 2 日，19 架盟军飞机分袭广州、香港。两天后，22 架盟机再袭广州，与日机展开空战。5 天后，10 余架盟机又袭广州，与日军发生空战，日航空兵团长中筆被击毙。12 月间，盟军飞机于 16、23、24 日 3 次袭击广州日伪据点，与日机展开激烈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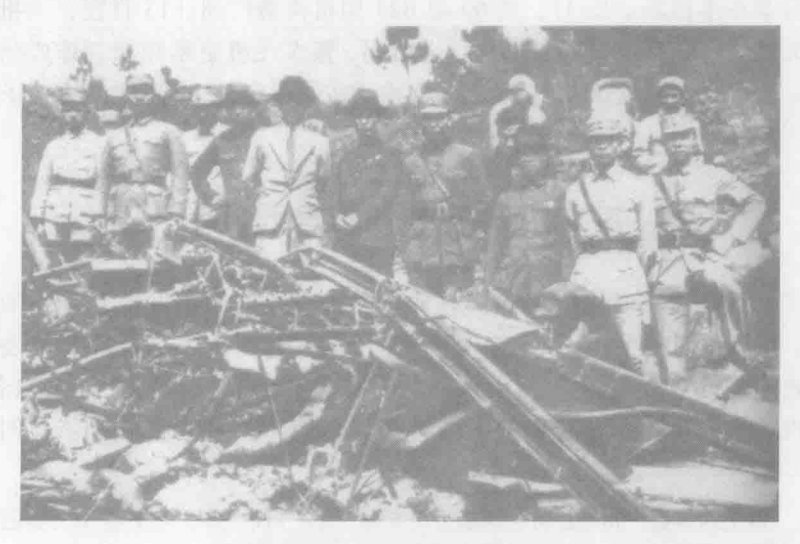


图 5－6　坠落在番禺的敌机残骸

1944年2月1日，伪广州市防空指挥部布告，由是日起严厉实行灯火管制，违犯者停止供电。2月11日，27架盟军飞机轰炸广州、香港及广九铁路沿线敌军事目标，并与日机展开空战，日伪损失重大。7月5日，20多架盟军飞机轰炸广州黄埔飞机场等目标区。19日，20余架盟军飞机再袭广州，与日机展开激烈空战。8月31日，10多架盟军飞机夜袭广州各处军事目标。6天后，盟机深夜再袭广州。9月30日，盟军美机夜袭广州各军事目标，投弹数十枚。10月3日、6日、15日、17日，美机先后轰炸广州日伪军事目标，并与日机在广州上空展开空战。12月22日，10余架盟军飞机分袭广州、香港，并与日机展开空战，27日上午，16架盟军飞机再袭广州，在白云、天河和黄埔机场空战中，击毁日战斗机9架，伤7架，毁地面日机1架。

1945年1月15日，70余架盟军飞机于上午9时36分起轰炸香港、广州、汕头达1小时，下午1时52分起再次袭击上述各地达半小时。3月10日，因空袭频繁，伪广州市保甲委员会饬令各保甲长，加紧挖掘防空壕。4月2日，数架美机轰炸广州日伪机场及其他军事设施。4月12日，美机袭击广州，在河南军事目标区投弹，日伪损失甚重。13—15日，美机继续轰炸广州河南、东山等目标区，日机未起飞应战。4月21日夜10时，由澳门开来广州的“民国丸”轮在莲花山附近被盟军飞机击沉。4月28日凌晨，盟军飞机袭击广州河南。5月10日，一批美机空袭广州，在河南投弹10余枚。12日，由菲律宾起飞的20架美B29型机及10余架P38型机空袭广州、香港日军军事机场。13日，约60架B24型机再袭广州。15日夜，一批盟军飞机又轰炸广州东山日伪目标。六七月间，盟军飞机更是频频轰炸广州日伪目标，侵粤日军及汉奸走狗已处于日夜不安之中，侵略者覆亡的日子就要到了。①

第二节　共产党领导的斗争

广州沦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对日军进攻广州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1938年10月18日，当广州即将沦陷时，省委才会同广州市委在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多数干部撤离广州，分散各地，省委机关撤往粤北，成立中共西南特委、东南特委和东江特委。此时，张

① 以上内容据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卷（大事记），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及《广州抗战纪实》大事记有关部分。

文彬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由李大林代理省委工作。会后，李大林到西江，尹林平到东江，梁广到香港，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活动的领导。10 月 24 日，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下辖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党的组织。

广州沦陷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 11 月 1 日致电广东省委，其中要求：①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②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组织自卫军。①

遵照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沦陷区人民奋起反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在各地建立起抗日武装，并在对敌斗争中发展壮大。1943 年 12 月，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基础上，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1944 年秋，在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的基础上，成立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即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庄田任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参谋长。1945 年 1 月，在南番中顺游击部队一部的基础上，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林锵云任司令员，梁嘉任政委，谢斌任副司令员，周伯明任参谋长。同月，粤中地区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梁鸿钧（后谢立全）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委，刘田夫任政治部主任。是月，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周楠任司令员兼政委，李筱峰任参谋长，温焯华任政治部主任。1945 年 6 月，在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林美南任司令员兼政委。全省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近 3 万人，全省半数以上的县成为抗日游击区，对敌伪作战 4 000 余次，成为飘扬在华南地区的一面抗日旗帜。②



图 5－7　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



图 5－8　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

①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 1 卷，411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②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319～332 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其一，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敌后抗日武装。

1938 年 10 月 22 日，吴勤在佛山市郊发起成立抗日义勇队。吴勤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农运骨干，这时从南洋回国抗日，组织了一支有五六十人的义勇队。义勇队在南海县平洲伏击日军运输船，袭击小塘火车站，破坏日军交通线。不久，抗日义勇队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 2 支队，吴勤为司令。游击队很快扩大到 200 多人，100 多支枪。广游 2 支队成立前后，吴勤亲赴韶关和香港，分别会见张文彬、廖承志，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他的游击队，接受中共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决定，要把吴勤游击队改造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在珠江三角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下基础。派刘向东等一批干部和党员充任游击队骨干。1940 年 12 月投入西海战斗，击败了前来偷袭的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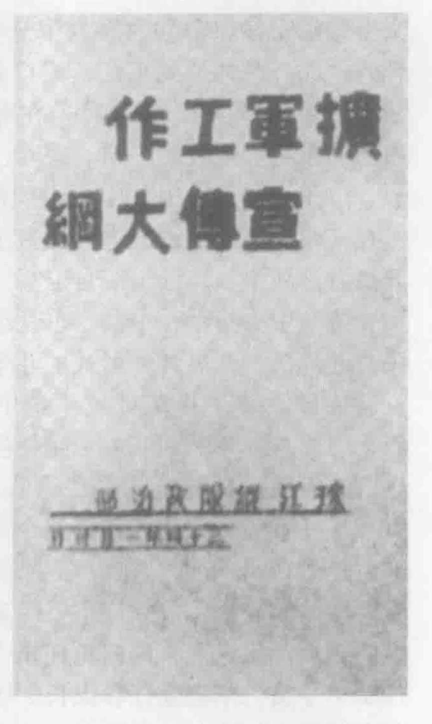


图 5－9　1945 年 1 月 30 日珠江纵队编印的《扩军工作宣传大纲》

1938 年 10 月下旬，中共南顺工委委员林锵云、黄云耀等带领部分党员，在顺德龙眼、众涌开展抗日活动，并在顺德西海、路尾围、大洲等地，筹建抗日武装。林锵云等于 1939 年 2 月 19 日在顺德大良成立了顺德抗日游击队，并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第 4 区直属广东第 1 游击区第 2 支队游击司令部特务中队的番号。1940 年 10 月初，编为广游 2 支队独立第 1 中队，不久投入沙湾战斗，首战获胜。

1938 年 11 月，中山县委召开武装工作会议，决定举办训练班，培养骨干，建立由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后，县委着手组织县别动队，部分区委着手建立区、乡别动队。至 1939 年 1 月，县别动队有 300 多人，其中共产党员有 100 多人。4 月 9 日，中山县委召开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要求各区党组织加紧建立抗日武装。会后，各区农民自卫队、乡警队、别动队相继建立。

此时，中共在广东敌后建立抗日武装，有一些有利条件，因为国民党还继续抗战，要求发展游击战，态度比较开明；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很高；

海外侨胞也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抗日。故中共在沦陷区的武装逐步建立起来，东莞、惠阳游击队积极活动于沦陷区。

1939 年 6 月，日军进攻潮汕地区，汕头、潮州、澄海相继沦陷，韩江、榕江、练江出海口被日军控制。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遂决定在潮安、澄海、饶平、汕头地区，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7 月 7 日，在潮汕中心县委领导下，成立潮汕青年抗日游击大队，对外称汕头青抗会武装大队，人数 70 余人。8 月与国民党独立第 9 旅谈判，取得“独 9 旅游击队”番号，后开赴潮安县北厢地区，取得了伏击日伪的“莲塘初捷”。

1940 年 12 月，增城中心县委为加强对广州外围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沦陷区工作委员会。次年 2 月，东江特委组织小分队挺进增城和广州外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于 4 月初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全队 100 多人，卢伟良为大队长。独立大队以油麻山为基地，在增城、永和、福和一带活动，并伸展到广州市郊的罗岗及从化的太平场。① 1942 年 8 月，该部由增城转移至东莞，编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主力大队。

其二，深入敌区，建立据点。

广东省委撤离时本来布置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一些党员留下坚持斗争，但日军进城后，陆新等人也仓促撤到粤中，致使中共在广州的工作中断了近两年。

1940 年 6 月，中共南海、番禺区委派员至广州，先后在中华中路云台里、惠福路、广东大学等地建立秘密据点。1941 年初中共北江特委派王磊为广州特派员和一批党员干部潜入广州，以洪门小学、省立二中、广东大学为据点，发展党组织。随后，中共粤南省委、粤北省委、珠江抗日游击队、东江抗日游击队等先后在广州市内或市郊设立联络站或工作组，有党员 60 余人。

1943 年 12 月，广东省临时工委负责城市党组织的负责人梁广也进入广州，在十三行路以开“华昌京果药材行”作掩护，设立领导机关，开展活动。1944 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梁广转移到东江游击区，省委派陈翔南接替梁广。1945 年 2 月，陈翔南抵达广州。鉴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不同系统在广州的这些据点和工作组（站）实行单线联系，各系统之间没有横的组织联系，但梁广及其继任陈翔南分别与各系统负责人有联系，如

①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 1 卷，419 ~ 425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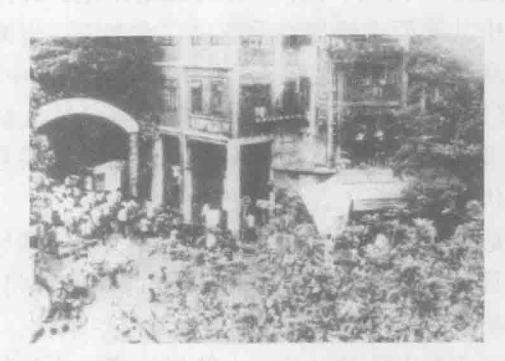


图5－10　1942年8月，中共粤南省委在广州米市路开设广安柴店作为秘密联络站



图5－11　抗战后期，梁广在广州文昌北耀华街建立秘密机关

梁广与东纵的陈坤，珠纵的郭静之、崔楷权，北江特委的王磊、何君侠以及打入国民党军统内部的张心吾、邓俊贤等3人。① 陈翔南与东纵的麦任、原粤南省委系统的余美庆、曾珍以及郭静之、何君侠等。

潜入广州的中共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职员、教师、商人、小贩、车夫等职业为掩护，有的还打入了汪伪广东高等法院、广东妇女会等机构。承担着发展组织、接送来往人员及传送文件、指示，搜集敌人军事、政治情报，散发宣传品等任务。如曾绘制了大汉奸陈璧君、林汝珩、汪宗淮等人的住地地图，提供给游击队准备采取捕捉行动，后因形势变化而未果。② 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为部队传递文件、提供情报、协助购买日本军用药品，并先后护送党员、干部和战士100多人到东江游击区。有的还派人深入工厂，发动工人进行各种斗争，如到日伪办的一间化工厂，破坏敌人的炸药原料生产。③

其三，打击日伪，惩处汉奸。

① 梁广：《沦陷时期广州地下工作片断》，载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3～8页，1985年印刷。

② 郭静之：《沦陷时期珠江纵队驻广州联络站情况》，载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85页，1985年印刷。

③ 马禧：《沦陷时期我参加广州地下工作的回忆》，载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197页，1985年印刷。

驻粤日军为巩固殖民统治，在沦陷区普遍设立“维持会”“绥靖军”等傀儡组织。1939 年 6 月，吴勤、何福海等在番禺县大石乡组织了抗日俊杰同志社（以下简称“俊杰社”）。共产党员严尚民、徐云、李冲等在该社指导工作。该社以禺南为支点，向南海、顺德、三水和广州市郊发展，成为拥有 52 个分社、社员数千人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半武装群众团体。“俊杰社”于同年 7 月奔袭广州市郊东朗和南海盐步伪军据点，攻打禺南员岗乡伪维持会，消灭了经常欺压百姓的地税队。9 月，“俊杰社”芳村分社在三山至大石间河面伏击日寇，缴获日军汽船两艘，毙伤、俘虏敌人数十名。“俊杰社”积极活跃于沦陷区，与广游 2 支队密切配合，给日伪以很大威胁。



图 5 – 12　我游击战士在广州外围对日作战

1938 年 12 月，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 14 区独立队”，由冯白驹任队长。日占海南岛后又改编为独立总队，由 300 人迅速发展至 1 300 余人，活动范围扩展至澄迈、临高、儋县、琼东、定安、乐会、感恩等县，先后进行了罗板铺伏击、奇袭永兴、攻击那大等战斗，到 1939 年底共毙敌 500 余名。

1940 年春，中共南路特委领导北海、廉州、灵山、钦县、防城等地群众，开展反对运粮资敌和“反汪肃奸”斗争，取得不小成绩，合浦白石水地区的斗争尤为突出。

1938 年 5 月，在中共党员徐可生的积极推动下，由李东林、魏友相等一批进步青年在增城福和地区组成一支抗日救亡自卫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0 月，增城福和被日军侵占后，该队坚持在福和附近山区不时袭击日军，破路毁桥，消灭汉奸。1939 年春，在大鱼头伏击前来扫荡的日军，后转至增西国统区。1940 年，中共增城县委成立，为扩大抗日力量，派魏友相加入国民党组织，充任福和区区长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同时将自卫队 200 余人改编为福和地区杀敌大队，并在该队建立中共支部，以魏友相为大

队长，李南为支部书记。随后以 63 军随军杀敌大队名义，在增城、番禺、从化地区进行游击活动。9 月，该队会同翁源大队 1 个中队和国民党 153 师 459 团一部，夜袭福和官塘日军据点，一举歼灭日军指挥官冈田以下官兵 260 余名。

1941 年 7 月，林锵云领导的人民游击队独立第一中队与广游 2 支队合编，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发展到 300 人，下辖 4 个中队，1 个手枪队，以西海地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41 年 10 月 11 日凌晨，伪军 2 000 多人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广游 2 支队在谢立全指挥下，与敌激战至下午 4 时，击毙伪军前线总指挥祈宝林以下 200 余人，俘敌 110 余人，缴获轻机枪 5 挺，步枪 400 多支，手枪 50 支，子弹 1 万多发。游击队仅伤、亡各 1 人。1942 年 5 月，吴勤被国民党杀害。中共广东省委即任命林锵云为代司令，罗范群为政委。1943 年 2 月，成立珠江地区武装指挥部，直接领导和指挥广游 2 支队和珠江地区的人民抗日游击武装，不断发展壮大。

1943 年初，中共台山县委把莘村、浮石、鹿坑、岭背等地的群众动员起来，建立武装抗日自卫队，反抗日伪的统治。

1943 年 6 月，为加强东江北岸抗日武装斗争，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抽调兵力组成小分队，挺进增城、博罗地区。10 月，在增城、博罗中共地方组织支持下，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独立第 2 大队，阮海天任大队长，李筱峰任政委。12 月，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独立第 2 大队。该大队成立后，活动在博罗西部、增城及广州东北郊，先后歼灭铁场伪警察中队、石滩伪联防队和警察所、新塘伪绥靖军 1 个连、龙眼洞伪军 1 个连，袭击长宁源头茹村和均和日军据点，在油麻山、黄旗山重建抗日根据地。1944 年夏，该大队会同东江纵队挺进粤北先遣队向粤北挺进，9 月 9 日，袭击清远县城。10 月中旬，该大队返回增城，11 月 11 日晚，由副大队长郑卫灵、政训部主任杨步尧率 100 余人夜袭新塘火车站，生俘日军物资供应站长阿南中佐及翻译等，将敌仓库焚毁，毙俘日伪军 3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 余支，使日军控制的广九铁路半个月不能通车。不久，又解放永和圩。12 月，增城永和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成立东江纵队第 4 支队，以永和为中心，在增城、禺北、广州近郊、从化、花县一带坚持抗日斗争。①

1943 年，中共珠江部队决定建立广州郊区工作组，派卢德耀、卫国尧

---

①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 13 卷（军事志），91 ~ 92 页、162 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等人以广州河南的沥滘镇为基点，在广州郊区并不时进入市区活动。1944年4月，他们与部队里应外合，活捉了在沥滘一带为虎作伥、恶贯满盈的汉奸“十老虎”中的8老虎和伪联防队员9人，为当地民众除了大害。6月，又抓了驻广州河南石榴岗的日军翻译罗芳嘉。①

1944年6月23日，珠江地区武装指挥部副指挥谢立全率广游2支队禺南、顺德、南海大队共300余人，袭击番禺新造镇的敌伪据点。新造位于广州东南，驻有敌伪400余人。晚9时，袭击开始，经两小时的激战，毙俘番禺县伪第二区长冼尧甫以下100余名，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200余支及军用品一批。

6月26日，谢立全又率广游2支队禺南、顺德、南海大队及民兵700余人，夜袭番禺市桥。市桥驻有日军300余人和伪军李辅群第40旅1 000余人。经3小时的激战，游击队攻占了第40旅旅部，打垮伪军3个连，毙俘敌人1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0余支、子弹1万余发及物资一批。

7月26日，广游2支队新编第2大队200余人在番禺植地庄被日军500多人包围，经过一天多的激战，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毙伤日军70余名。新编第2大队大队长卫国尧以下48人牺牲，22人受伤。

1945年1月，珠江地区武装指挥部所属部队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3月间，珠纵一部在番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反扫荡战斗。5月，组成600多人的挺进西江大队，进至西江北岸。②

1944年6月，日军大举向粤汉铁路进攻，不久，清远沦陷。中共北江特委领导建立了清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外挂“北江第2挺进纵队第3大队第9中队”番号。1945年春，9中队首次出击，活捉了回乡探亲的伪军大队长何秋及其部下14人，缴获长短枪和弹药一批。1945年5月，又与中共掌握的“挺二”2大队5中队配合，对清远南门街的日军据点夜袭，打死日军数人。不久，两支队伍合编为“清远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为大队长，朱小仲为政委，有200多人，6挺机枪。③

其四，组织群众团体，进行反日宣传。

日伪在敌占区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严禁任何反日团体和言论。为冲

---

① 卢德耀：《向广州市郊进军》，载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218页、232页，1985年印刷。

②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3卷（军事志），90页、160~163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③ 何俊才：《我在清三花四边区及清远县委工作的情况》，载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274~278页，1985年印刷。

破日伪的严密统治，中共地下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沦陷区组织群众团体，开展各种斗争。如在广州等地成立了“读书会”“游击之友”和“抗日大同盟”等外围组织。“读书会”要求不高，主要是吸收一些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参加，活动内容是通过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进行思想教育；“游击之友”要求比“读书会”高，秘密串联，经审查考验后才吸收，并举行宣誓仪式，成员是单线联系，每周接头一次，其成员有时也直接参加一些实际行动，如协助印刷秘密文件，张贴、散发抗日传单等。他们把从东纵、珠纵带出的宣传品如《前进报》、新华社社论等翻印后，以各种方式散发到广大群众中去。1945 年六七月间，广州地下党发动了一次全市规模的宣传攻势，动员了几乎全市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游击之友”参加，约定时间统一行动，一夜之间，将 4 000 多份东纵、珠纵《告全市同胞书》撒遍广州的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①

潮梅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建立了有数万群众参加的青抗会、学抗会、妇抗会等抗日团体，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护乡队、巡逻队、工作队。仅潮安县，参加这些组织的就达 1 000 多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在新形势下坚持斗争，中共组织充分利用合法和民间组织，改换名称，继续工作。如妇抗会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团体“妇女会”“新生活促进委员会”，潮阳妇抗会以“新运妇委会”名义坚持到 1944 年，利用办“女社训队”团结了一万多名妇女群众。青抗会被解散后，普宁、潮阳、揭阳、梅县等地建立了小学教师教育会、座谈会、生活促进会等新的组织。以及利用同乡会和文化娱乐团体，工作中心由校外救亡转向校内，后来还成立了地下学联，到 1941 年底，潮梅中共党组织所掌握和领导的小学有 400 所，中学有 30 所。在农村，则普遍利用潮梅地区民间组织和活动场所如兄弟会、姊妹会、父母会、拳馆、闲间、婆娘会，密切联系群众。中共潮普惠揭党组织派出一批党员参加有关的训练班后，即在其间开展工作。②

中共南路党组织重建后，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党组织团结爱国将领张炎，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协助其训练军事、政治干部。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还应张炎的要求，以香港学生赈济会名义派回国服务团近百人到高州，由张炎安排到各县、各部门工作。钦廉党组织争取到了驻

---

① 陈翔南：《抗战后期的广州地下党》，载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12～16 页，1985 年印刷。

② 谢毕真：《潮梅党组织执行“隐蔽精干”方针概述》，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 3 册，42 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军175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的支持，组织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200多人。遂溪青抗会组织下乡工作队，普遍创办农民夜校进行群众性的军事训练。

日军侵琼后，中共琼崖特委及时做出了“积极发展民众组织，以增强抗战的力量”的指示，在各地建立起青抗会、妇救会、农救会、儿童团等民众抗日组织，据1942年9月统计，全琼共有县级民众抗日团体9个，区级16个，乡级198个，参加人数达55 700多人。各地组织的锄奸团、民运队、救护队、情报站、交通站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委和中共游击队改编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1939年3月改为独立总队）创办《抗日新闻》《每日要电》《战斗生活》《南路堡垒》等报刊。其中《抗日新闻》每3~5天出一期，发行数量很快增至2 000份，成为最受琼崖民众欢迎的报纸，对宣传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其五，策动日伪反正，开展反战工作。

1942年春，香港的中共组织在进行大营救的同时，组织留港人员打进日伪机构各部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以图发展。同年8月，有一连伪军反正，投奔到东江游击区。1943年，中共琼崖特委也把“发动伪军反正”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并制定颁发奖励条例和反正证。还要求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矛盾，通过伪军家属做争取工作，注意接收自发反正的日伪军。经过策动，驻各地的台湾籍日军和伪军不断哗变、反正。仅1944年10月至12月，台籍日军携械投奔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就有三起。1945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将各地反正的台籍士兵集中起来，成立台湾士兵解放委员会，有组织地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在港九地区，1944年春，东江纵队同港九党组织联系，引带投诚过来的日本反战人员潜入香港，与日人秘密联络和开展反战工作。1945年夏，东江纵队在对日伪军俘虏改造教育的基础上，先后在战俘中建立了台湾人民解放同盟、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等反战组织。② 这些组织主动到前沿阵地向日伪军开展反战宣传攻势，瓦解日伪军。一些伪军军官在作战中被东江纵队俘虏，经过教育释放，返回广州后愿为抗日效力，如伪军新兵营白营长、陈璧君警卫连张连长、伪绥靖公署高参萧维扬等。萧维扬曾获取日军进攻禺南根

---

① 唐昆宁等：《琼崖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见《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3册，297~29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② 黄振位：《中共广东党史概论》，208~210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据地的作战计划及日军军用地图，及时送交了珠纵部队。[1] 1945 年春，珠纵 2 支队派王兰化装进入广州，利用她在伪方任职的亲戚，弄到子弹万余发，并由其亲戚设法将子弹送到游击队手中。

第三节 群众自发性的斗争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民素来具有爱国反帝精神，民间散失的枪支也较多，具有群众自发斗争的基础。有资料估计，不算旧式的杂枪，中山县至少有 3 万支好枪，东莞县大约还要多一些，惠阳县有 1 万 ~ 2 万支。广州失守后，这些地方的民间武装（有些是土匪武装）十分活跃。不少还挂起了各种游击队的牌子。

敌人初在惠阳登陆时，霞涌附近一个村有七八十名壮丁全部战死。东莞的袁华照有 1 000 多人，刘发愚有约 600 人，他们都曾向日军发起进攻，中山的吴发仔以 20 余人泗水 30 余里到三灶岛袭击敌营，杀死 40 余人。在南海、顺德、禺南等地，各乡都有联防，十几或几十个村子组织起自卫团，立下栅闸，日夜站岗放哨。这些自卫团时常杀死敌伪收税、稽查人员。[2]

广州沦陷前，广州工商航业无限公司董事长朱克勤即以公司所属“模范”“平等”“自由”3 艘拖轮及船上护舰武装，组成“抗日护市团”，一些民众团体组织及志愿青年参加。广州沦陷后先撤至江门，江门沦陷后又掩护江门各线轮渡疏散，撤退至台山、开平三埠。1939 年，3 艘轮船改装成炮艇，经余汉谋批准，成立了江防义勇游击司令部，但兵员、枪械、经费全部自筹自给。1939 年的一个月夜，在新会银洲湖面，正在湖上巡弋的“模范”艇与敌军 5 艘汽艇遭遇，撞沉敌艇 1 艘，击沉 1 艘，其余 3 艘负伤逃走。此役得到战区司令长官部及重庆中央军委会嘉奖。至 1940 年三埠陷敌，朱克勤遂将所属船只全部沉埋，遣散所部。至此，原工商航业公司资产，全部奉献给了抗战事业。[3]

增城、从化的山区地方，有一个会道门组织，称为“神打会”，宣称烧符念咒可以刀枪不入，参加的徒众不少。该会道门的头目之一李汉英，在

---

① 麦任：《抗日战争后期广州地下党生活的回忆》，载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25 ~ 28 页，1985 年印刷。

② 《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载自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77 ~ 80 页，1987 年印刷。

③ 陈廉中：《一支抗日的炮艇队》，见《广州抗战纪实》，278 ~ 280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广州沦陷时拉起一支队伍，号称“抗日别动总队”，李汉英为总队长。日军进犯增城、从化时，在狮头岭与日军打了一仗。李汉英部有七八十人，时而驻从化鸡笼岗，时而驻增城东洞，依山防守，斗志旺盛。“神打会”的徒众多是贫苦农民，但能脱产者只几十人，且是轮番更替。李汉英时常通过他在沦陷区的徒众，抓了不少伪维持会的汉奸，还抓过一个日军俘虏。李汉英部在1939年底为伍观淇接受编为国民党第二游击区别动大队。①

在海南崖县，民众的表现也很突出。“崖县民众，素有组织，在敌未登陆之前，已有苗、黎数千名宣誓歃血抗敌，现据情报，自动参加之苗、黎已达二万余众，各酋长、峒长、总带，皆携出极犀利之器械云。藤桥之役，苗、黎大建殊勋。”②

1940年2月8日，汕头敌伪警备副队长东谷、伪拓抚司令兼保安团长黄汉中被我义民击毙，汕市动荡，义民活跃，敌伪恐慌。③

1943年初，中山县第9区农民1 000余人和番禺八沙农民300余人，先后奋起，武装反抗征收所谓护沙捐。

1944年6月2日（农历五月十二日），日军由增城向龙门进犯，龙门县江厦群众商量决定，老幼上山躲避，青壮年组成战斗队，共60多人，拿起武器，分两路迎击敌人，一路由谭仙公庙正面迎击，一路由新庄坳小山侧面迎击，与日军先头部队决战一个多小时，打死敌军官一名。1945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六日），日军进犯到龙门县茅岗乡石墩村，该村村民在县参议员刘其敬的发动和领导下，以刘全安、刘柄光、刘日槐、刘应石等为骨干，奋起守卫村庄。他们以20多支长短枪、万多发子弹为武器，依托护村围墙，与敌激战，打死日军多名，刘其敬等骨干全部壮烈牺牲。日军攻进村庄后，疯狂报复，烧杀一空。④

日伪政权在各地建立后，群众以各种方式与之进行斗争。伪东莞县维持会会长搜罗流氓充当间谍，逼迫民众服军役，强征乡民参加伪自卫队、联防队、便衣队、“绥靖军”，并向石龙、莞城、太平征收治安费，向莞太路、莞龙路及河流孔道勒收行税，激起群众公愤。东莞厚街、赤岭附近各

---

① 何君侠：《在第四战区第二游击区的活动和斗争》，载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331～336页，1985年印刷。

②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6册，406页，1987年印刷。

③ （韶关）《中山日报》，1940年2月17日。

④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374～377页，1985年印刷。

乡村的群众，奋起反抗，杀死日伪军多名。东莞抗日军民还惩处了石龙、中堂圩、茶山等地的伪维持会会长或秘书长。

广东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有分散的，也有有组织的，以自卫队、壮丁队、联防队等形式建立起来，有些则是土匪武装改变过来。自发斗争是起伏变动的、不稳定的。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有的旋聚旋散，有的获得了国民党的委任，有的接受了共产党的改造，有着各不相同的结局。

第四节　日本投降与广东光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18日，蒋介石派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海南、粤西、广州地区受降主官，派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为粤北、潮汕地区受降主官，命令“第二方面军派张发奎为受降官，指挥第46军、第64军，接收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该区为敌第22独立旅、第27独立旅各一部。并指挥新一军、第13军负责接收广州、香港地区，该区为敌第23军主力。”“第七战区派余汉谋为受降官，指挥原辖各部，负责接收曲江、潮汕地区，该区为敌之第23军之一部。”[①] 行政方面由罗卓英接替李汉魂出任广东省主席，陈策任广州市长。

第二方面军在日军投降前所指挥的部队，有孙立人的新一军、韩练成的第46军、黄涛的第62军、张弛的第64军及阙汉骞的第54军共5个军，大部分集中于广西境内。为执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反攻广州作战指导计划，于1945年8月初旬先以韩练成军及张弛军的131师向雷州半岛的敌军发起攻击，攻略了廉江、遂溪各要点，正拟向湛江继续推进，希望取得广州湾（今湛江）海口，以迎接美军登陆及物资接济。同时，以刚从缅甸空运到南宁的孙立人军由南宁向玉林、梧州地区推进，先支援韩练成军在雷州半岛的攻击作战，然后沿西江向广州攻击前进，作为攻击广州西正面的主力部队。黄涛军在桂越边境对北越防御，掩护攻击广州主力军的后背。日军投降后，张发奎即以上述部队态势为基础，令孙立人军由西江水陆两路向广州兼程前进。韩练成军渡海南岛，所遗雷州半岛受降任务，由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及其所率的直属部队接替。张弛军经两阳、四邑推进中山、顺德，为便于与日军洽降及指挥进入广州的先头部队和监视日军起见，张发

---

① 《蒋介石关于规定各区受降主官等情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1），72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奎派中将高参主任张励为广州前进指挥所主任，于9月6日率部下135人，由南宁乘美军运输机8架飞往广州，与日军协定受降事宜，日军随即派出熊川中佐驻该指挥所接受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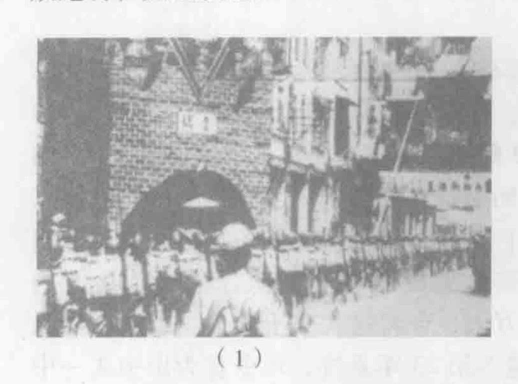
此时在广东的日军，在广州市区有第23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和独立第8、第13步兵旅团，第23混成旅团；在广九沿线东莞、宝安一带的有第129师团；在中山、江门一带的有第130师团；在雷州半岛的有独立第22旅团和第23旅团各一个大队；在海南岛的为日海军伍贺启次郎中将的海南镇守府及其所属的海南警备队；此外属于第七战区余汉谋受降区的汕头、惠州一带有104师团以约两个大队为基干编成的潮汕支队。全部总兵力为137 300余人。另日侨与韩侨各约1万人，台湾籍人7千余人。以上部队除海南警备队外，余均隶属于南支派遣军第23军系统，司令官为田中久一中将。日军投降前，南支派遣军的作战计划，原以阻止美军在沿海登陆和固守广州为目的，部队多配备于沿海地带，并在广州近郊四周及增城、花县一带，构筑以广州为核心的据点工事。宣布投降后，其部署略有变更，所有部队由分布状态变为集结状态，准备投降缴械。

广东伪政权方面，1944年4月陈耀祖被击毙后，陈春圃接任伪广东省长，1945年4月，陈春圃辞职，褚民谊接任，其后并兼汪伪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伪广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周应湘、汪宗准、李荫南、陈良烈分别为伪广东省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招桂章为伪广东海军司令，许廷杰为伪广东行政公署参谋长，郭卫民为伪警察局长。实际主持广东军政大权的是陈璧君。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即电令陈璧君转知所属照常办公，听候接收。陈壁君即召集军政各头目在法政路汪公馆开紧急会议，做出安排，各路伪军则被加委先遣军名义。

新一军的先头部队于9月7日进入广州，另由粤汉铁路南下的第13军第89师也于9月9日到达广州。张励即一面令孙立人统一指挥所有广州部队，包括原在广州活动的军统徐光英的别动军和伪军等，分驻市区各要点，对日军的移防集中进行监视。另一面令广州日军先行集中于河南的南石头及芳村、花地一带，候令缴械进入集中营。至9月11日，日军在上述各地集中完毕，广州市内日军绝迹。

9月15日，张发奎率同主要幕僚，包括参谋长甘丽初、作战处长李汉冲、后勤副司令何世礼、秘书长麦朝枢，偕美军联络官博文准将一道，乘机飞广州主持受降。11时25分，飞机在白云机场着陆。张发奎与博文并肩坐上吉普车，率同各接机官员、新一军新38师部队，举行隆重的入城进军仪式。队伍从机场出发，经搭有凯旋门的中华北路（现解放路）、一德路、

长堤、靖海路、泰康路等，至中山纪念堂前结束。沿途市民张灯结彩，大放炮竹，夹道欢迎。



（1）



（2）

图 5－13　1945 年 9 月，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新一军开进广州，正式接防

1945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广东地区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受降时，张发奎坐正中，左右为博文与参谋长甘丽初，面对日本投降代表田中久一及海南岛日海军代表肥后大佐宣布受降第一号命令，命令由作战处长李汉冲宣读，由译员译成日语、英语，然后令田中久一在降书上签字执行。该命令规定：日军受令后，应即就现集中地，依我指定仓库，按先重武器、后轻武器的顺序，自行卸下一切装备，纳入仓库，随即将武器、弹药、车辆、航空器材、海军舰艇，以及人员、马匹和其他军需物资、现存财务等，分别造具结册各五份，呈送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员按册清点；又规定日军卸下武器后，依原部队建制，徒手进入指定集中营，以战俘身份听候处理；田中久一及各部队长即解除指挥权，田中久一改为日俘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等。田中久一的降书内，则载有“如不执行命令或违犯命令，愿受惩罚”等语句。①



图 5－14　田中久一在投降书上签字

---

① 李汉冲：《广州受降接收纪实》，载自《广州文史资料》，第 4 辑，119～121 页，广州市政协，1961 年印刷。

潮汕地区，余汉谋派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中将、闽粤边区总司令部副司令欧阳驹为潮汕前进指挥所正、副主任。6日，徐景唐由兴宁至新亭，7日，潮汕地区日军司令小野修少将派汕头警备队长佐濑次郎少佐等进谒，8日在蓝田书院见徐景唐后受命而返。10日，战区上校参谋李柘等及美军上尉高露士抵汕，12日，徐景唐率百余人设前进指挥所于国际俱乐部，与敌降官拟定各地日为投降集中计划，自15日起，潮安、潮阳、揭阳3地的日军集结潮阳城附近的澄海、樟林、东陇、庵埠、南澳5地。潮汕地区日军，计有两个半步兵大队，炮兵1个大队，工兵、宪兵、通信兵、辎重兵各1个中队，人数共4 800余名，步枪3 000余支，大小炮110余门，汽车数辆，掷弹筒8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飞机15架。25日，汕头市行政司法机关开始接收汕头市警卫，点验日军军品仓库等。27日，日23军军长田中久一的代表富田直亮少将由广州飞汕头签降，28日上午9时，由徐景唐主持在指挥所礼堂举行了汕头地区受降典礼。①

广州日军于9月23日开始解除武装，29日进入河南的南石头、石涌口、白砚壳等集中营。源潭、新街的日军独立第8旅团则于10月10日进入芳村集中营。大良、东莞、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岛各地的日军，亦自9月27日起至11月中旬止，先后缴械集中完毕。其余分散各地的日侨、韩侨及台湾籍人等则于广州市内和海南岛的海口、榆林港各地分别集中管理（广州市日侨集中东山、黄埔两地，韩侨集中百子路一带，台湾籍人集中花地）。

在受降过程中，第二方面军共接收日军缴出的各种枪支57 200支，其中步枪47 714支，轻机枪1 893挺，重机枪546挺，高射机枪20挺；接收各种掷弹器（筒）3 557支；各种大小口径炮3 667门；各种刀剑36 343把；各种枪弹24 161 978发；各种炮弹220 689发；其他榴弹、手榴弹178 206发。接收各种有线、无线电机电话机2 983部；接收敌伪舰船40余艘；船舶434艘；各种车辆2 000辆。接收敌伪工厂84处，仓库11处。此外还有包括铁路、机车等各种器材、物资等一大批。②

对于战犯的审判和日俘的处理，第二方面军在1946年12月组织了“日军战犯调查组”，以情报科长汤亮光为组长，对日军在华南的具体罪行进行调查。当时国民政府根据有关国际法公布的战争罪犯处理条例，凡战犯的罪行，系指犯有非作战时期战场以外的罪行，并非指在作战期间直接的战

① 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26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有修改。

②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纪述》，56~63页，1946。

斗杀伤行为。按照此标准，广州方面最初以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机关为主要调查对象。1946年1月逮捕第一批战犯21名，其中日籍7人，德籍纳粹分子14人。至同年4月止，前后宣布逮捕战犯6批共622名，其中有将官7名，校官19名，韩籍4名，台籍人16名，日本驻广州领事亦在战犯之列。将官中有敌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特务机关长松井真二少将，宪兵队长重藤宪文少将，第130师团长近藤新八中将，第104师团长末藤知文中将，独立第23旅团长下河边宪二少将，92步兵旅团长平野仪一少将。校官中有特务机关负责人肥后大佐及宪兵关伊执五郎中佐，松永平司少佐等。

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1946年2月15日成立之日起，到1947年12月31日奉令结束之日止，共计拘留人犯961人，审理结案人数225人（其中判处死刑的38人，无期徒刑的10人，有期徒刑的37人，不起诉的101人，无罪的39人），非战犯（已遣返）694人，未结案及在审核中的42人。所有未结案件、人犯，及已结案正在服刑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犯人，均转解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继续办理。

在广州被判处及执行死刑的、属于日军高级将领的战犯，除1947年3月17日被处决的田中久一中将外，还有近藤新八中将、平野仪一少将等。在广州被判处及执行死刑的战犯，以日军特务机关及宪兵队的官兵占多数。他们有澳门正、副特务机关长泽荣作、山口久美，广州、汕头、曲江的宪兵队官兵植野诚、田中寅一、李安、水马猛雄、铃木明、魁头宽二、贝冢



图5-15　侵略者的下场——1947年3月27日，华南头号战犯田中久一被押赴广州流花桥刑场执行枪决

泰南、木下樽裕、岸田加春、小桥伟志、山田恒义、安藤茂柞等多人。[①] 在越南的战犯第38军军长土桥勇一中将等189名，亦解广州审理，广州法庭以他们罪行不详，大多从轻处理。

广东战俘自1946年3月21日开始遣送，按汕头、海南岛、惠州、广州、东莞、大良各地的战俘，最后为日侨的顺序，分批运送回国，至是年4月25日，由善后联络部代理部长富田直亮率领的最后一批包括日俘2.7万余名、日侨6 700余名为止，共遣回日本的有14万余名，留用服役的1 000余人与战犯600余名未包括在内。留用战俘最初由井上中佐参谋留穗继续联络管理，后由各调役机关自行甄别去留，其在服役中有成绩者，获得取消其战俘身份，改以平民待遇。台湾籍人因不属战俘身份，由我国自行另租挪威轮船沙班号等，于4月间运送回台湾。

对于汉奸伪军之处置。广州的肃奸工作最初由在粤的军统头目陈劲凡负责，因肃奸不力，激起公愤，张发奎报请蒋介石批准，改为成立由广州行营负责、各级政府、参议会、党部等参与的广州肃奸委员会，行营中将参议冯次祺任主任，军统广东办事处主任郑鹤影任副主任。当时所掌握的大小汉奸名单1 000余人，逮捕400余名，包括褚民谊、陈璧君、招桂章、许廷杰、李辅群、郭卫民、范德星、骆秀礼、吕春荣等伪军政要员。公开通缉三批共500余人，第一批40余名，于1946年2月公布；5月公布第二批100余名；7月公布第三批380余名。另公布新闻记者汉奸35人。这一类多为上中层的经济、文化、教育界的汉奸及一般之伪军政人员，多已潜逃异地或匿居港澳，其中有香港华侨日报督印岑维休、澳门大买办高可宁、傅德荫等。但有的被抓获，有的未被引渡或抓获，最后不了了之。

汉奸的最后判决与处理。1945年10月14日，吕春荣在广州被处决；12月8日，伪自警团长叶坤被处决；陈璧君、褚民谊、汪宗准、李荫南及汪精卫的女婿何文杰等被押解南京，褚民谊被判死刑，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招桂章、许廷杰被捕后，军统曾以二人已被策反、有立功表现为由给予营救，未果，在广州被军事法庭分别判处5年、3年徒刑，张发奎亲笔将之改判为10年、5年（1949年被国民党释放后逃港）。李辅群押往南京后被判死刑，但未执行（1949年后被押回广东处决）。郭卫民被判刑5年（1949年

---

① 黄汉纲：《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始末》，见《广州抗战纪实》，509～51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被国民党释放后逃港）。①

各路伪军先被改称先遣军，暂时维持。国民党部队控制局面后，遂逐次改编裁撤，几名伪军师长被招往南京“调训”，后一律从宽处理。

对于受降中暴露的问题和国民党人员的腐败，旁人所述或许不为人信服，此处我们引用华南地区受降最高指挥官张发奎后来的一份回忆，读者可自行判断：“这个历史任务虽已完成，可是整理受降后繁杂的任务，却令人感到不快。这固然因胜利的突然来临，使我们在时间仓促中不能预作详密的准备。而我们行政方面之低能与社会人心之腐败，也于胜利后不久之际，全部暴露无遗了。”“中央对于接收问题，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凡接收机关的派遣，接收部门的分类，接收物资的处理，都没有明白的规定。”“多数接收人员的低能和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乱。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的是私人，吃亏的是国家，军政部特派员莫与硕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节文的正法，亦不足以转变此种风气。发‘胜利财’与‘劫收’的名词，竟在这个时候添入了‘辞典’。于是，人民由希望的高峰跌进了失望的深渊。”②



图 5－16　广州民众欢庆抗战胜利

① 何崇校：《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肃奸专员办事处与广东肃奸委员会》，载自《广州文史资料》，第 24 辑，140～142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② 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记》，见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89～190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第六章　广西战场的辉煌一页
——桂南会战

1939 年 11 月 15 日，日军为切断中国南宁到越南河内的国际交通线，开辟海军对内陆作战的航空基地，集结第 5 师团、台湾混成旅团、海军第 5 舰队及第 3 联合航空队等部约 3 万人，包括舰艇 70 余艘、飞机 100 多架，在第 21 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指挥下，由海南三亚出发，在广西钦州湾强行登陆，24 日攻陷南宁。

中国军队 15 万多人①在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第 4 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指挥下，以杜聿明第 5 军为主力，于 12 月 18 日起对敌军发起反攻，至 31 日取得了攻克南宁东北部要隘昆仑关、歼敌 4 000 多人的昆仑关大捷。日军为确保南宁，又增派第 18 师团、近卫旅团到桂南，于 1940 年 2 月 2 日迂回攻陷南宁北部重镇宾阳，3 日再度攻陷昆仑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之后，双方处于胶着对峙状态。

1940 年 9 月 23 日，日军入侵越南北部，从越南进入我国广西的战略通道已被截断，日军遂决定放弃南宁。为防止日军在撤离前对占领区的破坏，中国军队尾追截击，于 1940 年 10 月 30 日重新收复南宁，前后历时近一年。整个会战，日军伤亡近万人，中国军队伤亡近 3 万人。

第一节　日军的战略企图与中国
军队的防御部署

日本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即以其在上海的第 3 舰队，在青岛的第 4 舰队，华南的第 5 舰队，对我国的东部、南部沿海进行封锁。此时我国的对外

① 一说最多时达 30 万人："中国参与的部队最多时有 5 个集团军、25 个师，另有 7 个独立团及 1 个教导总队及粤、桂两省之民团，甚至也动员了空军及军校分校的学生，总计不下 30 万人。"（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第 9 册，插表 5。见胡春惠：《对中日桂南会战的回顾与反思》，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

贸易和作战物资的运进，主要是通过香港、越南的海防、缅甸的仰光、陆路由新疆至苏联中亚地区这4条要道。日本对通过上述要道向我国输送物资的途径，曾想方设法企图切断。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陷之后，平汉、粤汉两条铁路交通线被切断，江南各地对外联络线也被梗阻。我国经香港进口的物资顿时减少，但从越南的海防港上陆由铁路运至昆明或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运至广西的物资则急速增加。

1939年的4月和6月，日军的海军和陆军曾先后提出过进攻南宁的设想，以截断我国在该地区对外贸易的通道，使中国因得不到国际援助而丧失抵抗能力。日方认为，“中国虽已丧失华南沿海主要港口，但仍能自法属安南及缅甸方面获得补给，而广西公路成为中国之主要补给线，其输入量，每月达4 000至6 000吨，占输入额的30%”①。海军且认为占领南宁地区后，还可利用南宁的机场攻击我国大后方贵阳等地以及轰炸河内通往昆明的铁路，航程则较武汉、广州为近。即“直接切断沿南宁—龙州敌补给联络线路，并强化切断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敌补给联络线路之海军航空作战”②。

但在1939年的5月至9月，日军参谋本部正集中精力指导其部队在诺门罕地区对苏蒙军作战和着手组建日本在华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与成立汪伪政权，进攻南宁的建议被搁置下来。

1939年秋，欧亚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德国在经过数年的战争准备，于1938年3月并吞奥地利、1939年3月并吞捷克之后，1939年9月1日突然以重兵进犯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宣布对德处于战争状态。英法决定对德宣战后，两国以全力增强其本土的国防，对其在海外的殖民地——特别是东南亚的香港、缅甸、马来西亚以及广州湾、越南，实已无暇顾及。日本政府则乘此时机，在9月27日德军占领波兰首都华沙当日，即令驻法大使馆参事内山岩太郎向法国政府提出，停止经由越南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的要求。法国政府对日本乘国际局势紧张之际进行的要挟，予以断然拒绝。日方遂积极筹划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行动。

1939年9月13日新任作战部长的富永恭次少将，提出了攻占钦州湾、

①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7卷，9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49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南宁，封锁我国与法属越南的通道和物资进口的作战设想。

1939年10月16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第375号作战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加紧切断敌西南补给路线。

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同海军迅速切断沿南宁至龙州之敌补给路线。

三、上项作战部队之作战区域，大致应为南宁、龙州以南。

日本陆海军达成了执行上述作战命令的协定：

作战时期预定为11月中旬，作战代号陆军方面为“和”号，海军方面为“N”号。

日本方面以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第21军司令安藤利吉中将为此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参战兵力为刚从青岛调到东北，准备投入对苏蒙作战的第5师团（司令官今村均中将）、在广州的台湾旅团（司令官盐田定七少将），并派近藤新竹中将的海军第5舰队（11月15日改称第2遣华舰队）、山县正乡少将的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协同。规定进攻的部队在11月10日前，到达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

当时安藤利吉为协助汪精卫策划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的伪政权，正指挥久纳诚一、浜本喜三郎两师团及近卫混成旅团，发动以夺取韶关为目的的对余汉谋第12集团军的作战，10月初接到攻占南宁的密令后，即积极着手准备。一方面缩小在粤作战规模，将部队集结到翁源、英德一线，以便转用到南宁方面；另一方面派员侦察登陆地点，在钦州湾测量水位，做登陆前的准备。

今村均的第5师团自10月27日至11月3日，分别从旅顺和大连登船，一部分驶回日本的濑户内海，在广岛的宇品港抛锚装载物资。

由盐田定七指挥的台湾旅团，在向新到广东的藤井洋治第38师团交代了佛山地区的防务后，于11月4日由黄埔乘船，9日到达三亚。

安藤利吉率其司令部11月9日从广州出海，10日夜间到达三亚。

敌第21军进攻南宁的计划主要内容为：

一、第5师团、台湾旅团，在钦州湾登陆后，沿钦州至南宁的公路两侧地区，分三路平行向北进击，攻占南宁。

二、以中村正雄少将之第21旅团为中路，直接指向南宁，并予以占领。

三、以及川源七少将之第9旅团为西路，以南宁以西的金鸡村、江西村进行迂回包围，攻占南宁。

四、以盐田定七指挥的台湾旅团为东路，由邕宁渡过邕江后攻向四塘，从东面迂回南宁。

五、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陆空军第21独立飞行队从航空母舰和涠洲岛机场起飞，配合作战。

六、预定首先在钦州湾企沙、龙门登陆之第9旅团，其登陆时间为11月15日。

七、登陆后向南宁进攻时，21军指挥所位于钦州。①

日方处心积虑，调兵遣将，侵桂之战已是迫在眉睫。

中国军队方面，抗战爆发后，中日正规军主力决战始终局限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广阔地区，1938年秋，日军虽然以突然袭击占领了广州，张发奎第4战区仍然控制着北江、西江、东江大部分县城。广西此时则还完全是一片净土，未遭日军践踏。日军驻广州的安藤利吉第21军，长期只辖久纳诚一第18师团、三宅俊雄第104师团及盐田定七台湾混成旅团。安藤因兵力有限，也只能控制广州附近地区，维持汕头、海口等几个港口的占领，无力对余汉谋所属的广东军队发动强大的攻势。而余汉谋长期以来也抱保存实力的方针，从未对日本占领军进行过有效的反攻。而且日方为分化中国抗日阵营，还于1939年5月通过和知鹰二对余汉谋诱降。8月汪精卫在广州活动20多日，利用他与原粤系将领的渊源，派人与张发奎及余汉谋部64军军长邓龙光等谈判媾和。但未能得逞。

日军筹划的侵桂行动虽然诡秘，但其舰队在北部湾集结的情报已为英美侦悉，预见到“对南宁作战不久似将开始”②。并及时通报国民政府军事情报部门，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11月9日已完全清楚日军这次行动的企图。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以防御为主的第一期抗战结束，着手调整战区，将全国划为南北两大战场，撤销重庆、广州、西安三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督导南北两战场之作战。程潜出任天水行营主任，负责北战场，白崇禧出任桂林行营主任，指挥长江以南的第3战区（顾祝同）、第4战区（张发奎）、第9战区（薛岳）。广西对日作战即由桂林行营和第4战区负责。辖余汉谋第12集团军所

① 转摘自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 229～1 23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② 转摘自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 23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属粤军5个军对占据广州的日军第21军作战，辖夏威第16集团军指挥的桂军两个军布防在南宁地区，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委任李宗仁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并给桂系以安徽省地盘，李宗仁、白崇禧遂将桂系老部队第7、第48两个军开赴上海参战，以后长期归第5战区指挥，驻大别山和鄂豫边地区。1938年冬，日军攻占广州，为防御日军入侵，李宗仁、白崇禧遂报请蒋介石给夏威以第16集团军的番号，集合民团编组成第31、第46两个军。这两个军不仅装备差，而且缺乏作战经验。其编成与部署情况为：

第16集团军	总司令	夏　威	驻广西贵县
第31军	军长	韦云淞	
131师	师长	贺维珍	驻广西容县（集团军预备队）
135师	师长	苏祖馨	驻广东鹤山
独立第3、第4团			
第46军	军长	何　宣	代理
170师	师长	黎行恕	驻广西贵县南（集团军预备队）
175师	师长	冯　璜	驻广西灵山、合浦
新19师	师长	黄　固	驻钦州湾以北之小董、以西之防城
独立第1、第2团			

中方得知日军集结北部湾动向后，第16集团军对其作战行动做了初步判断，认为有3种可能：一是敌军主力由广东南部沿海电白、吴川登陆，然后向宾阳推进，威胁南宁；二是敌军主力由北海登陆，攻取灵山、横县后，溯江而上，直逼南宁；三是敌军一部由北海登陆做佯攻，主力则由钦县、防城登陆，沿邕钦公路向南宁进攻。由于电白等地登陆不便，钦县、防城地形不良，北海登陆也受到公路破坏和防御工事的影响，故采用第一种方案的可能性大。据此，桂林行营制订了桂南作战指导方案，要求桂南驻军确保或掩护桂越国际交通线。然而，当时桂南兵力十分空虚，实际第4战区在敌军登陆的钦州湾附近，仅驻有46军的175师、新编19师和独立步兵第1、第2团。

桂南我军的这种部署，与最高统帅部对战局的判断也不无关系。1940年2月24日，蒋介石在柳州总结桂南会战时曾说：“自湘北会战后，我已成主动地位，曾于南岳会议说过，我当时判断敌人绝不攻南宁，因此将桂南

部队调粤西江，而将西江部队移粤北，此当然我负责任，我很惭愧，故北海防务松懈。孙子所谓：毋恃其不来，恃我有所备也。失了此原则，故而判断错误，此为最大错误。但如能配备得宜，我想南宁亦不至轻失，因钦、邕最近如能部署得当，以一、二师控制邕城，不必放在玉林，当时如加以深切研究，必无此失，此我们一大教训，可供作战研究。兵力小，部署好，亦可不失南宁。”① 说明对南宁方面确有疏忽之处。

第二节 日军占领南宁及对桂系将领的诱降阴谋

1939 年 11 月 13 日，敌 21 军部队在海军妙高、长良、名取等巡洋舰和加贺等航空母舰等配合下，乘舰艇冒着强风从三亚榆林港起航驶向钦州湾。迄 14 日晚，日海军在钦州湾的舰只大量增加，泊于企沙海面的舰船约 12 艘，北海附近约有舰船 11 艘，由 70 余艘运输船组成的运兵船队也载着参战部队驶抵钦州湾。

11 月 15 日黎明，及川源七率日军第 5 师团第 9 旅团在海军、空军掩护下，利用大风雨、守军易于失去注意力的时候，在预定的钦州湾西岸企沙突然发起登陆攻势，在日舰猛烈轰击沿海中方守军阵地后，于 8 时左右强行登陆。

由于中方对敌登陆地点判断失误，加上部队调动部署尚未就绪，兵力薄弱，故从作战开始便陷入被动，第 46 军新编第 19 师防线正面达 200 公里以上。日军登陆开始后，新 19 师师长黄固急令部队“务于敌登陆立脚未稳之际，努力将敌歼灭于海滨”②。中国将士对登陆之敌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下午，敌舰又对钦州湾龙门地区猛烈炮击，并以步兵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登陆冲锋。下午 3 时，佐世保海军陆战队在龙门登陆，双方交战十分激烈。傍晚，中国军队鉴于敌火力甚猛，遂放弃滩头阵地，退守防城附近后备工事。

战斗打响当日，第 16 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急令黎行恕第 170 师由贵县南西开南宁，贺维珍第 131 师由容县开向西南的陆川和博白，魏镇第 188 师由广东鹤山西开容县，苏祖馨第 135 师由广东高明西开贵县布防。

16 日，由企沙登陆之敌，向中国防城守军阵地进逼，另以一部在钦县

① 《蒋介石关于桂南会战的总结》，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908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②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附近的犁头嘴登陆，一部乘大雨涨潮之际，以汽艇沿渔洪江直趋黄屋屯。中国军队逐次退守钦县以南第二阵地，丧失了一个又一个滩头阵地。防城守军也因受敌机、大炮的轰击，阵地全毁，以致无险可守，弃城转移。日军乘胜占领了黄屋屯。面对严峻的形势，第46军军长何宣命令新19师："竭力固守平旺、钦县附近第二线阵地，无令不得退。"①

17日，犁头嘴登陆之敌，凭借飞机掩护，以主力猛攻钦县并以一部从中国军队侧背冲入城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街一巷，敌我反复争夺。巷战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中国军队退出钦县。

由于防城、钦县的失陷，使日军巩固了滩头阵地，给以后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陆日军马不停蹄，以南宁为目标，形成三路攻势。及川旅团为左翼队，沿防城通贵台、大塘一线推进，于19日晨在贵台附近反复冲锋后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进抵唐报，从西南方威胁南宁。中村旅团为中央队，在占领黄屋屯后长驱直入，于18日抵达大寺，直逼大塘。盐田混成旅团为右翼队，从钦县出发，沿邕钦公路向小董进攻，于18日攻占了小董，在这一带阻击蔡廷锴指挥的侧击部队，以掩护今村师团向南宁顺利推进。中国守军第175师、新编第19师虽在小董、大寺、贵台地区层层进行抗击，但终因实力悬殊，未能有效阻止敌军的冲击。日军从东南、南、西南三面形成了对南宁的包围。

位于郁江与桂越公路交汇点的南宁，是一个控制着国际交通线的战略重镇，市区位于邕江北岸，江宽约250米，江水并不很深。担负守备任务的第16集团军苏祖馨第135师和黎行恕第170师多是新兵，训练时间短，装备也差，加上在集结过程中缺乏运输工具，未能按预定计划到达指定地点。11月20日，第135师到达贵县后，"即以汽车输送宾阳转运南宁，但车辆缺乏，每日只能运兵约两营，时机迫切，运输工具如此，焉能应付强敌！"②21日，日军先头部队距邕仅三四十公里，大有渡河之势，但我170师也不能照预定计划抵达邕江南岸的据点吴圩，只能改由永淳渡河转往南宁作战，南宁保卫战我方一开始即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11月18日，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到达南宁指挥所，指挥该地区作战。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白崇禧于11月19日飞返桂林，决定在柳州至南宁间的迁江设立指挥所，他根据敌我双方态势，对南宁保卫战未做过高要求，因他认为我方"集中兵力至少需要3个星期以上，

---

① 《桂南会战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蔡廷锴自传》（下），51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所以对敌决战，要在12月上旬才能开始”①。重庆最高统帅部则基于两点考虑，令我守军坚守南宁，11月22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转162集团军夏威、韦云淞二位司令，令称敌由钦、防登陆后，以“小部队”分途突迫南宁，且“距其登陆根据地达200余里”，因此要他们“负责指定部队，固守南宁据点，待我部队集中后，断然予以打击。如无命令而使南宁不守，即以军法从事”。23日，又电令白崇禧等：“（一）着第16集团军指定两师兵力固守南宁，无令不得撤退。（二）对邕钦路妨害敌军行动之部队，应切实指定其负责官长与部队，破坏其交通。”②

22日下午，第16集团军任命135师师长苏祖馨为邕江北岸守备司令，第170师师长黎行恕为副司令，但在城防配置尚未完成之时，日军已开始渡江。日军西路的第9旅团、中路的第21旅团组成渡河突击队，以民船强渡邕江，准备攻击南宁城，但均被北岸守军的浓密火力击退。23日，敌第21旅团组织了20多次强渡，仍遭到北岸守军135师的强烈反击，敌军受到很大伤亡。

24日上午，日军除集中炮兵掩护渡河之外，又集中了海军航空兵，对北岸守军进行了连续的攻击、轰炸。在北岸守军阵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发生很大伤亡、而后续部队尚未到达的情况下，敌21旅团21联队的第4中队长新田宽一郎中尉，利用这一机会再次组织强渡，于10时左右到达了北岸，之后即攻占了南宁高等法院附近的建筑物，后续过江的日军则相继投入攻击。中方第135师在腹背受敌、处境危急的情况下，被迫撤出南宁，向高峰隘地区退去。日军攻入南宁后，在市内扫荡两天，街头血流成河。29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

南宁失陷之前，11月2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代次长刘斐就敌军意图判断与我军配置建议呈文蒋介石、徐永昌等，认为日军的企图可分积极与消极二项：

1. 积极企图：敌将于攻占南宁后，续向广西之心脏地之柳州进犯，扩大威胁我西南，并截断我桂黔后方联络。

2. 消极企图：敌于攻占南宁后，扩大并巩固外围守备，各以有力一部分攻宾阳、龙州，威胁桂、越，牵制我兵力，以为声东击西之计。

刘斐认为，“攻占南宁，事实上影响我国际运输者不巨，不过造成其军

---

① 程思远：《政海秘辛》，145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86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事上胜利，以振奋敌国内外观听而已。敌如认清此点，而抱积极企图，进一步直捣桂省腹心，截断西南各战区后方联络干线，使我尔后作战增加困难，亦有可能”。因此刘斐提出，我方现可用于南宁附近的兵力为31军、46军6个师，第5军3个师尚在输送中，根据过去作战经验，我以9师兵力对敌3个师团，敌占优势。为防止敌使用3个师团以上兵力进犯柳州，有必要增加兵力，作巩固柳州守备之准备，建议预以后方兵力以一军开宜山或柳州附近集中，另以一军待命出发准备向宜山集中，以巩固桂黔后方联络。①

增兵桂南，显有必要，开战初的11月20日，白崇禧就曾请求蒋介石将桂系旧部调回广西作战，但蒋介石未允准，而是就近从广西全州将其嫡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的第5军调往桂南。这时又令同属徐庭瑶第38集团军的傅仲芳第99军从湖南湘潭及贵阳移至柳州，令姚纯第36军自重庆及湖北当阳南下赴宜山集结，以增援第16集团军。

第5军前身为1937年始编成的陆军装甲兵团，是国民党的第一支装甲部队，杜聿明为第一任团长。1938年初扩编为第200师，以杜聿明为师长，邱清泉为副师长，廖耀湘为参谋长。充实以抗战后从苏联、德国、美国购进的战车、卡车、摩托车等机械装备，编制较一般陆军师庞大，总兵力约2万人。1938年12月，第200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下辖第200师，荣誉第1师和新编第22师。不久番号又改为第5军，徐庭瑶升任第38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升任该军军长。该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成立的唯一的机械化新军，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王牌。军部、直属团、第200师驻在全州地区；新编第22师驻湖南东安地区；荣誉第1师驻湖南零陵地区。这次奉令增援南宁作战，蒋介石是十分关注的，在23日致白崇禧的电报即明令“第5军应迅速集结宾阳附近地区，非待集结完毕后，不得逐次使用”②。显然是意在集中使用，攥成一个拳头突然打出去，打出第一支中央军机械化部队的赫赫军威。

杜聿明奉命后，即令戴安澜第200师以步兵两团为先遣部队，向南宁前进，该师第600团首先出发，在到达南宁途中即与敌扩张外围的南宁守军发生遭遇战。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86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86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高峰隘及昆仑关地势险要，为南宁北侧之天然屏障。尤其昆仑关，是邕（南宁）宾（阳）公路的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日军要确保占领南宁，就必须控制这两个天险。为此，分兵两路，一路以中村正雄旅团及骑兵联队为主力，沿邕宾公路北进；一路以步兵第41联队之一部由邕武（鸣）公路北上。25日，邕武公路之敌进至二塘，遭到中国军队第200师第600团的奋勇还击，全团将士浴血奋战，团长邵之一、副团长吴其升阵亡，副团长文模负重伤，官兵伤亡过半，仍顽强地挡住了日军的进攻。其后，由于日军攻占了四塘，截断了中国军队后方补给线，形成孤军被围的局面，守军才利用夜幕掩护，与第170师一起向高峰隘地区撤退。26日，从南宁城撤出的第135师等中国军队也到达了高峰隘东、西一线。30日，日军苦战终日，以火力摧毁了中国军队阵地，占领了八塘，中国军队退至九塘。12月1日，日军进占高峰隘，中国军队一部向武鸣方向撤退，第200师向昆仑关转移。

2日，中国军队以魏镇第188师第564团协同战车部队，对八塘之敌展开了反攻。日军抵挡不住中国军队的攻势，被迫后退。然而由于道路桥梁破坏严重，中国军队战车无法通过，乃与日军形成对峙。4日，日军猛攻昆仑关，第564团顽强抵抗，终因弱不敌强，被迫后撤，昆仑关遂告失陷。6日晨，日军将中村旅团主力回调南宁，攻势告一段落，敌我双方围绕着高峰隘和昆仑关，形成了战略对峙局面。

敌21军司令部于占领南宁的当日，即将台湾旅团一并交由第5师团长今村均指挥，军部于27日离开钦州，于12月1日返抵广州。

第5师团在南宁的警备态势是：

中村正雄第21旅团警备南宁以东地区及东北的昆仑关，并增派了反坦克炮一个小队，山炮一个中队，迫击炮一个中队，工兵一个小队及无线电两个小队和卫生队一部；

及川源七第9旅团警备南宁以西地区；

42联队松本总三郎少佐的第2大队，警备南宁以东的四塘地区；

骑兵第5联队及21联队森本宅二中佐的第3大队位于南宁东北的八塘地区，向宾阳方向警戒；

南宁以北的高峰隘，由第9旅团41联队野几久治少佐的第2大队进驻并警戒武鸣方向；

台湾旅团驻于钦州，负责保护钦州至南宁的补给线路，在钦州建立了兵站基地。

1933年以来，桂系曾聘请日本军人为军事顾问及教官，这次率队入侵

的日第5师团长今村均1934年前后就曾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军事顾问，对广西情况相当熟悉。日方还另派5年前曾受聘于广西当局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到第5师团任参谋兼特务机关长，专门对广西军队进行策反，离间广西将领。

1939年8月，日方由卖国贼汪精卫出面，派曾在李宗仁、白崇禧、龙云手下任事的“一名中国要人”对李宗仁、白崇禧、龙云进行拉拢，谈判与日妥协、联合反蒋事宜。在8月28、29日与龙云谈了5个小时，同白崇禧面谈了5次，同李宗仁面谈了2次。据此人9月初向驻上海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报告，3位将军的态度是：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据说3位将军对日方做了如下答复：

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但从各种事实表现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如近卫前首相在去年底所发表的言论足可证明，意思就是吞并，绝不是公平合作。对中国来说，与其让日本吞并就不如抗战到底，使日本恍然大悟，自行消除吞并思想。待事实上确有和我合作表现时，才有开始谈判的余地。

由于这次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也应该由日本提出。

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

日本穷困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抛弃仇恨，恢复友好才是谋求自救之道。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旧隙未泯，双方间的利益有冲突，但面对共同的民族敌人，广西将领是深明大义、不让敌人有机可乘的，日方的诱降阴谋受挫，也使他们在后来感叹：“那些华而不实纠缠不清的谋略路线，对中国并无损害，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虚弱。”①

但日本方面并未死心，桂南战事打响后，日方根据“蒋介石在11月20日拒绝白崇禧调回广西军的请求而调中央军进入桂林”的事实，判断蒋企图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广西省，本次作战将引起蒋介石、白崇禧及龙云之间的暗斗，加以今后海军航空队对其要地进行轰击，很可能加深其争执，“从而使谋略工作大有希望得到进展”。便借与桂系有渊源关系的今村均等人，在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之际，再度尝试对李宗仁、白崇禧的离间与诱降。

1939年12月10日，今村均向李宗仁、白崇禧二将军发出所谓日、华

---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505～50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提携之通电，其主要内容为：

1. 日军占领南宁之唯一目的，是为了切断蒋介石政权与法属印支之交通线。

2. 对李、白两将军在广西之建设成就表示敬意，因此将极力注意避免破坏，并对两将军治下之一般民众生命财产，尽力予以保护。

3. 愿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为促进东亚同文同种两民族之提携奋起前进。

4. 将军若仍执迷不悟与日军敌对到底，希图夺回南宁，我南宁驻屯军将独力对抗将军之50万军队，且确信将取得作战的胜利。

5. 将军部下在南宁附近战死之4 200余名勇士，日军已将其葬于南宁之中山公园，并予以郑重保护。

在广州前线的白崇禧将军与前来增援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协同，以更为猛烈的反击回答了日方的“敬意”。

第三节　昆仑关大捷

11月24日，南宁失守，蒋介石反倒冷静下来。26日，他电示白崇禧，告以“南宁失陷后，我军作战不可急求速胜，应以慎重出之”。指示一方面以运动战方式阻止日军向北、向东继续扩张，另一方面要以主力在邕钦公路两侧滞迟敌军后续部队的行动，妨碍敌后方交通并破坏其修复公路之企图。上述行动目的是策应我增援部队在南宁以北集结，待时机成熟时与敌决战，收复南宁。白崇禧按此意图对所属部队之行动做了周密部署。

11月30日和12月1日，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5军军长杜聿明均从设在迁江的指挥所打电报向蒋介石要求乘敌立足未稳、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将敌消灭。12月5日，蒋介石专门打电报给白崇禧，饬令各部加强对钦、防一线情况的侦察，命令蔡廷锴集团对邕钦公路积极袭扰，并捕获俘虏，侦讯其有无后续部队及补给状况，以便进一步了解敌情，选择决战的时机。

12月初，我桂林行营通过侦察，得知敌军从钦州湾至南宁，由南宁向东北至昆仑关，仅有第5师团和台湾旅团，驻守相当分散，而且正在组织人力，填平南宁向西被摧毁的公路，准备进攻龙州和镇南关。根据以上敌情，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了进行反攻以收复南宁的作战设想。

1. 敌情。敌侵邕兵力截至现在止，实不过4个联队，附以骑兵及少数

山炮。因邕钦路之未修复，敌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无法猖獗，且给养及补充也发生困难。

2．敌我战略比较。以我现有兵力，加上第5军，就步兵未必较敌劣势，若加上重火器与机械化部队，则明显优越于敌。若待敌修复交通后，我方即使再增加数师步兵，也会由优势转为劣势，不足以与敌抗衡。

3．地形于敌为背水作战，后方交通困难，而我后方及战场一带，利于机械化部队之活动。

故综合诸种情形，深信目下转移攻势，洵为有利。

但我守军已从4日起奉蒋介石之命开始破坏道路，实施清野，部队按掩护主力集中的意图配置。故白崇禧向蒋介石请示，如反攻提前发动，则必须先修复公路，召回部队。

12月6日，蒋介石复电白崇禧，同意于12月15日前开始反攻，第5军全部投入，派空军主力协同作战，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务节节截断邕钦路敌后方联络线，歼灭南宁方面之敌"。

白崇禧接蒋介石电令后，根据敌我双方态势，对方案又做了相应调整，12月12日开始做进攻的部署，12月13日，将反攻计划概要电呈蒋介石、何应钦，其要点为：

1．攻略步骤：第一步攻略昆仑关、高峰隘，第二步攻略南宁。

2．攻略预定日期：18日开始攻击，20日占领昆仑关、高峰隘，同时邕河南岸占领蒲庙、吴村，截断大塘附近敌后方联络线，23日开始对南宁的攻击，25日占领南宁。

12月8日，白崇禧请蒋介石电促张发奎从韶关到达迁江指挥所协助指挥西南地区之第4战区部队，16日，蒋介石又派李济深、陈诚从重庆飞桂林，当日转柳州助白崇禧指挥作战，当日傍晚，李济深、陈诚、白崇禧3人即到了第5军前线指挥所视察。派陈诚来，显



图6－1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右）与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左）

然是为使白崇禧便于协同指挥中央军嫡系，蒋介石为昆仑关会战，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桂林行营于12月16日，正式下达了收复南宁的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一）夏威的第16集团军，以周祖晃的第1纵队（辖170师、135师、坦克一个连），进攻南宁以北之高峰隘，一部进攻南宁以东的四塘、五塘，以策应徐庭瑶之第38集团军攻占昆仑关；以韦云淞之第2纵队（即31军）从南宁以南的大塘、吴圩进攻南宁，并阻击钦州向南宁增援之敌。

（二）徐庭瑶的第38集团军，以主力歼灭昆仑关附近之敌，然后攻向南宁，协同第16集团军、26集团军围攻南宁。

（三）蔡廷锴第26集团军之46军及挺进第3纵队，向桂南的灵山县及该县以西的陆屋地区集中，破坏敌由钦州湾至邕宁的交通，重点攻击陆屋以西的小董地区，阻敌向南宁增援；第66军到达宾阳东南的古辣、甘棠之后，应从邕宁以东的永淳（现峦城）横县以西的南乡地区渡过郁江，袭击邕、钦公路以东地区之敌，破坏其交通和通讯，并阻止敌北上增援。

（四）空军之任务：侦察钦州、防城海面敌舰活动与登陆情况；轰炸敌航空母舰、机场及军舰和运输船只；掩护地面部队攻击昆仑关、高峰隘；随时听通知出动，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五）炮兵部队：主力位于宾阳以西的思陇附近，协助第38集团军攻击昆仑关，一部位于武鸣以南的双桥一带，协同第一纵队进攻高峰隘。

（六）以38集团军傅仲芳之第99军主力为总预备队。

（七）预定开始进攻时间为12月18日。

（八）行营指挥所位于迁江（来宾县西南，红水河南岸之小镇）。①

中国军队共调动19个师15万余人投入战斗。

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广西战场英勇反击侵华日军的一场大战即将展开。

驻南宁的敌第5师团，事先并未获知国民党军即将进攻南宁的情报，于

① 转引自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 236～1 23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12 月 17 日上午，令及川源七第 9 旅团从南宁出发，进攻南宁西南约 190 公里的龙州和镇南关，这是敌占据南宁后，计划进攻的第 2 个目标。国民党军侦知日军将向该处进攻，因而对从南宁经吴圩、苏圩、山圩、渠荣、东门、绥渌、柳桥至宁明的公路，动员了本地民众全部挖毁。



图 6－2　昆仑关战役

日第 5 师团占领南宁之后，即着手填修被挖毁的公路和兴建机场做进攻龙州的准备。至 12 月 16 日机场已经建成，公路已填修到扶绥县的绥渌地区。

17 日 8 时，第 9 旅团长及川源七按计划率第 11 联队、第 41 联队的第 1 大队、迫击炮 1 个中队、工兵 1 个中队、汽车 1 个中队（95 辆）、卫生队一部，由南宁向镇南关和龙州进攻。

这支部队经修路、行军及与中国守军进行小规模的战斗之后，21 日 18 时 20 分占领了龙州。同日 18 时 50 分，山县的先遣队占领了镇南关。第 9 旅团进攻龙州和镇南关时，战死 105 人，战伤 256 人。

就在及川源七到达宁明以东的明江时，突然接到“中国军队向南宁大举反攻，旅团急速返回”的命令。于是，第 9 旅团占领龙州与镇南关后，立即作返回的准备。

南宁坐落在邕江平原，邕江的上源为通越南北方四府的左江和通云南东南地区的右江。南宁北面为大明山余脉扩散出来的丘陵地带，穿越丘陵有两条路通往桂北。一条从南宁北上通武鸣，而南宁北 20 公里的高峰隘耸峙路旁。另一条由南宁向东北延伸，经过四、五、九塘 40 多公里到达昆仑关要隘，再经思陇、芦圩 30 多公里到达宾阳。邕宾公路两端的南宁和宾阳，地势平坦，海拔在 300 米以下，但愈近昆仑关，地势则愈高，自五塘至芦圩间，海拔在 600 米左右。沿途群山叠嶂，绵延不绝，中多悬崖深谷。昆仑关雄踞于其间，其东面 2 公里处有 653 高地，西面 2 公里处有 445 高地和 441 高地，其下仅有一条由数百年前的旧式驿道加宽改建成的邕宾公路通过，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要守南宁，必先守住昆仑关，南宁始能确保，而要攻南宁，也必先取昆仑关，能取得昆仑关，则克南宁就容易

得多。日军对此也异常清楚，明了“昆仑关为中国有名的古战场”①。中村第21旅团夺关之后，在昆仑关以北的仙女山、老毛岭、441、653、600、罗塘等高地，以及立别岭、枯桃岭、同兴堡、界首等地，都筑有堡垒，周围有数重铁丝网，构成无异铜墙铁壁的防线，并附有机械化部队和炮兵协同防守。

担任昆仑关正面攻击任务的为杜聿明第5军。12月16日下午2时，杜聿明在迁江附近之谭蓬村军指挥所召集团长以上会议，传达作战任务及南宁会战计划，决定以郑洞国荣誉第1师（由战伤康复后的老兵组成，作战经验丰富）配置山炮、战防炮、坦克各一连，担任正面主攻；戴安澜第200师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荣誉第1师的战斗；邱清泉新编第22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使郑洞国、戴安澜两师放胆围攻。



图6－3　第5军军长杜聿明

18日凌晨，荣誉第1师开始了局部夜袭。拂晓时分，在战车及炮火支援下，对昆仑关发动正面攻击，“杜聿明军长一声令下，我军大炮开始向敌人疾风般地射击，霎时，日军各主要阵地上火光四溅，浓烟弥漫。大约20分钟后，日军回击炮火被迫稀疏下来，我立即命令荣誉第1师第一线部队发动攻击，其他各师也先后投入战斗。在望远镜中，我看到我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纷纷跃出工事，猛虎般地扑向昆仑关及四周各重要高地”②。据守昆仑关的日军森木大队，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纷纷向核心阵地退却。中午，我军攻克罗塘、同兴西北高地，接着又占领了石寨隘、同平、枯桃岭，并有一部进至九塘附近。

日军为了挽回败势，今村均师团长急调三木吉之助大佐的步兵第21联队及部分骑兵增援，该联队分乘31辆汽车，于18日傍晚自南宁出发，沿邕宾公路急进，当晚抵达九塘，并立即发动夜袭。双方激战不休，阵地上展开了白刃战。至19日凌晨，罗塘及同兴北方高地又被日军夺去。杜聿明令荣誉第1师继续攻击，重点指向653高地，并以一部截断昆仑关敌军后方补给线。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50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② 郑洞国回忆桂南会战。见杨克林、曹红：《中国抗日战争图志》，702页，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

当日上午，荣誉第1师左翼部队向653高地猛攻。653高地为昆仑关东北之要点，可以瞰制整个昆仑关战场。日军据守顽抗，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在此危急之际，连长安朝宣，排长杨讣明率部携带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最终控制了这个制高点。

执行迂回任务的邱清泉新22师是第5军的一支劲旅。1939年3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校阅组评定："第5军居西南各军第一；新22师又为第5军第一"，称赞该师"训练优良，军纪良好"，"团结力固，战斗力强"。这次大战受命于16日出发，由昆仑关以北的思陇穿越数十里山路到达昆仑关以南的五塘附近，发现日军尚未察觉，便决定对敌军进行突袭，于18日占领五塘、六塘，截断了日军后路。

这时日军第5师团的态势是：21旅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在昆仑关，第9旅团的一个步兵联队在龙州尚未返回，在南宁城内只有纳见敏郎大佐第41联队的两个大队（属第9旅团），因而再无部队去昆仑关增援。

位于钦州担任后方补给线警戒的盐田定七台湾旅团主动提出以林义秀大佐的步兵第一联队增援在昆仑关的第21旅团，19日进抵五塘，即与邱清泉新22师遭遇。

19日晚，气势凶猛的日军越过五塘向六塘推进，邱清泉以1个团在冰塘与敌周旋，以主力预伏于北侧山地，于20日凌晨1时许下令出击，先将五塘、六塘间的桥梁炸毁，接着伏兵四出，充分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予敌以重创。被阻挡的林义秀联队至23日下午才得以与被围在九塘的日军会合。

战斗打响后，西路的夏威集团周祖晃部在高峰隘也展开了猛攻，东路的蔡廷锴集团则在敌军后方四处袭扰，在钦县、小董、大塘、蒲庙等重要地域频频出击，牵制敌军行动。

20日，鉴于荣誉第1师两日来伤亡较大，杜聿明令第200师超越荣誉第1师阵地，担任主攻任务。第200师在戴安澜师长指挥下，强攻昆仑关。由于日军火力的密集封锁，攻势受挫。八塘方面，中国军队控制了八塘东、西两侧高地，破坏了交通线，从而切断了南宁至昆仑关的敌军补给线。

21日下午，我军在九塘将从南宁出援的三木联队重重包围。由于弹药缺乏，三木急向中村旅团长求援，敌军遂派飞机空投补给，下午2点，日方海军3架飞机在八塘附近投下弹药，由于受到我军严密包围，敌军无法取走。我方空军也在下午5时派出10架飞机到六塘上空扫射敌方阵地，7时，又派出6架飞机在九塘上空袭击敌人。地面部队21日晚彻夜向敌第一线阵地轮番进攻，昆仑关北面的敌三角山阵地被攻下。

从龙州奉命返回的及川旅团伊藤大队乘105辆汽车21日到达南宁西60公里的西长墟时，被桂军31军韦云淞部包围，经22、23两日激战，仍无法与前来接应的敌11联队第2大队会合，陷入死守阵地的苦战中。24日晨，我31军开始压缩包围圈，逼近敌人，敌军拼死抵抗，至下午3时，因日军从停泊在南海的航空母舰上派出7架飞机袭击我军陆地，伊藤大队才从重围中突出。同日8时，及川支队也从龙州出发返回。

20日亲率两个大队从南宁出发增援昆仑关的中村旅团长行至五塘即遭傅仲芳99军92师梁汉明部的阻击，经过不断战斗后，22日拂晓进抵七塘，原计划以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指挥1个大队实行中央突破，中村亲率1个大队强行突破进入西北山中以突过七塘北面的隘路，由于遭到梁师的顽强抵抗未能得逞。23日，台湾旅团林义秀联队援兵赶到，中村继续鼓足勇气指挥日军向七塘西北攻击前进，11时在七塘西北约2公里处被邱清泉新22师部队击中左颊。

我第5军荣誉第1师、第200师21、22日连续猛攻两天，昆仑关仍未攻克，23日，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以重点指向罗塘高地附近，继续对当面之敌攻击。荣誉第1师准备对罗塘据点之攻击，同时第200师由正面佯攻，以牵制敌人”①。

罗塘为昆仑关西侧高地，是昆仑关西南的天然屏障，也是日军的一个主要支撑点。24日，荣誉第1师以第2团和迫击炮营担任主攻，由老毛岭北方高地向罗塘高地两侧攻击，以排为单位，梯次配备，前仆后继，用大刀等简陋的器械连破敌军两道铁丝网防线，冲入敌阵。三木吉之助的21联队从昆仑关和九塘阵地逐步收缩，经被包围后的几天战斗，其粮食、弹药都很缺乏，因携带迫击炮弹均已打完，因而迫击炮中队将炮埋入土中，将竹竿削尖与我军拼死格斗。第一线官兵已将附近田间残留的食物吃光，只能捡拾地里的落穗充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三木联队长下令烧毁军旗，以防被我军缴获，一面向中村旅团求援：“黄昏前旅团如不能来到，第一线难以确保。”② 但是，日援军根本无法到达罗塘高地。身陷绝境的日军作困兽斗。在中国将士的冲杀面前，日军渐渐不支，当晚，中国军队克服罗塘高地。守备该高地的日军第5中队全部被中国军队消灭。我荣誉第1师第2团突击营也仅剩下数十人。

---

①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

罗塘战斗激烈进行时，中村正雄率部前往驰援，在九塘东北地区又被我荣誉第1师第3团部队击中腹部而负重伤。此时在九塘与昆仑关被围之敌，已有3个步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统一交由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大佐指挥。傍晚时分，我第5军再次向守敌猛然炮击，21旅团的军医正在一处民房为中村正雄进行腹部大手术，一颗炮弹炸中中村手术室的房顶，屋内处处是硝烟与尘土，敌军医用身体护住切开的腹部，手术至20时30分才做完。第2天早上5时18分，中村即死于九塘。

受命正面佯攻的第5军第200师于24日沿公路两侧，重点向界首附近高地之敌攻击。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东侧，峭壁悬崖高耸，与罗塘高地南端成犄角之势，可东西俯瞰昆仑关。25日下午，中国3架轻型轰炸机、1架驱逐机，飞抵昆仑关上空，日军误认为是己方战机，遂铺置信号板示意。中国驱逐机乘势俯冲扫射，轰炸机投弹18枚，全部命中目标，日军受到严重杀伤。第200师迅速发动强攻，于傍晚攻克界首南端高地，但不久又被日军夺回。29日，第200师继续进攻界首，师长戴安澜亲自督郑庭笈团及刘少锋团奋勇强攻，经过重炮轰击，白刃肉搏，终于重新攻克了界首附近敌军据点，并顶住了日军的猖狂反扑。入夜，第5军命令新22师超越第200师阵地，担任正面主攻突击任务。其右翼为荣誉第1师，左翼为叶肇66军第159师官祎部，协同作战，围攻昆仑关。

30日，新22师先后攻占了南北同兴、界首村落及其东南各高地，为完全收复昆仑关创造了条件，但中国军队进攻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敌据守昆仑关最高要地，除构筑了坚固壕沟外，还加设了游动铁丝网，使我军围攻敌军阵地时因受敌军火力压制，伤亡极大。每次冲锋正面不宽，少则一营，多则一团，连续十几次进攻，死伤均达1/2或1/3。在此情况下，桂林行营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临炮兵阵地指挥，“当时因敌利用反斜面阵地，及副防御，我军冲锋十次以上未能奏功。我于巡视地形后，见敌阵地左侧有高山，可作为炮兵侧射敌阵地之用，遂令炮兵指挥官邵百昌，将葡式山炮一连，俄式战防炮数门，于拆卸后搬上敌阵地左侧之老毛岭、枯桃岭、标高415等高地，实行侧射敌之反斜面阵地，并压制敌机枪、山炮，毁其铁丝网，支援我冲锋部队，结果一举成功。”① 31日拂晓，新22师在友军协同支援下，攻入昆仑关，并完全收复了昆仑关东西两侧高地，日军向九塘溃退。

1940年1月1日，日军增援昆仑关的部队到达九塘，与昆仑关溃败之兵会合，构筑工事，企图既守南宁外围，又伺机再取昆仑关。第5军决定乘

①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28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胜追击，于2日拂晓向九塘攻击，并“令新编第22师攻击九塘，荣誉第1师在1日黄昏占领411高地，第200师为总预备队”①。

441高地是控制着九塘至昆仑关公路的战略要点，也是敌昆仑关外围最后一处有力支撑点，受命担负攻击任务的荣誉第1师郑洞国师长派出第1、2团夺取441高地。第1团吴啸业部官兵在炮火支援下，不顾重大伤亡，经几小时剧烈战斗，奋勇杀上主峰，将残敌驱逐至高地南侧，敌获得援兵后向我方阵地凶猛反扑，双方在主峰两侧肉搏厮杀，敌方在飞机掩护下，调整部署，由东、西、南三面围攻我主峰阵地，我1团官兵头顶敌机的狂轰滥炸，英勇抗击近千名日军的持续进攻，最后终因伤亡殆尽，被迫退至高地北侧一角固守待援。郑洞国师长又派出汪波率第2团余部向高地增援反攻，苦战终宵，敌我伤亡均极惨重，但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双方混战至3日晚，日方竟以施放毒气助战。还在上年12月10日会战发起之前，蒋介石在致白崇禧的电报中即指出“步兵扑城冲锋队，其在最先头者，务须戴防毒面具”。但我军防毒械具装备不足，激战之中也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仍不顾一切与敌鏖战，在敌方陆空协同进攻之下，汪团官兵伤亡更巨，阵地危在旦夕，此刻，郑师长已将预备队全部用尽，考虑到该高地得失关系到整个战役成败，于是一面令汪波督队死守，一面令他火速将团部特务连和传令兵、伙夫等勤杂人员及部分主动请战的轻伤员编成一队，绕至敌侧背猛击，终于将441高地完全克服，使昆仑关获得了外围屏障。昆仑关战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图6－4 中国军队克复昆仑关

①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 日上午，新 22 师攻克九塘，从 5 日开始，第 5 军又以 200 师为右翼队，新 22 师为左翼队，追击日军，进攻八塘。但日军负隅顽抗，中国军队未能有所进展，双方对峙在九塘至八塘之间。11 日傍晚，第 5 军受命将防务交由姚纯第 101 军（原 36 军）接替，集结思陇附近整理待命。

我军反攻昆仑关阶段历时近 20 天，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昆仑关一战，日军第 5 师团第 12 旅团长中村正雄，第 42 联队长坂田原一和第 21 联队长三木吉之助，第 1、第 2、第 3 大队的长官均被我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亡达 85% 以上，士兵死亡 4 000 余人，被我俘虏达 100 余人。这一战，我方俘获的战利品有战马 79 匹，山炮 10 门，野炮 12 门，战防炮 10 门，轻机枪 102 挺，重机枪 80 挺，步枪 2 000 余支。还有子弹、手榴弹和各种炮弹等其他装备物资。此役我方出动飞机 115 架，击落日机 11 架，炸毁日机 15 架，我方伤亡 1.4 万人，我方空军也“遭受相当之损失”。



图 6－5　被击毙之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之墓

整个桂南方面的反攻作战，截至 1940 年 1 月 16 日，我方伤亡 2.3 万余人，敌方伤亡 8 100 余人。①

昆仑关战役我方虽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毕竟是继武汉会战后我国军队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而且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的首次攻坚胜利，证明

---

①　白崇禧向何应钦报告南宁战役概要电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891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抗战虽已进行了两年多，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我国正规军仍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抗战仍持积极进取的态度，打破了日军企图以战争逼迫我国屈服的妄想。这次战役遭受重创的第5师团也算是日军最精锐的劲旅，师团长以前是日本陆军名将、已调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该师团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战役，这次开辟华南战场前又经过了两个月的山地作战训练，是经整训后重新走上战场的生力军，在华南受到国民党军队如此勇猛顽强的抵抗和反攻确实予敌以巨大震撼。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临死前在其战地日记中写道：

> 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捷报传出，民心振奋，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

> 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5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①



图6-6　第5军昆仑关战役阵亡烈士之墓

关于这一点，白崇禧在总结桂南会战的经验时也将之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他说：“收复南宁，固为四战区官兵奋勇牺牲之战果，而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民众于邕钦、邕

① 《杜聿明将军》，3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武两路，不断阻截交通，使敌后方不能补给……”“广西民众不与敌合作（敌占领地百姓几乎迁徙一空）……”“现地无法购买，故敌对南宁能战不能守，能守而不能久。其势非退却不可。”“此次会战中，空室清野，破路工作能彻底而迅速，民众确实与军队合作，对抗战发生相当大之效果。”而在对我军的支援方面，“昆仑关战斗时，由各处调来几支军队，粮食之补给，后方兵站一时供应不上，乃临时由桂林行营下令上林、宾阳、贵县、永淳等县，以手车、民夫于两天内运送 1 000 担以上的米粮接济，方渡过难关，足证民力之伟大。”①

这说明，一些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也看到了发动民众抗战的意义，承认民众在配合军队抗战中的巨大作用，认识到不能片面依靠军队抗战。遗憾的是，他们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这一问题，始终自觉地发动民众、依靠民众。

第四节　日军的反扑及中国收复南宁的作战

中国军队在昆仑关的胜利，震撼了东京日军大本营和广州安藤利吉第 21 军司令部，安藤利吉主张第 5 师团部队应从昆仑关后撤 30 至 40 公里，与南宁的部队做相对集中的防御，这一主张得到大本营及中国派遣军的认可。

12 月 29 日 10 时，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荒尾兴功中佐、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及两名参谋——21 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与作战主任藤原武中佐一行飞抵南宁，了解战况与研究对策。佐藤贤了传达了安藤利吉关于第 5 师团后撤 30 至 40 公里，进行集中防御；以及因船只运输部队需时较长，约一个月后才可组织反攻的意见。使日军领导机关参谋人员颇感惊异的是，虽然情况紧急，但第 5 师团长今村均仍主张部队就地坚持不能后撤。理由是后撤意味着失败，这点对第 5 师团的震动会很大，此其一；其二，日军后撤组织防御，中国军队也将随之集中兵力组织多层包围，且数量会远比日军为多，这样反而更为不利。

根据今村均的意见，佐藤、铃木、荒尾一行随即飞返广州，当日 18 时，21 军即向第 5 师团发出如下的电令：

---

①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286 ~ 287 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1. 21 军决定向南宁增调部队，歼灭集结在南宁地区的敌军。

2. 第 5 师团依然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以利于新到达部队的作战。

21 军在上述电报中所提的“增调部队”，是指当时尚在广州以北的翁城、英德地区，与余汉谋第 12 集团军作战的第 18 师团、近卫混成旅团。中国派遣军为使广州地区在 18 师团、近卫旅团调到南宁后，能保持相应的防御兵力，决定将在九江准备回国复员的 106 师团，调到广州。

敌 21 军的“翁英作战”，目的是策应南宁地区之进攻，扩大在广州以北的占领区，使用了第 18 师团、104 师团、近卫混成旅团分三路于 12 月 24 日开始，西路由滨本喜三朗中将的 104 师团，从源潭沿铁路向滙江口（今名江口）、连江口，于 30 日 16 时 30 分占领了英德；东路由久纳诚一中将指挥的第 18 师团，从增城经永汉、铁岗、吕田、车埔、梅坑、回龙、青塘，于 29 日 18 时占领了翁城；中路由樱田武少将指挥的近卫混成旅团，于从化的温泉，分两路先包围良口圩，然后攻向沙田圩，到翁城以南的太平圩停止。这一作战，日军原计划，占领国民党军第 4 战区所在地韶关，中间因南宁形势吃紧，而只到达英德、翁城而结束。作战一星期，日军被击毙 239 人，击伤 1 281 人。随后这三路日军于 1940 年 1 月 1 日开始撤回到原出发地，准备开往南宁。

近卫混成旅团从源潭乘火车至黄埔，于 1 月 7 日至 9 日出港去钦州，18 师团步行至黄埔，于 1 月 11 日至 13 日也登船出海。

为了在南宁作战，日军以 12 个汽车中队，昼夜来往于南宁、钦州之间运输物资。为了应付国民党第 31 军、第 46 军一部对公路的破坏和袭击，敌第 5 师团组织了机动护路部队，并以空中侦察机、战斗机进行配合来往巡逻。1 月 27 日将预定数量的物资，运积于南宁。

1 月 22 日，近卫混成旅团，抵达南宁东北的七塘；第 18 师团在南宁以南地区集结。从关东军调来的战斗飞行第 64 战队的第 1 中队，和轻轰炸第 31 战队的第 1 中队，也于 1 月中旬到达南宁机场。

在敌 21 军向南宁增调部队期间，其第 5 师团对八塘地区的防守进行了调整，在该地区统一由第 9 旅团长及川源七指挥，将在九塘、昆仑关作战时间较长的 21 旅团第 21 联队、第 42 联队换回南宁，该地由第 9 旅团的第 11 联队、第 41 联队，台湾步兵第 1、第 2 联队防守，在工事构筑、弹药、粮食和土工器具的储存等方面，做 1 个月防守的准备。为扩大其防守周界，第 9 旅团还作了几次出击。及川源七到达八塘后，台湾第 2 步兵联队，向他送去一份该联队第 2 中队长安达守家大尉，在作战时缴获到的一份比例尺为五

万分之一地图，这比日军在战场上使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要准确得多，及川和看了这些地图以后的日军人员认为，前一段作战上出现的问题，不少是与地图不准有关。他们根据这份准确的地图，部署了炮兵，给支援的航空兵指示了地面目标，对旅团现用的地图进行了校正。

12月1日，日军任命根本博少将为21军参谋长。21军原参谋长土桥勇逸少将因懂法语，且任过驻法武官，此时已被调任参谋本部的第2部长，并同法国驻越南总督卡德尔将军进行谈判，要求其停止我国使用越南港口与铁路。

之后，根本博于1940年1月16日，随其司令部，由广州转移至南宁，在现地与作战主任藤原武中佐，制定出解南宁之围的反包围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1. 集中打击位于南宁东北至宾阳地区之中国第38集团军主力。

2. 各部队任务与攻击路线：

第18师团，在邕江以南从邕宁向东经刘圩、南阳、峦城，然后左转由卢村、甘棠从宾阳东南和以东的古辣、大岭、六龙、同礼，迂回包围至宾阳以北之邹圩、白圩、澄泰地区，切断第38集团军南方、东方、北方之对外联系。

近卫混成旅团在邕江以北，与在江南之第18师团平行，双重迂回包围在宾阳以南地区之第38集团军，并攻占宾阳。

第5师团、台湾旅团由四塘、八塘出发，从昆仑关以西、以北地区向右迂回，与近卫混成旅团在宾阳会合，构成合围圈，歼灭包围圈内之中国军队和进攻宾阳。

3. 预定开始进攻时间为1月28日。

我军夺取昆仑关之后，蒋介石向桂南前线指挥机关提出了如下战略方针：继续消耗敌人兵力，确保西南新国际交通线，不断袭扰敌人，截断邕钦路，将主力置后方整顿，迅速恢复战力，相机光复南宁。

根据上述指示，白崇禧对桂南前线部队重新做了部署：将昆仑关正面杜聿明第5军调回都安、柳州间补充修整，掩护黔桂铁路，以李延年第2军郑作民第9师接替昆仑关正面。傅仲芳第99军的92、99两师由邕宾路以东调往公路以西在五塘、六塘以北，七塘、八塘以西占领阵地；姚纯第101军两个师及配属的118师部署在九塘正面和七塘、八塘以东占领阵地；甘丽初第6军为第38集团军的预备队，控制在思陇地区；夏威部防守高峰隘，主力移绥渌、果德间整顿并掩护新开辟的国际交通线；韦云淞部两个师部署

在邕江东岸、邕钦路以西地区，与蔡廷锴指挥的邕钦路北的两个师配合，截断南宁日军通海的交通线；邓龙光、叶肇两个军任昆仑关以东至郁江北岸的作战任务，主力控制在永淳附近。

1月25、26日，白崇禧在迁江召集军政联席会议，27日，李济深、陈诚、张治中由桂林到迁江。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授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桂南作战，陈诚“不居名义，在此协助张长官指挥作战”①。

日军方面，安藤利吉于1月23日，再次到达南宁，24日10时，下达了进攻宾阳地区之作战命令。

1940年1月28日上午8时，今村均指挥盐田、樱田、冈本3个旅团从四塘、五塘对防守邕宾公路以北高地的傅仲芳军发起进攻。同时，久纳诚一指挥第18师团于邕江河曲永淳间偷渡。据守八塘前沿阵地的及川旅团，也于29日上午配合今村均向北进攻，对傅仲芳军进行夹击。樱田旅团于击败六塘北面高地傅仲芳军以后，30日集结于七塘，脱离今村均的指挥向东南挺进。28日，叶肇因保存实力，未率领自己的第66军在永淳附近截击渡河敌人，遂使久纳师团渡过郁江。至30日，徐庭瑶得到久纳师团渡江消息后，即抽调甘丽初军和粤军约5个师的兵力从武陵、大桥南下，拟在甘棠以北高地建立一道防线，阻止久纳师团北上。

敌发起攻击后，因整个战场有雾影响了能见度，从28日到1月31日上午均未好转，敌炮兵之观测、射击都直接受到影响。中午天气好转，其陆空军石川爱大佐的第21军独立飞行队，开始至战场活动，所属独立飞行侦察第82中队的飞行员发现了从宾阳南进，向武陵镇、古辣迎战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之中国方面甘丽初军等部。安藤利吉根据此一情报，于当晚电令所属各部：“本作战之成败在于明日（1日）之决战，官兵须人人奋战，以期必胜。”②

2月1日，敌各部队按计划继续进行迂回，并缩小包围圈，其陆空军的独立飞行队，及其海空军的飞机约100架，对中国军队布防地区狂轰滥炸，并炸毁后方桥梁。当日9时15分从南宁起飞的日军第90战队第1中队的7架轻轰炸机，对宾阳附近的军事目标集中轮番轰炸，炸中了徐庭瑶第38集团军总司令部，破坏了通信系统，使集团军总司令部与防守在昆仑关地区

① 《桂南会战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5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的99军、李延年第2军从宾阳向东南武陵出击的第49、76师，以及第66军之159师、160师和118师、战车第7连等失去联系，形成各部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

第38集团军的部队，这次作战准备不足，不少是临时调动仓促应战，到达战场的部队有先有后，在尚未取得相互联系和未构筑好守备阵地之前，即投入战斗，以致在2月1日最后遭敌各个击破，整个战场相当混乱。在撤退时由于部队拥挤，桥梁多数被敌机炸断，使战车、汽车、重装备无法通过而损失。

2月4日国民党军主力第36军、第99军，以及第2军第9师、第66军第159师，已撤至敌包围圈外之宾阳西北的上林地区；第9师师长郑作民在撤退时因遭敌炮击而牺牲，49师、76师则撤至宾阳以东之大桥和梨塘一带，原在七塘、八塘作战的第66军与160师及118师已撤至横县以北之青桐、校椅地区。敌樱田武所率的近卫混成旅团，于2月2日18时零5分，攻占了宾阳城，久纳诚一的第18师团于3日14时30分占领了宾阳东北的邹圩，控制了清水河上的公路桥梁，与刚到该地设防的新编第33师隔河对峙。

在昆仑关正面的国民党军，开始一直抵抗着第5师团的进攻，因后方的宾阳于2月2日被敌占领，3日乃开始撤退，至此宾阳作战即告结束。

2月4日，安藤利吉到达宾阳，对该作战结束之后，在南宁地区之防御向各部长官做了部署，接着8日各进攻之敌撤回南宁。第18师团则迅速返回广州，以应付余汉谋第12集团军在广州附近发动的进攻。

第5师团放弃了七塘、八塘地区之后，其在南宁之布防态势为：第5师团在南宁周围约10公里的范围之内；近卫混成旅团位于邕江以南地区；台湾旅团仍在钦、宁公路之沿线，上述之布防，各部日军于2月13日到达了指定位置。

敌进攻宾阳之役历时约1个星期，据敌21军统计，1月27日至2月6日10天双方的伤亡如下：

日军死295人，伤1 307人，共为1 602人。

中方牺牲27 041人，被俘1 167人（受伤人数敌方无统计）。

这次作战，桂林行营在敌情掌握上不准，以致临时调动大部队迎战敌人，使抵抗阵地的编成和工事构筑极其仓促，因而未能堵击住敌人或给以有力杀伤、消耗；对特种兵作战的保障不良，作战中损失了战车24辆、汽车30辆，除战斗损坏之外，大部分是由于桥梁被轰炸，未能及时以制式器材架通。

宾阳作战结束，敌我双方即较长时间处于对峙胶着状态，昆仑关会战

即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从1940年2月22日开始，在柳州以4天时间，召集了100多名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以检讨桂南作战和进行冬季攻势的总结。会上蒋介石一面听取各将领关于作战的汇报，一面看了从昆仑关缴获的日“步兵须知”的内容后，曾多次提醒将领们，要学习日本军人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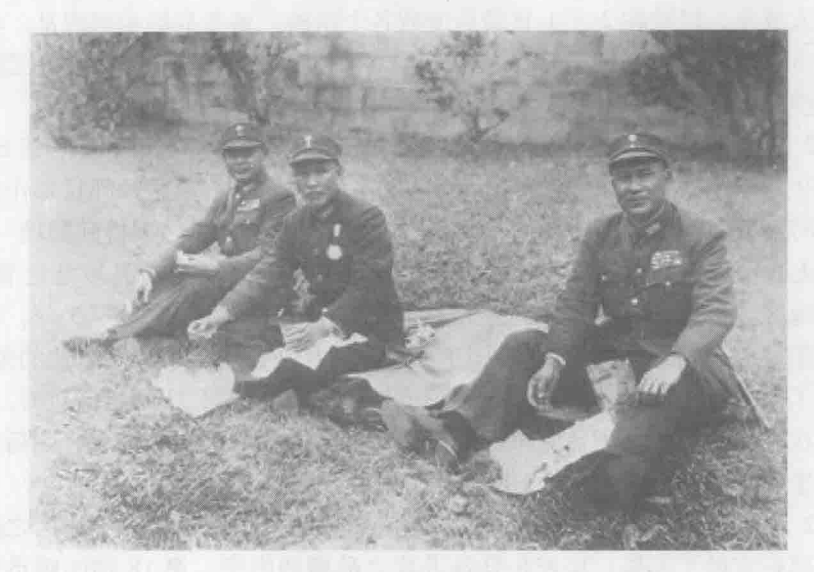


图6－7 战役总结阶段的蒋介石、白崇禧等

在汇报中，夏威的邕江南岸方面军各部，因敌军主力集中在邕江北岸，南岸情况并不严重，且在12月初，还攻克过钦州以北的小董，这次宾阳作战中，何宣46军所属的冯璜175师支援邕江北岸作战，打得比较主动、积极，所以在汇报时还算轻松。但整个会场气氛紧张，特别是在邕江北岸作战的将领们，因遭到敌人的迂回包围，部队与装备的损失较大，仗也打败了，只有检讨。其间陈诚曾指责白崇禧，在宾阳及其以南的古辣、甘棠一带，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以致未能打破敌第18师团、近卫第1旅团的迂回包围，而使昆仑关正面守军陷于危境。但白崇禧不承认其在钦州至南宁、南宁至昆仑关的部署以及1月28日派李延年指挥两个师由宾阳至甘棠、派陈骥的66军两个师由八塘向东至那向、派何宣的46军一个师，由横县以西至甘棠地区，打破敌人包围的部署有什么错误，且说明以上的反包围作战计划，已得到军委会蒋委员长的批准。但白崇禧承认他在督促部队、贯彻执行的方面有不力之处。

2月24日，蒋介石做总结发言，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抗战

已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及日本国内的困境，应认识到是由守势转入攻势的阶段，勉励各将领适应这一战略上的变化，认真研究，奋勇作战，夺取抗战的胜利。

蒋介石指出："去年在南岳会议上说过，战略战术要主动。湘北会战以前，战斗方式完全不同，以前取守势，现在取攻势，如仍照湘北会战以前方式做去，则完全错误。所以自上至下，不想固守，只想退却。

"我们自去年11月冬季攻势发动后取攻势，正我们转败为胜之时，不特取攻势已也。以前顾虑兵力，节省兵力，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现在则不能再消极，因敌人已到粤汉、平汉以西地区，乃我们转守为攻时期。唯有积极牺牲，始有成功希望，以后须以全力取攻势。但此非团长以下责任，此高级将领之责。如再不转变心理，绝不能成功，故现在应研究攻击战术。

"再说敌人力量、质量远不如前，敌人最多能动员250万人，截至现在，已消耗120万人以上；从前任何战区敌人均能集结兵力以攻我，现在则绝无集结多数兵力以攻我之事。观此次南宁会战，敌之兵力皆凑集而来，可知一切，尤以敌国内不安定，到处闹米荒，工厂停顿，敌人外强中干之现象，已暴露无遗。"①

应当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对局势的发展有其自己的看法，对抗战将取得最后胜利也是有所认识的。日本方面对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与中国正规军愈益顽强的抵抗也感到十分头疼，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念出发，甚至认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冈村宁次"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1939年11月14日）。对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蒋介石发动的冬季攻势，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不小"，"在中国事变8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②

蒋介石在总结中指出，日军由于兵力不大，只能利用其"快、硬、锐、

---

① 《蒋介石关于桂南会战的总结》，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908～9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519～52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密”对付我，即：

“快”，快速部队出我不意，攻我不备；

“硬”，硬守，硬攻；

“锐”，锐不可摧，勇往直前；

“密”，严守秘密。

敌之弱点，则在于：

“小”，只能作小兵力之侵扰；

“短”，只能为短时间之战斗；

“浅”，只能作浅距离之进攻，空间上不能深入；

“虚”，无预备兵力，敌后空虚。

针对日方的弱点，蒋提出了克敌制胜的战术与对策：

大制其小：以多数兵力胜之；

长制其短：彼利速战，我以持久胜之；

深制其浅：彼不敢深入，我以纵深配备胜之；

猛制其虚：以猛力突进，打破敌人空虚之后方。

蒋介石对我方将领的弱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 疏忽：不肯研究。

2. 骄傲：对民众、对敌人、对上官、对部下，目空一切。

3. 欺诈：不特欺骗部下与长官，且欺骗自己。各人均在40岁以上，正是做人立业基础。须有为人信仰。不问人之信不信，先问我自己欺骗与否。

4. 犹豫：因犹豫而疑虑，因疑虑遂无决心，甚至疑友军。此次作战如有一个团长有决心，即无此失败，打仗只须向枪炮声方向前进。

此外，针对将领中存在的推诿塞责、动辄辞职的现象，蒋介石指出：军人不能辞职，只有撤职，尤其抗战时，应避免此辞职习惯。要有不怕危险，打破困难的勇气。

2月25日，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对桂南作战负有责任和应受奖励的名单：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部队不力，予以降级；

政治部长陈诚指导无方予以降级；

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违令避战，贻误全局，予以扣押交军

法处审判；

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处置无方、决心不坚，未能挽回战局，撤职查办；

第36军军长姚纯放弃重要阵地，不负责任，撤职查办；

第66军军长陈骥放弃职责、作战不力，撤职查办；

第36军参谋长郭肃意图卸责，罔识大体，撤职查办；

第99军军长傅仲芳撤职查办；

第49师师长李精一作战不力，军纪废弛，撤职查办；

第160师师长宋士台作战不力，撤职查办；

第5军军长杜聿明、副军长兼荣1师师长郑洞国、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22师师长邱清泉记大功；

第36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记功一次；

第46军军长何宣记功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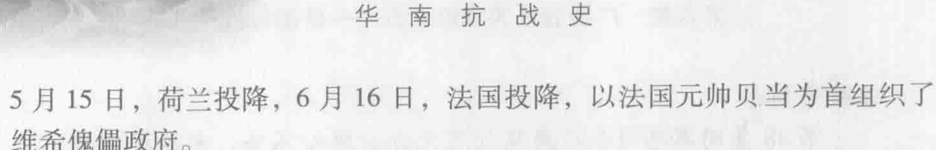
第76师师长王凌云记功一次。

桂南作战，是“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受到处分最多的一次。由于蒋介石认为桂林行营在作战指导上不力，随之在1940年4月将其撤销。不过被撤职查办的人，有些不久又任原职，如傅仲芳仍任第99军军长。

日军为了使两广成为向我国内地进攻的策应方向和进窥东南亚的基地，其大本营于1940年2月1日，决定成立华南方面军，辖22军，直辖第18、38、104、106师团和独立飞行队，华南方面军司令军由安藤利吉担任。第22军驻南宁，由原第18师团长久纳诚一中将任军司令官，辖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近卫混成旅团。

第5师团占领南宁之后，即整修机场，其海军首先于1939年12月30日，以海空军高雄航空队的12架轰炸机由此起飞，轰炸云南蒙自附近的滇越铁路大桥。1940年1月1日、2月18日海空军第3联合航空队，1月9日，海空军的高雄航空队，相继对我国境内的滇越路和桥梁进行轰炸。2月1日，海空第15航空队27架轰炸机，轰炸滇越铁路正在修复中的铁桥时，炸中了运行的列车，炸死了不少中国人、越南人，其中有5名法国人。这条铁路原为法国所有，当时英、美运进我国的生活物资、生产设备、军用器材大都经该路直接运输。日军轰炸后，法国以日本侵犯其权益和炸死5名公民为由，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2月20日，日本政府答应，对2月1日被炸死的法国人支付赔偿。

1940年5月，德军绕过法国马奇诺防线攻入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



5 月 15 日，荷兰投降，6 月 16 日，法国投降，以法国元帅贝当为首组织了维希傀儡政府。

当荷兰已被德军占领，英、法处于危难的时刻，日本即考虑趁火打劫，攫取东南亚和要挟法国在越南的海防、鸿基，英国在缅甸的仰光，不得向我国运送物资。并对英、法、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做军事进攻的准备和着手封锁进入我国的交通。

6 月 16 日，法国投降；6 月 18 日，日本政府即向法国驻日大使安里提出不得经越南向我国运送武器、弹药、汽车、汽油的通告；19 日，更提出要派出一部分军事人员，组成监视团，至越南的北部港口和通向我国各边境地区的公路、铁路终点，实地视察、检查有无物资运入我国。

此时的法国已自顾不暇，只得于 6 月 20 日同意日本的军事监视团进驻河内。日监视团 7 月 2 日到达河内，随之全部查封了我国在海防港尚未运出之物资，云南与越南的交界处老街铁路桥被拆去一段铁轨而中断，广西省的镇南关至同登、北仑河口东兴至芒街等处通向越南的公路，全部被挖毁。

日本方面得寸进尺，接着又向法方提出要驻兵越南，目的在于将越南作为进攻我云南、贵州、四川和东南亚的基地，进而达到从空中和地面切断由缅甸进入我国的国际通道。

经多次交涉，9 月 4 日法方同意日军进驻 5 000 人的地面部队，并使用其靠近我国的老街、富寿、永安 3 处机场。

但谈判进行之中，日军中村明人的第 5 师团（今村均已升任驻广州的 23 军司令官）一部即于 9 月 6 日从镇南关越过国境线，与法军发生冲突，驻越法军提出抗议。经再次交涉，法方于 9 月 22 日同意日军进入越南，但双方还未将进入时间通知到前线部队时，中村明人的第 5 师团即由镇南关的两翼，迂回攻向同登，经战斗于 23 日零时进入越南。25 日攻占谅山。

敌第 5 师团由南宁攻占越南之后，从越南向我国进口作战物资的通路已被切断，因而日军大本营令久纳诚一的第 22 军放弃南宁。该军于 1940 年 10 月 28 日从南宁撤退，11 月 18 日撤离钦州湾。

中国军队自宾阳战役失利之后，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自 1940 年 3 月起，即进入收复南宁作战阶段。中央军嫡系基本已调离桂南战场，主要由桂系夏威第 16 集团军 2 个军与粤系邓龙光第 64 军在这一地区与敌周旋。

3 月，第 64 军和第 16 集团军对桂南日军发动春季攻势，在灵山与日军激战，几经失而复得，最终将日军击退，迫其撤至钦县、南宁附近。从 3 月至 9 月，中国军队对桂南日军作战百余次，敌我双方均有损失，战线无大的变化。

9月23日，中方获悉日军攻入同登，与驻越法军激战的情报，遂派部尾随敌军之后，向桂越边境龙州及吴圩一线敌军反攻，并准备相机略取南宁。23日晚，中国军队会攻防城，24日克复，10月28日收复龙州。并侦悉敌军确有准备放弃南宁迹象，第4战区遂命夏威、邓龙光等部尽快尾追截击敌人，并防止敌撤退之前对城市的破坏。

10月28日晚，日军开始纵火焚烧南宁城及附近村庄，我夏威、邓龙光两集团军加紧对敌后卫警戒部队的激战，邓龙光集团各部于29日中午收复高峰隘、四塘及剪刀圩等处，向二塘、心圩一线挺进，30日拂晓，分由邕宾、邕武两路同时进入南宁城。由于中国军队近一周时间的袭扰、激战，敌撤出南宁时虽着手进行破坏，但毕竟十分仓促，中国军队入城时“邕北方面外围各据点工事、电话线及邕城电灯、自来水、机器均未坏，电灯厂燃料亦不及携走，邕城水电照常供给，秩序渐复”①。

我军攻克南宁后，以邓龙光64军的王德全156师守南宁，66军官祎第159师集结邕城西北郊待命，邕钦一线部队继续向钦县追击，直至敌军完全乘舰撤出钦州。

经过整整一年的战斗，中国军队终于将日军赶出了桂南，桂南重新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

关于桂南会战的评价，称赞者固然不少。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从较宽广的视角观察，中国投入如此大的兵力，伤亡如此之惨重（死伤有10万余），来争夺事实证明并无多大战略价值的南宁地区，而不能够做到以逸待劳、尽量减少牺牲、避敌锋芒，“是一次应避战而不避战的粗糙之作，也是中国抗日战役中再一次背离了持久战大原则的小败笔”。而就整个对日抗战言，中国的长期抗战，为其他国家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既贫而又弱的落后国家，却过早地肩负起对日本的孤军抗战，以至于造成了过多的中国人悲惨牺牲与伤亡。”“明显的是苏俄在此一时期的对日政策上，就是采取了避战的策略，用中国在远东为其进行对日的替代战争，以中国二千万人之牺牲，替苏俄战后在远东谋得大量利益。对美、英而言，中国的八年抗战，也可说是其对日战争的替代者。”②

---

① 《张发奎致蒋介石何应钦等密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92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② 胡春惠：《对中日桂南会战的回顾与反思》，见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



第七章　中国抗战与台湾、香港、澳门收复问题

第一节　抗战后期中国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斗争

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临近，对德日等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处置和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美、英、苏等几个大国多次就这类问题进行磋商，谋求相互间的利益协调。中国虽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常常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几大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有关中国台湾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一些提议和做法无视和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其中美国某些人在1942年前后提出的“台湾国际共管”的论调就颇具代表性。这种论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一、“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提出

1942年8月，由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编辑部共同组织的所谓“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委员会”印发了一本题为《太平洋关系》的小册子，全文共7章32页。其中第4章声称，应建立一条从夏威夷向西，经过中途岛、威克岛、关岛、南太平洋各岛屿，至台湾、琉球与小笠原群岛等各战略要点的横越太平洋的防御地带，由国际共管。并公然声称：台湾岛上之日本财产，应由国际行政当局接收……为尊重中国之优越利益起见，台湾可划入中国海关及货币系统，唯不宜划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居民亦不得要求独立，或举行公民投票及要求归还中国。赤裸裸地提出了“台湾国际共管论”①。

在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这三家杂志编辑部于此时抛出这种论调，显然

① 《太平洋关系》一文，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4—13日连载。

有其特定的背景，它反映了美国官方，尤其是军方一部分人不愿将台湾归还中国，而欲将之纳入其整个战略防御体系，以便在击败日本之后保持其在太平洋上的绝对战略优势的企图。

美国军方很早就有人欲控制台湾。早在1853—1854年，美国海军将领帕里就"想合并台湾……他幻想台湾为美国确保西太平洋的和平及秩序的前锋基地"，帕里建议："我们必须……对一切足以改变中国、日本及更南的国家，特别是台湾的政治及内务的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予以鼓励。美国应该单独采取这个主动……台湾在海军及陆战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虑的。另外一点，该岛直接地面对中国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泊驻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些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① 这就是说，控制了台湾就能控制中国沿海，控制了中国沿海就能控制中国及西太平洋。因此，台湾历史学家王晓波称帕里的这份建议为一份美国式的"田中奏折"，是颇有见地的。只是由于后来日本捷足先登，美国某些人的如意算盘才未再拨动，华盛顿远东军事情报档案中的"台湾档案"也才被束之高阁。

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一些人的心思又活动起来。五角大楼"远东战略小组"的情报官员、号称"台湾专家"的乔治·科尔在1942年初即准备了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备忘录，其中声称，"我主张一些国际托管的方式，设立警察基地在南台湾，运用台湾的丰富资源，来做战后重建工作"，"我当时吁请华府当局确立一明确的'台湾政策'。这海岛潜在上太重要了……历史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也指出台湾资源和工业发展远胜中国大陆诸行省，如此重要，难许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②

基于上述观点，美国军方曾着手制定攻占台湾的计划并开始付诸实施。据参加过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粤东工作团的卓杨等人回忆，美方曾通过国民党广东当局要求他们为美军物色台籍向导，以配合攻占台湾。后因美国改变计划，要直接进攻日本本土，不再打算在台湾登陆，工作团遂将应征的台胞资遣返乡。③

---

① 王晓波：《战后台独运动与两岸关系之前景》，载自《台湾研究》，1988年第2期。

② 乔治·科尔：《被出卖的台湾》，载自王晓波：《战后台独运动与两岸关系之前景》，见《台湾研究》，1988年第2期。

③ 卓杨等：《东区服务队与丘琮》，见《广州文史资料》，第28辑，14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除美国舆论界和军方在台湾问题上妄加动议外，英国也有所表演。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11月24日，美国方面由总统顾问霍普金斯根据中美双方磋商的意见，拟就了开罗会议宣言草案，其中规定，“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当然应归还中国”。26日，英国方面拿出一份修改案提交讨论，其中原方案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被修改为含糊其词的“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外次贾德干的解释是：此项修改之拟议，盖因英国会或将质询英政府：为何关于其他被占领地区并未说明归还何国，独于满洲、台湾等，则声明归还中国。上述各地固属中国，但殊不必明言耳。① 英国方面只言放弃，不言归宿，显然意在使这一问题模糊化，设下“地位未定论”的伏笔。

二、中国共产党明确主张中国应收复台湾

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台湾国际共管论”出笼之后，立即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从1942年底至194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以不同方式对这一荒谬主张进行了批驳，中国政府也在有关场合表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中国舆论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反对，使国际社会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在这一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认识到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民不甘再任由列强宰割的坚强意志，它对于其后开罗会议较为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关注台湾问题，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一切失地、积极援助台胞抗日斗争的最早倡导者，也是“台湾国际共管论”最坚决的反对者。

还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斯诺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外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毛泽东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在回答斯诺关于中共如何对待此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时，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表示：“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

① 总统府机要档案：《开罗会议政治问题会商经过》，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4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28～29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①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②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废除中国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收复被日本强占的一切失地，它当然也包括 1895 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行割占的台湾。

“台湾国际共管论”出笼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1943 年 1 月 24—25 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权威喉舌《新华日报》连续刊载该报总编辑章汉夫的《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独立思想的演进》一文，明确指出：

> 第一，这些谬论完全无视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不知道这些地方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寇武装占领和奴役的。如果在战后还要台湾脱离祖国，那完全是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
> 第二，这种主张完全违反了联合国的作战目标，把联合国的正义战争，为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战争，当作分赃战争。这种主张，是对联合国战时合作的挑拨，也是帮助东西轴心国攻心的毒计。
>
> 第三，我们在驳斥美国这些错误的孤立思想时，应该把它与罗斯福和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分开，不要混淆。同时，这种错误思想对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危险及在政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影响，也要予以适当的估计。一方面不能不估计到它在国会中在政府中的可能影响，另一方面却更不能不认清它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它和政府及国会中的多数，尤其是广大人民的意志是违反的。

这最后一点，尤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清醒的头脑和高超、成熟的斗争艺术，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努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的真诚愿望，准确地将美国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少数人与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严格区别开来。

1943 年 3 月 24 日、6 月 17 日，《新华日报》又连续发表《战争与战后

---

① 《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113 页、12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354 页、35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问题》《台湾，回到祖国来!》的社论，从不同角度对“共管论”继续进行驳斥，并严正指出：战后中国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要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国外有少数不明历史发展，不顾实际情况，而抱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们，曾经叫嚣一时，要将台湾从中国的母体割裂出来，高谈国际共管的谬误措置，实不值识者一笑。而且，台湾的前途，有大西洋宪章为最高原则，台湾的命运，决之于中国的抗战，台人的努力和各国人民对民族自决的尊重和遵守。因此我们不必与持谬见者争论不休，而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①

中国共产党对这场斗争的积极参与及正确指导方针的提出，对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国民政府、爱国台胞等积极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

1942 年 11 月 4—13 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将《太平洋关系》一文全文披载。11 月 13 日，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的《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一文，对“共管论”公开进行批评。其后，国民政府一些高层政要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

1943 年 1 月 7 日，重庆《大公报》又发表《中国必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的社论，指出：“把台湾看作单纯的日本的殖民地，忘记它的历史，不明它的现状，以为脱离了日本，台湾就像十字街头的流浪儿，可随便安排给任何一个慈善机构收养，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盟国之中如有人作此想头，必受中国人的强烈反对。”根据历史、国际公法以及大西洋宪章，日本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攫取台湾，台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与东北四省及‘七七’以后的沦陷区性质完全相同。中国为领土完整而抗战，为清算 1895 年以来的中日关系而抗战，我们忍受牺牲，不畏痛苦，自然要收复所有的失土，包括台湾在内。”“就台湾的国防地理论，它是中国东南海疆的屏障，它与海南岛是中国监视海疆的一对眼睛，谁愿意让人拆去屏障？谁愿意让人挖去眼睛？”②

在大陆参加祖国抗战的台胞反应也极其强烈。大陆台胞各抗日团体的联盟性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在 1943 年 1 月 30 日、4 月 17 日、6 月 17 日数次发表宣言，并在《马关条约》签字的国耻日 4 月 17 日举行大会，发

① 《新华日报》，1943 年 6 月 17 日。

② 《大公报》（重庆），1943 年 1 月 7 日。

表《告祖国同胞书》，强烈反对台湾国际共管。知名爱国台胞李友邦、宋斐如、林啸鲲、林海涛、丘念台、李纯青、刘启光等均以不同方式表明了对台湾国际共管的反对和警惕。这些主张和言论通过重庆各大报及他们自己编印的《台湾青年》《新台湾画报》《台湾问题参考资料》等书刊传送到国内外，他们还纷纷致函美国有关机构和传媒，阐明台湾人民要求重返祖国怀抱，绝不接受国际共管的意愿。其主要论点有：

第一，台湾原属中国领土，台湾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无法变更的。“台湾原属中国，台民中93.7%保有中国血统……本会特代表六百万台湾人民……严正声明中外：战后处理台湾问题，除将台湾之领土主权完全归还中国外，任何维持现状或变更现状之办法，均为台湾人民所反对。”①

第二，回归中国是台湾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共同心愿，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台湾人民的这一选择。“民族的生存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赖以生存的政府的权利？我们台湾人坚决主张台湾应重新归还其母国——中华民国……现今国际中有若干人士主张于战后国际共管台湾……我们台湾必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反对这种思想及这种措置”②。

第三，吁请国民政府早定复台大计，明确台湾人的中国国籍，恢复台湾省制，以消除国际上少数人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口实。

在此前后，桂林《大公报》《广西日报》等其他地方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和时评，对“共管论”提出严厉批评。桂林《大公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迩来美国舆论对于战后中国复土问题多有错误的主张，其谓‘台湾应划归国际共管’尤为荒谬绝伦。”③

美国这三家杂志抛出的上述谬论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后，仍顽固坚持其立场，1943年5月，该三杂志发行人、时代公司战后问题研究组主任吉瑟浦致函中国重庆《大公报》，“在这一问题最后决定之前，我们认为应当由太平洋永久和平的观点加以考虑，无论担负太平洋间治安的国际政治力量的形式是什么，我们所拟定的横贯太平洋的防御线，不是保卫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及中国自己海岸最合理的方法呢？台湾不是这条连

---

① 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见《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3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134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③ 《大公报》（桂林），1943年3月30日。

锁的碇泊场吗？如果是的话，不应当将它国际化吗？”其强词夺理的辩解活现出一副以国际警察自居、欲公然垄断世界事务的霸道面孔。

对此，重庆《大公报》于5月15日发表《再论关于台湾问题》，进一步加以批驳，认为：“既公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就应该无条件交还中国，至于在台湾怎样设防，及台湾防务怎样与英美合作，那必须在交还中国以后，再向中国政府谈商。”所以“中国政府不但有保卫它的一切领土的义务，也希望在战后有它保卫台湾的军力，故所谓‘共同设防’一类的措置，应为真正的设防，而不应把变更中国的领土作为设防的前提”。

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之下，中国政府也加紧了通过外交途径争取收复台湾的工作，并多次向美国方面表明这一意愿。由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及美国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罗斯福总统否定了美国军方共管台湾的建议，而选择了支持中国要求的立场。

关于罗斯福总统个人的态度，从中美双方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从1943年初起，他开始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1943年3月6日，蒋介石在接见回国述职的驻英大使顾维钧时对顾说：“宋子文刚给他来电称，罗斯福总统向他表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都应归还中国。”同年5月4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会见顾维钧，“总统说日本和德国都必须彻底解除武装。所有在日本岛四周的岛屿，如琉球群岛等，都必须交出。我马上插言说‘还有台湾’。他说台湾和琉球群岛都应该归还中国”①。据美国国务卿赫尔后来回忆，1943年3月27日，总统在白宫与艾登（英国外交大臣）、斯特朗（英国副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英国大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他们，他赞成将满洲与福摩萨（即台湾——引者）归还中国……后来到10月5日，即赫尔去莫斯科之前，总统重申了这一意见。② 正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坚持，美国方面从1943年下半年起开始以较为明朗的态度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并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帮助对英国和苏联进行说服。

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会前，国民政府有关机构即对将提交会议的有关方案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其中的要点之一就是要求收回日本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会上，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等人据理力争，抵制了英方有损中国利益的修改意见，在美方尤其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使开罗会议完全接受了中国收复台湾的要求。接着，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232页、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②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12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

就这一问题征得斯大林的赞同。12 月 1 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至此，中国收复台湾的正义主张，终于获得了国际承认，抗战后期中国人民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斗争，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纵观抗战后期的这场斗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这样几点启示：

其一，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是团结一致、积极参与的。从党派看，既有领导敌后战场的中国共产党，又有领导正面战场的中国国民党，还有带中间性质的《大公报》；从身份看，既有政府，又有民间；从地域看，既有代表大陆方面的声音，又有代表台胞方面的声音。这种举国一致的立场，准确、有力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使那些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难以找到分化挑唆、从中牟利的缺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回顾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与国际敌对势力较量的历史，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或者是中国利益得到保卫的时候，外人的阴谋不能得逞；而一旦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力量分散、党派严重对立的时候，往往就是敌人乘虚而人、两面要挟、坐收渔人之利的时候，历历往事，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思。

其二，在世界上，国际力量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集团之间，同一集团的不同人物之间，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是不尽一致的，既有敌视中国、无视中国人民正当权益的敌对势力，也有同情中国、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友好力量。在国际交往、国际斗争中，必须很好地加以区别，尽可能地争取一切同情和尊重中国人民的友好力量，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此问题上，《新华日报》的署名文章，国民政府的外交代表都做了很好的努力，有效地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其三，国际上确实有一些人，从其本国的私利出发，从不愿看到中国强大的阴暗心理出发，极力阻挠中国收复台湾，以各种手段对海峡两岸中国的统一设置障碍。抗战后期是这样，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对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同时，对那些虽身为中国人，却忘掉甚至背弃自己的民族立场，挟洋人以自重、借外力以拒统一者，中国人民尤其应当擦亮眼睛，及时识破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并坚决予以揭露和反对。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更好地团结，中国的和平、统一也才更有希望。

第二节　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立场和举措，尽管存在



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收复台湾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是较为积极的，这也是蒋介石去台后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一个重要历史渊源。

一、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立场

国民党人最早提出收复台湾是在什么时候？

蒋介石 1946 年 10 月 25 日在《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训词》中说：“我们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国父在台湾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当时发布宣言，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① 其后，何应钦 1962 年 3 月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讲《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也提到孙中山“曾在兴中会大声疾呼：‘收复台湾！’”②。但这一说法在有关兴中会的史料中还找不到确凿的依据，其他国民党元老也从未谈到，1927 年 2 月 5 日戴季陶在黄埔军校政治部曾以《孙中山与台湾》为题向台湾青年做专题演讲，也未涉及。③ 有台湾学者认为，“1920 年代孙中山也只能说：要台湾‘最低限度的自治’便打住”④。蒋介石的上述说法还有待证实。

据较为可信的现有材料，国民党人较多关注台湾问题并对台湾爱国志士的反日活动表示支持，是在大革命时期，这期间，孙中山先生曾与在广州地区活动的台湾志士接触，关心他们的活动。1924 年李友邦在广州创立“台湾独立革命党”，就曾“受孙中山鼎助”。李友邦在黄埔军校期间，“承蒙总理爱顾有加，要友邦每周日到革命先辈党国元老廖仲恺先生府中，学习国语、探讨革命问题”⑤。1926 年 6 月 16—18 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 3 天发表台籍岭南大学学生张月澄的《台湾痛史，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一文。1927 年 6 月 13、17 日，广州《民国日报》又连续刊载台湾革命团体的抗日言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成立后，于 1927 年 4 月 1 日发

---

①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300 页，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②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1 辑，11 页，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③ 讲稿见《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 2 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229 ~235 页，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

④ 吕芳上：《抗战与台湾光复》，见《近代中国》，1995 年第 108 期。

⑤ 严秀峰：《李友邦》，《抗战时期的台湾义勇队》，见王晓波：《台湾史与台湾人》，86 ~87 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行机关刊物《台湾先锋》，创刊号卷头即为孙中山肖像及遗嘱，有李济深的题字，并收入了戴季陶2月5日的讲演稿。戴季陶在讲演中明确指出，"台湾民族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民族，台湾的领土本来也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以强权和武力，夺了我们的土地，把我们的台湾同胞当作奴隶"，因此，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及所有东方被压迫民族要"打成一片，联合起来，以反抗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者"①。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在大陆台胞的抗日活动也趋于消沉。广州、厦门等地在1932年间虽曾一度有"台湾民主党"的活动，但终因经费无着、当局不敢公开支持等原因而难以为继。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至1933年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对日立场渐趋强硬。2月19日，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雪耻：倭寇之传统政策，在并吞满蒙，为东亚之霸主。吾党传统政策，乃在恢复朝鲜、台湾等失地，以行王道于世界也。"② 3月，蒋介石北上保定部署对日军事，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上做了《抗日必先发扬民族精神》的演讲，其中提到将来不但要收复东北，还要收复台湾和琉球。4月在另一次讲话中再次提到十年后，必可"驱逐日本出境，光复朝鲜，收回台湾"。但"上述两次谈话都在军中所讲，讲词当时并未公布"，听到的高级将领有的也将信将疑，未以为意。③ 1934年4月23日，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的一次演讲中也指出："父母既生我们下来，做了国家的主人，当然是要做一个独立国家的国民！当然要使我们的国家由我们手里复兴起来！不仅是东四省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朝鲜、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④

"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步入全面抗战轨道，收复失地台湾的目标日趋明确、坚定，并逐渐成为军政高层的共识。

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孙中山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为国民党定下了"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目标，"因为高丽（朝鲜）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

①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2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230～233页，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

② 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19日。

③ 《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影印版，4～5页。参见李云汉：《蒋中正先生与台湾》，见《近代中国》，1995年第109期。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第198页，台北，1984。

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要“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①。国民党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要收复台湾，且有文字可考，据笔者所知，这是第一次。

1940年6月4日，康泽致函朱家骅，将其答复“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对台工作问题若干请示的意见上报朱家骅，朱家骅又就此做了一些修改，反映了国民党中央对台湾问题、对开展台湾工作的一些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原函如下：

骝先先生赐鉴：

顷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对于台湾革命问题，函询中央之具体政策，以为今后活动之纲领，曾提几种问题，央为商讨，并予见复，谨将该函所请各点，与拟答之意见（带［］者是）并录于左，敬祈指示。

一、中央对台湾之根本政策如何？

1. 中央希望台湾完全复归祖国？抑由日本脱离后，保持独立形态，受祖国保护？［当然复归祖国。］

2. 台湾受日本统治已久，社会形态与祖国，略有不同，倘实行复国，中央对台湾政制，拟采如何办法？［可成一省或一行政区，依照地方自治原则，组织各级政府。］

二、中央对台湾革命运动之具体意见如何？

1. 组织问题？［可暂称为台湾国民党。］

2. 统属问题？［可暂保持独立性。］

3. 目前之中心工作？［在敌军中发展组织，提倡反战反正，暗杀日本高级军官等。］

4. 可否帮助台湾革命同志建立武装？［可。］

三、中央对回国参加抗战之台胞的国籍问题，拟如何处理？

1. 可否不经过法律手续，即可取得中华民国公民权？［可。］

2. 可否请通令全国，保护台湾革命同志？［可开列名单，送中央党部或青年团中央团部，惟须确实为革命同志。］

肃此奉闻，祗颂崇安。

晚康泽，六，四。

---

①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3集，《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2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6月20日，朱家骅复函曰（此处除引用了档案中由朱家骅部属抄写的复函外，还参照朱家骅亲拟原稿做了补正——引者）：

兆民吾兄勋右：四日惠札只承尊拟答复台湾革命团体意见，甚善，敬佩，兹有补充数点，条列后方，即请察照为荷，专复顺颂公祺。弟朱家骅。

一之1、［当然复归祖国］下加［因台湾原系福建省一旧府属］一语。

二之1、［可暂称为台湾国民党］下加［必要时用其他名称亦可］一语。

二之2、［可暂保持独立性］下加［但暗中须与本党保持极密切之关系，并接受本党之指导］数语。

二之3、答案分为a、b两项，a项为原文，b项新增：a、［在敌军中发展组织］云云；b、［在台湾各地从事秘密活动，创立组织，宣传三民主义，恢复我国固有道德，增进人民爱护祖国之心，挠乱地方秩序，相机发动革命与罢工怠工等等］。

三之2、最好确定由一机关办理，免生枝节，似以中央党部为宜。①

这说明，国民党中央这时已形成十分明确、成熟的对台政策：就是理所当然要回归祖国。不同部门的领导人看法都完全一致，这与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讲了，高级将领还将信将疑的情况比，有了相当进展。显示出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些国民党高级干部已经具有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并收回被日本窃取的台湾等失地的决心，开始积极推动台湾人民反日、在岛内建立国民党组织、引导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的工作，这无疑是国民党历史中值得肯定的一页。



图7-1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立场进一步确立，且从党内“吹风”进入“昭告中外”的阶段。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郑重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接着

①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2，标题：台湾党务——台湾革命运动与中国国民党。



在1942年4月间，陪都重庆掀起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光复台湾宣传运动，国民政府一些军政要人如孙科、陈立夫、冯玉祥、梁寒操、马超俊、康泽等，或发表广播演说，或出席宣传集会，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台湾对中国的隶属关系和收复台湾的意义。如4月5日，以陪都各国际文化团体的名义，举行了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由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主持，孙科出席并做了《解放已在目前了》的讲演；4月17日为《马关条约》签字纪念日，陪都再一次举行纪念大会，章渊若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发表《我们应如何认识台湾》的演说。其后，孙科6月28日在国民外交协会的演讲及7月7日纪念抗战五周年的文章中都明确宣布中国要收复甲午战争以来的所有失地。① 6月间刘峙在《中央日报》福建版发表了《怎样解放台湾同胞》的文章。

1942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表明了国民政府否定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中日间一切条约，在领土方面要恢复至甲午战前之状态的立场，也即要彻底清算日本从中国攫取的一切侵略权益的立场。② 次日，重庆《中央日报》公开发表了宋子文的这一谈话。

选择这一时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上披露出来，除了向国内人民有一个明确交待、向日本法西斯表明绝不妥协的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发言，是为了防止同盟国内的某些大国在战后安排上损害中国权益。因为还在这一年的8月，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印发了一本题为《太平洋关系》的小册子，公然提出战后要对台湾实行"国际共管"。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惕，从1942年11月4日，也就是宋子文上述答记者问的同一天起，重庆《中央日报》开始连载《太平洋关系》全文，至11月23日刊完，这种安排显然绝非巧合。在此期间的11月13日，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还发表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一文，严正批评同盟国内某些人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错误主张，如东北划归苏联、台湾国际共管之类。③

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指出："台湾、澎湖列岛

①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55页、37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3集，《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3~4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③ 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1月13日。

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屹峙东南，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迄至明末，乃为荷兰人所侵据，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其事迹真可歌可泣。”“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侵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①以《中国之命运》在当时的影响，蒋介石关于中国疆域与领土的观念应当说是非常明晰地透露给了中外各界人士。

在1943年11月下旬的开罗会议上，中方向美方正式提交了“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向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的方案。在听取了中方意见后，11月24日，罗斯福总统私人顾问霍普金斯起草了公报草案提交讨论，《草案》规定：“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笔误，后改为澎湖——引者）等，当然应归还中国。”11月26日下午，中、美、英三方就英方提交的公报修正案进行讨论，英方修正案将东北、台湾等地“当然应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对此，与会的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据理力争：“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必须由日本放弃’固矣，然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明言，转滋疑惑。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英国外交部次长贾德干解释：“本句之上文已曾说明‘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则日本放弃后当然归属中国，不必明言。”王宠惠不为所动，指出：“措词果如此含糊，则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在阁下之意，固不言而喻应归中国，但外国人士对于东北、台湾等地，常有各种离奇之言论与主张，想阁下亦曾有所闻悉。故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故主张维持原草案字句。”在场的美国驻苏大使哈立曼支持中方意见，因中美双方坚持，此项内容最后维持原草案。② 12月1日，由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公布，其中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国民政府外交努力的一项重大成就。

---

①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6～8页，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增订版。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525～534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台工作机构

在加强舆论宣传和外交争取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开始了策动台胞抗日、收复台湾的具体筹划工作。首先是逐步建立有关的涉台工作机构，这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为在抗战爆发后台籍志士发起组织的抗日团体，经当局有关机构认可并给予名义和少量经费，政府对之重视和支持程度都不高，大体上属于半民间半官方性的外围组织；二为官方物色台籍人士建立起来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1943 年 4 月之后正式成立党部，1945 年 9 月之后改为台湾省党部）。此为国民党中央据以在沦陷区及台湾岛内推进党务的机构，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后成为台湾党务系统的前身；三为由官方设立、吸收台籍人士参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这是国民政府于开罗会议后着手准备及实施接收台湾的工作班子，后成为复台初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之前身。

（一）以台湾革命同盟会为主体的大陆台胞抗日团体

“七七”事变之后，大陆台胞先后成立了一些抗日小团体，经一段时间的活动与联络，一部分于 1938 年 9 月 18 日合并成立“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领导人谢南光），另一部分则于 1939 年并入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主体为 1939 年 1 月成立的台湾义勇队），其中包括张邦杰于 1938 年发起组建的“台湾革命党”。

1940 年 3 月 29 日，台湾独立革命党与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在重庆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以谢南光、李友邦、张邦杰三人为常委，轮流担任主席，刘启光为秘书长。7 月 25 日，又有林士贤、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和宋斐如、柯台山领导的台湾国民革命党加入。1941 年 2 月 10 日，上述团体在重庆正式成立统一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了大陆台胞的抗日联合阵线。

这些在国统区成立的台胞抗日团体，大多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或闽浙等省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对其活动与发展给予了一些便利。以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为例，1938 年 11 月，李友邦为发动在闽台胞参加义勇队，从浙江去福建活动，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即给福建省党部主委陈肇英写信介绍，并赞助 600 元旅费，到闽后，福建省主席陈仪亲自接待，极力支持，并批给汽车、军装、路费、护照等。1938 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在桂林会见李友邦，原则上同意成立义勇队，并给予每月 500 元的资助。1940 年，又正式批准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台湾义勇队，

委李友邦为少将队长。①

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后，除重庆总会外，分设北方执行部和南方执行部，北方执行部的活动主体为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活动；南方执行部的活动主体为张邦杰领导的台湾革命党，在闽南地区活动；南北双方互不统属，意见纷歧。1942 年 3 月，同盟会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南北方执行部，另设 8 个分会，3 名常委分别以宋斐如、李友邦、谢南光出任，另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主任委员翁俊明为监委主任。由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将这一大陆台胞抗日团体的联盟性组织纳入国民党官方指派的台湾党部筹备处指导之下。② 朱家骅指示翁俊明“协会方面则我党同志应即组成党团，妥为运用，使该会成为我党之外围团体”③。但这种“指导”与“运用”由于党部筹备处本身的诸多缺陷，不仅未能加强同盟会内部的团结，反而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且造成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党部之间矛盾重重，严重对立。

（二）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

1940 年 3 月 30 日，蒋介石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及陈立夫、王芃生等的“极密”代电，称“查汪逆傀儡登场在即，我方对倭亟宜加大打击，赞助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使其鼓动敌国人民群起革命如罢工等等，以骚扰敌之后方，减其侵略势力，即希兄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为要”④。

4 月 1 日，朱家骅即致函内政部长陈立夫、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三青团中央团部处长康泽、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特种经济调查处李超英等，约上述诸人于 4 月 2 日下午到中央组织部会商此事。4 月 26 日，朱家骅向蒋介石报告初步商谈结果，其中关于台湾的部分为：“台湾本我辖地，兹拟迅速成立本党党部，为工作便利计，暂用化名。查有前在政治部供职之刘启光一名，系台湾籍，当先约其谈话，

---

① 张毕来：《台湾义勇队》，见《革命史资料》，第 8 辑，54 页、70 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2 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123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③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2 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312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④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1，标题：台湾党务——策动日韩台革命运动。



俟议有具体办法，再呈请核定经费及负责人员。”① 朱家骅通过原在中央调查统计局之部属、当时供职于军委会政治部的台湾籍人刘启光（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秘书长），令他“设法使台湾革命团体事实上与中国国民党发生统属关系，以利革命事业之开展”。6月下旬，经刘启光介绍，朱家骅约见了联合会领导人谢南光、宋斐如等，了解“台湾革命运动之现状”，并表示了台湾革命团体“可暂保持独立性”，“但暗中须与本党保持极密切之关系，并受本党之指导”的意见②。经多次协商，双方决定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刘启光介绍民初即参加同盟会的台籍人翁俊明参与筹备工作。

但对翁俊明其人，1941年2月，戴笠曾致函朱家骅表示怀疑：“骝先先生赐鉴：据报香港大道西210号俊明医院主人翁俊明于去年十月间忽告离港，外传其已赴沪，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港大诚中学教务主任姜适君接翁由渝来信，谓其在渝与毛庆祥同志倡办中国战时促进会。查翁在港行动值得注意者计有下列各点：①由日领署援助在港注册行医。②加入福建同乡会为一甚活跃之分子。③以翁俊明医生招牌掩护无行医执照之台人石霜湖在跑马地黄泥涌道一号设美容院，而石系台湾总督府间谍，该美容院即石间谍机关。④港之俊明医院为台奸出入繁杂之地等语。查翁现准备在渝组织平民诊所，最近复以经商为名，并拟离渝飞港，其行踪颇有可疑。惟其所填乘机保证机关系中央党部总务处。翁对于国家之忠实程度如何，及可否准其离渝之处，谨特函陈查报情形，以供参考，并祈示复为祷。专上敬请崇安。晚戴笠敬启，二月十九日。”③

1941年2月21日，朱家骅复函戴笠，为翁俊明作担保，函称：“雨农吾兄勋鉴：本月十九日手札敬悉，翁俊明系本党老同志，早年加入同盟［会］，致力台湾革命数十年，此间台湾革命同志均知其人，并钦佩之。此次赴港奉有本部使命，办理台湾党务，即请准其出境是荷。承询特复，敬颂台祺。弟朱家骅。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④

经朱家骅说明后，军统对翁俊明放行。1941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在香港正式成立，翁俊明为筹备处主任，刘启光为

---

①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1，标题：台湾党务——策动日韩台革命运动。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305～309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③④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2，标题：台湾党务——台湾革命运动与中国国民党。

秘书，陈哲生、李自修、叶永年分任组训、宣传、总务三科科长，林忠为重庆联络站负责人，谢东闵为桂林联络站负责人。香港沦陷后，筹备处迁移广东及江西泰和。

1943年4月，国民党中央将筹备处正式升格为直属台湾党部，派翁俊明为主任委员，但工作实际进展甚少，1943年11月18日翁俊明中毒身亡，死因不明，国民党中央乃以林忠继任。

党务系统自开始筹备到正式成立的4年多时间里，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在泰和办党务干部训练班，编印《台湾问题参考资料》，参与台湾光复的舆论宣传等，但总的来说未能负起指导其他台湾抗日团体的责任，其自身工作也常陷于停顿。

究其原因，一是存在着某些宗派主义倾向，"台党部执行委员人选，即不能集中全体奔走台湾革命人士成强固组织；唯一能用台湾人名义，在前线活动之台湾义勇队，亦不能合作"①。像著名抗日志士李友邦、谢南光、张邦杰、柯台山、陈友钦、李万居、谢挣强等均被排斥在外，原籍广东的翁俊明，对原籍福建者存有地域门户之见，认为"台湾之主要人民为汉族中之闽粤二族，闽人之特性与现在之闽南人民相同，生性骄吝，善于打算，……粤人之特性与现在之广东人民相同，生性勇敢，较能团结"②。

在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态度问题上，"台湾党部筹备处采用收买与分化政策对付本会，致使纠纷与磨擦不断发生"。1943年9月2日，台湾革命同盟会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转呈蒋介石关于台湾党政问题的意见，其中对党部的批评十分尖锐："苟徒设立一挂名食禄之机关于主义毫无进展与抗战毫无吻合，则中央何用乎，故今后台湾党部主任及委员必须慎重人选。"③

二是内部矛盾重重，纠纷不断。"党部在香港、泰和、漳州活动，……内部人员，均未能健全一致，几次纠纷、变易、冲突、攻讦"，"拘押同志，暗树小组，部内纠纷暗斗迭起"。1943年11月翁俊明突然中毒身亡后，"逐鹿者大有其人，甚至捕风捉影，谣言纷生"，迄今未能查明真相。党部11名委员中，据称派入岛内工作的有5名，但"如何活动，如何为人，数年

---

①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384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311～314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③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143页、166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无消息”，台湾光复后，也未见露面，更不用说在光复过程中发挥作用了。①

三是热衷于争名分、争地位，工作浮在表面，鲜有实绩。1944 年 1 月萧宜增继任后，向国民党中央呈文要求恢复台湾省制，并提出在恢复省制之前，应先将直属台湾党部升格为省党部，原因是所谓“本部现虽直属中央，但各方因名义不崇，地位不著，诸种进行，常多纷错阻滞，……殊难尽收预期效果”。同时，他要求增加编制、增加预算、改变工作地点。对此，国民党中央亦颇不满，中央组织部在复函中指出，“查台湾党部所请恢复省制，似应在国土光复之后为宜，至先改该部为省党部一节，应俟省制问题决定后再议。又该部成立不久，亟应深入台岛组训台胞，……应勿庸斤斤于名分之争。关于研究复员与设计调查等工作，前经该部呈准设置台湾建设委员会，殊鲜成效，该部今后允宜利用现有组织，加紧督饬工作，……先行建省与否，尤属末事”②。

由于党部实际上未能为光复台湾起到前驱先路的作用，致在去台接收前夕的 1945 年 9 月 17 日，在国民党中央六届十次中常委会上决定台湾党部彻底改组，原主任委员、书记长均免职，委员仅丘念台、谢东闵等 4 人留任。

（三）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

开罗会议之后，中国收复台湾已成定局。为保证接收工作顺利进行，1944 年 3 月，蒋介石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派曾任福建省主席、1935 年去过台湾的陈仪任主任委员，于 1944 年 4 月 17 日在重庆正式成立。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命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会同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拟具收复台湾政治准备工作及组织人事等具体办法”，张厉生等于 1944 年 3 月 15 日向蒋介石提出拟成立一个“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到 6 月 2 日，蒋介石复电告知“现在中央设计局业已设置台湾调查委员会，如稍加充实，多多罗致台湾有关人士，……即足以担负调查与筹备之责，暂时不必另设机构”③。

台调会成立之初的委员除王芃生外，基本上是陈仪任福建省主席时的

---

①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2 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336 页、383 ~ 384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2 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356 ~ 358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③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1 ~ 3 页，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顾问、秘书班子，有沈仲九、钱宗起、周一鹗、夏涛生诸人。6月，增加林忠为专任委员，李友邦、李万居、谢南光等为兼任委员，后又陆续任命黄朝琴、林啸鲲、游弥坚、刘启光、宋斐如、丘念台等台籍人士为专任或兼任委员，基本上做到了吸纳各派台籍人士共同参与。唯1944年11月台湾党部通过陈果夫提出要将台湾党部作为台湾最高党务机构，并且要求由其主要负责人参与调查委员会工作，陈仪托辞婉拒，除丘念台外，未再延请其他党部人员。

台调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搜集有关台湾的资料。早在1935年陈仪应日方邀请“考察”台湾之时，即注意搜集台湾资料，“返闽前，日本台湾总督府赠送了一大套《台湾法令汇编》，陈仪将其藏在省政府。又动员随行人员写此行之游记，……印成《台湾考察报告》一本并附图表，然后赠送各学校各图书馆留存做资料”①。台调会主要通过下列渠道系统搜集资料：①函请中央设计局及各党政军有关机构提供；②请在渝台籍人士介绍台湾情况，编撰专题资料；③请国民政府外交部电驻各地使馆搜集；④向福建省政府，甚至私人借用。至1945年3月，台调会共搜集到台湾法令、法规、各种统计资料等35部，国民政府驻美使馆送回的资料影片5部，及台湾最新的官报、报纸多份。

在汇集资料的过程中，台调会即组织人力编辑台湾概况及分类翻译台湾法规，到1945年3月，共编成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教育等概况资料19种，40多万字；分类翻译出台湾民政、财政、金融、司法、农林牧渔、工商交通、教育七大类法令，约150万字。

其二，起草《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在上述广事搜集资料的同时，从1944年5月中旬开始，台调会着手起草《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经过7月14日和8月11日的两次修正，拟就《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16项82条，并于1945年3月经蒋介石核准签发，正式公布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接收计划中的行政区划、土地问题、公营事业三方面，台调会认为尤其重要，乃专门成立了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会，先后制定了具体详尽的《台湾土地问题研究会报告书》《台湾行政区划研究会报告书》及台湾地政、金融、警政、教育接管计划草案。

其三，培训接收人员。1944年8月17日，蒋介石指示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陈果夫、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段锡朋、中央训练团教育

① 钱履周：《陈仪主闽事略》，见《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3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长陈仪、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会同协商东北及台湾接收人员培训问题，决定由陈仪牵头，在中央训练团举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学员120人，分民政、工商、交通、财政、金融、农林、渔牧、教育、司法各组训练，为期4个月，从1944年12月开学至1945年4月结业。又由四联总处之银行训练班，训练银行业务人员40名。1944年10月，中央警官学校开办“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次年在福建设立第二分校，共训练各级警务人员932名。当然，从整个台湾省的接收来看，这些人员还远远不够，但毕竟准备了一些骨干。



图7-2　台湾首任行政长官陈仪

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正式签发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的手令，台湾接管工作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台调会遂结束使命，于10月29日宣告该机构终止。

三、受降接收与台湾光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正式签署的投降条款等国际性法律文件，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开始了收复台湾的最后实施阶段工作。接收班子以陈仪领导的原台湾调查委员会为基础，另从各地抽调干部加以充实，并指定陆海空军有关部队参与，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较为顺利地完成了接收任务。

（一）中国实现了对台湾管辖权的全面接管

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后，1945年9月1日，即在重庆成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临时办事处，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具体负责，开始筹划去台受降接收的有关事宜，包括人员调配，去台部队的调动安排，与中国战区美军总部联络、商讨接管计划及空海输送等。9月9日，派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作为台湾省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葛敬恩约见了代表台湾日军投降的日军驻台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令其做好中方入台接收的有关准备工作。9月16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命张伯爵为台湾南部第

22地区空军司令，林文奎为台湾北部第23地区空军司令，[1] 在第一路司令张廷孟率领下于9月中旬率先飞台，并分驻台南、台北两地区，成为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入台驻防的中国军队。

9月28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成立，由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任主任，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诵尧任副主任，两单位指派专门委员及参谋人员42人、记者5人组成，包括黄朝琴、林忠、游弥坚、李万居等台籍干部多人，另有宪兵一个排34人随行。全部人员于10月5日飞抵台北，10月6日在原总督官邸举行第一次中华民国国旗升旗仪式，同时代表陈仪将警备总司令部的第一、第二号备忘录交付日方代表。

前进指挥所到台后即开始视察港口，为军舰来港停泊做准备；督促日方预为提供即将登陆的驻军营房；监督日军按指定地区集中，让出防区等候中国军队接管；调查台湾经济现状及物资储备情况，为正式接收做准备。10月17日，国民政府直属各机关驻台人员及由柯远芬率领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人员200余人进驻台北。前进指挥所即逐步结束使命，并于10月25日撤销。

国民政府派往台湾参加接收工作的陆军主要为陈孔达的第70军和黄涛的第62军，前者负责台湾北部地区，后者负责台湾南部地区。陈孔达部主力10月13日由宁波出发，17日在基隆登陆，逐次进驻宜兰、台北、淡水、新竹各要点，设指挥部于台北。黄涛第62军分三个梯队于10月16日起由越南出发，陆续于10月18、22、26日在高雄登陆，逐次进驻屏东、台南、嘉义、台中等地，设军司令部于台南。[2]

10月24日，陈仪乘飞机从重庆飞抵台北。

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典礼在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日本前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等5人代表驻台日军向中国方面投降。日方代表在中方命令上签字并呈递降书后退出，陈仪即发表广播声明如下："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

---

①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7页，1946。

② 此处黄涛部到台时间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第10卷，《光复志》，第28页所述，唯黄涛本人在《国民党第六十二军赴台湾接受日军投降纪实》（《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11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回忆中将时间记为11月的相同几天，将10月25日的受降仪式记为11月25日，疑其时间均错后一个月。

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①

11月1日起，接收工作正式展开。行政接收方面，陈仪提出"工商不停顿，行政不中断，学校不停课"的方针。② 由以民政处长周一鹗为主任委员的"接管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共接管省级机构33个。地方机构在省民政处主持下，另组织各地接管委员会接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各级地方政权的接管。

军事接收工作由"台湾地区军事接收委员会"负责，陈仪兼主任委员，各军兵种主官任委员，下设陆军三组、军政一组、海军一组、空军二组、宪兵一组。"当时在台日军，尚有16万余人，日人亦有29万余人，合计有45.8万余人，粮足，军器尚完备"③。经过前后4个多月的时间，共计接收飞机890架，船舶525艘，各种车辆2 097辆，各种炮1 315门，枪13万余支，弹药680多万发，及一大批装具物资器材，并将全部缴械日军集中管理，完成了军事接收任务。

至此，在主权上使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收归中国管辖的努力宣告圆满结束。

（二）中国接收台湾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

从1943年初起，美国总统罗斯福明确了支持中国收复台湾的立场。日本投降后，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于8月15日任命麦克阿瑟为接受日本投降的联合国最高统帅，8月17日，麦克阿瑟以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中国战区统帅蒋委员长投降"，明确了将严格履行开罗会议以来的有关国际承诺、台湾立即由中国接收的安排。

在接收台湾的过程中，美方在对日联络、情报，尤其是人员输送等方面予中方以帮助。重庆临时办事处开始工作后，其接收筹备工作得到美方的有力配合，双方每周"定期举行中美参谋会报，商讨占领计划及空运输送等问题"。中方组织前进指挥所先期赴台也是在美方协助下得以实施的。美方由柏格上校率40余人随同前往，"前进指挥所的人员，中美双方几乎相等"，"从重庆白市驿机场分乘五架美国军用飞机出发"④。

---

①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辑，14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②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史》，726页，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9。

③ 林忠：《台湾光复前后史料概述》，39~40页，台北：皇极出版社，1983。

④ 葛敬恩：《接收台湾纪略》，见《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114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其后中方人员、中国军队去台也都是由美国海空军负责运送，“1945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直属各机关驻台人员，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人员，由重庆乘美方运输机数架到达上海。在上海休息三日后，即于15日乘登陆艇横渡台湾海峡……10月17日午间基隆港隐约在望，这时又遥见海上有美方军舰护送国民党军队第70军向基隆港驶去”①。除第70军外，派往台湾接收的另一主力部队第62军也是由美军运送的，据第62军军长黄涛回忆：“62军是于11月16、17两天，分别在越南的康海、海防两地登舰出发的。前后分为三批（即三个梯队），每批约运输舰7艘。另有驱逐舰8艘，分别在前后护航。均属美国海军运输舰队，由派驻62军的美军联络组负责联系，到越南做运送部队的工作。”② 其后遣送近50万日俘、日侨的运输也是由美军担任的。陈仪在10月25日的受降典礼上曾表示“感谢协助我们光复台湾的同盟国家”，其中当然主要是指美国。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全力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并在涉及台湾主权的问题上不插手、不介入，是值得肯定的，它表明美国这时不仅在有关国际条约上，而且在行动上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应当回归中国，史实昭然，不容掩盖，亦不可忘记。

（三）日本完全接受了台湾归还中国的条件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9月2日，日本在向各同盟国投降而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中表示“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元首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呈递的降书中承诺：吾等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③。

10月25日，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代表日本驻台湾军政当局接受了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致日方代表的第一号手令，令称：本官奉命“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安藤利吉在签具之受领证中表示：“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

---

① 杨鹏：《台湾受降与二·二八事件》，见《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88～8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② 《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1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

③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第10卷，《光复志》，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0，图片第3页。

规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①至此，日本将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窃据之台湾、澎湖列岛交还中国的一切法律手续均告完成。其后，日方在移交过程中虽有少量隐匿、破坏物资和设备等现象发生，但毕竟只是个别人的抗拒行为，而丝毫不能改变台湾已归属中国的事实了。

（四）台湾人民衷心拥护祖国政府收复台湾

台湾光复，台湾人民重新成为中国公民，为确认这一事实，并涤荡殖民时代之污迹，国民政府及台湾地方政府公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条例规则。

1946 年 1 月 12 日，行政院发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令称："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②

过去由于日本在台湾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一些台胞被迫改用日本名字，台湾省当局遂于 1945 年 12 月 12 日公布了《台湾省人民回复原有姓名办法》，宣布："凡台湾人民使用之姓名为日本式者，统准予在三个月内向所在村（里）办公处申请回复原有姓名，山地同胞无原有姓名者，准参照中国式姓名方式自定姓名。"③

1946 年 6 月 22 日，行政院又公布了《在外台侨处理办法》，规定："台侨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即恢复为中华民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之在外台侨，其法律地位与待遇，应与一般华侨完全相同"。④

台北及其他城市的街道，原为日本名称，街道称为町，段称为丁目。长官公署于 1945 年 10 月 22 日公布《台北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从台北、基隆、高雄三地做起，规定在县市政府成立两个月内，将所有街道的日本名称，一律改正为"具有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宣传三民主义，或纪念国家伟人的名称"。台北市设了中山路、中正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等，还设了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罗斯福路，其余多为大陆省会和重要城市名，如南京街、重庆街等等，其他县以上城市几乎都有中山路。⑤

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民由衷欢欣，以各种方式欢呼庆贺。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去台，台湾民众即自动争挂国旗、争学国语，自觉维持社

---

①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第 10 卷，《光复志》，31 页，降书影印件。

②③④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4 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211 ~ 212 页、208 ~ 209 页、222 ~ 223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⑤ 黄朝琴：《我的回忆》，147 页，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

会秩序，以实际行动响应接收。中国官员和中国军队入台，均受到台胞欢迎，正如台湾学者王晓波所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台湾同胞仍在日本控制下，但都忍不住大肆庆祝，真可谓'张灯结彩'"①。

1945 年 10 月 10 日，台胞在岛上第一次庆祝"中华民国"国庆，10 月 25 日受降典礼之后，"即台北 40 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②。"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③ 其渴盼回归祖国之情，溢于言表。

纵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其态度较为积极、立场较为坚定，为收复台湾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工作，尽管存在着对民众团体重视不够，较大程度上依赖外援等不足之处，在接收台湾的具体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失误，但毕竟坚持提出并在抗战胜利后实现了这一目标，收复了祖国的一块重要失地，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节　抗战后期中国收复香港问题

一、战时中英关于新界之交涉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英国通过 1842 年的《南京条约》、1860 年的《北京条约》、1898 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先后从清政府手中割占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南端、租借新界 99 年。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掀起"改订新约"运动，中英新约谈判于 1929 年开始，但不久因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被迫停顿下来。抗战初期，因忙于集中对日，争取与国，一时还顾不上与同属反法西斯阵营的英、美等国交涉收回领土、利权问题。

直至 1941 年 4 月，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获任外交部长，由英经美返国，奉命向美国当局提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美方很快做出积极回应，同意对废除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先采取换文方式，正式谈判

① 王晓波：《台湾史与台湾人》，214 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②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162 页，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③ 林忠：《台湾光复前后史料概述》，39～40 页，台北：皇极出版社，1983。

待和平状况恢复之后。5月31日，中美非正式换文发表。在此情形之下，6月11日，英国方面由其外次白特勒发表声明，称英国准备在将来和平恢复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解决有关问题。7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奉其政府之命，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表示："候远东之和平恢复时，英国政府愿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军所占领，美英卷入对日作战，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大为提升，英美开始考虑接受中国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1942年8月27日，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受命将政府拟就的美中简明条约草案送请英方参考。怀南特指出，现在放弃在华特权，不仅可以有效地调动中国人抗日的积极性，调整美、英迄今与中国不够正常的关系，而且可以使两国商民从此在华享有正常的权利。这一建议为英方所接受，9月15日，英国外交部指示新任驻华大使薛穆，在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上争取主动。② 10月10日，美、英政府就此事分别发表声明，英方的声明称："帝国政府兹为强调其对中国盟友之友谊与联系计，决定就此事作更进一步之表示。外务部大臣特于10月9日向伦敦中国大使馆代办表示，帝国政府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将以规定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③ 10月30日，薛穆将英方草案送交中国政府，中英谈判随即在重庆开始，英方代表为薛穆，中方代表为外交部长宋子文、次长吴国桢及王宠惠等。英方草案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交还中方管理；将广州、天津的租界交还中国等等。但对中国至为关心的香港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英国根本无意考虑将香港交还中国的问题，10月中旬，在英国议会会议上，有议员问，正在起草的对华条约"是否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议会外务次官R. K. 劳答复，此约"仅仅和放弃治外法权有关"，并书面写道："香港是英国领土。"11月10日，首相丘吉尔更在出席一个午餐会时就香港问题公开表示，"我们的意思是再坚持下去，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

① 《卡尔致郭泰祺照会》，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53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② 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241～2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751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①。

10月30日英方将草案送交中方，31日，蒋介石就在其官邸主持对草案进行讨论，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的王世杰在当日日记中记载，"晚间在蒋先生官邸商英国政府提出之废除在华特权草约。该约内容与美案大致相同。惟该案对于九龙租借地之退还并未提及。予力主我方应要求交还。傅秉常次长甚迟疑，似以为不可。其实九龙既与威海卫半岛同一性质，我何迟疑之有。英政府未能自动提出，足见其无远识。蒋先生并欲将西藏问题提出交涉"②。可见蒋介石对此事的重视及有将香港问题与西藏问题同时提出交涉的打算。证之蒋介石10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所记，蒋介石当时确有此种考虑："美英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方案闻已送出，然其全文未到，照英大使函意推测，则九龙等租借地彼尚不肯放弃，而西藏之特权，彼更不愿提及矣，然余决心非令其同时撤消，则宁使不予接受也。"③

根据官邸会议讨论的情况及蒋介石的态度，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1月1日就向蒋介石呈交了一份"初步审查意见"和建议修改的若干要点，关于香港部分，外交部提出："草案第一条第一项对于条约所适用英方之领土，既采列举方式，依其文意，香港亦包括在内，我国是否同意。又九龙为租借地，应于订约时交涉收回。"11月7日，外交部拿出了一个较为正式的修正草案送呈蒋介石，关于香港问题，在英方草案第五条中增列了两项：即"（五）英王陛下认为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即废止，并同意该专条所给予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即予停止"，"（六）英方在九龙租借地（如该专条附图所示者）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④ 经蒋介石认可后，于11月13日由宋子文向薛穆正式提交。中方在此只提收回九龙租借地，而不是提收回整个香港地区，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中方在谈判中采取的一个策略。针对英国的态度，中方认为九龙租借地和租界性质相同，既然英国已同意交还天津、广州的英租界，九龙租借地也不应例外。至于

---

① 刘存宽：《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载自《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383～384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③ 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24日。

④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757～758页、761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香港岛和南九龙，由于英方在草案中未宣布废除《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中方担心提出后会影响整个谈判的进展。国民政府的考虑是，一旦收回占全香港90%的新界，香港就成了孤岛，其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会大大降低，英国在港岛和南九龙的存在也不会拖延太久。①

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以九龙租借地是英国领土（香港岛和南九龙）的扩展，与租界不属于同一范畴为由，主张对中方的要求断然拒绝，11月30日，在丘吉尔主持下，英国战时内阁通过了艾登的提议，12月14日，薛穆将英方的决定正式通知中方。中方对此据理力争，宋子文对薛穆说，在中国公众看来，租借地与租界并无区别，若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中英之间的隔阂就不会完全消除。同日，宋子文还派中英文化协会会长杭立武去拜见薛穆，告诉他，若新约不包括收回九龙租借地，蒋介石和孔祥熙不会同意在上面签字。但英方仍拒绝改变立场，致使谈判陷于僵局。②

在此情形之下，宋子文颇感棘手，而求助于此时正在国内的驻英大使顾维钧。他们的考虑是，中英新约的许多内容对中国是有利的，值得争取；英方在现阶段对香港问题让步的可能性很小，因在英国人看来，涉及领土调整的原则问题，如果因香港问题而使谈判破裂，对中国无疑是一种损失，也给人留下同盟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之印象；且由于最惠国条款的关系，拒签中英条约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美条约失效，加上香港现在还在敌人手中，中英之间的争执还是空谈，也可以留待战后再解决。基于这些因素，顾维钧在蒋介石召见他时，对蒋介石说，这次是英国首先采取行动同我们磋商的，是送上门来的礼。“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我说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同时我们可以公开讲明，希望英国在战后归还香港”。③ 也即这次新约可以不涉及新界问题，但英国应做出战后解决香港问题的承诺。对此，蒋介石表示可以考虑。然而，在12月21日由丘吉尔召集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所通过的只是可以在战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期问题”（注意：是“租期”问题，而非“前途”问题）。12月24日薛穆将此通知中方后，令中方十分不满，在中方一再要求之下，英国内阁在12月28日的会议上由艾登提出，将

① 冯仲平：《南京国民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与失败》，载自《晋阳学刊》，1995年第2期。

② 刘存宽、刘蜀永：《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载自《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176～177页、17～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重新考虑新界租期问题"的"租期"二字删去，于30日通知中方，并称英国决不会再让步。蒋介石在无奈之下，只得表示暂时接受，但实有不甘。他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彼对九龙交还问题坚不愿在新约之内同时解决，余乃忍之，此实为对英政策与技术大改变也。"如果英方不"反要我作九龙不在平等条约内之'声明'或'换文'"，"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作'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之谈判，以为日后交涉九龙问题之根据"。如英方要求过苛，"则我政府惟有作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在战后用军事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狡狯，必无可如何，此乃最后之手段"。[①] 1943年1月11日下午4时，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同一天，外交部长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②]，表明中国只是暂时让步的立场。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再次重申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我国政府于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即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保留有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③]

1943年11月，蒋介石应罗斯福之邀，即将赴开罗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14日，中方拟在会中提出讨论的问题整理就绪，决定"对邱吉尔谈话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④]。17日，蒋介石又约见王世杰，"询问对于与罗邱会见时应采之态度与应提出之问题"，在收复领土方面，王世杰提出，"台湾及澎湖列岛与九一八事变前之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朝鲜应独立"，"至于港九问题则可听任罗斯福总统相机设法解决，我可暂不提出。蒋先生亦以为然"。[⑤] 在开罗会议正式开始的11月23日，蒋介石非正式地向罗斯福提出，战后英国必须取消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希望美国予以支持。罗斯福表示同意。关于香港问题，罗斯福主动提议在日本投降后，

---

① 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31日。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781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③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121页，重庆：正中书局，1943。

④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5日；（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35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192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由中国先行收回，然后建立自由港，允许各国在那里自由经商。26日，在三首脑会谈时，蒋介石提出东北、台湾、澎湖等应归还中国，罗斯福、丘吉尔均表同意。在会上，罗斯福问蒋介石，“你对香港如何打算?”蒋介石尚未回答，丘吉尔便大声喊道：“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土地。”蒋介石反驳说：“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① 由于英国顽固地坚持其殖民主义的立场，罗斯福总统也没有公开支持中国，香港问题在开罗会议这样一个决定战后问题的重要会议上亦未能得到解决。会毕，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开罗会议之经验，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之存亡生死，则更不值顾矣”②。

二、战后关于收回香港之谋划及其放弃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盟国求降。13日，英国总参谋部发出指令，其中包括英国须于香港受降，此事必须切切执行；英国须于香港重新驻军，接收香港行动将由英太平洋舰队执行。③ 随即，英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考特（又译“夏悫”或“哈尔可特”）率领英国舰队日夜兼程赶往香港。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日杜鲁门发出第一号命令，指令中国境内（东北除外、包括台湾地区）一切日本陆、海、空军都必须向蒋介石投降。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划定受降区，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为北纬16°以北地区，包括越南北部、台湾及香港等地。当时驻守香港的日军隶属华南派遣军第23军，日军驻港防务归属广东；抗战中，香港也没有被盟军列为特别战区，是归属中国战区的广东战区。而战后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也就意味着对香港的统治控制，所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根据盟军命令把香港划入广州受降区，准备以驻扎南宁的第二方面军的张弛第64军向北海、湛江推进，然后坐船赴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并请求美军帮忙负责运输所用船只。当时第二方面军的官兵对接收香港异常兴奋，都以为香港从此可以收回。④

---

① 冯仲平：《南京国民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与失败》，载自《晋阳学刊》，1995年第2期。

②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5日，本月反省录。

③ 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158页，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7。

④ 李汉冲：《日本投降后粤、港、澳关系的回忆》，见王楚英、陈远湘等：《受降内幕》，33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但是蒋介石的内心害怕因为香港问题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尽管15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都建议蒋介石派兵先占领香港，蒋介石当场答应“当予考虑”。然而当晚蒋介石召集张群、何应钦等商谈香港越南问题时，却决定不与英国竞争先后，免惹英国恶感；并自我安慰：既然英国对美国声言决定派兵进占香港，如其不先与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协商，“则其自背约言，我当抗议其违约，而不与之争先进占也。但时间许可，仍须进占九龙”。可是英国却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这些所谓“约言”，16日中午，英国通告蒋介石：“英国政府现正准备派遣必要军队重占香港，恢复该地之行政，并确保对于日本南方军队总司令部之统制”。蒋介石接获英国如此不客气的通告，内心极为不快，“极费心力，原稿极不妥也”，一面回复英国电文，一面致电美国寻求帮助。①

然而蒋介石的迟疑不决解决了英军路途遥远的一大难题，17日，英国军舰已快行驶到香港海域附近，蒋介石当然万分不乐意，但英国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不高兴，英国明确表示不会接受总命令第一号内容的“中国境内”的字义以及对英国占领香港的任何解释，只愿意蒋介石派遣一位代表参加日本军队在香港投降的仪式。1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英国已通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国政府，一支英国海军部队正在向香港进发，任务是从日本占领下接管香港，协助被日本抓去的殖民地俘虏和被拘禁的人们，并恢复英国的统治。艾德礼还说：“在这个地方的日本指挥官，可能会把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因此我要求您指示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最高统帅官保证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日本地方司令官，应在英国海军部队的司令官到达香港后，向他们投降。”表明英国不接受香港为“中国范围”的说法，坚持英国在香港的受降权。杜鲁门权衡轻重，感到英国占领香港并不会触及美国的远东利益，而且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急需英国的支持，当然就不会为了中国而伤及英美关系，于是指令麦克阿瑟部署香港日军向英国司令官投降的事宜。18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把这个决定通知宋子文，并假惺惺地表示：这样做绝不等于表示美国对香港未来地位的看法②；美国原则上不反对英军到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因为香港最后如何处置系另一问题。尽管宋子文当即表示香港在中

---

①《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200页、203页、205页，台北“国史馆”，2011。

②《杜鲁门回忆录》（上），41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国战区内，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投降。① 但在现实利益面前，英美关系远高于中美关系，宋子文的再多抗议也改变不了美国的决定。

19 日，得到美国支持的英国毫不客气地致函蒋介石，蛮横声称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在内，坚持英国接受香港的日军投降是在“为与其荣誉有关之事”，只同意蒋介石派代表参与英军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②在英美压力下，碰了一鼻子灰的蒋介石不得不让步，同意英国参与受降并重占香港。但为保全面子，20 日，蒋介石致信杜鲁门，要求“日本在香港的部队应向我的代表投降，在受降仪式上，将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参加。在受降后，由我授权英国部队登陆并重行占领香港。英国不得利用任何借口，命令部队在中国大陆登陆，我做出上述让步是迫不得已的”③。并向魏德迈解析：中国作出让步是“不忍因此致中美与英国发生裂痕之意”④。杜鲁门看到蒋介石有让步的意思，于是趁热打铁致函蒋介石：日本在香港投降“主要是一个军事行动性质的问题”，没有政治成分，“英国在该地区的主权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他已电复英国，认为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是合理的，希望蒋介石同意中英在行动上取得军事合作，“这种协调将使日本在香港向英国军事当局投降成为可能”⑤。言下之意就是表示美国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地位，要求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迁就英国。

虽然蒋介石非常不愿意在香港的主权问题上让步，他希望由中国代表把香港当作中国的一部分加以接收。但是，蒋介石也意识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他的军队就无法到达香港，更加无法到达华北和东北，这对自己的政权相当不利。⑥所以蒋介石只好再次做出让步，23 日通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但要他来授权这位英军司令官，同时指派一个中国官员和一个美国官员参加香港的受降仪式，希望英国把接受香港投降的将官姓名在受降前三日知照中方。同时把这一决定告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次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对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让步辩解为：中国不派兵接收香港是为免引起盟邦间的误会。但又怕激起国人不满，所以随后补充说：“现在中国全国各租借地均经次第收回，九龙的租借条约，自非列（笔者著：原文如此）外，但是我们中国亦必循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62 册，242 页，台北“国史馆”，2011。
②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62 册，262 页，台北“国史馆”，2011。
③ 《杜鲁门回忆录》（上），417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④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62 册，275 页，台北“国史馆”，2011。
⑤ 《杜鲁门回忆录》（上），417 ~ 418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⑥ 《杜鲁门回忆录》（上），418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两国外交及条约途径，以期解决此未了之问题”。26日又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重申中国仍然坚持原定委托方案，如果英国继续拒绝，“则违纪乱法，责在英国，余则不能不守定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也”。并在内心痛骂：“英国争取接收香港之横态以及美政府不负责任不重公约之愤状，完全为英所操纵，吾诚不知美国之惧英一致于此也”①。

可是英国对蒋介石的让步丝毫不领情，英国顽固认为，英国在香港接受投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但不愿把香港或香港的其中一部分交还给中国，甚至连中国的授权也坚决不同意，于是仍以其对香港的主权不受中英新约影响为由，坚持受降权在英国，拒绝蒋介石的授权。8月27日薛穆口头通知蒋介石：“他们不能接受委员长关于英国部队军官应作为委员长的代表在英国的属地上接受投降的建议”，蒋介石指派的中国和美国官员只能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的资格参加受降仪式；在日本的投降书上，只能以证人的资格签字。蒋介石闻言大为光火，马上正告薛穆：“对英国政府对此事所采取之立场不能同意”，中国本着中英关系友好的愿望已做了多次让步，“如余再作此超出次办法之让步，不独与盟邦各协定不合，且与余为中国战区统帅之职责不符”。并当场表示：英国政府既已指定哈可尔提（笔者著：原文如此）接受香港日人的投降，自今日起，我即授权给他。最后严肃宣布“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并即委其所派之哈可尔提少将代表余——中国战区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嘱其通知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②。随后致信杜鲁门说英国的态度是帝国主义式的，表现飞扬跋扈，与联合国成员的资格不相称。然而偏袒英国的杜鲁门根本不在乎蒋介石的这点伎俩，不再加以理会。③

英美的狼狈为奸彻底激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决定为面子抗争到底。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拟定了中方在香港的受降计划，请蒋介石审定，要点有：①请蒋介石指派中方受降代表。②中方受降代表的任务包括代表中国与英美办理香港九龙的受降事宜，指挥第七战区派往九龙租借地受降的中国军队。③香港受降签字应在南京签字之后。④以后是否由军令部与英方直接商谈香港日军投降事宜。⑤中国军队的一个教导团、突击独

---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308页、328页、347页、349页，台北“国史馆”，2011。

②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354～356页、351～352页，台北“国史馆”，2011。

③ 《杜鲁门回忆录》（上），42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立第一支队及154师主力在10天之内进入深圳以南地区，并挺进九龙，是否撤回？蒋介石当即指派广东省主席、陆军中将罗卓英为中方受降代表，但蒋介石又不愿与英国在香港发生冲突，使事态恶化，故而命令即将前往九龙的中国军队停止前进。①

然而英国对蒋介石的好意并不领情，已于19日离开日军集中营的詹逊召集了港英政府的旧部，并电召在澳门居住的英国人来香港成立临时政府总部；28日，接获英国指令的詹逊在香港电台宣告："我是目前驻港英政府的首席代表，现已取得日方同意，在维多利亚城设立一个办事处，并准备必要的步骤，当英军抵达港岛受降时，恢复英国的统治权，我确信英军抵达香港将为期不远。"② 制造先声夺人的舆论声势。8月30日，英国海军上将哈考特率领英军在香港登陆，把驻港日本军民送入战俘营和集中营，同时拒绝蒋介石的委派令，准备以英国受降特使身份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这下，蒋介石再也无法忍受了，当天下午，蒋介石紧急召见英国大使，发出前所未有的强硬通牒："除非联盟国不承认余为中国战区之统帅，华盛顿之盟约无效，或者英国脱离联盟，宣告单独自由行动，否则，余之指令决不能改变，余决不能破坏盟约，违反公约，屈服于强权也，余令既出，必贯彻到底，希望英国恪守信约，保持警誉，如其最后仍加拒绝，则必宣布其恃强违约，公告世界，以著其罪恶。"9月1日，蒋介石又电告杜鲁门："英国军队英国海军及其他帝国主义之部队在中国不受欢迎"，如果"美国海军舰队进入中国任何海口时，任何英国船舰抑部队不得偕来"。③

蒋介石在面子问题上的固执态度让英美始料不及，英国政府感到自己若再坚持，中英关系势必弄僵并恶化，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远东利益没有丝毫好处，而且英国已实际控制了香港，这点面子上的让步并不影响英国在香港的统治，于是，9月1日下午，英国勉强接受了蒋介石授权哈可尔提在香港受降的命令，同时应允中美两国各派一名军官出席受降仪式，并答应香港的受降仪式延至16日，在南京的受降仪式结束之后才举行，尽量给足蒋介石面子。这样，也等于承认了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力，接受了香港"在中国范围之内"的说法，蒋介石算是保住了一点面子。但在这场较量中，蒋介石非常清楚英国才是最终的赢家，所以，他在当天的日记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365~367页，台北"国史馆"，2011。

② 谢永光：《香港战后风云》，18~19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96。

③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395页、417页，台北"国史馆"，2011。

中愤恨写下："英国对余委派两英军官接收香港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惟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① 可是以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蒋介石没有更好的办法，因而9月4日，王世杰赴伦敦参加五国外长会议前夕，与蒋介石"谈香港问题，尚未能确定方案，拟候抵英后再酌定方案"②。

10日，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香港日军投降，业由英海军少将哈尔可特代表英国政府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并由中美两国各派代表一人参加受降典礼"的决议。③ 16日，哈考特以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双重代表身份，在香港督宪府接受日军投降。在受降典礼大会上，中国、美国、加拿大各派一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仪式，中方代表潘华国少将发表演讲："此次祖国军人在港出现，能与英军官兵享受平等待遇，实为百年来所未见，故港胞对奉命来港之祖国军人，备极欢迎"④。不过这种自我宽慰的空话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在整个受降仪式上，英军根本不提及蒋介石的授权，⑤ 港英当局甚至禁止香港市民悬挂中国国旗。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期间，英国外相贝文等人与王世杰会面时，亦避而不谈中英问题，⑥ 故意闪避香港主权的归属问题。

此后，国民政府仍未放弃通过谈判收回香港的努力。1946年6月13日，蒋介石、王世杰向即将离任的英国大使薛穆提出了中方的这一意愿，"薛穆大使今午向蒋先生辞行，予在座。蒋先生嘱其致意英首相，对香港问题务设法早日解决。予并言此一问题尽可觅得解决而不影响双方之实际利益"。蒋介石对薛穆说："斯大林曾以英国占有香港为理由，试图取得旅顺、大连。如果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苏俄就没有理由抓住旅大不放。"并说，"香港可在不改变两国实质利益的情况下归还中国"。14日晚，驻英大使顾维钧出席王世杰宴请薛穆的晚餐，王世杰"嘱其此次赴英转美之前，务向

---

①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1日。

②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69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影印：《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7)，516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

④ 王楚英、陈远湘：《受降内幕》，331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该书著为"潘国华"，但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及1945年的报刊等资料，应为"潘华国"）。

⑤ 《杜鲁门回忆录》（上），42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⑥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5年9月16日，176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英外相当面提出香港问题，表示希望此一问题能早由英方提出解决”。6月27日，顾维钧约见英国外交大臣贝克，宣布中国希望与英国展开谈判，以使香港问题早日获得解决。① 直到1948年行宪国大期间，还有代表提出这一问题，外交部的答复称，政府决循正当外交途径，以求港九问题之根本解决。②

但实际上，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忙于应付国内共产党问题及与之相关的苏俄问题，国内问题处于优先地位；在外交上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走的是依美联英的路线；自然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真刀真枪地干，而选择了通过外交谈判谋求解决的忍让妥协的路线。以这种方式来与顽固、狡诈的老牌殖民主义的英国打交道，其结果自不待言。

第四节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努力

一、战时国民政府曾拟解决澳门问题

抗战爆发以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国民政府而言，澳门问题实在不算一个很大、很急迫的问题，中葡关系也只能摆在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因此，在较长时间内，国民政府似乎没有太多的心力顾及此事。

到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景的明朗化，战后安排问题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对于澳门，国民政府面临着是否收回、如何收回以及收回后如何治理等问题。

迟至1943年，国民政府似乎都还未作收回澳门的打算。这年七八月间，外交部长宋子文出访欧美时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稍事停留，葡萄牙外交部代表以试探方式询及中方对战后处理澳门问题持何种态度，不知是为了安慰战时作为英国盟友的葡方，还是宋子文本人对澳门问题就是作此打算，宋子文居然表示：“国民政府收回的领土是指满洲、台湾和九龙，并无收回香港和澳门的打算，因为认识到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③

---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334～33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723页、727页、7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冯仲平：《南京国民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与失败》，见《晋阳学刊》，1995年第2期。

②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3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③ 葡外交部谈话记录，载自陈锡豪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79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

从1944年起，国民政府内部开始考虑收回澳门的问题，但对于如何收回，意见不一，大体上存在着“缓进”与“急进”两种意见，均提供给最高当局采择。

“缓进”派以国民政府外交部系统的官员为主。所谓“缓进”，是笔者今天的一种看法，其内部各个具体人物的态度与做法其实仍然颇有差异。

最早明确提出要收回澳门的应当是驻葡公使张谦。① 张谦长期担任驻外使节，熟悉西方各国情形，他任驻葡公使不到半年，即于1944年2月21日向外交部发回了建议战后收回澳门的报告。张谦指出：“葡萄牙早已失去海外殖民力量，仅依仗英国来支撑其远东利益，葡国在远东也无实力保持澳门的中立，自然无履行中立能力，为此招致中国受政治军事上的无限损失，为国防计，应予收回。”② 张谦认为，葡国依赖殖民地供养，故此对殖民地不会轻易放弃。他提出了解决澳门问题的积极办法和消极办法：

积极办法：①游说英、美、苏三国支持中国收复澳门，策动国际舆论要求归还澳门；②向葡提出归还交涉。

消极办法：①战后在澳门实行公民自决投票以决定治权谁属；②暂时不收回，与葡方另订新约，但附带数项条件：第一，华人须有投票权，与葡人分享平等政治权利；第二，紧急时中国在澳门有进行任何军事行动的自由权。③

张谦本人虽力主收回澳门，但他所提的方案仍是十分温和的，即使所谓积极办法，也不过是欲通过正常外交途径争取英、美、苏支持或向葡进行交涉。他所谓积极，是指取一种主动争取的姿态，而不是指手段上的强硬或急进。另外，他提出以公民投票决定“治权谁属”（不是主权），这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提法，极易产生副作用。

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份相当委婉的建议也未能引起外交部足够的重视，

---

① 张谦，广东新会人，1888年生，早岁赴美国留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应清廷学部考试，授举人，曾任驻美留学生监督处秘书长，中国赴美教育调查团秘书长，1929年8月任驻旧金山总领事，1931年3月任驻纽约总领事，1933年5月任驻智利公使，1942年10月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1943年9月至1946年11月任驻葡萄牙公使，其后任驻荷兰大使。

② 《驻葡公使张谦致外部电报》（1944年2月21日），第339号，“澳门问题”，（档案类目：312/8）台湾“外交部”档案室藏档（下文所引档案均出自“澳门问题”，恕不一一注明）。

③ 载自陈锡豪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81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

此后半年多，未见外交部有何行动，宋子文似还未从上年8月的立场转过弯来，直到这年10月，由于另一渠道所提收回澳门的建议上达蒋介石，接蒋介石指令，宋子文的外交部才开始做出反应。

另一渠道就是下面要说到的“急进”一派，它以广东地方官员为主，包括战时的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和战后的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同为军人，所议所为均有先行动再交涉之意。1944年10月，李汉魂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澳门在葡人统治下色情赌博和毒品充斥全市，危害华侨甚巨，是中国的重大耻辱，必须收复，基于战时葡萄牙的中立国地位，澳门问题若战后处理必感困难。”他建议“在华南发动反攻之期，乘澳门兵力薄弱，以镇压变乱保护侨民和追击敌伪为由，进攻澳门，以造成即（既）定事实，然后以外交手段与葡交涉”。他认为“此乃上乘方法”①。

这项建议迅速获得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赞成，10月19日，徐永昌即发出指示：“奉上级命着李汉魂研究在发动华南反攻时乘澳门兵力薄弱，以镇压变乱保侨为名，占领澳门。”10月27日，委员长侍从室又发出蒋介石给外交部的指示：“命研究占领澳门事。”②

11月4日，外交部官员举行会议讨论澳门问题，并向国民党中央做出了如下报告：“查依照1887年中葡条约，澳门系由我国准葡永驻管理，惟不得转让于他国，故澳门之地位特殊，既非割让地，亦与普通租借地或租界不同，我于战后要求交还，固可援引各国交还租借地界之先例，惟事实上将视我要求英国交还香港九龙之结果而定。英若交还香港九龙，则葡之交还澳门始不成问题。”

外交部的意见是把澳门问题的解决放到香港问题解决之后，要视英国对于交还香港问题的态度而定。从其后的中英交涉来看，国民政府还是相当软弱的，没有对英方稍显强硬的姿态。既然因顾忌英葡同盟而存在港澳一体的打算，实质上外交部自然不会赞同地方军政官员带有刺激性的建议。外交部担心“军事占领澳门可能引起英美的不安，尤其英葡有同盟关系，将不利华北的收复”。但又同意从现在起即着手搜集便于交涉收回澳门的材料，并可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在对我方有利的时机采取相应行动。宋子文据此向蒋介石提出两点建议：

1. 惟华南战争进展时，倘日敌进占澳门，或日军败退时逃入该地，我

① 《徐永昌签呈之报告》（1944年10月10日），载自陈锡豪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81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

② 《国民政府主席代电》（1944年10月27日），第2385号。

自可以追击为词予以占领，然后由外交部途径要求归还。但若无此显著事实，则务宜慎重不可轻动。

2．随时由广东省政府及当地附近驻军搜集澳门当局压迫我国居民及接济日寇之事实，径电本部，以便分别向葡方质询或抗议，作为将来要求收回澳门之根据。①

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于 1945 年 1 月 4 日电令李汉魂：“（1）日军退入澳门即占领之；（2）搜集澳门政府接济日军情报以为占领之依据。”②

7 个月之后，战争因日本宣告投降而突然结束，并未出现期待中的华南对日反攻、或日军退入澳门的局面，国民政府借机占领澳门的计划自然无从实现。

二、战后外交当局依然举棋不定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20 日，驻葡大使张谦即要求葡萄牙政府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8 月 31 日，外交部欧洲司拟就了一份新的处理澳门问题方略，包括不同形势下可考虑选择的四种对策：

1．根据左列理由要求收回。

——在国防上，澳门乃珠江右岸滨海陆地之前卫。

——在经济上与我输出入甚微，葡人如欲与我经营商业，不妨利用我华南其他商港如广州、香港等，且葡人最初借地曝货之历史理由根本已不存在。

——在社会上，澳门在远东以烟、赌、娼三大恶事名闻全世，且为歹人流徙逃薮之处。我不收回，邻近各地治安难靖。

——在政治上，澳门居民都为华人，葡人甚少。为和平计，允宜消除此种不合理情势以及其所引起之纠纷及两国邦交上之障碍。

——在法律上，葡人逾越订约时之原状增占土地，条约已为破坏。我在顺利环境下，或亦可以强硬态度，主张不受原来条约拘束而采取断然之行动。

2．进行划界，澳门本岛、关闸以南，龙田、沙岗以南之地归葡，其余归还我国。

---

① 《外交部长宋子文致蒋委员长密电》（1944 年 11 月 7 日），第 2260 号。

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致广东省韶关李汉魂电副稿》（1945 年 1 月 4 日），外交部来电代字第 1159 号。

3．澳门本岛、关闸以南归葡。

4．澳门本岛由两国共管，5 年或 10 年后由人民投票自决（用意在予葡人以逐渐撤退之机会）。

一策为彻底办法，二策为缓冲办法，三策为不得已之下策，四策为最下策，只可于环境最劣时予以考虑。

欧洲司在阐述收回方案时，其理由之一便是“此次战事期间日人封锁澳门，所有澳门界内物资悉资敌用，并有以澳门军火售与日人情事，显因葡政府无实力保持中立，致我国无限损失”。同时，具体制定出收回办法：①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主权谁属。②由两国政府磋商交还条件——澳门当时既系无条件让与葡萄牙，此次应无条件交还中国。公产公物一并公平估价由中国政府购回。具体步骤则为三步：

（1）应先策动舆论，造成空气。

（2）应先取得美苏赞助，英国方面因与葡有同盟关系，葡必依赖英国力量以为护符，故对英尤应获得谅解，我方可对香港做适当让步，以为收回澳门之条件。

（3）电令驻葡张公使向葡政府表示我国收回澳门之决心，请由葡政府提出办法与条件，以凭考虑。①

受抗战胜利形势的鼓舞，欧洲司的这一方案，特别是第一种对策中提出“不受原来条约拘束”，“以强硬态度”，“采取断然之行动”，较过去外交部的意见进了很大一步。但所列收回澳门的步骤仍然比较消极，给人以无论在何种局势下均欲获得一权宜结果之感。如为争取英国谅解而“对香港做适当让步”，“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主权谁属”等，实非富于远见、具宏大气魄之方略，倒不如在一时不能彻底解决时，暂时维持现状以待时机更为妥当。

外交部是否照欧洲司的建议有所行动呢？有一份材料说：“9 月，国民政府外交部电饬驻葡公使，向葡国政府表达收回澳门的意愿。”② 这与欧洲司所提三项步骤中的第三项还是颇为吻合的。

1945 年 9 月，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前往伦敦出席苏、美、英、中、法五强外长会议，协商起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约。9 月 9 日，王世杰抵

①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十八），第 1905 号，载自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244 页、245 页，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

② 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230 页，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

达伦敦。9月23日，他在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会面时表示，“他希望中国能收回澳门。委员长曾指示他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顾维钧告诉王世杰，前些时候他曾和中国驻葡公使张谦谈论过这个问题。因外长会议在英举行，张谦也到了伦敦，他建议王世杰与张谦谈谈，王世杰接受了这一建议。

在澳门问题上，顾维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不赞成采取稍微激烈的行动，而主张以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处理，据顾维钧回忆，（张谦、王世杰）“会见后我又劝告他多加慎重，王世杰同意我的看法：不顾必要的外交礼节而推行任何造成刺激的政策是不可取的”；“对若干中国深为关注的问题，如收复香港和澳门，我个人看法是，我们表示我们的愿望时应当更为慎重一些，特别是外长会议并不是提出这种问题的适当场所，以澳门来说，我国驻里斯本公使馆与葡萄牙当局联系甚密，他们对澳门的看法和我对香港的一样”。顾维钧对香港问题是什么看法呢？他说：“我很了解英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和感情，并且知道过早提出我们的意见将会一事无成。在过去三年中我曾和英国两党的领导人作过多次非正式的谈话，使我相信英国人实际上是愿意将香港归还中国的。不过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有条不紊的移交计划。有许多事务细节必须商定，以显示英国政府并非马马虎虎地移交。”①

中国驻里斯本公使馆对澳门问题的态度与顾氏对香港问题的态度真是一致的吗？恐怕并不尽然。前已提及，张谦的态度要积极得多，他并非纯粹按照外交部的指令行事。张谦去伦敦，似有寻机说服王世杰支持收回澳门之意。在此之前，他已将主张收回澳门的电报发回国内，9月26日，这份电报又由外交部发往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处转王世杰，电文称：

> 中国急欲收回澳门，原因为：
>
> 1．治外法权取消后，外人在我全境内可以旅行、居住、经商，葡方无再保留澳门之必要。
>
> 2．澳门虽与一般租借地有别，但有碍中国主权统一。
>
> 3．法国现已交还广州湾，葡交还澳门不应再缓。
>
> 4．中日战争期间，澳门曾为日方使用，致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567页、5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仰根据以上理由与葡方交涉。①

王世杰、张谦会见后，9 月 28 日，王世杰复电外交部，称已将关于澳门问题的处理意见面告张谦，详情由张谦另电外交部。同一天，张谦致外交部的电报转达王世杰的指示要点如下：①向葡施压，派员会同查点敌产。②暂缓向葡提出接收敌物资。③收回澳门问题待王部长返国后再详加考虑。这表明，张谦的伦敦之行收效不大。实际上王世杰将他意见搁置起来，也未按蒋介石的指示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对澳门问题，刚上任不久的王世杰似乎还未理出一个头绪，也无意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当外交渠道按兵不动之际，临近澳门的广东却率先闹出了一些响动。

日本投降后，一度依靠日本势力作威作福而在当地臭名昭著的中山县坦洲伪联防大队大队长黄祥、日伪驻澳门特务机关头子黄公杰以及黄森、陈棣九等人，眼见大势已去，急欲另寻靠山，通过中统地下人员及国民党中山县长张惠长，表示愿以所部伪军乘澳门兵力薄弱之际，“联合夺取澳门以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请中央政府以保护侨民和维持治安名义，派军队进驻澳门，最后再由外交部门出面办理交涉。他们愿以此办法协助政府收回澳门，并预计在 9 月 10 日采取行动。②

此计划由中统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于 9 月 16 日转外交部征询意见，外交部 10 月 1 日的答复称：“澳门与香港有唇齿相依之势，中国若以武力侵占澳门，葡以英国为后盾，决难拱手相让，必指控我于联合国机构，中国纵有收回澳门之充分理由，至是陷于理屈地位。”外交部建议：“我方以防日人将物资运走为首，派兵附近布防，向联合国申述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主权谁属。”③ 这份答复委实令人失望，不仅轻易放弃了收回澳门主权的这一良机，而且一些考虑明显失当，除重申不平等的 1887 年中葡条约，主张收回方式应同于香港外，再次提出英葡同盟、公民投票决定主权谁属等要点，并不辨轻重，错用“侵占”二字，更显荒谬。

由于蒋介石多次就澳门问题征询意见，行政院也有催促，外交部又在 10 月下旬拟定了关于收复澳门的甲乙两套方案，分别于 1945 年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2 日呈行政院和蒋介石。

---

① 《外交部机要室致伦敦大使顾维钧转王世杰电文》（1945 年 9 月 26 日），外交部电文第 366 号。

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致外交部长王世杰代电》（1945 年 9 月 16 日）。

③ 《外交部致蒋委员长公函》（1945 年 10 月 1 日），欧字第 1942 号。

方案甲

由中葡两国政府磋商交还条件。

1. 第一步办法，由中国主张无条件收回，澳门原由无条件让与葡萄牙，这次理应无条件交还中国，除私人财产应予承认及保护外，所有公产公物仿照广州湾成例，无偿让与中国政府。

2. 让一步办法，为澳门地区无条件收回，公产公物有偿移转中国政府。

3. 最后让步办法，为澳门地区连同公产公物一并公平作价，由中国政府购回。

方案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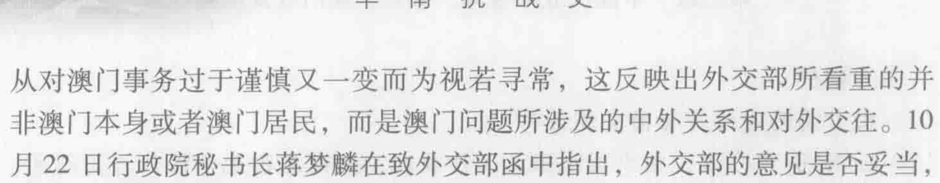
葡国政府若仍拒绝讨论，则中国可申述理由，诉诸国际和平机构。主张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主权谁属。

关于收回时机，外交部的意见是："俟政情安定和九龙收回后处理。"①

这份方案接近于8月31日欧洲司所拟的那份方案，估计是在该方案的基础上拟定的。当时关于澳门问题，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授权外交部处理，各种信息均汇总到外交部，有关人士的种种提议也交由外交部加以筛选。外交部所提方案，基本上都为蒋介石所采纳。可惜外交部过于软弱，不敢越雷池一步，十分害怕引起任何外交纠纷，怯于理直气壮地要求收回澳门主权。这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收回，但暂不收回澳门（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同，国民政府是想收回又不敢收回，自愿受1887年条约束缚，担心英美不快，担心葡利用英葡同盟，担心在联合国被指控，甚至极不适当地提出以"公民投票""决定主权准属"，更是缺乏远见。主权问题本属不容讨论、丝毫不能含糊的大是大非问题，又岂能以公民投票来决定取舍呢？

关于收回后的治理方式，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奉蒋介石指示在致外交部的公函中提出，根据收复威海卫（1930年4月英国交还）和广州湾（1945年8月法国交还）等租借地的经验，以及澳门地区几个世纪以来殖民统治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现状，收复后的澳门应设立为与省同级的特别市，直属行政院。这么做既可使收复后的澳门具有较高的行政地位，又可显示中央政府对澳门的重视程度和特殊关怀。应当说，这一考虑还是颇有道理的。但外交部10月11日复行政院的密函却认为澳门不宜设立为特别市，应比照广州湾成例设立为普通市，若为顾及涉外事项及地方上之需要，则收回初期市长人选可由外交部推荐，由广东省政府委任。

① 《外交部致行政院秘书处函》（1945年10月30日），欧字第10461号。



从对澳门事务过于谨慎又一变而为视若寻常，这反映出外交部所看重的并非澳门本身或者澳门居民，而是澳门问题所涉及的中外关系和对外交往。10月22日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致外交部函中指出，外交部的意见是否妥当，还应再作进一步研究。①

三、广州行营封锁澳门事件

利用伪军黄祥进占澳门的计划搁浅后，率第二方面军到广州受降后就任广州行营主任的张发奎并未就此放弃努力。以他为首的广州行营主张对港澳采取强硬态度，认为这既可顺应人心，收复失地，也不至引起大的国际争端。据当时任行营参谋处长的李汉冲回忆，张发奎有借助美国牵制英国的想法。张发奎不止一次说过："美国为扩张其太平洋势力范围，必须排斥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因而它也不愿意英国占据香港，如果我们对香港发生了事件，美国暗中一定高兴，决不会出面来支持香港。英国此时如无美国的支持，当不敢单独对我们有所动作，因此，我们对香港的任何地方纠纷，都不至酿成为国际的争端。"第二方面军的官兵中还有不少人主张武装占领港澳，扩大事态，以最后收回港澳。他们根据战时港澳英、葡军队狼狈软弱的经验，认为只要一个师即可占领香港，一个营即可占领澳门，葡萄牙是一个蕞尔小国，澳门全部军警不到1 000人，海军只有两艘数百吨的小炮舰。因此，他们认为收回澳门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军人此时出入港澳颇为自如，口口声声说"我们不是进入外国地区，而是在自己家乡的走动"。广州行营当时对港澳采取了"寻求机会，制造借口，纵容部属，扩大事态"的方针。②

张发奎首先针对澳门采取了行动。

10月初，香港方面曾派英陆军驻港司令菲士丁少将到广州拜会张发奎，其他英美人士在华南活动者，也都顺便到行营拜访，唯独澳门没有派人前来，加上澳葡当局对查封敌伪物资与引渡汉奸之事推三阻四，张发奎便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山县长张惠长及驻军159师师长刘绍武策动澳门及中山各界提出收回澳门的口号，进行反葡澳政府的活动。张惠长在各种集会及宴会上都为收回澳门大造舆论。他说："澳门原本是中山县的地方，是中山

---

① 载自陈锡豪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84页、130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

② 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见广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发行），163页、164页、180页，广州，1962年印刷。

县的一部分。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全国国土都已光复，澳门也不能再让帝国主义的葡萄牙继续占领下去。我们中国人应该收复澳门；中山县人民更要收复澳门。”中山县临时参议会、中山县商会等则表示“热烈支持”。[①] 接着，以屈仁则为支部长的国民党澳门支部又在澳门境内发动集会、游行，反对葡萄牙继续统治澳门。中山各界为支持澳胞要求，也组织代表团、请愿团等赴澳，与澳胞联合行动。这些活动引起了澳葡当局的恐慌。为了扑灭抗议声浪，澳葡当局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关闭了前山一带边境的出入口，限制内地人民进入澳门，禁止澳门居民集会宣传。严厉取缔澳门居民的反葡活动。

对澳葡当局的这种反应，广州行营决定给予进一步的反击。

首先，张发奎致电中央，要求收回澳门。他在11月中旬致蒋介石的一份电报中说：“查收复澳门曾迭具申意见电请核示在案，窃以收复澳门不仅关系国土主权，其于目前之地方治安与惩办奸党、收回物资诸事尤为刻不容缓之事，盖澳门向为烟赌盗匪之薮，自日军投降以来，而一般汉奸及日本间谍罪犯暨日军船舰物资均先后逃匿该处，奸匪更以为据点，设立电台，组织策动机关，葡方均为之掩护，虽迭经交涉，抗不引渡，苟不予以有效办法迅速处理，诚恐任其滋蔓，则噬脐莫及。职以重寄南疆，对此瓯脱之区，兹日不为心忧思虑，冀其早日收回，以杜祸患而靖地方，谨再电呈，伏乞核示。”[②]

蒋介石接到电报，也甚为重视，11月20日即将电报转外交部长王世杰，并要求“3日内速议复蒋中正”。24日，王世杰在致蒋介石的密函中称“收回澳门时机尚未成熟”，建议“暂缓处理”。12月1日蒋介石致电王世杰：“对外交部长11月24日……所呈意见准照办理，并电知张发奎。”[③]

争取中央支持一途虽被外交部驳回，但张发奎已主动采取行动，使事态进一步扩大。据李汉冲回忆，广州行营“一方面利用当时有日本人数名匿居澳门之情报，向澳门政府提出备忘录，要求将该日人立即交出，否则中国军队保留有进入澳门搜捕日犯之行动自由，并声明如因此引起之任何后果，概由澳门政府负责。同时制造有日俘数十名潜逃澳门，现为澳门政府所庇护等事实，以扩大事件之严重性”；另一方面，就在蒋介石将电报转

---

① 陈庆斌：《“收复澳门”为名企图消灭五桂山人民武装亲历》，广州市政协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134页、13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

② 载自陈锡豪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86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

③ 《国民政府致王世杰代电》（1945年12月1日），府军爱字第916号。

王世杰的11月20日，张发奎已命令驻中山的第64军159师师长刘绍武派出该师的陈庆斌团，率同师炮兵一营，进驻前山边境，对澳门实施边境封锁，禁止一切商品出口，包括澳门每日依赖我方供给的牲畜、肉类和蔬菜等。刘绍武亲自到前山部署，将炮口瞄准澳门要地松山，并频频催促行营下达攻击命令。①

执行任务的陈庆斌团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宣布"准备要收复澳门，故先行对澳门封锁，所有人口和物资一律严禁进入澳门"，并派出检查岗哨分别在水陆两路盘查，往来澳门的客轮，渔船及其他船只均禁止开行，中山与澳门两地的交通顿时完全断绝。完成封锁的次日，张惠长、刘绍武一同到翠微、前山及拱北关闸附近巡视，张惠长对一些被阻在拱北关前想到澳门的人说："等收回澳门以后再去吧，现在忙什么?"在一个星期内，中国军队连续几晚在湾仔和前山等地进行夜间实弹演习，同时以两艘小登陆艇架上轻重机枪，驶到澳门南边海面游弋，并不时在夜间向澳门侧面实弹射击。在前山、拱北等处，又命令炮兵连和迫击炮连分别实施超越澳门地区上空的炮火夜间射击，使澳门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炮声。②

刘绍武部当然是奉张发奎的命令行事，但因尚未征得中央政府同意，张发奎在进呈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报告中，声称这是前线部队激于澳葡当局的"倒行逆施"而请求采取的行动。报告引述159师师长刘绍武的电报称："澳政府近来对我更加倒行逆施，作种种不利于我之措施，大量吸取我国币，并压低我币值，虐待华侨，掩藏奸伪，无所不用其极，本师为增强我外交力量，并对葡人之无善措施，拟即发动民众对澳门实行柴粮菜蔬等日用品之封锁。"③ 张发奎并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封锁行动。

在张发奎的封锁下，澳门一时秩序大乱，食品价格猛涨，其中米价上涨一倍，蔬菜价格上涨三四倍，工业品如布匹等价格却大跌，市面萧条，人心惶惶，一些逃澳的日伪人员及大买办等极其恐慌，不少人转逃香港，也有的冒充葡籍转逃欧洲或东南亚，中国居民则纷纷返回内地避难。中国方面稍作强硬表示，澳葡当局即陷入了极其狼狈的境地。

为摆脱困境，澳门政府除通过外交部驻澳专员唐榴进行斡旋外，并由驻华代办和葡萄牙外交部向国民政府进行交涉。

---

① 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广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发行），181页，广州，1962年印刷。

② 陈庆斌:《"收复澳门"为名企图消灭五桂山人民武装亲历》，广州市政协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136页、13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

③ 《国民政府致外交部军令部代电》（1945年11月24日），府军爱字第847号。

唐榴与驻葡公使张谦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外交官。这位广东中山籍的职业外交人员，任职经历与张谦并无大的区别。他以外交部代表身份到澳门活动一段时间后，于1945年10月被任命为首任驻澳专员。但他不像是中国外交部的专员，倒像是澳葡当局的专员。他任职期间在引渡汉奸和清查敌伪财产等方面无所作为，却一个劲地向国民政府和外交部打电报颂扬澳葡当局，在一系列交涉事件中倾向澳门政府。这位颇受外交部信赖的驻澳专员，在公开场合引领侨众“高呼葡总统万岁，澳督康健万岁，连续数起，狂而忘形”。他声称“国家大事不须我们过问，吾人只须巩固中葡利益，永久亲善合作”即可。“葡外交部对派唐榴为专员极表满意。”① 但“参加侨众以其有辱国体，咸表愤慨”。国民政府也促令外交部予以查办，指出唐榴“对于国民党立场及政府行政系统毫无认识，近在澳门言行失检之处颇多”②。1946年初，唐榴因私吞敌伪财产和多次延误外交要务，终被外交部免职，但不久后的1947年1月，他又被外交部任为驻美国檀香山总领事。

封锁事件发生后，唐榴致函广东省主席罗卓英，以封锁对葡人影响并不大而在澳华民则衣食无着为说词，请求解除对澳门的封锁。③ 他还致函外交部提出同样的要求。

里斯本方面，据驻葡公使张谦1月27日向外交部报告，11月24日葡外交部约见张谦，就澳门被封锁之事表示了以下意见：①葡政府在澳门毫无抑低中国法币之意，中国地方军事当局以此为借口封锁澳门，于理不合。②澳门食粮一直由内地输入，希望中方顾念数十万人民生活将封锁解除。③近来中国报纸对澳门颇多激烈议论，中方作何解释。张公使答以战后新闻检查制度已被撤销，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恐难干预。他并请示外交部，对葡政府意见“应如何答复，乞电示”④。他没有像唐榴那样四处代葡人说项。

澳门政府除请托唐榴缓颊之外，是否曾向广东方面表示愿意妥协？据李汉冲回忆，澳方曾函复广州行营，表示保证将所有在澳日人驱逐出境，交由粤方处理；引渡汉奸战犯并查封其资产；要求按照香港办法，规定中国军民可以自由出入澳境，不受任何限制；设立广州行营驻澳联络专员和肃奸专员办理有关军纪维护及引渡案件；允许中国方面的一切党团公开活动，群众集会游行绝对自由等等。澳方并派雅玛纽来穗道歉，同时恢复驻

---

① 《驻葡公使张谦致外交部电》（1945年11月15日），第562号。

② 《国民政府致外交部代电》（1946年1月21日），府军义字第1687号。

③ 《唐榴致广东省政府罗主席函》（1945年12月16日）。

④ 《驻葡公使张谦致外交部电》（1945年11月25日），第569号。

穗领事馆，以雅玛纽为驻穗领事。雅玛纽在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澳门交还中国极有可能，为求中国领土之完整，本人极愿对此作各种之努力。"①

但这仅仅是澳门政府的一种外交姿态，实际上封锁期间双方还发生了一系列纠纷。在引渡汉奸和查封敌产方面，澳门的配合仍极勉强，屡屡加以阻延和推托。绝大部分经济汉奸均被澳门保护下来。关于雅玛纽的道歉，1946年1月20日葡驻穗领事蒙泰罗致函《西南日报》做了澄清。据他讲，雅玛纽为副领事，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即使他为葡萄牙领事，众所周知，在属于中央政府权力范围的这么一件重要事情上，领事馆既不能有所决定，也不得发表意见"②。实际上，澳葡当局并未真正改弦易辙，采取与广州行营切实合作的态度。

何应钦在接到张发奎的报告之后，立即转呈蒋介石。11月24日，蒋介石命军令部长和外交部长核议具报，外交部再次做了十分消极的选择。12月20日，外交部致电军令部称："我对澳门政策，以目前内外政情尚未安定，认为收回该地时机尚未成熟，对澳门所发生之事件，决定暂以外交方式向葡交涉，封锁澳门现时似无必要。除经将上述意见节呈委座请示外……特电请查以核办。"③

这一意见又为蒋介石所接受。12月22日，蒋介石指示："即电何应钦总司令饬知张发奎转饬所属勿对澳门封锁，倘澳门政府有庇护奸匪或敌伪情事，即由外交部严厉交涉。"军令部于28日将此项指示通报了外交部。④广州行营在接到命令后撤销了对澳门的武装封锁。12月26日，内地恢复了对澳门食品供应。

至此，历时一月余的封锁事件宣告结束，地方当局借机收回澳门的计划未能如愿。

四、国民政府放弃收回澳门计划的原因

解除封锁之后，国民政府内部实际上已统一于外交部的立场，即暂时不再考虑收回澳门。但各方要求收回的呼声依然很高。

---

① 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广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发行），182页，广州，1962年印刷。

② 载自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247页，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

③ 《外交部致军令部代电》（1945年12月20日），欧字第12572号。

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致外交部公函》（1945年12月28日），令二商第8008号。

1946 年 2 月 5 日，第 64 军 159 师师长刘绍武以宣慰同胞为名，未通知澳门政府，率武装警卫一个排进入澳门。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刘绍武发表演讲说："澳门由于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受治外人，同胞痛苦有如水深火热，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中国已为五强之一，所有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中国领土必须完整，澳门必须迅速收回，才可用副同胞之愿望。"①

1946 年 5 月 21 日，西康省参议会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要求收回澳门，接着全国各省、市参议会也纷纷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并通电全国。湖南、江苏、广东等省参议会先后电请南京中央政府，要求收回澳门。②

1947 年 4 月 1 日，中葡两国就葡萄牙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放弃在上海、厦门等公共租界的特权等事项换文，但这份换文对中葡之间最重要的澳门问题却只字未提。对于各省参议会要求收回澳门的通电，国民政府做了如下批复："关于收回澳门，参议会曾有此项建议，经交外交部接办。据称，目前国际形势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俟时机成熟，再提出交涉收回。"③ 此后，国民党在大陆的处境每况愈下，收回澳门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综观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在收回澳门问题上的种种举措，笔者认为，国民政府对收回问题还是经过了反复考虑的，也确实有心收回这块已流失百年之久的殖民地，一些地方军政官员和中下级官兵还采取了积极的行动。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之后，国民政府最终将之无限期推迟了。究其原因，或者可从这样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葡萄牙政府和澳葡当局为保住澳门这块远东乐土，明里暗里搞了一些花样：

其一，打"英国牌"。战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是相当强硬的，拒不向中国让步。而中国外交部官员又恰有港澳一体、先香港后澳门的打算，对英葡同盟投鼠忌器。不知葡方对中方内部的这种考虑是否洞悉，但明显地将打"英国牌"当作一种对策。1945 年 10 月 6 日，葡总理在里斯本发表战后文告，阐述葡萄牙在二次大战时的立场，其中最重要者为公开了葡在 1943 年曾与英国签订密约，将阿速尔群岛租给英国充当海军基地，英国则承诺在战后维护葡萄牙在远东的利益。言下之意澳门已得到英国保

---

① 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广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内部发行），183 页，广州，1962 年印刷。

② 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233 页，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

③ 黄鸿钊：《澳门史》，192 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



护，中国不可轻言收回。[1] 另外，在封锁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澳门葡萄牙政府就急电香港，请来两艘英国兵舰，停泊在澳门海面以防意外”[2]。澳葡当局曾“请求英国政府出面向南京政府求情”，“还请求英国保护澳门，将澳门的防卫问题并入香港方面，为香港英军防卫任务之一，并规定尔后有关澳门问题概依存香港处理云”[3]。

其二，打“民意牌”。澳葡当局在不同场合数度提到战争期间，特别是香港沦陷后，澳门成为数十万难民的庇护所，救助了无数中国难民，有功于中国，并策动一批亲葡的澳门商人和华侨团体，在日本投降后，以澳门各华侨团体主席名义代表全澳华侨向葡京各报拍发致葡总统、总理和殖民部长的通电，盛赞葡政府和澳督在战争期间严守中立，使澳门居民获致安全，并感谢葡政府在战时对澳门居民的关心和照顾。[4] 澳葡当局企图借此显示澳门居民对葡萄牙统治的拥戴。

其三，利用国共矛盾。抗战中后期，华南地区国共两党的斗争十分尖锐。澳门所处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国共两党的势力都非常活跃，日、伪、国、共在号称中立区的澳门也都有或大或小的力量。澳葡当局根据局势变化和价值大小，与四方均维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1944 年 8 月，经事先与澳门当局联系，中共中山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派代表到澳门，与澳门总督的代表、政治部秘书慕拉士会见，双方达成合作协议，义勇大队帮助澳门当局维持澳门及其外围的治安，澳门当局同意义勇大队秘密在澳募捐，购买子弹、医药及电台等。[5] 前文述及，抗战结束之后，日伪在澳门的特务头子黄公杰曾与伪军头目黄祥一起向广州行营献计，愿先带人攻占澳门，再请国民党接管，但他的计划被外交部所否定。走投无路之际，他于 1945 年 10 月率部下数百人向中共珠江纵队投降。“因其罪恶尽人皆知”，珠江纵队将其扣留。澳葡政府闻讯，即由警察所派人来要求将他移交澳门当局公审，并口头提出如准其所请，澳门政府愿援助珠江纵队，还保证公审后将他送还珠江纵队。澳方之所以急欲控制此人，一是因其掌握不少战时澳葡当局

---

① 《驻葡公使张谦致外交部电》（1945 年 10 月 10 日），第 536 号。

② 陈庆斌：《“收复澳门”为名企图消灭五桂山人民武装亲历》，广州市政协编：《广州文史资料》，第 15 辑，137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

③ 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广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内部发行），181 页、182 页，广州，1962 年印刷。

④ 载自陈锡豪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86 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8 年硕士论文。

⑤ 欧初：《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见《炎黄春秋》，1995 年第 11 期。

与日军交往详情，澳葡当局担心他向中国方面供出，使所谓中立的假象被彻底揭穿，中国政府更有收回的理由；二是黄在战后与多股伪军联系“献城”，使澳葡当局深为痛恨。对此内幕，珠江纵队方面是不知情的，以为仅是“葡方受他压迫，极痛恨”，拟以下述三项条件为前提同意葡方要求，即：①保证将他处决。②没收全部财产归我支配。③协助我方在澳公开募捐。但为慎重起见，广东省委书记尹林平专门打电报向中央请示：“惟王［黄］是一个汉奸，如此处理，在国家立场上与国际法手续上是否适当，我们一无所知。请速复。”① 结果，经中共中央同意，珠江纵队允许澳葡当局“以重金”将黄公杰“赎回”。②

但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黄公杰既为知名汉奸，战时杀害过国民党在澳人员，战后居然又转向中共投诚，这都是国民党所无法容忍的，故得知黄公杰被澳门当局掌握后，即通过外交途径以汉奸罪要求引渡。澳门政府初时不允，但此时正是封锁前后，澳葡当局不欲进一步激怒国民政府，便佯允在澳公审完毕后研究遣送问题，却于1946年1月2日凌晨3时在转移囚禁地点时将黄公杰击毙，理由是黄公杰试图逃跑。人们一直怀疑这是澳方有意为之。③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因为外交部软弱胆怯，国民政府一再错失良机。本来，中国在取得抗战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日本归还台湾和澎湖，法国交还广州湾的形势下，从已经衰落的殖民小国葡萄牙手中收回澳门应属探囊取物之事，不会有太多障碍。葡澳政府尽管煞费苦心，实际上也拿不出几张过硬的底牌。但外交部却瞻前顾后，不敢建议国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致使收回澳门的最佳时机飘然而逝，委实令人惋惜。不久，蒋介石挑起内战，大陆地区烽烟四起，战火连绵，澳门回归问题已无足轻重了。外交部所谓“内外政情尚未安定”，“时机还未成熟”，也是无奈之言。国民政府这具庞然大物，经过近20年的外侵内蚀，外表虽还堂皇，内里实已疲弱，在抗战结束后的动荡年代，做出那样一个难免畏葸之讥的选择，确也有其难言的苦衷。

---

① 《林平给中央电——关于可否送王［黄］公杰往澳葡政府问题》（1945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8册，533页，广州，1987年印刷。

② 载自陈锡豪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95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

③ 载自陈锡豪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96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

第八章 华南抗战余论

第一节 张发奎与两广抗战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北伐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师长、副军长、军长的第4军是北伐军的主力，曾取得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役的胜利，被誉为“铁军”。抗战军兴，他又受命出任第4战区代司令长官等重要军职，率部转战于华东、华中、华南，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桂南会战、桂柳会战等，是指挥两广抗战的主要将领之一。抗战胜利，他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的名义在广州接受华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他曾严词拒绝汪精卫的拉拢诱降，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较好的合作。

一、受命督师粤桂，调整军事部署

广州、武汉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重新划分战区，任命武汉会战后率部退守平江一带的张发奎为第4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地区作战。兵力包括吴奇伟第9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夏威第16集团军，共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1939年元旦，张发奎在当时华南的抗日中心曲江宣誓就职。



图8－1 第4战区长官张发奎

当时两广地区广西尚是一片净土，广东适逢惠广战役新败之余，日军在占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城镇后，攻势告一段落，以第21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一部约4万人在上述区域巩固

既占据点，并加强外围守备，从事公路铁路交通的修筑。原负责广东守备的余汉谋第12集团军退守粤北。

第4战区序列部队虽号称18个师，近20万人，但实力有限。广西部队主力已由李宗仁率领到第5战区，留守的夏威第16集团军是由地方保安团队扩编而成，兵员较足，战斗力却不强；广东部队减员较多，64、66军是刚从武汉前线调回整补的，第4军在淞沪会战后又参加了南浔会战（1939年初调回广东甫及半年又归入第9战区编制），余汉谋刚经过惠广战役，“故实际上的兵力，不足三分之一”①。

根据上述情况，张发奎确定了调整军事部署，稳定第一线，加强阵地工事，确保粤北的守势作战方针。

首先，是整顿内部，激励士气，加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张发奎发表《告军人书》，号召官兵坚决抗日，洗刷丢失广州的耻辱。他在对第12集团军旅以上军官训话时说：我张发奎是由粤军第1师出身的军官，你们12集团军的部队也是由粤军第1师发展起来的。我们粤军第一师从邓仲元师长建立以来日益发展，经过无数次的战役，从没有打过败仗，是国民革命最坚强的部队，不意这次你们12集团军在惠广战役中，只和敌人作过几次小小的接触，就溃败下来，这不仅是粤军第1师同仁的奇耻大辱，也是广东人民的奇耻大辱。我这次来当第4战区司令官，先要整顿部队恢复作战能力，整理政治，增加行政效率，支持军事，消灭敌人，我回广东工作并不是来争官做、争地盘，而是来协助余总司令振军经武，恢复名誉。待广州收复后，决将广州军政大权交还余总司令负责。② 随后他开始了对部队官兵的整顿，将守卫惠广前线失职的第151师师长莫希德送交重庆军法执行总监查办，对部分师、旅长给予革职、记过处分；解除李煦寰第4战区政治部主任、李洁之第4战区兵站总监主任职务，分以丘誉、冯次淇接替。

其次，在南雄修仁成立第4战区干部训练团，由张发奎亲自主持，一方面将党政军各级干部轮流调训，另一方面挑选各部队优秀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和储备初级军官。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从各地招收青年学生，培训战地组训民众及协助部队作战的政工人员。干训团先后培训毕业4 000余人，并组训了粤北10县壮丁。

---

① 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记》，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2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② 李洁之：《抗战时期四、七战区交替始末》，载自《广东文史资料》，第55辑，8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再次，减少指挥层次，明确各部职责。将作战区域划分为东南西北4区，每区以一个集团军担任。

1. 东区——第9集团军吴奇伟指挥第65军、预备第6师及独立第9旅。

2. 南区——第16集团军夏威指挥原第31、46两军。

3. 西区——将粤省保安团抽出8个团编为1军，加上邓龙光第64军，编为第35集团军，由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兼任总司令，邓龙光为副总司令。

4. 北区——由余汉谋指挥第12集团军之第62、63、66军及独立第20旅。

经过整训，调整充实了领导指挥机构，广大官兵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士气和军事技术、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为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坚持两广抗战打下了一定基础。

当然，在调整、整训的过程中，由于两广军队各系统之间的不同历史渊源和隶属关系，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分歧，像上述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等原都是第4军将领，他们分别担负了广东东、西两区的防务，这被余汉谋集团的人视为有意分割广东部队的统一，树立原第4军系统的势力。1940年1月张发奎去广西后，分掌广东军、政的余汉谋、李汉魂之间果然因权力分配问题所生嫌隙而相互摩擦。至于属于广西部队的夏威集团，实际上主要听命于坐镇桂林行营的白崇禧，张发奎很少过问。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纠葛被有形无形地沿袭下来。加上蒋介石对两广军事自有他的一套安排，第4战区长官部在1940年1月之前实际只负责广东方面，而在1940年1月之后，又只能负责广西方面，广东方面则转交余汉谋，并于不久另设第7战区。故抗战期间张发奎并不能尽伸其杀敌报国之志，反而时时要为弥合内部纠纷而苦恼。加上张发奎本人也并不能完全超脱于派别和个人恩怨之上，难免有偏颇和意气用事之时，这对两广战事自然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二、粤北、桂南协调指挥，是非功过尚待评说

1939年11月15日，日军集结陆海空军3万余人，在广西钦州湾强行登陆，24日攻陷南宁，中国军队15万多人在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等指挥下，与日军进行桂南会战，于12月18日对敌军发起反攻，31日攻克东北部要隘昆仑关，取得昆仑关大捷。1940年1月28日，日军发动新的攻势，于2月2日攻陷南宁北部重镇宾阳，3日再度攻陷昆仑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之后，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桂南会战结束。

会战期间，驻粤日军为牵制中国兵力，从1939年12月17日起，又兵分三路向粤北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第一次粤北会战开始，余汉谋第12集团军进行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如前所述，日军进攻粤北次日桂南方面中国军队开始猛烈反攻，粤北日军遂不敢恋战，在29、30日占领翁源、英德后奉命后撤，调主力增援桂南，第12集团军乘机从26日起全线反攻，经5日鏖战，相继克复原阵地各要点。

桂南会战和粤北会战作战区域都在两广，正属张发奎第4战区负责的区域，张发奎参与了这两次会战的指挥，为粤北会战的胜利和桂南会战前期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指挥机构的重叠和内部派系隔阂未能消除，他在这两次会战中的处境也较为微妙，与某些传记的说法不能完全吻合。

桂南会战前期，张发奎在粤北，了解到广州日军为配合桂南的行动北进牵制我军的企图，决定争取主动，制敌机先，“即以一部在铁路正面，另以一部进出广、花、增、从间地区，先行向敌方袭击，以摧破他的攻击准备”①。对粤北会战酝酿阶段的应敌之策做了较为正确的处置。这期间，由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来电催促，张发奎遂于12月6日启程经衡阳于8日抵达桂东南之迁江指挥所，参加党政军高级会议，共同研究桂南反击作战计划。张发奎到达当日，白崇禧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攻击计划及部署正与张长官及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会商，一俟详细策定后，立即呈报”，并就指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桂南地区属于第4战区范围，似宜以张长官担任为宜。职于日前曾经电请钧座，希电其前来指挥。现张长官已到此，拟由其负责”②。但此前的6日蒋介石在致白崇禧电报中就已定“仍由兄亲自统一指挥”，10日的复电未再提此事，估计暂无意改变原定人事安排，这样在12月13日白崇禧向蒋报告参战部队序列时，确定西路军、北路军、东路军总指挥分别为夏威、徐庭瑶、蔡廷锴，张发奎未担任具体指挥任务。③因此会战结束后，张发奎即离开迁江指挥所，但未立即返粤北，而是“经柳州、平乐、梧州往西江视察。我在封川、都城（今郁南）、德庆等地，均曾召集各界举行座谈会，随后并拟再赴南路视察，适因粤北吃紧，始中止南

① 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3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②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870页、870～87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路之行，而于12月27日返曲江”①。

可见，从12月6—27日，张发奎一直是在湘桂粤间奔波。前已述及，粤北会战日军出动的时间是12月17日，战况最激烈的时间为12月24—30日，之后即撤出战斗。这段时间，张发奎基本上不在粤北。但有的传记对此却说得相当模糊，一份传记说：“1939年11月广州地区日军为策应桂南作战，调集各兵种军队4万余人，沿粤汉路向粤北进犯，张指挥第十二集团军对敌进行正面截击……共毙伤敌一万多人，称为第一次粤北战役。”② 另一份传记主要依据张发奎本人的《抗日战争回忆记》，对张发奎在粤北会战中的指挥情况也有不尽准确的描述，给读者的印象是似乎粤北会战始终是由张发奎亲自指挥。③ 既然从12月6—27日张发奎都在桂林行营开会和在桂粤间“为了配合以后之作战”进行视察，举行各界座谈会，跋涉于险峻的桂南山区和蜿蜒的西江之上，他对粤北战况的了解和指导，就只有依靠电台（电话?）遥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什么来保障对粤北前线瞬息万变的敌情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及时采取相应的御敌之策？他又如何与粤北前线的余汉谋等人及其他幕僚人员有方便的联络和研究，并随时发号施令呢？由此可见，在第一次粤北会战期间，张发奎作为战区的最高长官对如何击退粤北之敌虽提出过相关指导意见，但大部分时间未在第一线具体负责指挥。

粤北会战后期，张发奎回到曲江后，对如何击退敌人进攻做了较为适切的处置。他认为不能令部队以守势施行逐次抵抗，因曲江是战区的基地，距第一线不及100公里，再没有深广的地区可以与敌周旋，必须以主动的攻击手段，把握时机，乘敌人突进分离的时候，予以各个击破。他命令第12集团军各部、第35集团军之暂2军、第2游击纵队及增援之第54军等部队从不同方向相互协同，主动向敌进攻。至1940年1月初，会战终于以恢复至战前态势而结束。

关于这次会战歼敌的人数，上引传记所说“毙伤敌一万多人”恐不确切。当时国民政府公布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 966人，④ 日方战史

① 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3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② 丁身尊：《铁军丧敌胆，名将震倭顽》，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22~2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③ 徐好文、范银飞等：《张发奎》，见《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5集，335~33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④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75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则称："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 293 名（39 名军官），负伤 1 281 名（57 名军官），死伤共 1 574 名。[①] 估计中方数字出于宣传需要而有所夸大，战后张发奎本人对这次会战结果的描述是："1 000 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 58 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②] 这与敌第 21 军的记录大体接近，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数字。

进攻粤北的日军主力西调后，桂南再度吃紧。1940 年 1 月 7 日，蒋介石令张发奎将广东西江、东江、北江地区的指挥权移交余汉谋，转而指挥桂南。张发奎对取消其广东地区指挥实权的这一安排颇感失意，在 10 日交卸之后，11 日回到始兴老家。其间，陈诚、白崇禧、张治中不断以电报、电话劝其尽快到任，张发奎遂在 1 月 20 日启程。经衡阳、桂林、柳州于 27 日到达迁江桂林行营指挥所。

如前所述，桂南会战一直是白崇禧坐镇指挥，中间蒋介石又派陈诚、李济深前往协助，张发奎战后在回忆录中说是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将他调来的，"桂南之战，实际非我指挥"，"在我一切情况未明了之前，我第一件事，就签署下达一个正面部队退却的命令。这个命令已经行营指挥所的人员预先拟定，好像是专待我来签署下达。白崇禧将军和林参谋长告诉我，当晚的情况已到了不容丝毫考虑片刻，否则昆仑关附近的部队有被敌包围歼灭的可能。我无可奈何，只好忍痛负起这个失败的责任"[③]。另一部关于他的传记称："1940 年 1 月下旬，张发奎奉蒋介石令到广西指挥桂南战役。由于到达时败局已定，此役原由军委会桂林行营指挥，张却代人受过，签署了撤退令，事后受到记大过处分。"[④] 似乎蒋介石、陈城、白崇禧、张治中等已料到桂南战事必败无疑，让他前来是为了找一个替罪羊，代人受过，这种说法值得推敲。

其一，蒋介石在 1 月 7 日就已决定张发奎来桂南指挥，张发奎却延至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1 分册，7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中译本。

② 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33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③ 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34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④ 丁身尊：《铁军丧敌胆，名将震倭顽》，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23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27日才到指挥所，中间整20天是因他自己的原因耽搁的，否则不至于一到迁江就是面临“签署撤退令”的局面。

其二，从桂南会战的时间表来看，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钦州湾登陆，24日占领南宁；12月18日，中国军队发起反攻，31日夺回昆仑关，1940年1月1—11日则是扫荡昆仑关外围，向南宁日军迫近的阶段，可以说，拟调张发奎来桂之际正是中国军队经苦战后取得在整个抗战中亦属十分难得的新胜之余，而非将败之时。

昆仑关铩羽之后，日军从1940年1月7日开始将粤北撤回的近卫旅团、第18师团运至钦州增援桂南，至22日集结完毕，预定于1月28日开始进攻，而张发奎正是1月27日到达前线指挥所，早于日军总攻之前一天到达，应当说还是胜负未分之际。当然，部队的调遣、配置已基本完毕，等他来时再调整不可能了。但第一，日军蠢蠢欲动大举兴兵，中国军队急待调整部署，做好临战准备的阶段，张发奎回故乡休息去了；第二，即至1月27日，也还是大战即将开始，未到“败局已定”程度，不可能一到就是签署拟好的撤退令，实际上，前来协助指挥的陈诚、李济深、张治中等均是同时到达，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正式授命由张发奎负责指挥，陈诚“不居名义，在此协助张长官指挥作战”①。蒋介石这份电报的意图可能是想统一桂南前线的指挥权限，明确张发奎的指挥权，也是对迭电催促张发奎到桂南来的一种交待。

1月28日上午8时，日军进攻开始后，因整个战场有雾影响能见度，攻击受影响，到31日晚日军方进入有利的攻击位置，日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遂电令各部：“本作战之成败在于明日（1日）之决战，官兵须人人奋战，以期必胜。”② 2月2日，日军攻陷宾阳，3日陷昆仑关，之后攻势基本停止，会战遂告结束。故后期会战的转折点应当是2月1日。

其三，是否“代人受过”？会战结束之初的2月16日，张发奎有份致蒋介石的自请处分电，称：“职奉令指挥桂南军事，自忖材力不称，嗣迭奉钧令敦促，爰不敢再计成败，毅然西来。本期袭昆仑关战胜余威，率循成规，勉力撑持。乃只身抵迁数日，司令部人员尚在输送之际，敌竟潜师北进，陷我宾阳。我昆仑关各部仓卒突围，迭告损失，职诚信未孚，坐失机

① 《桂南会战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见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18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5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宜，实属指导无方，难辞重咎，拟请先行将职严予处分，以昭炯戒。”[①] 此电一是说“本期袭昆仑关战胜余威”，而不是“败局已定”；二是说自己“指导无方，难辞重咎”，这固然有严于责己之意，主要责任当然还是在于白崇禧、陈诚等人，但张发奎作为后期会战主要指挥官之一，部队溃败如此之快，损失如此重大，说自己毫无责任，也未必符合事实。从总结阶段的处分来看，陈诚、白崇禧均被降级，桂林行营被撤销，不少集团军司令、军长被撤职查办，是“七七”事变以来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也可以说别人的过，别人已经受了，并未叫他人当“替罪羊”，张发奎仅被记大过而如此忿忿不平，倒也大可不必。

上引同一本书的另一份张发奎传记则更让人莫名其妙：“1940 年春，(日军）侵占广西宾阳、思陇，围攻昆仑关，桂南危急。张发奎移司令部于柳州指挥，2 月获昆仑关战役胜利，歼敌甚众。”[②] 这是误将 1939 年 12 月的第一次昆仑关大捷与 1940 年 2 月的第二次昆仑关失守混为一谈，又移花接木到张发奎名下，以致得到这种喜剧性效果。

三、桂柳会战回天无力，收复失地广州受降

桂柳会战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始终由张发奎负责指挥的会战，张发奎自己也认为是其“在八年抗战中最值得回忆的战役”，是其军事生涯的一件杰作。“会战虽然是失败了，但我自认亘全会战的作战指导来说，无论敌情判断、决心、处置，都吻合了战术的原则”，“特别包含了一个内线作战指挥运动的典型”[③]。

桂柳会战自 1944 年 9 月至 11 月，历时 3 个月。日军为了对中国抗战力量给以致命打击，扭转在整个亚洲战场的不利局面，于 1944 年 4—12 月，对中国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发动了自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即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桂柳会战为“一号作战之三”。日军纠集约 10 万人马，由冈村宁次指挥，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向广西进攻，来势凶猛。“第 4 战区司令长官部尽力察知日军企图后，鉴于兵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906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② 熊尚厚、陈宁生：《张发奎将军传略》，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0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③ 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45 ~ 146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力处于劣势，逐步制定了内线作战计划。”①

在张发奎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方面投入桂柳会战的先后有9个军，但其中半数是湘粤赣败退下来的部队，战斗力很差。张发奎令原广西驻军第93军守卫黄沙河、全县，第31军守桂林，第46军175师守柳州，第35军135师守南宁。

9月8日，日军沿湘桂路两侧向广西急进。一路上未遇大的抵抗即陷黄沙河，14日占领全县。这样，广西东北门户洞开，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捣桂林。22日，由广东西进的日军陷梧州。28日，由雷州半岛北进之日军占领丹竹空军基地，对桂林、柳州形成夹击之势，广西全境处于危急状态。

面对此一局势，张发奎认为：由西江入侵之敌对桂柳背后威胁太大，柳州是战区的中心，在兵力使用上无法在桂柳同时进行主力作战。于是决定对占领桂平、蒙圩之敌实行反击，以解除后背之围。从10月21日开始反击，战斗9天，但因连日阴雨，攻势受挫，桂林方面战况又恶化，反击未能奏效。

11月4日，日军对桂林发起全线攻击，守军第31、46、79军依托防御工事和石山岩洞节节抵抗。日军对漓江东岸七星岩守军据点施放毒气，守军300余人惨死岩洞。日军占七星岩后，迅速渡江向城内扩大战果，11日桂林失陷，柳州也于同日失守，桂柳会战终告失败。

桂柳会战失败，当然主要不是因为张发奎个人指挥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军事上的问题。战后第4战区在《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中就敌我双方在作战指导、一般战术及我方军政、军民关系、陆空军协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问题总结了近40条。② 有些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正面战场的这次大溃退确实在国内外引起不良的反响，张发奎在后来的有关回忆中却对当时的战术指导仍称赞不已，这恐怕不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毕竟没有取得何等辉煌的胜利。

桂柳会战之后，张发奎奉命率夏威、邓龙光两集团军至桂西百色地区整训。1945年3月，所部改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出任司令长官。这期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溃败，华南战场局势日趋好转，张发奎所部也抓

---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中译本。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1 336～1 33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住这一有利间隙加紧整顿，并积极捕捉机会，以期收复失地，一雪败退之耻。5月26日，张发奎部主力收复南宁，6月下旬，克复柳州，7月3日又分兵攻克龙州、凭祥，随拟进兵雷州半岛，大举反攻广州。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发奎被指定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9月15日，他由南宁飞往广州主持接收，次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主官驻华南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等“首先步人礼堂向我鞠躬致敬，挺直的立在我的面前，很沮丧阴沉的聆听我下达命令，继而战栗的签署了降书”①。张发奎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了他的两广抗战经历。

四、坚持团结，反对投降

张发奎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战期间不仅始终坚持抗战，而且在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方面做得也是比较好的，与坚决反共的顽固派将领有很大区别。“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即请郭沫若帮助，率先成立了第8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团，随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个政工队。服务团由郭沫若引荐，共产党员钱亦石出任少将队长，招收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热血青年，其中不少共产党员一直随张发奎到韶关，如左洪涛、何家槐、孙慎、刘田夫、王河天、杨应彬等，组成第4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左洪涛、何家槐、孙慎等人还担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等职，颇受信赖。

1939年秋，左洪涛应邀到倾向进步的韶关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民主与宪政”时事讲演，事前征得张发奎同意并请张发奎审阅了讲话提纲。在讲演中，左洪涛从爱护国民党的角度出发，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违背总理遗教的种种劣迹，吁请坚持抗战，开放民主、实施宪政、改善民生。但时任第4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丘誉派《阵中日报》主笔谢某混入场内监听，随后在报上指名道姓攻击“左”的讲演言论荒谬，有危害“党国”之嫌。张发奎得知此事后，在随之召开的战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对丘誉严词训斥：“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讲演，是我同意的，他的讲演提纲也经我审阅过。他是我的秘书，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

① 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18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战宣传动员工作横加诽谤，是何居心?”① 丘誉只得将谢某撤职，并向左洪涛当面道歉。不久，丘誉本人也被调离了战区政治部。

在第4战区工作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排演了一出由延安剧作家创作、反映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改造自发抗日武装的新剧，一些人看了之后横加非议，说是变相贬低国民党军队。而张发奎看过之后，大为称赞，并指示以后不管下到哪个部队都要演出该剧，给了他们较为有力的支持。②

第4战区西迁柳州后，张发奎对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继续予以重用，何家槐、左洪涛任上校秘书，柳倩、孙慎、沈振黄任少校秘书，杨应彬、杨野明、郑黎亚、吕壁如、沈丹枫、方兮任中尉附员。杨应彬还被保送到军校深造，后成为张发奎的作战参谋。

张发奎对在两广地区活动的其他爱国进步团体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台湾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领导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东区服务队，其成员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攻击，一段时间内不仅经费无着，甚至能否合法存在也成了问题。丘念台通过关系向张发奎求助，张发奎很快同意将服务队编入第4战区，拨给经费，张发奎还建议为避免怀疑，服务队可全体加入国民党，但因顽固派把持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作梗，这一建议未行得通。③

1940年4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张发奎做了较高的评价：“我们做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二个主要对象是张发奎。张发奎为人直爽，受过中国大革命的洗礼……他今天一般表现还很好，曾经在几次逆流来时，表示应该抗战、进步、团结，大胆的用青年，对共产党不用怀疑，内部不应摩擦。在曲江，他们公开的讲话和政治意见，都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出来，比如，反汪运动的问题、对‘抗先’的问题、对我们的干部被捕问题，都公开表示应该团结，反对内部摩擦。曾公开的在长官司令部干训团，指出反苏的舆论不合时宜，不合抗战建国纲领。”④

对平江惨案、皖南事变，张发奎都持反对态度，表示“在广东不容有

---

① 广东韶关市委党史办编：《粤北抗战资料选编——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专集》，49页，1985年。

② 舒模：《忆抗敌演剧一队在韶关》，见《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17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③ 卓杨等：《东区服务队与丘琮》，见《广州文史资料》，第28辑，13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④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7册，171～172页，1987年印刷。

如平江之事”，皖南事变发生时，他心情苦闷，长叹不已，告其部下：“如果内战，必定亡国，本人决不参加内战。”① 肖克将军曾指出：“抗战时期，张发奎积极参加抗战……在第4战区任职时，他曾任蒋光鼐为参谋长，过去他们是死对头，这时期又合作，表现了民族危亡时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精神。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十二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唯有张发奎没有发表反共通电。”②

从在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设立由进步人士组成的政工队，到皖南事变后唯一一个未发表反共通电的战区司令，能成为这“第一个”和“唯一一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

当然，在对待中共及进步人士的问题上，张发奎有些做法也不尽妥当，据肖克将军一篇文章回忆：“但在叶挺被拘禁桂林时，他不作可能的照顾，不仅北伐时期的同壕友谊没有了，就是在抗战中共同对民族敌人的战友之谊也不见了。1944 年我从敌后回延安，周恩来同我说：张发奎不够朋友。”③ 这说明，张发奎既与那些反共顽固派有很大不同，又与那些始终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还有区别。

1938 年 12 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乞和“艳电”，张发奎即通电予以驳斥。1939 年初，他以第 4 战区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在曲江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张发奎等粤系军人本与汪精卫渊源较深，汪精卫投敌后也欲对此背景加以利用。1939 年 7 月，汪精卫到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国民党广东将领进行劝降，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蔡廷锴、蒋光鼐等当即通电声讨，表明了与敌伪势不两立的爱国立场。关于此点，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张发奎本来与汪精卫有些关系，表示汪到广州的活动不能起作用，而要给一打击。所以他反汪更积极，我们也通过张发奎进行反汪运动。首先，是张发奎发表了广播词，广播词全部是我们拟的，以后发表了论文，也反映了我们的意见。”④ 由于张发奎等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汪精卫的阴谋被挫败。

纵观张发奎抗战期间在两广的所作所为，他抗日是比较坚决、比较努力的，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争取两广抗战的胜利贡献了他一份力量。作为一个有着复杂

---

①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7 册，114 页，甲第 38 册，149 页，1987 年印刷。

②③ 肖克：《铁军纵横谈》，载自《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④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7 册，178 页，1987 年印刷。



经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反映出他复杂的政治态度和矛盾的内心世界。但总的来说，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基本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节 抗战时期主政广东的李汉魂

从总体上看，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粤军是一支有着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部队，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诞生和壮大于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广东军人在近代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和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中，表现都相当突出，涌现了一批饮誉中外的爱国名将，不算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员的叶挺（惠阳）、叶剑英（梅县）等人，如陈铭枢（合浦，今属广西）、蒋光鼐（东莞）、蔡廷锴（罗定）、陈可钰（清远）、张发奎（始兴）、黄琪翔（梅县）、李汉魂（吴川）等，都曾在历史的这一段或者那一段写下过闪光的一页。而且，他们大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疆场，他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但对于内斗、对于党争，他们却常常会消极落伍、下野出洋，而不是那种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好汉”[即使是一直追随蒋介石、最后终老台湾的几人，如作为三次长沙会战主将的薛岳（乐昌）、两次粤北战役主将的余汉谋（高要）、中国远征军主将之一的罗卓英（大埔）、桂南会战中独当一面的邓龙光（茂名），在抗战时期，也都向世人展示过其曾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奋勇抗争的一面。有的将领（如战时的余汉谋）虽难免派系门户之见，造成内耗，受人诟病，但能坚持民族立场，不受敌伪诱惑，在这方面也还是值得肯定的]。李汉魂在这些广东军人中，也算是颇具特色的一位。

一、在北伐战争中崭露头角

李汉魂，1895 年生于广东吴川县岭头村，其父系晚清秀才，家境殷富。李汉魂自幼聪敏好学，辛亥革命时，奉母命到广州求学，加入同盟会。1912 年考入黄埔陆军小学第六期，1917 年入保定军官学校步科第六期，1919 年毕业，不久即进入粤军部队。北伐前夕升至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第 12 师中校参谋，旋任 12 师 36 团参谋长。



图 8－2 战时广东省省长李汉魂

12 师师长是张发奎，是北伐时期两湖、江西战场战功最卓著的一个师，该师参加北伐的为

叶挺独立团、缪培南第35团、黄琪翔36团，都是为第4军赢得“铁军”称誉的打硬仗的部队。

1926年8月19日，平江战役打响，由叶挺独立团和36团担任主攻，在战斗中，李汉魂率第一营勇敢出击，与兄弟部队一起，半天时间即冲入平江，打开了通往湖北的门户。8月27日的汀泗桥战役，第36团担任正面主攻；29日进攻贺胜桥，李汉魂指挥该团机枪连猛烈扫射，配合主攻的独立团、第35团于次日拿下贺胜桥；接着，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于10月10日占领武昌。

10月21日，第4军奉命东征援赣，消灭孙传芳，11月1日，部队沿马回岭向德安、涂家埠方向进攻，作为左翼军，目的是切断南浔路，协同右路、中路大军向南浔线全线出击。第36团到达指定的烂泥坡、夏家铺一带后，李汉魂率各营长到前方探察地形，研究敌情。2日发起攻击，因黄琪翔受命兼任另两支部队的指挥，第36团的指挥即由李汉魂担任，该团先后攻克了孤山、骆驼山。稍后，又参加进军德安、马回岭、九江之役，连奏凯歌之后，部队回防武汉，并升格扩编。12月22日，李汉魂出任第25师参谋长，1927年3月初，又回任第36团团长。

但革命阵营内部日渐显露的危机，却使对革命曾抱有美好信念的李汉魂感到了彷徨和痛楚，且在他看来，问题是出在国民党内，他不愿介入党争，而但愿保持良好的合作。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出乎我们的意料，当长江以南的地区大致底定，显示了革命形势大好之际，一缕袅袅升起的邪气却慢慢凝聚成为一片阴霾，党内关于‘容共’政策的问题产生了一部分人的歧见，这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几十年的这个问题纠结成了中国多次的流血悲剧，国运厄逆外侮频仍，生灵涂炭，惨象延续泛滥，使人觉得前尘不堪回首！”

“我个人不愿介入党争，也不愿把文章涉入到太多的政治是非问题上。当时只有一个非常质朴的思想，就是：革命政府曾经以最开明的姿态，领导广大的群众披斩了许多革命道路上的荆棘，允宜有保持良好合作的共识，大家不要走回头路！”但“1927年的春天，……由于国民党内出现了容共政策的分歧，纠纷迭起，党中央也潜藏着权力斗争的暗潮，这一事件，是中国的革命事业伤及元气，而且也构成了一次历史错误”，“数月来我在武汉目睹革命事业如日中天，又目睹革命阵营阵脚自乱，心境凄然，可以想



见”。①

国共分家之后，武汉政府继续北伐，李汉魂在河南战场仍有十分出色的表现。4月底在驻马店，因奉军来势汹汹，先期出动的第12师（师长缪培南）处境不利，本已决定暂作退却打算，但李汉魂却主张利用有利地形，稳住阵脚，以保持我军士气，震慑敌军。遂联络各团级军官，积极向上级反映，终于获得师部批准，乃下令紧急布防，挡住了奉军的进攻。接着，在5月中旬上蔡、5月下旬临颍二役，李汉魂指挥有方，能守善攻，甚至带头冲锋，将北伐军的第一面红旗插上临颍城头，得到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的高度肯定，6月，以战功升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4军第25师师长。

1928年2月，李汉魂卸去师长职务，到日本治疗耳疾，年底回国。这时第4军已缩编为第4师，李汉魂任参谋长，次年4月改任副师长。在此后的新军阀混战中，先讨桂，后又反蒋，1930年7月兵败后避往香港。1931年冬出任陈济棠之下的广东西北区绥靖委员，兼广东独立第3师师长，驻兵韶关，管辖广东西北区25个县，因政绩突出，为各区之冠，其长于行政治理的一面亦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1932年7月，李汉魂在韶关与湖北宜昌籍的吴菊芳女士结婚。吴菊芳出身名门，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开明，聪慧能干。在后来李汉魂掌粤期间，吴菊芳以省主席夫人身份，领导妇女界热心于抗战救亡、扶贫济困的工作，为广东各界所称道。李汉魂此前在家乡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他18岁时，妻陈氏，为其生育一子，两年后因病去世。第二次是在1922年，妻庞氏，生有三子一女，因李汉魂长期在外行军作战，庞氏与4个孩子大多数时间住在广州或者随李母住在广州湾。②

1935年，李汉魂调任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所部第3师改编为第2军第6师，驻节汕头，管辖粤东24县，期间惩办了一批抗纳米税的日商。

二、在抵制内耗、坚决抗日中赢得赞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逐渐成为各界同胞的共识。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又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对此，李汉魂不以为然，7月6日，在汕头发表《为拥护统一御侮呈陈济棠总司令电》，7月7日，又发表《呈林主席蒋委员长电》《向全国党

① 李汉魂：《我是沙场过客——北伐战争回忆片断》，裁自吴川县政协编：《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85～88页，1988年印刷。

② （美）李湞：《花开梦怀》，55～56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政军领导机关、单位首长、民众团体、传播媒介暨海外贤达呼吁共挽大局电》，宣布“挂印封金”，辞去本兼各职，留下库存20余万元，退避香港。在致陈济棠电中，李汉魂表示，“诚以国难已深，天良未泯，既不忍睹钧座躬蹈于不义，更不肯背钧座而别有所图，垂涕而道，据理而争”劝陈济棠“悬崖勒马”，“翻然变计，目标只在抗日，领导仍仰中央”，“统筹大计，中央自有权衡，当不因一着而误全局”。李汉魂还表示，“职救国有心，回天无力，谬膺疆寄，心窃耻之，用是挂印封金，拜还大命”，这样做“纯出于爱国爱民之至诚，受良心血性所驱使，事前绝未有对任何方面有所接洽，事后亦非对任何方面有所企求”，一旦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他便愿“负弩前驱，誓作马前之卒”。①

“两广事变”结束后，李汉魂回任原职，第6师改番号为155师。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李汉魂甚感忧虑，在当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此实民国以来第一大变，而国家存亡之所关”，希望事变能够和平解决。25日，闻经过各方努力，张学良送蒋返宁，又曰：“漫天风雨，一旦清明，实国家之幸事也。”② 这期间，日方数次在潮汕各地挑衅，与潮汕警民发生冲突，并派军舰实施武力威胁，李汉魂均能沉着应对，不辱使命，拒绝接受日方的种种无理要求。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此时李汉魂已升任第64军军长兼第155师师长，多次向南京中央发出请缨参战的报告和函电。1938年4月，奉命率155师、187师北上河南增援，终于等到了与日寇真刀真枪较量的一天。在豫东前线，李汉魂受命作为桂永清27军、宋希濂71军及64军的临时总指挥，与敌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作战，掩护徐州会战后的我军顺利撤出，于5月25日发起攻击，27日战斗结束，将陇海路重新打通，我火车42列全部安全撤回，经开封、郑州西驶。其中陈公侠155师承担进攻敌重要据点罗王砦主阵地的攻坚战斗，经与敌反复争夺，将罗王砦克复。数日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李汉魂称赞道：“历次作战中，能有力攻下敌寇据点的，算来只是从这次罗王砦155师开始。”③

6月9日，李汉魂被任命为第29军团长，随即于17日自许昌率部南

---

① 李汉魂：《铁衣曾照古中原——抗日战争回忆》，载自吴川县政协编：《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173～177页，1988年印刷。

② 陈利克、廖新强：《李汉魂》，见《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4集，21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③ 李汉魂：《铁衣曾照古中原——抗日战争回忆》，载自吴川县政协编：《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189页，1988年印刷。



下，受命参加武汉会战。临出发前，李汉魂吟诗一首：

遮目胡尘障许昌，卧龙未出卧南阳，
中原板荡愁侵骨，黄水扬波苦断肠。
战火休燃乌柏树，薰风遥望白云乡，
愿驱十万横磨剑，尽洗前仇恨始偿。

6 月 25 日，统帅部决定 64 军 155、187 师、预 9 师和李觉 70 军 19 师、91 师、预 6 师均划归 29 军团指挥，属薛岳第一兵团战斗序列，参加会战。李汉魂率部东下，担负九江、马头镇、马当等要点的防务，阻击日军溯江而上。但当李汉魂率部赶到时，马头镇、马当已先后失守，第 9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命他“全部担负九江方面防务，第八军李玉堂部全部拨归二十九军团指挥，望即先行赴浔部署”。此时九江已成为长江正面战场之枢轴，牵动整个会战局势，李汉魂自知责任重大，乃积极部署防卫。7 月 23 日凌晨，日军两个师团在九江以东姑塘、启家庄登陆，在其海、空炮火掩护下，对九江防线展开猛烈攻击，李汉魂指挥有关各部激烈抵抗 3 天后撤离九江，退守南浔铁路一线。占领九江的日军企图沿南浔铁路南下，李汉魂率部顽强阻击，双方相持达一月之久。李汉魂将主力布置在德安、马回岭一线，寻找战机猛烈反攻，在德安痛歼日寇，取得了德安战役的胜利。参加此役的除粤军外，还有属于川军、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的部队共 30 余个师，在李汉魂指挥下，各部均能积极配合，协同一致，也显示了李汉魂不偏不私，善于协调的能力。

德安之捷当然并不能改变正面战场整个战局日益紧张的形势，武汉会战已渐近尾声，10 月 21 日，华南重镇广州又告失守，24 日，蒋介石乃下令结束武汉会战。24 日夜起，日寇从德安北面陆续渡河，加紧了对德安守军的攻击，李汉魂指挥部队与敌展开巷战，苦战 7 天后，放弃德安南撤，至修水南岸重新布防。撤离之际，他又口占二首：

柴桑水碧战旗红，奏捷中原万骑风；
此日与君同饮马，眼前袍泽尽英雄。
沙场过客敢言烦？欲挽乾坤报国恩！
浴血德安马回岭，铁衣曾照古中原。

三、危难之际受命主粤，撑持大局造福桑梓

日军侵粤，未及一旬，广州即告失守，各界一片哗然。为扭转广东之被动局面，蒋介石将张发奎、李汉魂均派回广东，张发奎任第 4 战区司令长

官，负责两广军事（前期实际负责广东，余汉谋第7战区成立后实际负责广西）；李汉魂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主持粤政，并兼任广东省保安司令。1939年元旦，李汉魂在连县宣誓就职，2月迁府韶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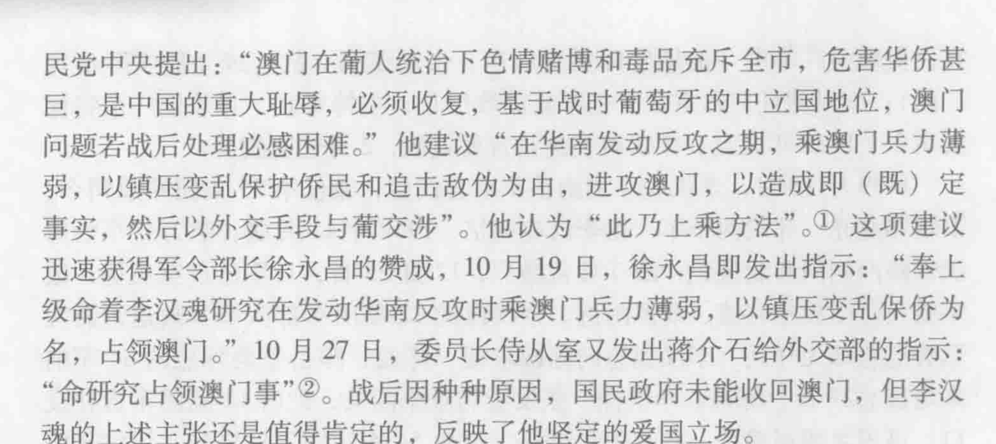
1939年10月，李汉魂参加南岳军事会议后，兼任第35集团军总司令，下辖邓龙光、邹洪两个军。据李汉魂回忆，1939年11月底，数万日军沿粤汉铁路两侧向粤北进犯，战斗日益激烈，12月25日，日军已进至英德，敌军骑兵已出没在官渡、翁源附近。余汉谋的12集团军部队节节败退，韶关形势危急却无守兵。李汉魂急向陈诚求援，陈诚、薛岳急调陈烈的54军前来增援。27日，陈诚、李济深、张发奎均赶来韶关，此时12集团军自在良口、吕田之线崩溃后，各部俱失联络，遂由54军防守正面之敌，邹洪部绕至北江西岸侧击敌军，邓龙光64军冒险深入敌后，截断粤汉铁路、清远至花县公路、佛冈至广州公路，断敌后路。至1940年1月2日，敌军开始后退，3日，54军收复翁源，5日，克复英德，10日，克复清远，粤北战役至此告一段落。①

李汉魂主政广东期间，认真行使职权，经常巡视各地；整顿战时吏治，注重官员选拔任用的公平公正，如以考试方式选拔县长，惩办贪污；致力于发展广东的战时经济，兴修水利、交通设施，鼓励开垦荒地，大力推广良种、冬耕，增加粮食生产，1941—1943年发出农贷1个多亿，从1941年至1944年共征到各种田赋约830万市担；开办战时急需用品、物资的加工厂，改善物资供应，产品有电池、肥皂、药棉、棉纱、面粉、酒精、纸张、丝棉织品、动力酒精、汽油、柴油、农用机具、白糖、红糖、硫酸、盐酸、麻袋、军毯等数十种，使“抗战时期广东工厂之多甲于邻省”②；打击走私，加强财政税收管理，增加财政收入，1940年收支数已超过战前一倍，1941年又打破本省有史以来财政入不敷出的记录。1941年以后，省财政并入中央财政系统，当时省库尚存2 200多万元；在文化教育方面，在战时艰难动荡的环境之中，尽力保障师生的基本生活需要，收容救济因战乱迁徙的师生，充实学校设备，开办社会教育，还新增了两所高等学校，使战时的广东教育得以薪火相传，教职员工的生计得以维持，少年儿童减轻了失学之虑。

李汉魂还是战后中国应收回澳门的极力主张者，1944年10月，他向国

①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广东文史资料》，第88辑，71～7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② 沙东迅：《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载自《学术研究》，1995年第1期。



民党中央提出："澳门在葡人统治下色情赌博和毒品充斥全市，危害华侨甚巨，是中国的重大耻辱，必须收复，基于战时葡萄牙的中立国地位，澳门问题若战后处理必感困难。"他建议"在华南发动反攻之期，乘澳门兵力薄弱，以镇压变乱保护侨民和追击敌伪为由，进攻澳门，以造成即（既）定事实，然后以外交手段与葡交涉"。他认为"此乃上乘方法"。① 这项建议迅速获得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赞成，10 月 19 日，徐永昌即发出指示："奉上级命着李汉魂研究在发动华南反攻时乘澳门兵力薄弱，以镇压变乱保侨为名，占领澳门。"10 月 27 日，委员长侍从室又发出蒋介石给外交部的指示："命研究占领澳门事"②。战后因种种原因，国民政府未能收回澳门，但李汉魂的上述主张还是值得肯定的，反映了他坚定的爱国立场。

四、军政龃龉内耗严重，纠纷不断，大局受损

由于内战时期造成的裂痕，以及中国官场争权夺利的积弊，出身于原粤军 11 师的余汉谋系与出身于 12 师的张发奎、李汉魂以及邓龙光、吴奇伟等人均心存芥蒂，貌合神离。粤北之战结束后，蒋介石令张发奎将广东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余汉谋，邓龙光部移驻广西贵县，余汉谋一统广东军权，与李汉魂常生龃龉，1942 年 6 月初，竟发生了战区长官司令余汉谋强令李汉魂的省政府迁往连县，且限于月底前迁移完毕的事情。后虽经各方协调，行政院也未批准广东军方的方案，但战时广东军政不谐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后来李汉魂浩叹：他主持粤政 7 年多，"无日不受挤压，麻烦天天有，谣言时时闻，主粤七年受尽毁谤及闲气。……这种两虎争山的闹剧也不独见于粤省，四处皆然，小日本所以横行于大中华，这种内讧实为祸根。"③

李汉魂就任省主席后，省党部也进行了改组，国民党中央任命李汉魂兼省党部主任委员。但广东的基层党组织和省党部委员，一部分为军方所控制，一部分仍听命于前任粤省主席吴铁城，这使得粤省的党务工作也不能协调，时时发生纠纷。李汉魂在韶关桂头办了一个干训团培养党政干部，立即就有流言说是"桂头造党"。吴铁城的旧属在各县组织的同乡会，一有风吹草动就发通电，派代表往重庆投诉，想方设法要将李汉魂轰下台，李汉魂本人也为此类事情弄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到 1944 年初国民党中央

① 《徐永昌签呈之报告》（1944 年 10 月 10 日），载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81 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8 年硕士论文。

② 《国民政府主席代电》（1944 年 10 月 27 日），第 2385 号。

③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88 辑，77 ~ 78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才确定由方觉慧接替李汉魂的职务，方觉慧到韶关就职，李汉魂陪他到省党部与各人见面，方觉慧的外套居然在省党部内被人偷走。“广东的怪事，真是无奇不有！”

省政府与军方的矛盾，也是始终存在，1944年2月南岳军事会议期间，就传闻粤省“军政不和亟须调整”，李汉魂亦自称“平心而论，粤中军政确实不和，余长官亦放任其部属对我明攻暗讦”。会上两人联手表现合作姿态，才暂时平息外界议论。1945年1月，日军从南北两面夹击广东战时省会韶关，1月21日敌军攻陷乐昌，23日上午余汉谋率部撤离，稍后，李汉魂带领省府人员撤往龙川。“自从韶关沦陷，省府东迁后，我的处境更是困难。凡有枪者皆有权，省府形同虚设。2月中旬长官部电令省府：今后国库、省库收入，及征实、征借粮食，非军方命令不许动用。后来任命县长，军方亦插手委派。新成立的绥靖公署也凌驾省府之上，命令保安团、民团听其调遣，甚至迳令撤免南雄县长。至于各县的自卫委员会则完全剥夺县府职权，其总部更无视省府，他们擅自派粮派款、责成供给，毁法乱纪，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至于上下各方的谣言，更是无日不有。”5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吴铁城派更是公然让人不要投李汉魂的票。①这虽是李汉魂一家之言，其中是非曲直未必尽是余汉谋、吴铁城方面之过，但它无疑是反映了在这么长的时间，粤省军政不睦、不能同心协力共赴国难，粤籍要员插手地方事务、造成矛盾扩大的实情。此种随处可见的、国人内斗内耗无休无止的历历史实，读来怎能不令人痛心和羞愧！另外，在事后，李汉魂能将之坦率道出，交由后人评断，窃以为，也比某些当事人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将历史的疮疤创痛抹得无比光亮平滑、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痕迹要好。

由于上述种种缘故，李汉魂的省主席自然是难于再做下去，1945年8月，李汉魂调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广东省主席由罗卓英继任。全面内战爆发后，1947年1月，李汉魂告假出国治疗耳疾兼考察，遍游欧美20多个国家，1949年1月回国。此时，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汉魂应邀任总统府参军长兼内政部长，当时内政部有人捕风捉影地告曾参加中共一大、此时任内政部人口局长的包惠僧贪污挪用，李汉魂也未加深究，草草敷衍一番也就放过了。② 10月13日，李汉魂辞去职务，12月5日，随

---

①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见《广东文史资料》，第88辑，86页、9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② 左双文：《包惠僧一桩鲜为人知的公案》，见《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3期。

李宗仁夫妇飞美国，从此开始了与家人一起侨居美国的晚年生活。为在美国立足谋生，李汉魂夫妇集股在纽约百老汇路开办了“康乐酒家”，吴菊芳主持店务，李汉魂收银，也兼招待，“我以当年指挥10万大军的从容，面对百来位食客，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壮举。就这样，我们在美国站住了脚跟”①。

1982年5月，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邀请，李汉魂偕夫人吴菊芳及儿女一行4人回大陆访问，到北京、上海、广州、韶关等地参观游览，并受到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李氏夫妇5月29日凌晨乘机抵达北京，当天下午，邓小平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李汉魂一行到达时，邓小平步出大厅迎接，邓小平还亲口告诉吴菊芳，大陆绝不会再搞运动了，“我被打倒过三次，我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害成残废，我们都是运动的受害者，还会搞运动吗?”吴菊芳则称赞邓小平访美为中国人争了光，希望中共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再整人了。而在上一年的11月份，李汉魂夫妇阔别多年后访台，蒋经国出面接见，时年87岁的李汉魂携夫人到达“总统”府后，蒋经国迟了10余分钟才出来，双方略微交谈几句，交换了礼物就告辞了。李汉魂的大陆之行，“颇不得某些人理解，思想仍停留在旧日恩怨之中，原先常来我家走动的朋友，有的甚至竟不再来我家了。有的报纸也对此事滥加攻击，横加干涉，似乎大陆去不得，谁去谁错”②。

1987年6月，李汉魂在纽约病逝，享年92岁。大陆方面，中共中央统战部、广东省侨办、广东省政协、吴川县政协，以及邓颖超、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广东省省长叶选平、驻美使馆临时代办唐树备等均以各种方式表示吊唁，新华社发布了“抗日名将李汉魂将军逝世”的消息。而“台湾方面除私人唁电之外，政府无任何表示”③。对此种不同的处理态度，李氏家人自然有他们的看法。只是粤系政要包括军人，向有反蒋的传统，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邹鲁、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到李济深、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以及邓龙光、吴奇伟、黄镇球、薛邱等，反蒋历史深厚，作为张发奎系第4军重要将领的李汉

①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见《广东文史资料》，第88辑，17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②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见《广东文史资料》，第88辑，332页、334页、33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③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见《广东文史资料》，第88辑，33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魂自然也不例外。加上第4军瓦解不久，他又曾回粤为陈济棠的部下与蒋介石对峙；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组客，李汉魂得任要职，后又一直在美徘徊。因此，台湾方面对他心存芥蒂、不冷不热，也算是其来有自。然彼之所疏，正乃此之所亲，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统一、统战工作重新备受重视，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励精图治，谋划祖国统一大业之心甚殷甚切，对原国民党重要人员是既往不咎、热忱欢迎，对李汉魂等既是抗日名将、曾为国家做出宝贵贡献，又长期游离于台湾当局之外的还算重要的人物，给予相当的重视和礼遇，恰逢其时。

第三节　抗战后期孙科关于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

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临近，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日渐重要，特别是战后对日处置问题，与中国关系尤为密切。孙科作为国民党中抗日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时期以主要精力密切关注着战局演变和国际战略问题，创立并亲自主持“中山文化教育研究会战后世界建设研究社”，其任务为：①搜集并译述有关战后问题的外国文件与杂志，以使我国了解其他国家对解决战后各种问题所持的态度。②进行独立研究工作，并就战后世界合作与重建各方面拟具报告。[1] 从1941年9月至1943年10月，他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身份，先后在美国、国内的报刊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十余篇（次），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指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断然予以破坏，永使绝迹”，使“日本军国主义之疫疠，于此后百年间不再循环复演”。[2] 并对同盟国内一些人在这类问题上的各种错误主张如“中国威胁论”、保留部分日本实力的“国际均势论”、阻碍中国收复台湾的“台湾国际共管论”等进行了批评，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基本立场。



图8－3　战时主张彻底清算日本的孙科

---

① 《孙科传记资料》(1)，93页，台北：天一出版社印行，1979。

②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49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一、中国应收复自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掠夺的所有失地

1942 年 7 月 7 日，孙科在《我们的最后胜利就在前面》一文中指出，日寇的最后覆灭，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中国不但要恢复“九一八”以来之失地，而且要恢复至甲午战争之前。“就是说：甲午之战所失去的台湾及澎湖群岛，日俄战争被掠夺的旅顺、大连与南满铁路，‘九一八’后被侵占的东北四省，‘七七’后被敌寇一时所蹂躏之沦陷地区，都一起归还中国。”① 这与其后 11 月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答中外记者问中表述的立场完全一致，是国民政府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两次较为重要的表态，确立了中国在收复领土方面的基本原则。

对于收复失地的范围，当时出现异议而有损中国主权的主要是两个地区：

一个是东北。美国有人在报纸上公然主张战后东北应划归苏联版图，由苏联统治。对此，孙科驳斥道：中国所以最早起来抵抗，单独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其起因即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东北数省是中国领土，日寇侵占以后，更以之作为威胁中国的根据地，“若反侵略同盟国共同击溃日寇，获得最后胜利以后，中国而仍不能收复东北失土，则中国抗战究尚有何意义?”② 主张中国在克服一切困难、彻底击败日本之后，一定要收复东北。从后来“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来看，同盟国内关于苏联的东北特殊权益之议并非空穴来风，孙科的担忧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另一个地区则是台湾。某些人提了所谓“台湾国际共管论”，孙科更是明确表示反对，1942 年 11 月 13 日，他在《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对之加以痛斥，并要求收复台湾，这是我国批“共管论”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中共《新华日报》在 1943 年 1 月 1 日曾全文予以转载。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经过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英美苏等国均接受了中方的这一要求。

二、彻底消灭日本的陆海空军，解散其军事教育机关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9 月 1 日，孙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一文，即提出中苏英美四国联合一致，“对

---

①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37 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②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142 ~ 143 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日本侵略者加以制裁，彻底解除其侵略武装”。1941 年 12 月 7 日日美开战后，孙科对战局的估计更趋乐观，次日他在“中枢纪念周”做题为《太平洋大战与中国》的报告，指出，日本陆空军已受到中国相当的削弱，只有海军还较为完整，对中国构成较大威胁，国内不少人对此也感到忧虑，“现在日本竟然发了狂，要拿他的老本与英美一拼，这真是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彻底解除日本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① 其后，孙科更对这一主张做了具体的阐述：

1. 对敌陆军的处置。孙科指出：“敌人的陆军，我们虽有力量来应付他，但是今后要使日本不能再有侵略中国的力量和野心，必须……解散其全部的陆军，……兵工厂全数拆毁，五十年内不许他有一个兵，只许以警察来维持治安，因为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他的武装不是拿来自卫的。”②

2. 对敌海军的处置。孙科认为，彻底摧毁日本的海军对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抗战以来，敌人的陆空军已毁灭过半，我们对于敌人的陆空军已有制胜的把握，但却对付不了敌人的海军，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将来同盟国胜利，打败敌人的海军后，敌人残余的海军船只，在英美用不着，我们却用得着，应该全部给中国，免其死灰复燃。同时为防止敌人在战后重建海军，“日本国内所有的海军要港，军事设备，须全部撤废，海军教育，须完全停办，五十年内，不许他再建海军”。

3. 对敌空军的处置。“日本空军须全部解除武装，所存残余军用飞机须全部拆毁，日本国内飞机制造厂完全拆卸，航空学校须全部解散，五十年内禁止日本制造一切航空器材。”③

4. 解散日本的军事教育机关，根本消灭日本的黩武主义教育和排华仇华宣传。“日本人民给予世界的印象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好战心理并不是日本人民的天性，而是黩武主义教育的结果，……从这种教育熏陶出来的人民，显然会成为世界和平的阻碍。”必须使日本的“军事教育完全停办”，“使他的国民不受军事教育”。同时，日本应对其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④

---

① 孙科：《中国的前途》，144～149 页、160 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②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56 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③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28 页、56 页、37～38 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④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45 页、38 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三、惩办日本战争罪犯，解除其工业武装

孙科1943年7月7日在《彻底毁灭日本寇国》一文中指出，反法西斯国家应当吸取上次大战后的两个教训，一是战胜国虽然限制了德国的军备，但却没有彻底摧毁德国的军事机构；二是虽然削弱了德国的经济力量，却没有解除德国的工业武装。因此，为了将来在战胜日本后不重蹈覆辙，一定要做到这样两条：

1. 惩办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事干部，警惕日本少壮军人的重新崛起。"不管日本人民如何好战，他们却不会发动战争，发动领导侵略战争并驱使人民去杀人、被杀的是日本军事干部，他们是罪魁祸首，必须全体交付裁判，分别处分"，"对于那些发动战争的祸首，应执行惩罚，使他们的党徒永不敢再作侵略邻国的梦想"。尤其是一批沉醉于战争冒险、作恶多端的少壮军人，更是不可令其逍遥法外："现在日本的军事干部，年龄高的虽已不少，可是还有一批少壮军人，具有军事的智能和侵略的野心，将来虽然失败，过了相当时间，可能像过去的德国一样，能够恢复过来，为我们心腹之患。所以我们在战后必须设法消灭他们的力量，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无法组织强大的军队。"①

2. 解除日本的工业武装。包括：①摧毁日本残余的军事工业、重工业和机械工业，或则加以销毁，或则输出国外，"以抵偿日寇所破坏的同盟国家的工业的损失"，"在我们战胜以后，把他们的工厂接收过来。……在日本境内凡与国防军备有关系的工业，在战后必须完全由我们控制。……使日本军阀，在战争失败以后，再无法利用这些工厂来重整军备，重新破坏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②限制日本的轻工业。"使日本的工业只能从事日用必需品的制造，而且生产的规模要有一定的限制。这种处理的目的在使日本没有重整军备的机会，也不能在民生工业的装饰之下复兴军事工业的基础。"②

与上述主张相联系，孙科对美国某些人主张战后仍需扶植日本、恢复其军力，以牵制中国的"国际均势论"进行了驳斥。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之中，美国耶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主持人斯派克曼教授就在其新著《世界政治中美国的国策》一书中提出：从现实主义的立场考虑，"一个强盛的日本

①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45～46页、96页、55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②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44～46页、96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和一个强盛的中国，对于美国都是有威胁性的，所以此次于击溃日本后，还须与日本提携，以恢复它的军事力量。这一来可以使将来中国和日本互相牵制，才能够维持远东的和平。”对此种论调，孙科极为反感，认为“所谓新的均势实在是陈旧的滥调，无异于纳粹德国地理政治学派理论的重唱”。这种主张“率循纵横捭阖的旧路，一切都以自己的利害得失来权衡”，今日联甲制乙，明日又联乙制甲，“光为自己的眼前利益着想”，是一种对保障战后世界和平十分有害的帝国主义思想。①

四、日本必须对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

关于战后赔偿问题，孙科提出了如下数端：

（一）甲午以来日本在中国所夺获之军事器械装备用具及所劫掠之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系之古物、书籍字画等，曾陈列于日本各博物馆或为私人所收藏者，须全数送还中国。

（二）日本国内之冶铁炼钢厂、造船厂、机器制造厂以及轻工业之纺织厂、造纸厂等，须拆除半数，将所拆下机器装备送交中国。

（三）日本所剩余商船，须以半数送来中国。

（四）日本各大学、各图书馆所存之中文、日文、西洋图书刊物及机器，须将半数送交中国。

上述赔偿要求，与日本近50年来对中国的掠夺和战争破坏、与日本从中国榨取的巨额战争赔款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日本对中国进行一定数额的战争赔偿也是完全应该的。孙科也仅是提出以部分实物偿还中国，而未提出战后赔款的问题，在这方面还是相当克制的，而且即使是这一类要求，日本在战后也并没有做到。

孙科还指出，还必须废除天皇总揽国家大权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体制——天皇专制制度。1943年10月，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的《消灭日本天皇》一文指出：“吾人必须决心使敌人日本永不能再举以侵略中国，……军阀之毒瘤自日本身上割下之后，‘天皇制度’必须同时消灭。”② 这一要求也完全是正义的，正是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日本在战败投降之后，天皇制发生了较大变革，由战前和战时的专制君主制变为战后的象征天皇制，

---

①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62～65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②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49～52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成为战后初期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①

五、中国必须拥有对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对日处置的发言权

同盟国内某些人在关于战后世界问题的议论中，有过这样一种耸人听闻的论调，即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强盛之后，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他们“不信任中国是和平主义的国家，担心中国富强以后会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对美国发生威胁”。对此，孙科在不同场合多次予以抨击：“若就战后世界建设的理想来说，我们还是不免有孤立之感。这是因为有些盟邦人士，有如我最近几次讲演中所提过的，‘幻想中国强盛后会给世界威胁。’说到这里，不由人不想起‘被蛇咬过的，见了绳子也害怕’的谚语来。实则，绳子绝不会咬人，‘害怕’只是神经过敏的结果。”对于将台湾置于“国际行政机构”管理之下，纳入“横越太平洋之防御地带”，孙科曾坚决反对，认为这也与“中国威胁论”的误导有关：“如建议者心目中竟或疑惧中国富强以后，或将不利于南太平洋，而预以台湾为空军根据地，利其接近中国沿海以控制中国，则此种不信任中国为爱好和平之民族，而自存猜疑之思想，其危险更属显然矣。”②

孙科强调，“世界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要推中华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中华民族向来以和平亲善态度与其他民族友好相处，中国强大之后不仅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而且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安全的重要力量。倘若因为担心中国强大而排斥中国对于战后世界问题的发言权，是极不明智的：“如果战后的和平事业，不尊重拥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意见，或者不让中国有绝对平等的机会致力于这一事业，那么这一事业的基础就一定不会十分稳固。”这“并不是单纯出于为中国着想，而是纯粹出于为全世界的永久和平着想的”。③

孙科提出的中国参与战后国际事务的权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参与对日处置，对中国而言，这是当时至关重要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也最有发言权：“亚洲方面解除武装的侵略国，当然只有日本，而有充分的权力与力量，来提出很有效的彻底解除日本武装方案的，当然是中国，因为中

① 徐康明：《日本在败降过程中维护天皇制的活动》，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②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116页、66~67页、145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③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60~67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国受日本的侵略最久，而抵抗侵略也最烈，知道日本的野心最深。"① 孙科主张从军事和行政两个方面在战后对日本加以必要的制约：

在军事方面，中、美等联合国家，为保证日本对于各条件之忠实履行，得派遣联军，驻扎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地。联军驻日给养费用，由日本政府负担。

在行政方面，联合国家中，尤其中、美二国，在占领日本之后，"必须建立管理与指导之机构，以助日人树立其民主制度并助其发展"，由四强协力把军阀统治下的日本改造为民主的日本，"非但是要铲除他们穷兵黩武的思想，并且要根除他们的独裁主义。就是要把他们过去政府的组织和作风改变过来，成立民主的新政府，使他们的人民有权，能过问政治"②。

需要指出的是，孙科主张彻底清算日本，是针对日本法西斯而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使战后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保障。这种主张并不是在战后要控制日本或奴役日本人民，"我们绝不觊觎日本的领土与人民"③。

但在富于侵略扩张性质的日本未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之前，急于让日本复苏的主张则是孙科所不赞成的，认为将成为和平的隐患。"有人以为我们不应使日本在战后过于穷困，甚至慷慨建议应让日本在中国获得一部分市场——这实在是有碍将来和平的思想。我们对于日本人民没有仇恨，我们不愿使他们受到冻馁。然而为了远东的永久和平，我们一时却不得不使日本国家尝尝穷困的滋味。"因为"在传统的侵略政策未彻底肃清以前，富裕的日本必将促使日寇侵略野心的复活"。孙科指出，这一问题如果不做彻底的解决，"日本将来还要发动侵略战争，那时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恐怕比这次抗战中所遇到的还要重大"④。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频繁活动，不断挑起事端的情况来看，孙科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提醒人们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还是很有必要的。

孙科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平等合理的新世界"。在日本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清除其军国主义的阴魂之后，中国愿与日本人民平等友好地相处，恢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⑤

孙科这一时期提出比较彻底的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并防止其复活的主张，

---

①《孙科文集》，87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② 孙科：《三民主义新中国》，3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③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56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④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46～47页、96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⑤ 孙科：《中国的前途》，172～173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从其个人主观因素看，不是偶然的，它与抗战时期孙科始终坚持抗日爱国的立场，坚持对苏友好，与中共较能协调关系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他注意研究国际局势和国际战略问题，对国际风云和国际舆论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和了解分不开。

其一，孙科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高层最早力主对日抵抗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抗战后期主张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二八”事变后，“孙哲生先生等二十余人请政府增兵，派飞机前往援助”①。孙科并打电报给何应钦，斥其抵抗不力，乃“甘心亡国”之举。

1932年3月6日，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孙科等22人提出《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4月27日，孙科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出了“为集中民族力量，贯彻抗日救国之使命”而对内政、外交、党务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的主张，包括筹备宪政、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允许其他抗日党派合法存在、恢复国民党的民众立场、以彻底抗日为目前外交之主要方针等内容。②

12月15日，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孙科等27人又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指出“今日最重要而待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然欲彻底抗日，必须内部一致”。并指出过去“政府之所以未能积极抗日”，是因为担心内部不一致，而内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政府、在于中央。因此，中央只有“对外确定抗日方案”，“对内政治开诚布公”，才能改变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③

12月20日，孙科又在“总理纪念周”以《如何集中国力挽救危亡》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国民党要顺应“全国人民的心理和要求”，停止内争，积极抵抗日本侵略，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指出，想依靠国联来制止日本侵略已毫无可能，唯有依靠我们自己，唯有“团结一致，集中全国的力量”，④ 积极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

1932年，是孙科政治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年初，孙科在反蒋的“非常会议”之后出面组织的内阁不足一月即告夭折，国民党回复到蒋汪合作、蒋再度掌权的局面。孙科一系列要求抵抗侵略、改革内政的主张一方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57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② 孙科：《中国的前途》，207～209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③ 《孙科文集》，1 203～1 20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④ 《孙科文集》，434～43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面表现了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不满，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题，孙科的主张客观上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把握了时局变化的脉搏，做出了比较迅速、比较准确的反应。

因此，1939 年6 月10 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反投降提纲”的报告，明确将孙科列为“九一八”后不甘屈服、反对投降的一类人，说明中共这时对孙科是相当肯定的。

其二，孙科是抗战时期主张对苏友好的代表人物之一。

1932 年12 月，在《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孙科等人提出“以彻底抗日为目前外交上主要方针……积极进行中苏邦交之恢复”。全面抗战一爆发，孙科即向蒋介石建议加速与苏联结盟的步伐，7 月中、下旬，多次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促成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8、1939 年，孙科两度出使苏联，在争取苏联对华 2.5 亿美元军援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孙科对蒋介石联苏政策缺乏连续性颇感忧虑，1939 年12 月28 日，他对冯玉祥说，“苏联对我们帮这么多的忙，我们要是疑惑他，他也一定会疑惑我们的，要是这样，国家实在是不得了。”①孙科长期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经常在文协主办的《中苏文化》上发表文章，为维护战时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其三，孙科是这时期国民党内主张和共容共的人物之一。

孙科 1932 年4 月在上海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其中已含有只要共产党遵守法律，可以允许其存在的意思。1935 年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孙科很快做出了积极响应。根据“一·二八”之后孙科的表现，在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急取冯玉祥及孙科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②。1937 年2 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孙科又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 人紧急提议《恢复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案》。周恩来后来曾将之视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③ 1938 年孙科访苏时，苏方对国共关系“未能融洽”表示不安，孙科对此十分重视，在返国途中即致电蒋介石，提出对此类事“应急改善”④。1940 年7 月，孙科在报刊上公开赞

---

① 《冯玉祥日记》，第5 册，765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 部，61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19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④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 编，《战时外交》（2），409 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扬中共对团结抗战的贡献，指出：保持团结统一，实现民主宪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首要条件，而“首先表示促成这个统一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一般人谈起统一，便联想到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对统一有很大的贡献的缘故”①。1940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将中国资产阶级大体上分为三派，即：“大资产阶级投降派（暗藏在抗战营垒内的）”“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今天主要当权者）”以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与中间派”，中共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孙科、冯玉祥、李济深、于右任、陈嘉庚、陈光甫、黄炎培等为代表，这个阶层至今基本上还没有政权，还是我党较好的同盟者”，是“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的一派。② 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反共”“防共”心理，孙科提出对中共问题不能反潮流，“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今后，“首先要扫除反共的心理。我认为今天要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绝不可也绝不能用武力”，只能“以政治方法求解决”，要允许中共合法存在。③ 1944 年，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并在重庆秘密征求部分人士意见。孙科等人建议，不妨提议扩大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通过联合的国防委员会来改造政府，筹备选举，制定宪法。④ 因此，1944 年 5 月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⑤。此点虽非事实，但孙科在此期间确与在重庆的中共人士接触较多，也是中共重点关注、团结的对象之一。1944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在给党内《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中提到，“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⑥。1945 年 2 月，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阐明中共方面的立场，其中即包括孙科并宴请了孙科等人。9 月 1 日，孙科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宴请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孙科出席并主持。

总之，抗战时期，是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孙科基本上维持了与中共接近的立场，是较为坚决的抗战派、亲苏派、和

---

① 《中苏文化》，（重庆）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 年 7 月。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481 ~ 485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③ 孙科：《三民主义新中国》，61 ~ 62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④ 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载自《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纪念集》，233 页，1995 年增刊。

⑤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724 ~ 727 页，台北：南天书局，1994。

⑥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19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共派。他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推动团结抗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作为一个信仰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国民党领袖，能够这样做，说明他还是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摆在较为重要的位置的，不管他出于何种考虑，对其历史作用不应抹杀。他这样做与这时期他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过从较多，在政治上经常与他们保持同一姿态有关，也使得抗战时期成为他个人历史上较有光彩的一个时期。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他在这一时期能够在一些重要方面大体上接近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均提出了某些有进步倾向的主张，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他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区别出来，而视之为国民党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

最后还想说明的一点就是，在民国史上，孙科是一个家世显赫、身处政坛核心、具有特殊影响的人物，但并不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蒋介石、孙科相互之间始终有所保留，始终存在一定距离。孙科是位高而权轻，虽在抗战初期因在修复中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度为蒋介石所倚重，但在访苏使命结束，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中苏关系降温后，孙科在实际政治决策和政治运作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他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并曾流露出苦闷和失落的情绪。他在其后常常以谙熟国际问题的官员身份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意见，也是对其政治角色的一种调整，是扬其所长、对祖国抗战尽可能贡献其力量。由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意见仍是很有分量和值得重视的，在当时发挥了其应有的影响力。即在今天看来，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节　台胞抗日复台活动在广东

广东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省份之一，早期台湾同胞主要是闽粤两省移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后，台湾人口615万，其中闽粤籍同胞570万。自1895年马关条约日本割占台湾，台胞为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由于血统上的亲缘关系和地域上的便利，许多台湾青年回广东求学并在广东积极从事抗日复台的革命活动，广东成为在大陆的台胞进行抗日爱国斗争的中心之一。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台胞在广东的抗日斗争更与整个华南的抗战联为一体，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宝岛台湾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广东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一些台湾青年志士，也深受感召，在广州开始了他们的爱

国活动。1926年12月，在张深切、李肇基（友邦）等领导下，即酝酿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编辑出版了《台湾先锋》杂志，不久又发展为台湾革命青年团，参与者有郭德钦、黄济英、张学东（美统）、张克敏、陈旺枞（思齐）、李祝三、杨春松、温而励等一大批人。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39年秘密出版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似乎亦为在各地的台湾人留学生，因受支那革命运动的影响而组成的团体之一。将希望寄托于支那民族革命的发展，以打倒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为目标。组织的当前目的是，先形成革命势力的母体，呼吁四百万台湾本岛人，提高其民族革命意识。台湾学生联合会，不久便把名称改为革命青年团，且在被检举而组织崩溃后，其团员个个成为共产主义者，或参与台湾共产党的创立，或加盟为党员，对本岛共产主义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①

关于台湾革命青年团的由来与构成，曾任该团宣传部长的张深切在《广东台湾独立革命史略》（中央书局1948年出版）一书中说："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前身，是广州台湾学生联合会。该会的组织，虽然以学生为主体，其实当时因为要适应社会客观的情势，所以包含相当广阔的范围。未几会内发生分裂，学生与非学生之间，意见不合，才又组织上述的革命青年团。事实这两个团体，可以说是完全一体，凡学生联合会的会员，没有一个不参加青年团，而青年团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支援学生联合会，可以说是以这两个团体作两轮，推动了台湾的革命工作的。日本政府也不分彼此，凡属于这两个团体的人，都认为属于同一起的案件，统称为'广东事件'。"②看来，这个组织内有台籍学生，也有其他台籍人士。学生成员中，一部分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一部分为以中山大学为主的其他各院校学生。

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受大陆反帝反封建革命洪流的推动，提出了十分鲜明、富有特色的反帝革命主张，这些主张主要反映在1927年3月12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于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敬告中国同胞书》和1927年6月17日《台湾革命青年团为"六一七"台湾耻辱纪念日事致中国民众书》等文献中，其要点为：第一，台湾是日本霸占的中国领土，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必须摆脱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谋举台湾独立"，回归祖国。他们明确提出："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

①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册，160页，（台）创造出版社，1989。该书为《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2编中卷之中译本。

② 张深切：《广东台湾独立革命史略》，8页，台中：中央书局，1948。

地!”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实现“台湾民族的自决”，“收回台湾”。应当说明，这里说的“谋举台湾独立”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含义，不仅不是要从祖国分裂出去，而且恰恰相反，是要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怀抱。关于这一点，后来李友邦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解释：“为什么要‘独立’？因为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台湾革命首先要闹独立；独立了，要返归祖国。”① 第二，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指导，积极投身祖国的革命运动，同情共产主义。他们模仿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口吻指出：“西方有一怪物，被称为共产主义，东方有一伟物被称为三民主义。现在领导着西方的无产阶级的是共产主义，而正在唤醒东方弱小民族的是三民主义。”“东方弱小民族之一的台湾，虽然也与中国同祖同宗，但是其所受的痛苦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蹂躏的惨状，却超乎祖国数倍。祖国现在已进入革命发展时期，我台胞应认请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赶快完成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以促进大同主义的实现。”第三，呼吁中国民众、中国革命政府“毋忘台湾”，积极支持、援助台湾革命，帮助台湾人民从残暴的异族奴役下解脱出来。他们提出：“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援助台湾革命!”“希望中国全国的民众，尤其是国民政府更加注意，中国的土地，台湾的问题。更加爱护台湾的民众，援助台湾的革命。”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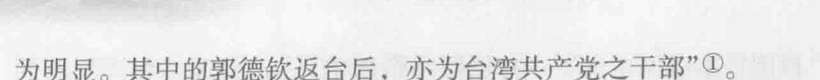
台湾革命青年团上述主张的提出，在台湾革命史上，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为使台湾成为其“南图北进”的基地，乃对台湾人民的统治策略改取所谓“怀柔政策”，岛内一些上层人士所领导的抵抗运动重点也因之转为“非武力抗争”，带有较为温和的、改良主义的色彩。台湾革命青年团的主张则较进步，据张深切回忆：“革命青年团成立后，时常开会讲座台湾的革命方式，逐渐趋近于独立运动的倾向，不久就把过去的妥协思想都完全肃清了。”“革命青年把这种议会请愿的消极理论，完全加以清算，重新树立了台湾独立革命的旗帜，毅然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宣战。”③ 因此“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称这个组织有“共产主义的影响”，台湾学者王晓波认为“台湾革命青年团是属于国民党左派倾向者尤

---

① 张毕来：《台湾义勇队》，见《革命史资料》，第8辑，4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10～1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③ 张深切：《广东台湾独立革命史略》，9～10页，台中：中央书局，1948。



为明显。其中的郭德钦返台后，亦为台湾共产党之干部”①。

但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台湾革命青年团存在的时间较短，1926 年 12 月，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后，革命青年团成立的时间，王晓波先生的文章说是 1927 年 5 月，② 此说当有误，因上文曾提到该团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时发表了《告中国同胞书》，时间为 1927 年 3 月 12 日，可知该团至少成立于 3 月 12 日之前，但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订。到 6 月中旬，该团即告解散。解散的原因有下列三点：其一，蒋介石新右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东当局的清党。据张深切回忆，广东当局“四一五”清党之初，还未波及台湾革命青年团，“但是到 6 月初旬，不知何故，青年团也被当局注意起来，于是 6 月中旬本团就结束了一切的事务，同时留在广州的同志也分散到各处去亡命”③。其二，日本殖民当局的检控。日本乘机在各地布下罗网，搜检关系广东台湾革命的嫌疑者，被搜检的有 1 000 余人，送至警察署审问的 300 余人，提交检察局的 20 余人，被检查局起诉的 13 人，有名单而脱走的仅有 10 余人。一度活跃于广东的台湾革命力量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其三，革命青年团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大革命后期日益尖锐的国共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该组织：“当时在广州的台湾学生，没有加入党派的很少，而加入国民党的居多，这党派的暗流，由于争取领导权而影响了我们的学生会。”张深切一派“主张台湾学生须超越党派”，“不需要参加任何派别的斗争”，认为台湾的情况和祖国不同，斗争任务也有区别，前者是抗日，后者是反对军阀，“我们需要援助祖国的革命，但不能相信祖国革命的成功，就等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强调两个革命的区别，重点放在台湾革命，这一派的主张“虽然未受反对，但不受欢迎是事实”④。李友邦等人则偏重于完成中国革命才能解救台湾，持较为激进的革命主张。主张的分歧加上不同党派斗争的背景，使得该组织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和外界压力缺乏必要的承受能力，随着国共关系的破裂而迅速解体了。

1932 年 3 月 7 日，广东台籍青年林汉平（云连）、余长啸、黄文光、刘武刚、林正德、向爱玉等在中山大学商建台湾民主党，以便领导台湾同胞开展抗日斗争，推翻异族对台湾的统治。最初用“华侨联声社”名义进行活动，1933 年 10 月，正式宣告成立台湾民主党。他们于“大中华民国即革

①② 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载自《台湾研究集刊》，1990 年第 2、3 期合刊。

③ 张深切：《广东台湾独立革命史略》，7 页，台中：中央书局，1948。

④ 张深切：《里程碑》，221 页，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

命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在“我祖国革命先烈墓前”宣誓，要“为我大汉民族争光荣；为我台湾同胞争自由”。① 台湾民主党本部设在广州，分部设于汕头、惠州、香港等地。他们创办《台湾革命运动》刊物（后改名《台湾》，再改为《研究日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台湾省的罪恶，号召台湾同胞起来斗争，恢复国土。他们还计划从香港返回台湾，领导台湾同胞起来斗争。

抗战爆发后，在粤台胞更以空前热情投身于祖国的抗战事业，他们或在军队中统兵杀敌，屡立功勋，或组织战地服务组织，在前线进行宣传鼓动及其他工作，活跃在辽阔的华南抗敌战场上。其中以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最为突出。

丘念台又名丘琮，是台湾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老同盟会员，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矿科。曾任广东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和中山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数次出山海关参加支援东北义勇军，并协助广东当局抄获广东汉奸名单及地址，减少了日谍的损害。抗战爆发后，丘念台到延安，得到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等中共负责人的接见，并经常去“陕北公学”听课，对中共组织和教育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抗战的办法表示钦佩。

1938 年夏初，丘念台回到广东，争取到余汉谋第 12 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职衔。他每月领得的薪金，拿出一部分作为活动费，邀集陕公、抗大学习结业返回广州的青年杜声闻、林启周、丘继英、魏梵、卓扬、蔡伟青（蔡子培）、关其清、关炳辉、邓云龙（邓慧）、萧道藩（萧炯）等人，筹建抗日救亡团体，请求国民党当局批准。因国民党当局对丘念台有疑心而未具体答复。一直到 1938 年 10 月中旬，日寇迫近广州时，丘念台通过他的朋友、12 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赵一肩的帮助，才得到该司令部发给 2 000 元作为经费。同意他组织抗日团体。这时蔡伟青、关其清、邓慧、黄炳辉、卓扬、陶祖梅、肖昭声、丘时婉等人都参加了丘念台领导的这个团体。1938 年 10 月下旬从广州撤至梅县后即正式宣布成立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东区服务队。

东区服务队成立后，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举办青年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1938 年 12 月上旬，丘念台率领东区服务队开赴蕉岭文福乡，这里是丘念台的家乡，丘念台计划使这块

---

①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2 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16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地方成为群众抗日运动的示范地区。在召开过许多座谈会以后，决定在文福乡举办青年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训练班以丘念台为班主任，招收了当地青年和蕉岭梅县的知识青年 100 多人，分高级班（初中毕业程度）、初级班（小学毕业程度）进行训练。训练时间一个月，训练内容和方法基本照抗大和陕北公学。军队政治工作课程包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哲学、抗战理论、抗日游击战术、抗日群众运动、中国革命问题、三民主义等。训练班结束后，大多数人回到本乡本村进行群众工作，普遍建立夜校识字班、武术馆，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成立村青年抗敌会、妇女抗敌会等组织，还成立乡抗敌后援会。东队队员每晚都下到村里，轮流辅导，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时，东队还出版了一份《总动员》专刊，由林启周主编，都是鼓动全民抗战的文章。

第二，到潮汕前线独立第 9 旅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39 年初，国民党当局撤销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该委员会的东区服务团遂失去合法存在的依据。丘念台到韶关经过活动争取到张发奎的支持，同意将东区服务队归属于第 4 战区，张发奎叫他将全队开往潮汕前线，受独立第 9 旅华振中旅长指挥，参加抗战。东队于 1939 年 6 月到达前线后，先是协助独 9 旅政治部办青年训练班，学员为随独 9 旅撤退出来的潮汕青年学生，共 200 多人，独 9 旅想把他们培养成为地方抗日工作的骨干，要东队帮助训练这些青年。训练班结束后，该旅政治部把这些青年编为战时工作队，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东队则留在独 9 旅的特务营及第 3 营里做军队政治工作，同时也在潮安前线农村做宣传发动工作，提高群众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思想，搞好军民关系。

第三，收容安置台籍青年和对敌情报策反工作。香港沦陷前不久，台籍爱国青年钟浩东、蒋蕴瑜、肖济寰、黄丽珍、李南锋等秘密从台湾经香港回大陆，欲投身于祖国抗战事业。但踏上祖国的土地后，因心情兴奋，竟用日语唱起歌来，在惠阳被国民党情报人员当作日本间谍逮捕。丘念台得知后即与有关当局交涉，经张发奎同意，他们加入了东区服务队成为东队的得力干部。1943 年秋，“东队”曾两次派人潜入广州日占区做情报和台侨策反工作。当时先获得了一条线索，一个名叫陈明的男子，在通过石龙日伪检查站去惠阳时，仅和检查的人悄悄说了几句话便放行了。因此受到国民党情报人员注意。经调查得知陈明是台籍人，但一时未能取到陈明是敌探的确凿材料，故没有即刻逮捕他。国民党方面把这些事告诉丘念台，要丘念台协助查实。丘念台叫“东队”的钟浩东、肖济寰和李南锋三个台籍队员去做这项工作。钟浩东等以认同乡拉关系的方法，和陈明混熟后，

问陈明来惠阳有什么任务，陈明承认是奉广州日军情报机关派遣到惠阳搞情报的。于是丘念台约陈明面谈，对他晓以大义，要他认清形势回归祖国参加抗日等等。他表示愿为祖国效劳。陈明回广州后积极为我方提供我们所要的广州日军情报和策动“台侨”起义，后因日方察觉未能成功，陈明也被日寇杀害。①

1941 年，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在香港秘密设立了“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任命台籍革命志士、老同盟会员翁俊明（祖籍广东澄海）为筹备处主任，时在军委会政治部工作的台湾人刘启光为秘书。1943 年 4 月，“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执行委员会”在漳州正式成立，翁俊明任主任委员，谢东闵、林忠、郭天乙等任执行委员，在广东的东区服务队队长丘念台也当选为执行委员。

还在 1942 年冬，丘念台就曾上书国民党中央，请求恢复台湾省制，他当选为直属台湾党部执委后，于 1943 年 8 月再次上书提出此一建议，认为明确恢复台湾省制后，“台岛革命热情可提高。陷区台侨可离敌内向，英美可息共管分治等妄议”②。1943 年春，丘念台获任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委员后，不久又兼任台湾党部粤东工作团团长，由他引荐的台湾爱国青年钟浩东则担任了台湾三民主义青年团粤东工作队队长，遂将东区服务队结束，而以上述两个组织的名义继续工作，丘念台用他个人在台湾党部所得的薪水和补助，作为原服务队员的活动经费。丘念台本人的工作重点则转到了抗日复台的方案拟订和理论宣传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1944 年 6 月 17 日，他在《台湾青年》杂志上发表《怎样纪念台湾沦陷四十九周年》一文，对抗日复台问题提出 9 点意见和建议，其要点为：①在大陆工作的台胞较大陆同胞肩负的责任更重：一方面，不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战事业，战胜日本侵略者，就不能收复台湾；另一方面，不加倍努力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使之有较大改善，也不能好好接收台湾。因此必须抛弃个人的功名利禄念头，埋头苦干。②不能把收复台湾当作官僚军阀争权夺利、抢夺地盘的机会。③要以独立自主的意识来收复台湾，既要争取国际承认，又要对恢复行使在台湾的主权理直气壮。④要从民族灾难中吸取教训，不要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偷安享乐，要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要看

---

① 卓杨等：《东区服务队与丘琮》，见《广州文史资料》，第 28 辑，123 ~ 146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2 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1 324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到我们的国家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必须发愤图强，迎头赶上。①

1944 年 8 月，丘念台将他草拟的《复台大计管见》《台湾党务改进管见》等文件送呈国民党中央，对光复台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尤其提出将来接管台湾时不能“视为接收宝库，群趋享用；用人惟亲，弃法尚情，贪污苟且，残虐其民”，从而导致“民必叛而独立，而共管，势甚累卵”②。从后来国民党接收的情况及不久就酿成“二二八”事变的乱子来看，丘念台的看法无疑有较强的预见性，是对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状况有相当了解后的率直之言。丘念台在意见书中还对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几年来的工作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认为应加以切实改进，特别要消弭内部的派系纠纷，增强各团体间的团结。

1944 年 9 月，丘念台被聘为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委员。1945 年 2 月曾奉命协助美国第 14 航空队（驻兴宁）招募 20 余名台胞，准备协助美军在台湾登陆作战，后因美军改变作战计划而未果。1945 年 9 月，丘念台到广州协助遣回台胞的工作。

在粤活动的爱国台胞除丘念台组织的东区服务队——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粤东工作团这一系统外，还有李友邦等所领导的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的下属机构。1941 年 2 月 10 日，台湾革命同盟会总会在重庆成立，1942 年 3 月决定在几个主要地区设立分会，到 1943 年 6 月，已经成立或筹备的有西南、泰和、福建、厦门、上海等 8 个分会。而广东一省，就占 3 个，即曲江、广州湾、汕头分会。

曲江分会成立于 1943 年 3 月，柯康德为主任，领导人还有赖光雄、袁曙协、郑明仁、梁义清、黄庆光、王文辉，有成员近 40 人。该分会以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为活动区域，并负责台湾岛内交通联络及组训工作之一部分。

广州湾分会筹备于 1943 年 5 月，李建华任筹备主任，成员有沈昆、林平、赵惠民、丘明，以广州湾、海南岛、越南、香港为活动区域，并负责台湾岛内交通联络及组训工作之一部分。

汕头分会筹备时间同上，主任为苏贵，成员有萧子明、章纯、黄木、

①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2 集，《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202 ~ 204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②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2 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382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廖建，活动区域为汕头。①

此外，像台湾新竹人邹洪，青年时回大陆，1936 年任粤汉路警备司令，后任粤省保安处处长。抗战爆发后率部拒敌，1939 年升任陆军新 2 军军长，1942 年任第 35 集团军副总司令，转战湘粤，屡建战功，1945 年病逝，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台胞在广东的抗日复台活动是相当积极而活跃的，他们一方面踊跃投身祖国的抗日斗争，一方面热诚地为祖国收复台湾奔走呼吁、献计献策。他们的活动，是活跃于大陆的所有爱国台胞全部抗日复台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广东地方当局囿于党派成见，对他们的工作未能给予应有的鼓励和支持，甚至常常设置障碍，他们是在较为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就整个华南战场来看，他们人数不多，力量有限，但他们的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抗战胜利后，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这一胜利的取得与抗战期间在粤台胞的不懈奋斗也是分不开的。

第五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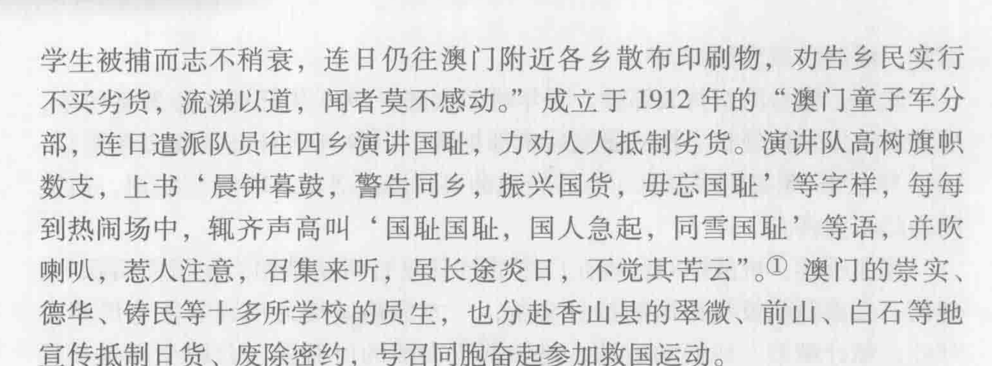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重视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环境，进行革命斗争，这其中又以香港为重点。由于澳门地域小、人口少、澳葡当局控制较严，中共在澳门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和影响相对较小，留下的资料也是一鳞半爪的，中共在澳门的活动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本节仅根据现有资料略加梳理。

一、中共初创阶段在澳门的组织状况

港澳同胞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一些进步分子还积极配合祖国内地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澳门的青年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澳门孔教学校的学生对于此次国耻（5 月 9 日）异常愤恨，经已组织 11 人团，实行抵制劣货，并派出演说团，虽有

① 《台湾革命同盟会工作报告书》，见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139 ~ 156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具体活动情况，限于资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学生被捕而志不稍衰，连日仍往澳门附近各乡散布印刷物，劝告乡民实行不买劣货，流涕以道，闻者莫不感动。”成立于1912年的“澳门童子军分部，连日遣派队员往四乡演讲国耻，力劝人人抵制劣货。演讲队高树旗帜数支，上书‘晨钟暮鼓，警告同乡，振兴国货，毋忘国耻’等字样，每每到热闹场中，辄齐声高叫‘国耻国耻，国人急起，同雪国耻’等语，并吹喇叭，惹人注意，召集来听，虽长途炎日，不觉其苦云”。① 澳门的崇实、德华、铸民等十多所学校的员生，也分赴香山县的翠微、前山、白石等地宣传抵制日货、废除密约，号召同胞奋起参加救国运动。

20世纪20年代初，澳门的工人阶级开始组织工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2年5月29日，澳门发生葡警打死华人45人、打伤60多人的惨案，激起了澳门各界华人的极大愤怒，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在各行业工会组织下，3万多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澳门华商也宣布罢市。对此，澳门当局采取高压措施，规定凡未经澳门政府立案的工会团体一律撤销，宣布解散68个曾与这次罢工罢市有关的工会团体。然而，澳门工人没有因此而屈服，继续坚持斗争，迫使澳葡政府坐下来谈判，并部分满足了工人的要求。1927年10月，为抗议江门“新南海”轮无理开除工人和国民党当局压迫工人，澳门海员工人参加了广州、香港、江门海员工人联合举行的罢工。10月14日，省、港、澳、江海员工人及广州工人共万余人在广州集会，组成海员工会维持委员会，并举行示威游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的早期领导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到澳门。1922年澳门“五二九”事件发生时，张太雷即向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执行委员会提出，通电警告葡萄牙政府，组织关于葡案的宣讲队。张太雷并在中共创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声援澳门工人的文章。②

至于中共何时开始在澳门开展活动和发展组织，目前尚无确切的材料，估计在大革命时期即已开始，组织名称为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由广东省委领导，成员曾发展到数十人，但大革命失败后，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据中共澳门特支1929年11月在给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现在澳门的同志，差不多都是成为害怕和机会主义者落后各种现象，只有10个同志还是比较积极，查其原因，为着今年来未有开过一次会，和负责者的谈话，以为党

① 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21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②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对他们作为死了。”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关于今后工作的设想：“①访寻失踪同志谈话。②去工厂和码头把工人组织起来。③吸收新同志。”① 稍后的另一份报告也谈到中共在澳门的工作目标，从中显示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澳工作的重心仍是工人运动：“在邓来澳之后，曾找着负责同志讨论工作问题，已决定：①工作中心：甲、歧关汽车公司；乙、青洲红毛泥厂（即水泥厂——引者）；丙、码头工人及该处苦力工人；丁、火柴厂、香铺女工。……以上各事已经积极做去。”② 1930 年 12 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第 18 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紧布置年关斗争，提到“在香港、汕头、澳门等地方成立失业工人委员会来号召这一斗争”③。这说明党在澳门的工作正在恢复。

1931 年 1 月，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3 月改为两广省委，李富春任书记。5 月，李富春调到中央工作，省委书记先后由蔡和森、章汉夫、陆更夫接任，其间，蔡和森牺牲，章汉夫被捕，陆更夫也牺牲了。1932 年 9 月，两广省委改为两广工委，潘洪波任书记。12 月，潘洪波被捕叛变，部分同志组成两广临时工委，到 1933 年底才与中央和属下党组织恢复联系。1934 年 3 月，两广临时工委改为香港工委，9 月，香港工委又遭到严重破坏，至此，在香港、广州等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被完全破坏，作为中共广东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便停止了活动。

在上述背景之下，澳门党的情况一再发生变故，组织几经波折，与上级的联系也时断时续。

1931 年初，澳门党组织的工作应当已有进展。这年 3 月，中共两广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到广州及苏区工作，其中均打算从澳门支部派人。该文件说：“省委必须从香港、澳门支部和赤色工会中在两月调 10 人到广州去建

---

① 《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澳门环境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 年 11 月 15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25 册，192 页，广州，1984 年印刷。

② 《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澳门工运情况》，1929 年 11 月 27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25 册，195 页，广州，1984 年印刷。

③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 18 号）——加紧准备年关斗争的布置》，1930 年 12 月 17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18 册，353 页，广州，1984 年印刷。

立”党的组织。① 这时在澳门还有共青团的两个支部6个人。到这年4月，澳门的工作似又有新的发展，机构也已由支部升格为市委，据广东省委的一份文件提到：“澳门市委要根据上面决定的办法进行，尤其要去建立失业工人、烟厂、士敏土厂，口厂（原文如此——引者）的工作。”② 到1931年7月，澳门的党员已发展到20余人，改属中共两广省委领导。但一个月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人员损失近3/4：“澳市工作有许多和香港相同地方，如大部分在业，大部是琼崖、海陆丰人。但是都是由香港驱逐出境，或南洋回来的同志，情绪也不很好，一共20余人，一贯的和平发展。最近破获被捕同志16人。”③

这次破坏使澳门党组织的元气大伤，到1932年5月，中央巡视员到粤视察时，澳门党组织的工作仍然没有起色：“澳门原来有市委，30多个同志，去年8月大破坏，现在没有恢复。”④ 可能在中央巡视员巡视之后，澳门党组织的情况引起了两广省委的重视，到这年9月，中共两广工委在致中央信中谈道：“澳门工作已派人去建立和恢复，即可成立互济会和党团的组织。”⑤ 然而，两广工委很快又遭破坏，幸存的党员与广州、澳门“一向无关系，这两处的关系，尚没有恢复”⑥。

新成立的临时工委恢复澳门组织的工作数月之后才重新开始。1933年10月，中共两广临时工委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答复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澳门组织状况怎样？怎样去找？有无找到的把握”等问题时，该同志回答：“由东江交通员新近到澳门，才找到少数过去支部的同志。至于详细情形，因我来沪前，尚未接到他的报告，大约现有小部分同志找到。

① 《中共两广省委接受中央对广东工作决议的决议》，1931年3月2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册，81页，广州，1984年印刷。

②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号），1931年4月6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册，93~94页，广州，1984年印刷。

③ 《中共两广省委致中央报告》，1931年8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60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④ 《中共中央巡视员定川汇报两广工作》，1932年5月24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0册，90页，广州，1984年印刷。

⑤ 《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致中央的信》，1932年9月2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0册，356页，广州，1984年印刷。

⑥ 《中共两广临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21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1册，178页，广州，1984年印刷。

将来定由这线索去发展澳门的组织。”① 1934 年 3 月，两广临时工委改为香港工委。4 月，香港工委曾有恢复澳门工作的打算，但在 9 月份遭到彻底破坏，从此，中共在华南地区包括澳门的活动便一时陷于沉寂。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澳工作所遭遇的这种情况，与“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王明冒险主义的干扰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在较长一段时间，澳门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是工人运动，发动工人反对资本家，但由于不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遇到了很大阻力。1929 年 11 月澳门特支给省委的一份报告，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澳门的环境，大有差别，澳门尺寸之地且交通又不方便，若做伟大的斗争，当然没有可能，……以去年陈联馨香铺要求加工是一个举例，因东主减工钱而至罢工，当时澳政府派差拿人，卒至无条件而屈服。所以，对于行动上略有觉悟的，就非常注意，工人对于组织公开工会，一律被解散，秘密则工人骇怕，若逐渐做去才有可能。对于散派传单等工作，本属很容易，不过全澳门居住人数太少和交通不便，若此种工作发现，差人（即巡警——引者）就注意到生面人等，而且搜查非常严厉，只有做完工作离开澳门才有可能。”②

但在当时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对澳门党组织的要求反而更加脱离实际，认为“目前广东党在继续立三路线错误之时，右倾危险特别严重”③，而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张。1931 年是中共两广省委发出各种斗争号召最多的一年，也是广东党组织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一年。这一年，省委先后发出了“接受四中全会决议和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五一”斗争的布置、“八一”斗争的布置、关于两广兵运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反帝工作的布置、关于纪念十月革命 14 周年斗争的布置、关于纪念广州暴动 4 周年斗争的布置等等。要求发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举行群众大会、飞行集会。如“决定‘五一’在香港罢工一天，在广州罢工一天，在各厂均召集厂内或车间的会议，召集学校的会议，召集飞行集会。……在澳门、汕头也要

---

① 《中共两广临委负责人的口头汇报记录》，1933 年 12 月 26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21 册，223 页，广州，1984 年印刷。

② 《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1929 年 11 月 15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25 册，191 ~ 192 页，广州，1984 年印刷。

③ 《中共两广省委接受中央对广东工作决议的决议》，1931 年 3 月 29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19 册，79 页，广州，1984 年印刷。

举行会议"①。两广省委不顾客观环境，不顾实际情况，层层压任务、定指标。3月份要求澳门调人去广州、汕头发展党组织，动员20人去红军；4月份又要求动员30人去红军；6月份再提出"澳门工作，在'八一'斗争中应该发展3个群众组织、3个同志，建立2个自动的支部。同时要举行广大的征调运动，派去参加红军"；9月份又提出"澳门，应动员每个同志分别召集谈话会，发展2个、3个到5个的反帝小组"。② 在"九一八"事变后，广东省委不是号召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提出"扩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当时的澳门提反对葡帝国主义，这除了引起澳葡当局的进一步防范外，对党在澳门的工作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左"倾中央布置的往往是一些很难执行的任务，对那些达不到冒险指标的组织和党员，他们便横加指责，实行惩办主义："澳门工作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那里的工作完全没有推动，而且倒退，这次澳门负责同志来，很严格的谴责了，解散特支，把负责人放工厂中去找职业。"③

这一系列"左"的做法，给中共在澳门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最后弄到党员无处藏身、党组织的工作陷于瘫痪的地步。直到王明路线结束，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之后，中共在澳门的工作才开始复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制定的工作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在抗战时期，由于主要骨干不断被抽调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澳门党组织状况一度波动较大，但从总体上看，它是朝着成熟、稳健、富有成效的方面发展。

二、中共成熟阶段在澳门的组织状况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香港，找到大革命时期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柯麟。柯麟1931年初受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派遣到香港开诊所，一直未与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香港站稳了脚跟。1935年中秋节

---

① 《团广东省委"五一"工作通告》，1931年4月1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5册，110页，广州，1984年印刷。

② 《中共两广省委通告》（第4号）（第6号），1931年6月30日、9月20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册，151页、225页，广州，1984年印刷。

③ 《团广东省委报告（第2号）——四中全会后广东工作情形》，1931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5册，143页，广州，1984年印刷。

前，潘汉年安排柯麟与刚从国外回来、定居澳门的叶挺见面。之后潘汉年向柯麟提出，希望他去澳门定居，就近照顾叶挺一家，影响叶挺重新参加党的工作。柯麟欣然接受，于中秋节举家迁居澳门，不久进入澳门镜湖医院。柯麟从普通医生到出任院长，医院也从一所小医院发展为澳门最大最好的医院。

柯麟与1943年到澳门的柯平（柯麟之弟，中共党员）这条线与广东地方党组织是一种什么关系——上下级关系？平行关系？或是柯麟直属中央有关部门？笔者尚不完全清楚。一些学者有言："中共在澳门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叶剑英系统的柯麟（镜湖医院值理），平时活动则以'大华行'这家贸易公司作掩护。"① 但不知何故，在此后广东党组织的文件及给中央的报告中，从未提到过柯麟，笔者也未见到柯麟参加澳门地方党组织活动的材料，柯麟似乎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据柯麟自己回忆，1930年前后，"我即转到香港，开南华药房作交通联络工作，只与李少石（中央驻港交通总站负责人）联系，和地方没有关系。所以30年代初期省委秘书处长潘亚波（?）、军委书记廖某某叛变，牵连许多在香港的同志，……我仍没有被发现。1936年间，香港政府搜查了我们药房两次，为免遭破坏，我把南华药房交弟弟柯平管理，我到澳门开设南华医社。到1939年才开设镜湖医院，在澳门仍与李少石联系，与省委林平、方方同志个别联系。这期间做一些联络工作，并接纳一些同志医病，……联络过的同志还有夏衍、范长江、连贯、李少石、潘景中等。李少石走后，由潘与我联系。我在澳门工作一直到解放。"② 这份回忆或者大致可以说清这种关系。③

到1936年上半年，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实到广东恢复南方的党组织，大约到此时，广东地方党系统的澳门工作才开始恢复，"薛尚实到广东后，首先在香港、广州、澳门，潮梅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并

① 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第225页，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

② 柯麟：《参加革命运动的回忆》，见《广东党史资料》，第21辑，18～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③ 关于柯平1943年受广东党组织委托去澳门工作及中共在澳门活动的情况，还可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子健、叶文益主编：《澳门归程》，102～15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恢复了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的组织关系”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 年 9 月，中共中央又派张文彬到广东整顿和加强党的组织，10 月，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等地的党组织。中共在澳门的工作得以重建，成立了新的澳门工委，人数发展到 20 余人。② 1938 年 4 月，南方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广东省委成立，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的党组织。此时澳门党的书记为杜岚，女，20 多岁，小学教师。

1938 年 10 月 21 日，日军占领广州。24 日，广东省委决定，在香港成立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吴有恒任组织部长，虞焕章（杨康华）任宣传部长，澳门市工委的工作划归东南特委负责，由廖锦涛任工委书记。廖锦涛为汽车公司职员，30 多岁，1937 年入党。组织部长余化，小学教师，1938 年入党，因工作出色，1939 年调任东南特委青年部长；宣传部长林枫。廖锦涛任书记时，澳门党组织的“工作有了相当的发展，到广州失守时有党员 50 人”。1939 年初，廖锦涛领导服务团回内地，余化任书记，组织部长邓平，宣传部长林枫。1939 年 4 月，余化调到特委，林枫任书记。1939 年 7 月，林枫调广游二支队（吴勤部队），邝任生出任书记，邝任生内战时期入党，1937 年恢复党的关系，大学文化程度，中山人，曾任中山县委宣传部长，在澳门的职业为教师。“目前看他工作还积极，还能够根据我们的原则做工作，澳门的工作目前是比几个月前进步的。”③

1939 年 11 月，东南特委被撤销，澳门工委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当时党员发展到 46 人，其中产业工人 25 人，教员 12 人，学生 6 人，商人 2 人，自由职业者 1 人。工委由 3 人组成，除书记邝任生外，组织部长邓平，织布厂女工，20 多岁，“积极负责，阶级意识及组织观念还好，有小学文化水平”，“宣传部长沈△△同志是个新党员，小学教员”。下设 8 个支部，8 名

---

①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139 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② 《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报告》，1937 年 11 月 7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9 册，52 页，广州，1987 年印刷。

③ 《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 年 1 月 13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113 ~ 115 页，广州，1986 年印刷。《中山县检查工作目前的结果》，1939 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55 页，广州，1986 年印刷。

支部书记都是抗战后入党的党员。[1]

194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南省委1940年12月在香港成立，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宣传部长石辟澜，澳门工作由粤南省委负责。1942年2月粤南省委撤销，准备与粤北省委合并，但在五六月间，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相继被破坏，引起中央和南方局高度重视。南方局在1942年8月间指示：为避免事件的继续扩大，"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干部转移到游击区工作，其余干部找好社会职业如教书、做工、读书、做生意等社会职业作掩护，勤工、勤学、勤交朋友，约定符号，不定期的联系，等待时机，恢复活动"[2]。广东党组织坚决贯彻了这一指示，1943年1月成立临时工委，由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梁广负责城市工作，机关设在广州、香港、澳门，"决定对东、西、北三江的组织停止工作，保存个别关系；广州外围与珠江三角洲及东江前东组织并四个城市（广、港、澳、湾）采单线形式继续工作"[3]。关于澳门情况，尹林平1943年2月给中央的电报说："广州、澳门、广州湾（今湛江市——引者）三城市之具体情况，因交通困难，尚未清楚。现正派人联络，详情以后报告（照去年7月前的组织基础，广州只有25人，澳门28人，广州湾有9个人）。"也即1942年7月以前为28人。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临时工委还对广州、香港、澳门、广州湾四城市党的组织工作原则做了如下规定：

> 一、省、港、澳、湾四个城市党组织依照中央指示由梁广负责指导，在各城市分设特派员一人，采取单线领导方式，必要地区设平行组织（分别职业部门及工厂、学校，分开地区）。
>
> 二、省、港、澳、湾均处于敌后及被敌人统制情况下，党的组织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长期掩护、积蓄力量、培养干部、埋头苦干。
>
> 三、领导干部职业化，停止会议生活，停发文件，关系疏远，

① 《粤东南特委地方党干部党员统计表》（统计时间：1939年11月）。《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年1月1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1册，115页，广州，1986年印刷。

② 尹林平：《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回忆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斗争历史》，见《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2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③ 《林平给中央并恩来电——关于临委对所辖各地工作的意见》，1943年2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8册，230页，广州，1987年印刷。

禁止任何横的关系。港、澳、湾着重巩固，慎重发展（主要是工人、海员、学生）。广州则着重发展（主要是工学两类），亦采取双重组织，严格审查工作。

四、以勤职、勤学、勤交友的精神去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广泛统战工作，加强干部与党员教育，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①

1944 年 10 月，随着环境的好转，省临委向中央请示在大部分地区恢复组织活动，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澳门仍坚持原来方针，只加强联系及阶级教育”②。1945 年成立广东区党委，1947 年改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分局下设城市工作委员会，继续指导着中共党组织在澳门的工作，“城委，下分香港市委、广州市委、澳门市委、湛江市委、桂林工委，有党员约 1 500 名”，其中香港、广州即占 1 200 名。③ 至于澳门的党员人数及工作状况，香港分局 1948 年 9 月的一份电报说：“澳门则有党员 19 人，中有黑名单的 10 人，无的 9 人，前者不敢活动，后者则领导弱，作风保守。党员分散，联系不密。……我们澳之方针为：深入群众，发展新生力量；首先从改造领导、教育旧基础做起，纠正保守作风，展开群工，才能挽救‘从少到无’的危险。”④ 在这一方针指导上，党在澳门的工作得到及时调整和充实，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发挥了应有作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再次从港澳抽调干部参与华南各地接管，包括柯麟也调回中山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在澳门的工作又交给了一批新的同志。

三、中共在澳门活动的主要内容

澳门与香港一样，是连接广东与海外的门户，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处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的直接统治之外，抗战时期保持着形式上的中立，斗争环境与内地略有不同。但另一方面，澳门地域狭小，才十几平方公里，

---

① 《林平给中央转恩来电——关于香港沦陷后的一般情况》，1943 年 2 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8 册，235 ~ 237 页，广州，1987 年印刷。

② 《中共广东临委给恩来及中央电》，1944 年 10 月 23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8 册，320 页，广州，1987 年印刷。

③ 《罗迈致尧电——华南党组织分布状况》，1947 年 8 月 27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1947. 5—1949. 3，43 页，广州，1989 年印刷。

④ 《香港分局港城委致中央及中城部电》，1948 年 9 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1947. 5—1949. 3，212 页，广州，1989 年印刷。

活动空间十分有限，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人口仅十余万，到抗战时期因难民涌入才增到三十几万，外来人员容易引起注意，若没有正当职业作掩护，要长期活动是十分困难的。基于上述特殊条件，加上中共主观方面的原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1. 掩护革命同志，提供撤退和转移的便利。广州起义之后，中共又准备在江门发动起义，但不慎被国民党破获，“负责同志都逃来香港和澳门了”①。澳门也曾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在澳门隐蔽了一个多月，然后从澳门回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到澳门隐蔽起来，半年之后，又从这里去苏联和欧洲。1941 年底，香港沦陷，一大批来不及从香港撤退的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取道澳门转移，他们以香港大中华酒店为据点集中，然后由组织安排乘走私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由澳门党的秘密联络站帮助，经广州湾或江门、台山到桂林。这批人包括夏衍、范长江、廖梦醒、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金仲华、王莹等几十人。据廖梦醒回忆：“到澳门以后，我们立即与柯麟同志的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是南方局派到香港负责地下工作的，撤离香港后又“留澳门坚持地下工作一年多”。②

2. 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内地斗争。10 年内战时期，中共澳门支部曾动员人员到内地和红军中去工作，1931 年 4 月团广东省委的工作报告提到，“在澳门动员了 2 个南洋失业回来的到红军中去”③。

抗战爆发之后，中共澳门工委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工作，广泛发动澳门同胞，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爱国青年加入“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旅澳青年乡村工作团”，回到广东的东江、西江和粤中等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 年 8 月成立的澳门四界（教育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就是在中共澳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澳门工委还动员爱国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1938 年 10 月 21 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正式成立，由党的负责人、救灾会理事廖锦涛任团长，先后派出 11 个队共 160 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内地工作。为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团于 1939 年 4 月成立中共动员青年回乡服务支部，书记胡泽群，组织委员沈章平，宣传委员梁铁。服务团以下各

---

① 《立三致中央的报告》，1927 年 12 月 28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7 册，261 页，广州，1984 年印刷。

② 《秘密大营救》，360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③ 《团广东省委工作报告》，1931 年 4 月 2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5 册，91 页，广州，1984 年印刷。



队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或党小组。1941 年 1 月，粤东南特委组织委员吴有恒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特委“从香港、澳门动员了大批的干部、党员，特别是坚定的工人干部和党员回敌后工作，增加了内地的力量与内地的同志们的信心”①。这时澳门回内地的党员已有 20 余人。

1944 年春，中共中山义勇大队派郑秀、郭宁等化装成普通百姓，进入澳门活动，建立了秘密办事处，动员了不少澳门青年到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工作。这些青年先是在代号为“纽约桥”的“青年训练班”学习，然后分配到宣传队、医疗站或者到连队做文化教员、政治战士、卫生员等，在部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种训练班一共办了 3 期。②

3. 接触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中共在澳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是将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发动下层民众，较少注意与上层各界人士的接触，这种状况直到抗战前后才开始有所转变。在这方面柯麟所起的作用是很突出的。他利用镜湖医院慈善会这一机构，广交各界朋友，特别是与何贤、马万祺、林炳炎等经济界实力人物成为至交，得到他们的支持。1946 年初，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会主席林炳炎提议，聘柯麟为院长，当林炳炎将董事会名单送澳督审查时，澳督说：“这几十个人我都同意，只有柯麟不行，听说他是共产党。”林炳炎表示：“如果柯麟是共产党，那我也是。这几十个人谁都可以换，唯独柯麟不能换。”澳督只得同意。③ 柯麟为中共在澳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联络站，叶剑英、张云逸、廖承志、李一氓、阳翰笙等到澳门都曾在柯麟处落脚。

1944 年春夏间，中共的统战对象，在澳门、中山两地均有一定地位的黄怀向中共方面传信：澳门当局想与中共游击队取得联系。中共方面经过考虑，在 8 月份派出梅重清作为游击队的代表，到澳门与澳门总督的代表、政治部秘书慕拉士会面。双方达成协议如下：①澳门当局同意义勇大队派出人员到澳门活动，但不要太公开。②澳门当局与义勇大队互相配合，打击扰乱澳门之反动分子和土匪，维持澳门及其外围的治安。③澳门当局同意义勇大队将重伤员送澳门的医院治疗，同意在澳门募捐，购买子弹、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台等通讯器材。此后，双方遵照协议，建立了一定的合

① 《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 年 1 月 13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1 册，117 页，广州，1986 年印刷。

② 欧初：《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炎黄春秋》，1995 年第 11 期。

③ 李葆定等：《柯麟传略》，26 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作关系。[1] 中共游击队帮澳门方面捕获了海上惯匪出身、经常扰乱澳门治安的国民党小特务“老鼠精”，将战时日伪在澳门的特务头子黄公杰引渡给了澳门当局；澳门当局则帮助游击队抓捕了叛徒郑实。1945 年春，澳门当局还通过慕拉士协助，将澳门地下党为珠江部队拿到的一部电台通过层层哨卡，安全运抵根据地。这期间，“我们与澳门当局的关系相当默契”。

游击队还与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我方在澳门做秘密工作的郭宁、郑秀、李成俊等人，工作也是得力的。澳门中央酒店（当年澳门最高级的酒店）老板傅德荫（即傅老榕）、搞粪务（清洁卫生行业）的严仙洲、‘回春油’老板梁柏燊和招兰昌医生等都为我们游击队捐钱。”“澳门当时的‘大丰银号’司理是马万祺，副司理是何贤，他们也都十分关心珠江地区的游击战争，为我们出过力。”[2]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与中共志同道合的马万祺在爱国富商林炳炎支持下，开办了大华行，经营葡、澳、内地间的贸易，不久，柯平与马万祺合作，开办新中行，以合法的进出口商行作为掩护，成为中共一个新的工作据点。1948 年，周恩来又派朱慎修到澳门，得到柯麟兄弟、马万祺的协助，开辟了一条山东、苏北至澳门的航线，将北方解放区出产的大豆、花生、药材等特产运到香港、澳门出售，再购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大小五金器材等等，有力地支持了解放区的经济工作。[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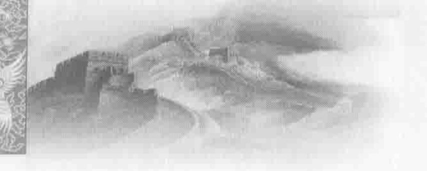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根本目标，党在不同区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的组织和党员，尽管从事的具体工作千差万别，但最终都是为着实现这一目标而斗争。澳门的环境不同于内地，澳门的党组织，其工作方式和工作任务与直接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或者在根据地工作的组织不同，与在国统区城市的党组织比较接近，但仍有一定差别。他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设立机关、沟通联络、广交朋友、搜集情报、积蓄力量，在可能的条件下以人力物力支援内地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他们不是直接投身这场斗争，也不是要在澳门从事推翻澳葡当局的斗争。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进入抗战以后，中共澳门党组织是基本完成了上述任务的，一些方面还是较为出色的，是符合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在这类环境中党组织的工作设想的。

---

① 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 3 卷，411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② 欧初：《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见《炎黄春秋》，1995 年第 11 期。

③ 谢常青：《马万祺传》，161 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引用及参考书目

1. 刘子健、叶文益主编：《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 黄鸿钊：《澳门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

3. 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

4.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5. 《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6.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7. 钟卓安：《陈济棠》，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

8.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概况》，台北：学生书局，1996。

9. 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10. 《杜聿明将军》，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11. 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13.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4. 周鼎培等：《过去的学校》，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

15.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3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6.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7。

17. 叶文益：《广东革命报刊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18. 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19. 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20．吴志辉等编：《广东货币三百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21．张正、冯鉴川等：《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3卷，抗日战争时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22．（伪）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广东省政概况》，1942。
23．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纪述》，1946。
24．张深切：《广东台湾独立革命史略》，台中：中央书局，1948。
25．广州市政协文史研究馆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26．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27．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8．《广州抗战纪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29．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迹图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
30．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1987年印刷。
31．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32．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33．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卷（大事记），第13卷（军事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
34．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3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36．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怀念张文彬》，1998。
37．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38．邹鲁：《回顾录》，长沙：岳麓书社，2000。
39．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4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1938年7—12月，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
4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1945年8—9月，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
42．（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43．《今井武夫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4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台北：南天书局，1994。
4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46. 李葆定等：《柯麟传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47.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48.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4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50. 张宪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51. 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硕士论文。

52.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1985年印刷。

53. 张深切：《里程碑》，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

54.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

55. 《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56. 广东吴川县政协编：《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1988年印刷。

57. 谢常青：《马万祺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58.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9.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0. 黄秋耘，夏衍，廖秋沙，等：《秘密大营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61. 王成斌：《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62. 黄仲文：《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

63. 湛江市党委研究室编：《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64. 逄复主编：《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65. 广州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66. 《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

67. 广东省海南区委党史办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1986。

6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中译本。

69. 夏琢琼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70. 莫世祥等：《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纪实》，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

71.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72. 广东省档案馆：《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7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74. 孙科：《三民主义新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75.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省港抗战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76. 洪流主编：《石辟澜》，广东党史资料丛刊专刊，1993。

77. 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

78. 《孙科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79. 《孙科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印行。

80. 黄菊艳：《损失与重建——抗日战争与广东经济》，中山大学历史系2000年博士论文。

81.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82. 《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

83. 王晓波：《台湾史与台湾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84.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史》，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9。

85. 林忠：《台湾光复前后史料概述》，台北：皇极出版社，1983。

86.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0。

87. 《台湾社会运动史》，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

88.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特支十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89.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90. 黄朝琴：《我的回忆》，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

91. 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记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92.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93．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4．王正之：《西江间谍战》，广州华美文化艺术研究社，1946。

95．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北京：三联书店，1980。

96．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9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9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中华书局，1985 年中译本。

99．《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100．邓开颂、陆小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01．广东韶关市委党史办编：《粤北抗战资料选编——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专集》，1985。

102．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印：《战时粤政》，1945。

103．程思远：《政海秘辛》，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

104．《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5．黄振位：《中共广东党史概论》，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94。

10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07．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08．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109．杨克林、曹红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

11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中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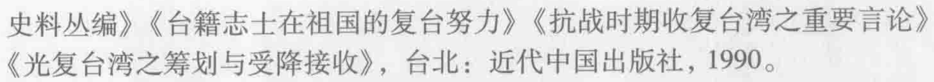
111．孙科：《中国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112．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113．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4。

114．《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3 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

115．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



史料丛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

116.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中译本。

117.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1946。

118.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 2 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19.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第 3 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2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122.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 3 编，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3. 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辑：《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图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

124. 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125.《新华日报》（重庆），《大公报》（重庆、桂林），《中央日报》（重庆），《中山日报》（韶关），《中苏文化》（重庆），《广东省政府公报》，《新华南》，《新战线》，《救亡呼声》。

126.《广东文史资料》《广东党史资料》《广州文史资料》《革命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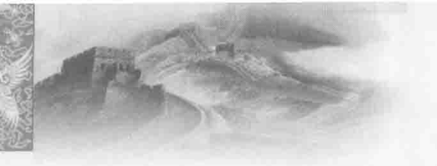
127.《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台湾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广东社会科学》《广东史志》《学术研究》。

128.《近代中国》《传记文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29. 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130. “蒋中正档案”、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

131. 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



后 记

对于广东以至华南地区抗战史的研究，是我投入精力较多的部分，写过一些文稿，2004 年出版了《华南抗战史稿》。今年适逢抗战胜利 70 周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朋友提出愿意再出《华南抗战史》一书，我当然甚为高兴，也很感谢，乃在有限的时间根据新近公布的一些重要史料对文稿做了一些补充修订，其中主要是台北开放的“蒋中正档案”“朱家骅档案”和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以及广东省档案馆编辑、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

这次出版，经与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亚芳女士和责任编辑商量，又根据书稿内容选配了部分图片，这些图片主要选自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广州出版社，2006）；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广州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辑《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图录》（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等，恕不在书中一一注明。

这部书稿的完成，得到学术界许多前辈、朋友的关心，参阅了许多师友的研究成果，在此我必须提到的是：广东省社科院的方志钦、沙东迅、江中孝、黄淑娟；广州市社科院的杨万秀、汤爱民；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曾庆榴、官丽珍、袁小伦、叶文益、王涛；广东省档案馆的黄菊艳、郑泽隆、黄瑞金、赵修磊；广东省委港澳办的彭建新；澳门政府反贪局陈锡豪，等等。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尤其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杜继东处长，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张俊义、张丽等朋友；感谢台北的黄秀政、张力、潘光哲、吴淑凤等朋友，感谢他们热诚无私的帮助。王涛先生与本人合写了几节初稿；有几节的内容，因我缺乏研究，是根据曾庆榴、沙东迅、郑泽隆等先生和黄菊艳女士提供的论文编写而成的，虽然我在

注释中尽可能做了一些说明，但仍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在此还想特别加以强调。

书中的舛误和不足之处则完全应由我本人负责，我期待着各位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左双文

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区

2015 年 6 月

华南抗战史

HUANAN KANGZHANSHI



ISBN 978-7-5361-5356-1

定价：48.00元